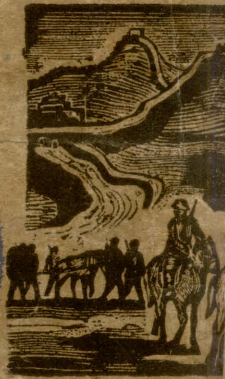


愛特伽·斯  
史家康等

# 長征

25000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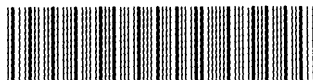
(足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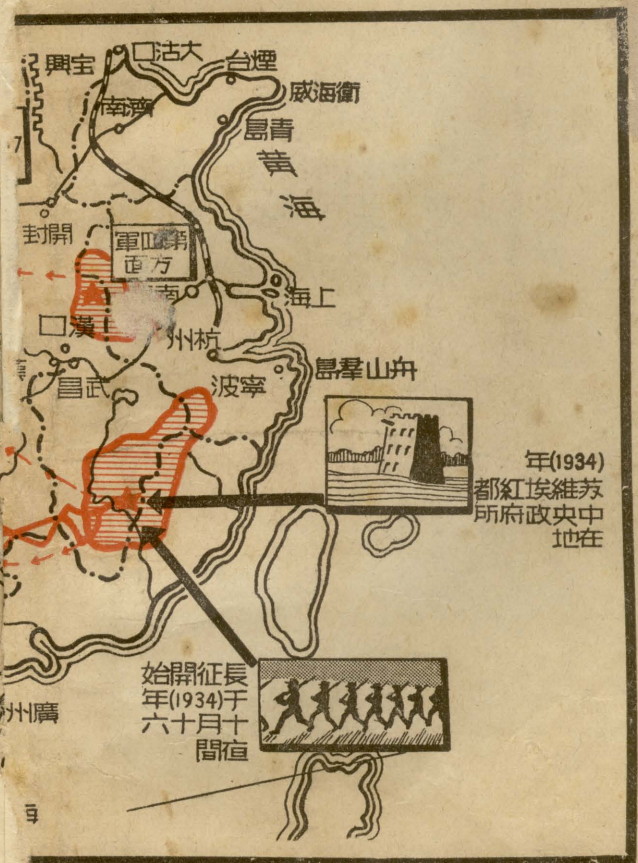
又名西行漫記

TAR OVER CHINA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1211B



# 重版序言

錢公俠

本書初版於一九三九年，距離現在，已經整整十年了。這個十年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極大的轉變。社會主義已經抬頭，資本主義開始沒落。整個世界如此，中國尤為明顯。回憶本書初出版的時候，日本正在侵略中國，帝國主義勢力在兩個矛盾的堡壘裏同樣氣焰逼人。人們爲了驅逐侵略者，忍受着反動政治買辦經濟的壓迫和剝削。然而也就在這個時候，西北却有一顆紅星，在黢黑的天空中閃閃爍爍，照耀一角。一般人們不大認識它，反動派則儘量封鎖它，不能封鎖便儘量誣蔑它。十年以來，侵略者被打倒了，反動勢力經過一個迴光反照的飛揚跋扈時期，也跟着崩潰下來，而至於煙消雲散。反之那顆紅星則逐漸從地平線上熠熠上昇，已經成爲普照於東亞大陸的太陽，使需要陽光的人民大衆歡欣萬狀，使久在黑暗中作惡多端的魍魎魍魎不禁驚慌失措。

人人愛解放軍，人人對於解放軍的成就感到又快樂又驚奇。這分驚奇是可以諒解的。解放軍是憑了什麼能夠達到今日的呢？他們如此之驍勇善戰，不可征服，他們遭遇過無數次的攻擊，封鎖，遭遇過幾乎不可抵抗的鹽荒，飢饉，疾病，瘟疫，以至於美國貨的飛機，大砲和兵艦，而竟能一一加以克服，終於得到今日的勝利，決不是沒有來由的。在反動派統治之下，二十餘年來，要做一個共產黨員或者做一個同情共產黨的人，就有死罪，而且的確有上萬這樣的人被處決了。可是仍舊有千萬的青年，不顧生命的危險，在參加這個隊伍，來從事英勇的反抗。這是什麼緣故呢？究竟有什麼強大的力量可以鼓

勵他們不顧生死堅持這種政見而鬥爭到底呢？

解放軍的經歷和由來，是一連串難以索解的問題。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該將史諾這部『長征』細讀一過。這是二十世紀一個古老民族用血與肉寫出來的史詩，讀了這史詩，我們不但可以恍然於解放軍之有今日的所以然，而且可以欣然於認識這古老民族動脈中所流的新鮮的血液，以至於他的光明前途的必然。

我們今日將此書重版，一則以迎接解放的事實，一則以貢獻於所有解放了的人民大眾之前，用爲同聲的歡呼與號召。

一九四九年六月九日。

# 目次

## 第一章 尋求紅色的中國

- 一 一串沒有回答過的問題……………一
- 二 到西安去的慢車……………七
- 三 大漢的子孫……………一四
- 四 通過紅色的大門……………二四

## 第二章 赴紅都之路

- 一 被『民團』追逐……………三五
- 二 叛徒……………四一
- 三 賀龍特寫……………四九
- 四 紅色伙伴……………五五

## 第三章 在保安

- 一 蘇維埃的巨頭……………六一

二 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七一
三 論對日戰爭	七九
四 共價兩百萬元的許多腦袋	八九
五 紅色劇社	九五

## 第四章 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

一 童年時代	一〇五
二 長沙時代	一一七
三 革命的前奏	一二八
四 國民革命時代	一三五
五 蘇維埃運動	一四一
六 紅軍的生長	一五〇

## 第五章 長征

一 第五次圍剿	一六三
二 整個國家的遷移	一六八
三 大渡河上的英雄	一七三

四 通過大草地……………一八〇

## 第六章 西北的紅星

一 陝西蘇維埃的開始……………一八九  
二 死亡與捐稅……………一九四  
三 蘇維埃社會……………二〇〇  
四 貨幣的解剖……………二〇九  
五 生活在五十歲開始……………二一六

## 第七章 到前線去的途中

一 和紅色農民的一夕談話……………二二三  
二 蘇維埃工業……………二二九  
三 『他們唱得太多』……………二三四

## 第八章 在紅軍中(上)

一 『真』的紅軍……………二三九  
二 彭德懷給我的印象……………二四六



三	爲什麼變成一個紅黨	二五一
四	游擊戰的戰術	二五七
五	紅色戰士的生活	二六四
六	政治集會	二七〇
<b>第九章 在紅軍中(下)</b>		
一	紅色陶工徐海東	二七九
二	階級鬥爭在中國	二八六
三	四匹大馬	二九三
四	回教徒與馬克思主義者	三〇一

## 第十章 戰爭與和平

一	再談四馬	三〇七
二	『小紅鬼』	三一—
三	實踐中的『聯合陣線』	三一八
四	關於朱德	三二六

## 第十一章 回到保安去

一	途中所見	三三七
二	保安的生活	三四二
三	蘇俄的影響	三四六
四	中國的共產主義與共產國際	三五一
五	告別紅色的中國	三五六

## 第十二章 回到白區

一	叛變的序幕	三六三
二	蔣介石的被扣	三七二
三	蔣張與共產黨	三七九
四	『針鋒相對』	三八九
五	破鏡重圓	三九五
六	未來展望	四〇〇

## 第十三章 旭日上的暗影

一	論日本的戰略	四一五
二	紅軍的迎擊	四二四

三	游擊戰爭的展開·····	四二九
四	不可征服的中國·····	四四〇
五	日本財政上的危機·····	四四九
六	中國戰略的展望·····	四五七

# 第一章 尋求紅色的中國

## 一 一串沒有回答過的問題

在我僑寓在中國的七個年頭裏，曾經有許多人向我提出問題，其中最難回答的是關於中國紅軍蘇維埃，以及共產運動的問題。一般好事的黨人們，極願意回答你的，因為他預備着一大串製成的答案，隨時可以提供給你，惜乎這一串答案是很難使人滿意的。因為他們這些答案從何面來的呢？他們既然沒有親自到過紅色的中國？

其所以不能回答的原因是，那紅色中國的經歷是世界上最神祕最難索解的一篇史詩。事實是如此的，那些天國的紅軍的所在地是世界上最人口最多的老大國家的中心，他們在那裏奮鬥了九年，在這九年之中，他們的所經所遇，外界無從知道，因為他們與世界之間，有一道比石建的堡壘還要堅固的防線，這一條防線就是新聞封鎖線。一座由幾萬敵軍造成的活動長城始終包圍着他們，所以要進入他們的區域，是難於上青天的。自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國第一蘇維埃在湖南東南部的茶陵地方成立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人自願穿過這座長城，再回出來把他的所見所聞記載下來。即使是最最簡單的幾個問題，也是言人人殊的。有些人竟根本不承認紅軍這件東西的存在。他們以為就是有的也只是幾千飢餓的土匪而已。又有些人不承認有所謂蘇維埃的存在，以為那不過是共產黨的宣傳作用，是憑空虛構出來的。然而另外對於紅軍表同情的人，卻極力稱頌紅軍和蘇維

埃，以為若要解除中國的一切禍患，非他莫屬。在這樣絕對相反的言詞中，要使一般求真理的人得到真確的報道，是難乎其難的事。這裏有一串沒有回答過的問題，是凡關心東方政治和它的劇變歷史的人都要感到興味的。

中國紅軍不是一個有主義的馬克斯革命者集團，經過一種統一的綱領訓練過，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指揮的呢？如果是的，那末他們的綱領是什麼呢？共產黨方面自命其鬥爭目的是土地革命，是反帝是蘇維埃式的民主，是民族解放等等。而南京方面，卻說紅軍只是由「知識匪徒」所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和匪賊。究竟誰對誰錯？還是雙方都對的呢？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產分子是正式得國民黨容許合作的，但是就在同年的四月，著名的「清黨運動」就開始了。於是共產黨員，以及無組織的過激知識分子，上萬有組織的工農分子，都被當時的右派政變領袖加以大規模的屠殺。從那時起，要做一個共產黨員，或做一個同情共產黨的人，就有死罪，並且的確有上萬這樣的人被處決。可是仍有上萬的青年繼續冒險做這樣的人。有數萬的工、農、兵與知識分子加入了紅軍，和南京政府的軍事獨裁相對抗。這是什麼緣故呢？究竟有什麼強大的力量可以催迫他們不顧生死要堅持這種政見呢？究竟國共兩黨之間的根本爭點是什麼呢？

總之，中國的共產黨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團體呢？他們和別國的共黨或社會主義者有什麼相同之處，什麼不同之處呢？而且各人所要問的着眼點也不同。一個好奇心重的遊歷家所提出的問題，是他們是不是留着長鬍子，他們喫湯的時候是不是有呷呷聲，是不是在公文皮包裏帶着用土法製造的炸彈等等。至於比較要求真的人，則問他們是不是「道地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有沒有讀過資

本論和列寧的著作？他們有沒有真正社會主義的經濟計畫？他們是史太林派，還是托洛茨基派？或者兩者都不是？他們的運動是不是世界革命之一部？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或者不過是「莫斯科的工具」而已，抑是不是抱着爲中國的自由獨立而鬥爭的大願的民族主義者？

紅軍的戰士們戰鬥得如是之長久，如是之驍勇善戰，而且——各種膚色不同的觀察家都已承認了，就是蔣介石將軍自己的部下也已暗中承認了的——如是之難以征服——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人呢？誰使他們那樣戰鬥的呢？誰支持着他們的呢？什麼是他們所倡導的運動的革命根據呢？他們之如是難以相信的頑強，究竟是怎樣的希望，怎樣的目標，怎樣的夢想，驅使他們的呢？——說他們難以相信的頑強，是和另一方面的中國的妥協態度比較而言的；因爲他們曾經經歷了無數次的戰仗，受過無數次的封鎖，遭到過鹽荒，飢饉，疾病，瘟疫，而最後演出了那不朽的六千英里的「長征」，歷過行省十二，衝過國民黨軍隊的截阻數千重，結果終於得到勝利，在中國的西北方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新根據地。

他們的領袖是誰呢？他們是不是曾經受過教育的人，是不是對於一種理想，一種觀念形態，和一種學說抱有熱誠的信仰？他們是社會上的先知先覺，還是不過是徒然爲着生存而鬥爭的無知農民？例如那毛澤東，他是南京名冊上的第一號「赤匪」，曾經懸賞二十五萬元緝求他的首級，或是活擒他的，他到底是怎樣的人？那個價值如是之高的首級，究竟有一些什麼東西在裏面？或是如南京官方的公布，毛澤東真的已經死了嗎？又如那朱德——被稱爲紅軍總司令的——他的生命在南京看來有同樣的價值的，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還有那個二十八歲的紅軍戰術天才林彪，他的著名的紅軍

第一集團軍是從來沒有喫過敗仗的，他也是怎樣的人？他是從那裏來的？還有其他許多紅軍的領袖，屢次報告說是死了，可是後來又在報紙上重現，絲毫無恙的在指揮着新的軍隊和國民黨對抗，他們又是些怎樣的人呢？

九年以來紅軍對於比他們優越萬分的軍事集團對抗而造成了驚人的紀錄，這究竟應該作何解釋呢？沒有南京方面所可以利用的大工業根據地，大砲毒瓦斯飛機錢以及近代技術，而紅軍勢力如何能夠依然生存，並且還擴大起來呢？他們所用的是怎樣的戰術？這些戰術是怎樣學習得來的？是誰教他們的？是不是他們中間有俄國的軍事天才在幫助？誰在主持謀略，不但勝過了南京派去的那些國民黨司令，並且勝過了蔣介石以重金禮聘來的外國軍事顧問們（這一個軍事顧問團是由曾經做過德國希特勒國防軍領袖的西克脫將軍領導的。）

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那些農民們支持它嗎？假使不，它是什麼組織起來的？紅軍在他們的佔領區域內將「社會主義」推行到怎樣的程度？為什麼紅軍沒有佔領大都市？這是不是就可以證明紅軍並不是一種由真正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運動，而根本只是一種農民的反叛呢？總之在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還停滯在農業時代，工業狀態即使不患小兒癩瘡症，也還是穿着嬰孩的衣服，要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是怎樣可能的呢？

又，紅軍是怎樣穿怎樣喫怎樣玩怎樣戀愛怎樣工作的？他們的婚姻法律是怎樣的？婦女是不是如國民黨所宣傳的那樣「公有」的？所謂中國紅色工廠是怎樣的？紅色的劇團是怎樣的？他們如何組織他們的經濟財政他們的公共衛生娛樂教育以及「赤色文化」是怎樣的？

紅軍的軍力如何？真如共產國際宣傳刊物所誇說的有五十萬人嗎？假使是的，他們爲什麼不  
到政權呢？他們的軍火是從那裏來的？他們是不是有紀律的軍隊？他們的士氣怎麼樣？他們的軍官和  
士兵的生活真是平等的嗎？假使蔣介石將軍在一九三五年已宣佈南京已經「根除了赤禍」，那末，  
一九三七年時紅軍佔有了中國在軍事上最有利的西北的一整塊地，比前更大的地面，這事實又將  
怎樣解釋呢？假使紅軍真的是完了，那末日本對中國提出那著名的廣田三原則，爲什麼有一項說要  
南京加入日德的防共協定，以「防止東亞的赤化」呢？紅軍是真正反帝國主義的嗎？他們真要對日  
抗戰嗎？在這戰爭中，莫斯科會不會幫助他們？或者，如那著名的胡適博士神經過敏地對他在北平的  
興奮學生所說的，他們那種熱烈的抗日口號不過是一種把戲，要博取大眾的同情的無辦法中之辦  
法，是一班惡化漢奸和匪徒的最後呼聲，這是真的麼？

中國共產黨運動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前途是怎樣的？它的歷史的發展是什麼？它能成功嗎？這  
種成功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對日本有什麼意義？這巨大的轉變對於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會發  
生怎樣的影響？它在國際政治上在世界歷史上會得引起怎樣的變化？它對於英美及其他各國在中  
國的巨大投資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實在，紅軍有沒有「對外政策」的？

最後，共產黨倡導的在中國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是什麼意義？

在非共產黨的觀察家裏面，竟沒有一個人能夠對這些問題給以可靠的正確的回答，或是根據  
親身的視察而作一些事實的報告，這似乎是很可笑的。因爲這個故事在一天一天的增加它的興味  
和重要性，而且所有的新聞記者也差不多都已承認這是中國絕無僅有的故事了。然而我們對於



這故事的知識却又如此之貧乏，因為在「國軍區」裏要和共產黨人接近，是萬分困難的事情。

那些頭頂上懸掛着死刑的共產黨人，無論有禮或是無禮的地方，都是不肯自己承認是共產黨的。即使在外國的租界裏，南京也僱用着一批薪俸很高的偵探在那裏工作，其中所包含的，竟有如吉文斯（C. Patrick Givens）那樣機警的人物。他是從前上海公共租界英國警務處裏偵緝赤黨的探長。探長吉文斯每年要逮捕到幾十個共產嫌疑犯，年紀大都在十五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的，這一些犯人由國民黨的當局從租界裏引渡過去之後，便是監禁或處決。到了一九三四年，他的大功竟然爲南京當局所賞識，贈給他一塊彩玉勳章，並且一筆可觀的現金特賞。可是他不過是受南京僱用以偵探中國過激青年的許多外國偵探之中的一個而已。

我們都知道，要想知道一些紅色的中國實在情形，唯一的辦法是跑到那裏去一趟。但是我們總是推諉着說「沒有法子去。」也曾有過幾個人嘗試而失敗了。於是大家相信這事是不可能的。大家都以爲進入了紅區裏去之後是不能夠再活着出來的了。這就是多年反共宣傳的效力，因為在中國報紙之受檢查與統制，其嚴格程度是不下於德國或意大利的。

後來，在一九三六年的六月裏，我的一個中國的密友，帶給我一個關於中國西北政治局勢的可驚異的消息——這一個局勢後來竟造成了蔣介石將軍之被禁西安以及中國現代史之全部轉變。但是與這一個消息同來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消息乃是有一個方法可以進入蘇區去。並且要立刻就去。因爲那機會是千載難逢，萬不能交臂失之的。我於是決定下來，要嘗試去打破那有了九年歷史的新聞封鎖。

我此去的確是有相當危險的，不過後來新聞紙上報告我的死——「被土匪所殺」——未免太誇張了一些。但是這許多年來，那些受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正充滿著關於紅軍的恐怖故事，我那一番前去當然是沒有什麼可以鼓舞我的確，除了一封給蘇維埃主席毛澤東的介紹信之外，我實在一無所有。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他。要經過些什麼艱險困難？我不知道。但是在這多年的國共的戰爭裏面，千萬條生命已經犧牲過了。那末以一個外國人的頭顱去換取關於這事的所以然的知識，還有更值得的事嗎？我自己也知道這樁事情是和頭顱有出入的，但是我的結論是，這代價並不太高。

在這樣興奮的心境之下，我出發了。

## 二 到西安去的慢車

正是六月初頭的時節，北平城裝飾着綠色的春之花邊，它那無數的楊柳和古柏，使得那紫禁城成了一個奇異迷幻的地方，且在那許多陰涼的園子裏，要相信那些宮殿的金碧輝煌的屋頂之外，竟還有那勞苦飢荒革命和受外國侵略的中國，似乎是不可能的事。那些飽食終日的外國人住在他們自己那精緻的地面裏，享受着威士忌酒和蘇打水，馬上球，網球和閒談，竟可以快樂得全不覺得那大城市靜默絕緣的城牆外的人間脈搏——有許多人確實是如此的。

然而，在過去一年裏面，就是北平那樣的綠洲裏面，也已被瀰漫在全中國的鬥爭空氣所侵入了。日本人侵略的威脅，已經惹起了民衆的大示威，特別在那些被激怒了的青年。就在那時的幾個月以

前，我曾經站立在那飽經變患的內城城牆下，看見上萬個學生在那裏集合，不顧憲兵的棍棒，喊着一種偉大的合唱：「一致抗日！拒絕日本帝國主義！分離華北的要求！」

其時中國紅軍企圖通過山西，出兵長城，號稱要對日作戰，收復失地。頓時北平起了反響，差不多使北平一切防衛機關無所施其技了。這種有些近乎狂妄的出兵，是被蔣介石將軍的十一師新式精銳部隊所阻止了，但是阻止不了那些愛國的學生，他們不顧監禁和處決，羣集到街頭去喊那被禁的口號：「停止內戰！和共產黨合作抗日救中國！」

有一天夜半，我爬上了一節破舊不堪的火車，身上覺得有點不舒服，可是十分的興奮。興奮的原因是因爲在我前面放着一條探險的旅程，和紫禁城的中古光輝時間上相隔數百年空間上相距數百哩的地方。我是要到「紅色的中國」去。而所以覺得「有點不舒服」則是因爲我身上種過了一切的預防疫苗之故。我當時的血液如果拿到顯微鏡底下去檢查一下，便可看出裏面有一個烏合之衆，因爲在我的臂上和腿上，我已經接踵注射了天花、傷寒、虎列拉、霍亂、瘧疾、瘋疫的病菌。這五種病症，在西北正是流行着，而且最近有驚人的報告，說陝西省內還蔓延着黑死疫，地球上只有少數幾處地方有了。

我的第一目的地是西安——是「西方平安」的意思。西安是陝西省的省會，離北平有兩天兩夜倦人的火車路程，那裏便是隴海路西端的終點了。我的計畫要從那裏再向北進入佔着所謂「大西北」中心的蘇維埃區域。有一城市叫洛川，在西安北面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在當時是陝西赤區的起點。凡在洛川以北的，除了公路幹線有幾個地段，及下文將要講到的幾個地點而外，都已經染成

了赤色，南至洛川，北及長城，東西則以黃河爲界，成了赤區的粗略的疆界。那條挾着黃土的大河從西藏的邊境流出，向北流過甘肅和寧夏，越長城而達內蒙的綏遠。然後向東紆廻行了許多英里，重又折而向南，穿過長城而成了陝西、山西兩省的分界線。

當時蘇維埃統轄的地方，就在爲中國之大禍的大河的河套裏——包括陝西的北部，甘肅的東北部，與寧夏的東南部。真是歷史上的一個奇蹟，這一個區域恰好和中國誕生地的最初境界差相符合。數千年之前，中國民族就在這相近的地方，形成了她民族的雛形。

第二天早晨，我在車上觀察我那些同行的同伴，看見一個青年和一個道貌岸然的白髮老者，坐在對面嚼着苦茶。不久，那個青年和我說起話來，先是客套，後來自然而然的談政治了。我發見了他的叔丈人是一個鐵路上的職員，他乘車是免費的。他是在回到他四川去，是離開已經有七年了的故鄉。不過他不能斷定此番回去究竟能不能找到他的老家。因爲據說那裏附近有土匪在活動。

『你是說紅軍嗎？』

『哦，不是紅軍，雖然四川紅軍也有的。不，我是說土匪。』

『可是紅軍不就是土匪嗎？』我出以好奇心問他。『報紙上常常稱他們赤匪或共匪的。』

『唉，可是你得知道，那些編輯先生不能不如此啊，因爲南京命令他們這樣稱呼的，』他解釋說。『假使他們稱爲共產黨或是革命黨，那就證明他們自己也是共產黨了。』

『但是在四川地方，人家對於紅軍不是和對土匪一樣怕的嗎？』

『這個麼，也不能一概而論。有錢的人是見他們怕的，還有地主、官吏和收稅人，是怕的。可是農民

並不見他們怕。有時候他們還要歡迎他們。」說到這裏，他向着坐着的老者瞟了一眼，因為那老者正在一本正經的聽他，卻又裝做並不在聽的樣子。「你看，」他繼續道，「農民們太愚蠢了，他們不了解那些紅軍的目的是要利用他們。他們以為紅軍真是言行一致的。」

「那末他們所說的話都不是當真的了？」

「我父親寫信給我，說紅軍在松潘地方禁止重利盤剝，與吸鴉片，並且在那裏把土地重新分配過。所以你看，他們並不是真土匪。他們的主義是不錯的。可是他們都是壞壞子。他們人殺得太多了。」說到這裏，那白鬚老者忽然抬起他那慈和的臉，用着含養甚深的樣子，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殺不夠。」我和那青年兩個人聽了，不由得向他一呆。

不幸火車已將近鄭州了，在那裏我要換上隴海車，因而不得不中止我們的討論。可是自從那時起，我心裏一直疑惑着，不知是什麼真憑實據使那一位儒者風度的老人，維持他那駭人的論據。第二天一整天，我坐的火車，是一種很舒適的新車輛——在河南、陝西兩省地面的黃土山上很慢地爬行，直至滾上了西安的那個新建的美麗車站，我還一直在懷疑着。

一到了西安，我就去拜訪陝西綏靖主任楊虎臣將軍。這位楊將軍是那些未被紅軍管轄的地帶的獨霸的皇帝。他本來是土匪出身，後來經由中國許多能幹領袖所走的那條終南捷徑達到了權位，而且據說就經由那條同樣的大道發了照例的大財。但是最近，他却不得不把他的權力分一部份給西北其他一些大老們去了。因為在一九三五年，那位從前統治滿洲的「少帥」張學良率領他的軍隊到陝西來，在西安就任了最高的紅軍征勦者——國民政府勦匪副司令。而為監視這位少帥起見，

又來了蔣總司令的親信邵力子。這位邵老先生便是陝西省政府的主席。

在這幾位人物——還有其他一些——之間，是維持着極精密的均勢的。至於在他們的背後牽線的，就是那位可敬可畏的蔣委員長，他要伸張他的權力到西北去，不但想要肅清那正在掙扎中的蘇維埃民主政治，並且要同時解決老楊虎臣和青年張學良的軍隊，便運用着叫他們自相排擠的單純手段——一本政治軍事大戲劇裏面的三幕戲，蔣氏分明相信只有他自己懂得那其中的奧妙。可是他是估計錯誤了，同時在進行上也不免稍嫌操切，又未免把對方看得太笨，因而幾個月之後，蔣氏他自己竟同時做了他們三方面的階下囚，關於這驚人的蔣氏被劫的一幕，以及它如何把中國的歷史導引到新的方向去，我在後文將要敘述。

我會見楊將軍是在一所新建的石頭大廈裏，那大廈的造價是五萬元。可是他住在這所有許多房間的大廈——就是綏靖主任的官舍——裏卻只是孤零零一個人。原來楊虎臣同在這過渡時代的許多中國人一樣，有着家庭不和的困難，因為他有兩位夫人。他的第一位夫人是他年青時娶的三寸金蓮的女子，是他父母在浦城給他配的親。第二位夫人則是正如蔣介石夫人一樣是一位活潑而勇敢的女人，年輕貌美，已經做了五個孩子的母親，既摩登而又前進，據說從前做過共產黨，是楊將軍自己選擇的。據教士們說，當楊將軍置辦他的新家庭的時候，兩位夫人都曾向他提出相同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她們彼此相互妒忌，因為兩方都曾替他養過兒子，都有權利做正夫人，於是兩方都不願意搬到石建大廈裏去住，除非對方一個不住在裏面。

在一個局外人看來，這件事情是很簡單的：最明顯的解決辦法，就是離婚或是討第三位太太。可

是楊將軍還沒有下這樣的決心，因而還是孤零零一個人住着。他這種左右爲難的局面，在現在的中國也並不是少見的。常蔣介石將軍和那位富有的受過美國教育的基督教徒宋美齡女士結婚的時候，也曾逢到過相同的難局，解決辦法是對兩位舊式的太太供給贍養金。這一種解決辦法是爲一般常替他靈魂祈禱的教士們所贊許的。然而這種由西方輸入的新思想仍舊有許多中國人看着要皺眉頭。至於平民出身的楊將軍，則對於怎樣處置靈魂的問題，大約是不如對於祖宗的傳統那樣關心的。

而且我們不可以想楊將軍是土匪出身，就沒有做領袖的資格。在中國是不能作這樣的假定的，因爲青年時做過土匪的人，往往就表示他是一個有強毅的性格和志氣的人。你如果看看中國的歷史，你就可以發見中國有好些最能幹的愛國志士，都是曾經做過著名的土匪的人。事實上是如此：有多數惡貫滿盈的匪徒、流氓和漢奸，拿恭敬的容貌，和孔子格言中那種朽腐的偽善，以及中國經典的教士恐民術爲護身符，漸漸達到有權有勢的地位。這種情形，即使在現在也還是差不多的。

楊將軍在大多數外國教士當中，名譽素來不大好，足見他總還不會裝腔作態，倒算不得一個真小人。從他一生的革命歷史來說，他的身分是一種粗暴的農民，他從前也許曾經做過高遠的夢，夢見他的世界裏有一個大大的變化，但是他一旦大權在握，卻想不出一點兒辦法，而且聽了他周圍一班人的勸告，漸漸覺得厭倦而昏亂了。不過即使他有過這樣的夢，他也不肯傾吐給我聽的。他不願意和我討論政治問題，便很客氣地派了他的一個祕書作代表，陪我參觀城裏各處地方。又當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正害着很厲害的頭痛和風濕症，所以在這個時候，我也不便打攪他了。相反地，我對於他這

種左右爲人難的僵局，倒是十分同情的。所以經過了一段簡短的訪問之後，我就很識相的告退了，再去見那可敬的邵力子主席，從他那裏去找尋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寬敞的衙門的花園裏接見我，當時我正從西安灰塵撲面的街道的熱炎下奔波過來，所以覺得分外涼爽安適。我曾經在六年之前見過他，那時他是蔣介石的私人祕書，我會因他的助力而得見總司令。從那時起，他就在國民黨裏很快地加官進爵起來。他是一個能幹的人，很有學問，現在總司令是委以省主席的榮譽職位了。但是可憐的邵主席也同其他許多非武人的主席一樣，權力不出那省會的灰色城牆之外——城外的地方是楊將軍和張少帥所分着的。

說出來也許要覺得無禮，就是這位可敬的邵先生自己也曾一度做過「共匪」的事實上他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辦人之一。但是我們也不能過分苛責，因爲在那時，做共產黨是十分時髦的事，而且也沒有人確切明白所謂共產也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知道所有的漂亮的青年人都是共產黨罷了。後來邵先生就脫了黨，因爲一九二七年之後，一切明白了，原來做共產黨是要腦袋搬家的。自此以後邵先生成爲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一心頂禮，從來未表示過異心。

『現在那些紅軍怎麼樣了？』我問他。

『所餘無幾了。在陝西的不過是些殘餘部隊罷了。』

『那末戰事還是繼續着嗎？』我問。

『不，現在陝北沒有什麼戰事。紅軍都移動到寧夏和甘肅去了。他們似乎在想和外蒙方面取得聯絡。』



然後他把話題移到西南問題上去。因為當時那邊有幾位反叛的軍長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問他，他以為中國應不應該和日本開戰。『我們能戰嗎？』他反問我。於是，那位虔信佛法的主席便把他對日本的意見對我說了，不過叫我不發表——正和每一個國民黨的官吏一樣，談起了對日的意見，總是叫你不要發表。

這一次訪問的幾個月之後，可憐的邵主席就爲了對日戰爭的問題，被張學良部下的一些反叛青年將他和總司令一起禁閉起來，爲了那些青年人不肯再跟他講理，也不肯再忍耐那一句「也許有一天」的那個滑頭答覆了。當時他那位矮胖的夫人——一個莫斯科留學生並且曾經做共產黨——則被一部分暴動者困在一個角裏，奮勇抵抗着他們的逮捕。

可是在我們那一次談話的時候，他絲毫沒有洩露出什麼預感來，其時我們的意見也交換到似乎可以同意了，我就告辭。當時我所要知道的事，已從邵力子那裏問到了。他已證實了我的北平朋友所報告的消息，陝北方面的戰爭確已暫時停頓着。所以我知道，如果部署得宜，到前線去是頗爲可能的了。我就着手預備起來。

### 三 『大漢的子孫』

我到西安之後大約六個月，那西北的危機終於爆發了，其突兀是任何人所不能意料的，到那時，全世界人才戲劇地知道了在張學良部下的大軍和他以勦匪軍副司令的資格去勦的那些「土匪」之間有驚人的聯合，但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間，外間對於這些驚人的發展還是蒙在鼓裏，即使在西

安統轄警察的蔣介石自己的那些藍衫憲兵隊的大本營裏，也沒有一個人知道事情究竟是怎樣在發展着。當時有三百以上的共產黨被拘禁在西安獄中，而藍衫隊還繼續在那裏追捕。一種極度緊張的空氣籠罩着。間諜和反間諜到處都是。

現在，關於那些緊張日子的情形是不必再加隱蔽了，所以我把當時所得的祕密在這裏宣露出來。

我未到西安以前，我從沒有見過紅軍裏的人。那個在北平用隱跡墨水替我寫信介紹給毛澤東的人，我知道是一個紅軍司令，但是我們從沒有見過面。那封信是由一個第三者——一個老朋友——交給我的。除了這封信之外，我另外還有一個希望可以同西北方面發生接觸。他們吩咐我一到西安之後，只要在一個旅館裏開個房間，就會有一個自稱姓王的人來找我，可是這個姓王的，我是素昧平生的。他們允許我，這個姓王的會得替我想辦法，借用張學良的私人飛機把我送到蘇區裏去。

我在西安旅館裏住幾天之後，果然有一個身體魁梧而相貌莊嚴的中國人，穿着一件灰色綢長衫，走進我的房間來，用極漂亮的英語招呼我。他看上去像一個得發的商人，但是自稱姓王，說出我的北平朋友的名字來，因此我知道他正是我所等待的人。

在此後一星期裏，我發見就只是這姓王的一個人，我已經算不虛西安之行了。我每天要費上四五個鐘頭，聽他講述他的新聞和舊事，以及比較正經的關於政治局勢的解釋。他到這裏來，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他從前是在上海一個教會學校裏受教育，在基督教徒當中頗有聲望，並且主持過一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共產黨裏面都叫他王牧師的。正和上海許多成功的基督教徒一樣，他是青幫中的一

員，上自蔣介石，下至杜月笙，他一概都認識。曾經在國民黨裏做過高官，可是雖在現在，我還不便宣布他的真名字。

王牧師辭棄了教職和官爵之後，在紅軍裏面工作了好多時。確實多少時期我不知道。他負的任務是一種祕密的非正式的大使之類，爲共產黨奔走於各種文官武將之間，遊說他們那種「抗日聯合陣綫」的政策。至少在張學良方面，是成功的。要明白所以會達到那祕密的諒解的，那末非講一講背景不可。

誰都知道，張學良直到一九三一年爲止，是滿洲三千萬人民的獨裁軍閥，名氣很響，好賭，慷慨，思想摩登，喜打高爾夫球，吸食毒物。他這地位，是繼承他由那土匪出身的父親張作霖而來的，南京政府加以委定，給了他一個副總司令的名義。到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出兵征服東北，張學良的厄運開始了。當日本侵略發動的時候，張少帥正在北平協和醫院裏養傷寒病，他單獨是無論如何應付不了這個危機的。於是完全聽命南京和他那插血爲盟的「大哥」蔣介石總司令。但是蔣不顧代價的想避免戰爭，主張不抵抗，自動撤兵，依賴國聯，那時張學良既爲病魔纏繞，又太年輕（那時他還不過三十歲），缺少經驗，又爲一班腐敗無能的羣小所包圍，毫不遲疑地接受了蔣總司令的主張和南京的命令。結果，他差不多一槍不落地喪失他的老家滿洲，而此一番犧牲，卻使總司令在南京業已動搖的政權復趨穩定，而重新開始殲滅紅軍的戰事了。

如此這般，那在中國稱爲「東北軍」的大量滿洲軍隊就南入長城而進了中國本部。後來日本侵入熱河時，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彼時張學良並不在醫院裏，可是還是在的好。南京並不援助他，也

並不準備自衛。蔣介石爲避免戰爭，早已預備熱河失陷的，後來果然。但是張學良卻不得不裝傻瓜，身任其咎。其時爲抑平民衆的憤激起見，不得不有一個人引咎辭職，那當然張必居其一，結果是後者俯首告辭，跑到歐洲去「考察」了一年。

且說張在歐洲第一條要事，不是會見莫索里尼和希脫勒，也不是拜訪麥唐納，更不是要遊蘇俄而被拒，原來如此。他在那裏戒絕了吸毒的習慣。幾年之前，他正和許多中國武人一樣吸上鴉片過的。要想戒除煙癮，並不是易事，他根本沒有充分的時間作長期治療。可是有一位他素來信任的醫生，對他說可以用注射的方法戒除。後來，鴉片癮果然戒斷了，可是等他走了之後，張少帥却成了一位嗎啡吸食者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第一次見到張的時候，他是世界上最年輕的狄克推多，那時他的氣色看上去還是很好的。他人很瘦，面孔有些緊綁綁，彷彿害着黃痘病似的，可是他的頭腦銳敏而有力，他似乎頗有生氣，他是公然而決然地反日的，他急乎要造成一種奇蹟，把日本人逐出中國，而把滿洲現代化起來。數年之後，他的體格就差多了。有一位在北平的他的醫生告訴我，說他每天用「藥」要費二百金——那是一種特製的嗎啡，在理是可以逐漸戒除的。

但是在歐洲，張學良打了一次一勝仗。他立志戒除毒癮。當他一九三四年回中國來的時候，他的朋友們都高興而驚異。他體重增加了，肌肉也飽滿了，而孔上紅光煥發，看上去像是輕了十年年紀了。人們重新在他身上看見了他年青時做着那漂亮而有氣骨的領袖的痕跡。他素來具有一個敏捷而現實的頭腦的，現在他就給它一個發展的機會。在漢口，他又回復了東北軍的指揮權，那時東北軍已

調到華中去打紅軍了。他過去雖有過種種錯誤，但是他的部下仍舊很熱心地歡迎他回來，這也足見他的深得人心了。

張採行了一種新的日常生活——六時起身，運動，逐日的操練和讀書，食物簡單，作事刻苦，和他的下屬乃至那仍有十四萬人的軍隊的軍官們直接相接觸。一個新的東北軍開始出現了。懷疑派都漸漸相信這位少帥重又值得注意了，已經認真實行起他回國時所發的誓言：他要盡他畢生的力量去規復滿洲，爲中國人民雪盡恥辱。

這時，張對蔣也還未失去信仰。在他們兩人的全部關係中，他從來不會動搖過對這大哥的忠誠的。這位大哥的政權曾三次瀕於崩潰，都是因他而得救的。他對於大哥的主張和誠意一向深信不疑。他相信蔣介石已準備收復滿洲，再不肯無抵抗的失去領土。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的軍閥繼續他們的侵略，冀東的偽政權成立了，察哈爾的一部分被分割了，並且提出要求要分離華北，而南京也已大部分默認。於是，含有惡兆的不滿意，在少帥的軍官和士兵中表示着特別是他的部隊要調到西北去繼續向紅軍從事不滿人意的內戰，而對日本則反而一彈不發，這是他們所大爲不願的。

在南方把紅軍打了幾個月之後，這位少帥和他的一部分軍官們認識了一些重要事實：認識了他們的對敵所謂「共匪」也者，實際上是有能幹的愛國的抗日的司令們在那裏領導；認識了這個「勦共」的過程也許還有許多年數要延長；認識了勦共戰事如果繼續下去，抗日成了不可能的事了；又認識了當時的東北軍是很快的在普羅化了，並且經過了幾次全無意義的戰陣之後，漸漸的減少了，潰散了。

然而，當張把他的大本營移到西北去的時候，他對紅軍的戰事開始積極起來。並且一時確也得過一些成功，但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十月和十一月，東北軍幾次大敗，潰散了有整整兩師人（一百零一師和一百零九師）還有一師（一百十師）也散失了一部分。這些東北軍都投到紅軍那邊去了。有不少軍官被俘，受了相當時期的「抗日教訓」。

當這些被俘的軍官釋放回到西安來的時候，他們把關於蘇區的士氣和組織，很動聽地述說給少帥聽，特別是說到紅軍方面的停止內戰要求確是誠意的，他們要用和平民主的方法統一中國，要組成聯合陣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些話在張那裏是頗發生一些影響的。可是最重要的乃是從各師中傳來的一種報告，說他的部隊全部已經瀰漫着反對跟紅軍作戰的情緒；紅軍方面那種「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及「跟我們聯合起來打回東北去」的口號，已經傳染到全部東北軍的軍官與士兵裏面去了。

這期間，張本人深深感動了並且左傾起來。他的東北大學的大部學生已經跑到西北來跟他工作，其中一部分是共產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平提出要求之後，張派人到華北去放消息，說凡是反日的學生，不論政治信仰，都可以到西安去工作。這時候，各處的反日宣傳都要被南京所禁止，在陝西，卻得到鼓勵和保護。張部下的許多青年軍官，也都已受到了學生們的影響，所以當那些被俘的軍官回到西安，報告紅區裏面如何地在把抗日羣衆公開組織起來，以及紅軍如何積極地在把愛國思想灌輸到民衆之間去，張就開始認識紅軍乃是友軍而不是敵軍。

就在這期間，一九三六年的年初，那王牧師告訴我，說他有一天跑到張學良那裏去，一見他面便

說：『我此來非爲別事，是來向你借飛機到蘇區裏去。』

張一聽見這句話，霍地跳了起來，十分吃驚的拿眼睛向他瞋視着：『怎麼？你竟如此大膽來此作這樣的要求嗎？你知道這要斃命的？』

於是那牧師煞費心機地向他解釋，如何他跟共產黨方面有聯絡，而知道一些張所應該知道的事情。如何共產黨方面已經變更了政策，如何中國應該統一起來一致抗日，談到如何紅軍願意大大讓步，以期可以使南京政府受感動而抗日，因爲這一個政策，紅軍深知道他單獨負責是不能實現的。他又提議，關於這幾點，將來他可以設法使張和紅軍的領袖從詳商討。張爲了最初的當頭一驚，對於他的話都凝神細聽。他當初本來也會想過他可以利用紅軍，而紅軍方面也分明相信他們是可以利用他的。那麼剛好，他們二方在停止內戰和一致抗日的共同要求的基礎上，也許就可以互相利用起來罷。

那位牧師的要求竟成了事實，坐了少帥的私人飛機飛到陝北的延安（卽膚施）。他進入了中國的蘇維埃區，帶了一個議和的方式回來。不久之後，張學良竟親自飛到延安去，會見紅軍司令周恩來，兩人舉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詳細商討，結果張對於紅軍的誠意認爲可信，對他們那種聯合戰線的提議認爲健全可行。

這東北軍和共產黨協定第一步履行辦法，包括着陝西戰事的停止。雙方在沒有通知對方之前，都不得有所行動。於是紅軍派了好幾個代表到西安，換上東北軍的制服，加入張學良的幹部，幫助他在軍隊中改良政治訓練的方法。在王柱村地方辦了一個新學校，招收張的下級軍官在那裏上課，內

中有政治、經濟、社會科學，以及關於日本侵佔滿洲的歷史以及中國所受損失幾何等等詳密而有統計的研究。接着有數百思想急進的學生來到西安，進入了另外一個抗日的政治訓練學校，少帥自己也常常跑去演講。有一種從前蘇俄用過的，紅軍裏也用過的，像政治委員體制的東西，現在被東北軍採用了。一班由滿洲時代任用至今的具有封建思想的舊派高級軍官，都被淘汰了去，起而代之的是一班較前進較年青的軍官，對於這一班人，他是像是建造新軍的主要支柱一樣地看待的。當張從前做「浪子」時候包圍着他的一班腐敗的阿諛之流，現在也被排除殆盡，而代之以一班熱心嚴肅的東北大學學生。

但是這些變化，都是在十分祕密之下進行的。當時東北軍雖已和紅軍妥協，而晉、陝邊境，乃至甘肅、寧夏，都還有南京的軍隊，在那裏繼續苦戰。關於張學良跟共產黨的真正關係，報紙上一點兒也沒有洩漏。蔣介石的在西安的間諜們雖然知道有一種事情在那裏醞釀，卻無從得知詳情，並且也不知道性質如何。偶爾到西安來的車輛裏面載着紅軍的人物，可是他們都穿着東北軍的制服，那有什麼關係呢？至於偶爾有車輛從西安開到蘇區方面去，可是這種車輛很像是開到前線去的，所以也不會引起疑心。

我到西安不久，王牧師就來告訴我，說我要到前線去，就用這種車輛去。坐飛機去的計畫只能「取消」了，因為這件事在少帥一方面覺得太不方便，倘叫他的美國飛機師送了一位外國人到前線，而一去不返，那恐怕他們難免要把消息洩漏出去的。

一天早晨，王牧師陪同一位東北軍官——或是一位穿着東北軍官制服的青年——跑來找我，



提議坐汽車到西安城外的漢代古城去觀光。接着就有一輛掛着窗帘的汽車等在旅館門口。我上車後，看見角裏已經坐着一個人，戴着黑眼鏡，穿着國民黨官吏所穿的中山裝。我們隨即出城，到了漢代古宮的遺址，跨上了一個小丘，原來那便是赫赫有名的漢武帝當時坐在寶座上統治華夏的地方。在這裏，你仍舊可以拾到那二千多年前的古宮頂上殘瓦的碎片。

王牧師和那東北軍官要談幾句話，便離開我一段路去談話了。當我們車子開過那灰塵路上的時候，那一位國民黨的官吏沒有開過口，現在，他走到我面前來，脫下了他的黑眼鏡和白帽子。我看他年紀還很輕。在一圈光澤豐滿的頭髮底下，他的一雙銳利的眼睛直射着我。一個開玩笑似的笑容在他那紅銅色的臉上展開，他那時已經脫下了眼鏡，一眼看去就可以知道他穿着的那一套中山裝是假裝的，並且還看得出他決不是一個坐辦公廳的官僚，一定是一個在戶外活動的人物。身材中等，卻十分雄壯，所以當他走到我的身邊，像鐵鉗一般把我的臂膀鉗住的時候，我就嚇了一跳。後來我見到他的舉止是豹一般的柔順，雖然穿着那套制服看上去像是凜然不可犯似的，裏面卻是非常柔和的。

他把面孔挨到我眼前，微笑着，把一雙鋒利的發光的眼睛看着我！兩把鐵鉗把我兩條臂膀鉗住，這纔搖着他的頭，滑稽地掀起他的嘴，兩眼一霎！『你看我！』他像小孩子發覺了祕密一樣快樂地低聲道：『你看我！你看我！你認識我嗎！』

我對於這人真是莫名其妙，不知如何對付才好。他如此興奮，竟使我也受了傳染而也興奮起來了，可是我不知從那裏說起，只得呆呆地看着他發怔。認識他嗎？我這一生一世也沒有碰到過這麼一

個中國人！我否認了，搖搖我的頭。

他放了我一只臂膀，拿一個手指指他的胸口。『我想你也許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我的相片。』他說。『怎麼，我就是鄧發呀！』他自供道——『鄧發呀！』說着他頭往後一仰，稍遠地看着我，我要看他所拋給我的那個炸彈究竟會發生什麼效果。

鄧發？鄧發……哦，是的，鄧發就是中國紅軍特務隊的首領。而且還有別的任務，天啊，也是懸賞五萬元要他的腦袋的呀！

鄧發洩露了他的真相，快樂得手舞足蹈起來。他被這有趣的局面所鼓舞，興奮得無法壓制；他，這著名的「共匪」，現在竟在敵人的窠裏生活着，拿他的鼻子碰着到處密布的偵探呢。而他看見了我，一個自願跑進匪區去的美國人，尤其是喜不自勝，竟至於屢次想將我摟抱着。他願意爲我設法任何事情，問我要他的馬騎嗎？他這馬是多麼好呀，是紅色中國數一數二的一匹馬！要不要他的各種照片呢？他所收集的照片數量足以驚人，他可以都送給我。而後來竟實踐了他的諾言。

是怎樣一個中國人！怎樣一個共匪！

這位鄧發先生是廣州人，一個勞動階級家庭的兒子，從前曾在一隻走廣州、香港的輪船上做過西崽。那一次香港船員大罷工，他是一個領袖，曾被一個與罷工糾察員站在敵對地位的大英巡警打在胸膛上，打斷了好幾根肋骨。然後加入了共產黨，進入黃埔參加國民革命，直至一九二七年，他纔加入江西的紅軍。

我們在那土丘上站了一個多鐘頭，談着話，俯看着皇城裏面一個上面罩着綠色的墳墓。我當時

的情緒非常緊張，難以形容出來，又加當時我們所處的環境，更足以使我的情緒強烈起來，因為那個環境含有一種奇異的預兆，它對於我是莫明其所以地隔膜，對於那一部變幻無方的中國歷史也出奇地隔膜；因為那些共產黨人會得在這地方優悠自在，像一個安全托庇所，會得讓我們四個人在那裏聚會，非常安全，那是多麼矛盾而又多麼合理的一樁事呀。不過當時我會見那駭人的現代革命青年戰士，那個地點，畢竟是再適當沒有的，因為二千多年前以此為中心的那大漢時代的人，以他們自己那種方式，他們自己那個時代看來，也是十分過激的，惟其過激，這纔能統治一個統一而進步的中國，這纔能從戰國時代的混沌中使一個民族和一種文化強盛起來，使他們的後裔都甘心情願地自命為大漢的子孫。

就在這個地方，那位鄧發君告訴我，說他要護送我到紅區去，又告訴我路上應該怎樣走，在紅區裏應該怎樣生活，並說我到那裏一定是大受歡迎的。

我們坐車回城的路中，我問他說：『你不為你的腦袋擔心嗎？』

『不見得比張學良更擔心，』他吃吃笑着說：『我是和他住在一起的。』

#### 四 通過紅色的大門

我們離開西安是在黎明之前，那曾一度稱爲「黃金城」的高大木頭門一遇到我們那軍事通行證，便彷彿着了魔似的霍的開了開來。拖着的鍊條礮作響。在黎明之前的微光裏，那一部軍用大車輾輾地駛過飛機場。當時那飛機場是天天有飛機飛到紅軍防線上去偵察和轟炸的。

若是一個中國的旅行者在這一條從西安往北的路上旅行，每一哩路都可以引起他關於他的民族過去的榮華的回憶。中國歷史最近的一幕，即是共產黨要選擇這個地點來發展，似乎並非偶然的。一小時後，我們就渡過了渭河。當初在這河流的肥沃流域裏，那些做孔子祖先的暗膚色野人，曾經把他們的稻米文化發展起來，並且造成了即在現在也還在中國農村的民間神話裏發揮着力量的種種傳說。嚮午，我們達到了中部。大約在二千二百年之前，那個最先統一中國的威嚴人物秦始皇，就在這個築有堡壘的城市附近誕生下來。當初中國邊境上本有許多城牆，這位秦始皇第一次將它們統統鞏固起來，一直傳到現在成了地球上最最壯觀的建築——中國的萬里長城。

沿着那新完成的汽車道行進，一路上已結實的罌粟點着它們的腫脹的頭，等着人們來收穫。那條路雖然是新築，卻因了山水沖激與駛行過甚，已經深深打起了皺紋，以致即以我們那輛載重只有六噸的道其車，有時也無法可走。陝西是一個著名的鴉片省。數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人命喪失在三百萬以上，當時據美國紅十字會調查的結查，認為那慘劇的原因，大多是與鴉片的種植有關，而鴉片却是由貪圖稅收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的。

那天晚上，我們到了洛川，在一個污穢不堪的茅舖裏的土坑上過了一夜，我的房間隔壁便是豬和驢子的下宿處，我住的房間裏也有老鼠，所以我們都難以入睡。第二天早晨走出洛川數英里，那黃土平原便漸漸峻峭起來，壯觀起來，地勢變換之速真是觸目驚心。

這一種黃土地面，包括着甘肅、陝西、寧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當雨量充足的時候，這些地方就異常肥沃，因為這種黃土有數十尺之深，多孔的浮層土供給無窮。地質學家以為這種黃土是有機物質，

在許多世紀以前由亞細亞中部吹來的大風，把蒙古及西部的泥土帶了過來。在此一帶的景象上的變化無窮的怪異地勢——就是說，成了各種不同形狀的小山，有像大堡壘的，有像巨象的行列的，有像圓形的大薄餅的，有像被一隻巨手抓過一把而留下了怒爪的印子的，都是這大風所造成的結果。那些奇幻莫測，難以置信的，而又有時使人驚駭的形狀，成了一個瘋神捏就的世界，而有時卻又是一個具有奇異的超現實美的世界。

而且你雖然可以到處看見田疇和開墾的土地，卻很難看得見村落與人家。那些農民們是躲在那種黃土山裏的。因為在整個的西北，數世紀來造成的習慣，人們都在那種堅硬的軟糖色的山岩裏穴居而處，謂之「窰房」。可是這種窰房並不是西洋人之所謂洞。這種窰房乃是冬暖夏涼，造起來很容易，清潔起來也很容易的一種建築。即是最富有的地主們，也往往在山裏掘洞爲家。其中有些竟是大廈，包含許多房間，設備和裝飾都非常美麗，以石鋪地，很是高爽，壁上開着用紙糊的窗，並且也有堅固的黑漆大門。

有一次，在離洛川不遠的地方，在我旁邊一輛車裏，有一位東北軍官，指給我看一種「窰房村」。那地方離開汽車路不過一英里左右，中間只隔一條深澗。

「他們是紅軍，」他把消息洩漏出來說，「幾星期之前，我們有一個支隊被派到那裏去買玉米，那些村民拒絕賣給我們。那些愚蠢的兵士就動手強搶。但當他們退出村來的時候，那些農民們便開槍。」說着他把手畫了一條大弧線，包括汽車道兩邊的一切地面，說那裏有幾十個國民黨軍隊的「堡壘。」所謂「堡壘」就是山頂上的機關槍陣地。他說，那邊過去，就都是共匪的地面了。

我向着他指給我看的空間帶着甚深的興味凝視着，因為在幾小時之內，我就要進入那不可知的山嶺的地平線那邊去了。

在路上，我們遇見了一百零五師的一部分，統統是東北人，從延安回到洛川來。他們都是瘦削而剛強的青年，大多比一般的中國兵士的身材為高。我們在路邊的小旅店裏歇下來喝茶，他們有的也在那裏休息，我坐的地方和他們很近。他們是從陝北的瓦窯堡回來，剛剛在那裏和紅軍有過幾次小衝突。我偷聽到了他們中間的一些談話。他們是在談論關於紅軍的事。

『他們喫的東西比我們好得多呢。』一個辯論道。

『是的，但是他們喫的是老百姓的肉呀。』另一個回答道。

『那也沒有關係，不過是少數地主，倒反而好。我們到瓦窯堡去，是誰感謝我們呢？是地主呀！這不是事實嗎？我們為什麼要爲了有錢的人而自相殘殺呢？』

『他們說現在我們東北軍有三千以上加入他們那邊去了……』

『原是他們不錯呀。我們除了日本人本來是不想打的，現在爲什麼要打起自己人來呢？』

一個軍官走近來，於是這一番有興味的談話就告中止。那個軍官下令叫他們前進。他們就拿起槍，向那條路上蹣跚而去了。一會兒，我們也繼續開車前進。

第二天午後，我們到達了延安，那地方在長城之南約四百華里，這裏是陝北唯一可通汽車的公路的終點。這是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城市，因為在若干世紀以前，北來的遊牧部落侵略者曾經在這裏通過，那成吉思汗的大蒙古騎隊南下攻西安時也在這裏經過。

延安是一個絕對適當的防禦地點。四周圍都是高山，它彷彿是藏在一只碗裏，四周的牆壁可以攀登至極頂。不遠的地方，便有新建的防禦要塞，機關槍陣地森嚴地對紅軍那邊監視着。公路和它的鄰近地點都在東北軍之手，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全被隔斷的。蔣介石曾經想要封鎖那裏的紅軍，卻反而爲紅軍所封鎖起來，以致有數百人活活餓死。

就是飛機，對於包圍的紅軍也已失效。紅軍把機關槍架在山頂上——因爲沒有高射砲，——就很可能控制南京的飛行員，因此他們飛機裏來輸送給養時，不得不飛得極高。於是大多數的給養都落在紅軍陣地裏，他們就在延安城外開設一個市場，把那些誤送的食物賣回給城裏被困的居民。連張學良自己的駕駛員，見那機關槍的高射不免胆怯，有一個美國人竟因此而辭職。後來我在西安，看見那少帥的美麗波音式自備飛機滿身彈孔，我就同情那飛行員的苦衷了。

紅軍對延安（註）的長時間的圍攻，在我到那裏之前幾星期，已給解除了，但是圍攻的痕跡，可以在那面帶飢色的居民身上，和那些架上空無所有或是關門大吉的店舖上，很顯著地看得出來。食物是少到極點，因而物價像山一般高。那一點可以買到的東西，都是由與紅軍方面暫時停戰而來。當時訂有協定，東北軍不向這方的蘇區取攻勢，所以現在蘇區的農民們已肯把少量的米糧和蔬菜賣給那饑餓的勦共軍隊。

我是有着到前線去參觀的護照的。我的計劃是第二天一早離開延安，先去觀察「國軍」的前

（註）延安後來被紅軍佔領；現在（一九三七年）已成爲臨時的紅色首都。

線，當時在那裏的軍險的目的只是守着防線，並無前進的企圖。然後我打算就從一條山徑上岔道而過，因為我聽見說，商人們將貨物出入紅區，都從那些山徑混過去的。

當時我便按照原定計劃，混過了最後一個步哨，進入了無人之境，此中情形，要是我按照事實詳述，也許要使那些幫助我前去的「國民黨員」遇到嚴重的困難。現在我要說的，只是我的經驗替我再次證明了在中國是無論什麼事情都屬可能的，只要做時依照中國的方式。因為到了第二天七點鐘的時候，我已經實實在在的混過了最後一架國民黨的機關槍，通過了那劃分紅白的狹狹的一條地面了。

跟着我走的就只有一個騾夫，是我從延安僱來的。他答應把我的簡單行李挑到紅軍的第一個前哨去，所謂行李是我的一個小鋪蓋，一點食物，兩具攝影機和廿四捲軟片。我不知道這騾夫是紅是白，不過看他的樣子，一定是個匪。幾年以來，那一帶地面是由那紅白兩色的軍隊更替着佔領的，所以他既做過紅匪又做過白匪是十分可能的，或許竟同時兼做着兩種匪。不過我決定這種惹人厭的問題最好是不問，因而我只是乖乖地跟着他，希望着沒有什麼亂子發生。

我們沿着一條彎曲的小溪一連走了四小時之久，不曾看見一個人影子，我們所走的其實並不是路，只是夾在高山之間的一條小溪的溪床。若要把一個多說多話的洋鬼子送命，這是再好也沒有地方。當時那個騾夫對於我腳上穿的皮鞋屢次表示欣羨不置的意思，因而我的心裏不免有些兒惴惴然。

後來，我們兩側的山壁突然消失，一個狹窄的山谷展開在面前，裏面鋪着青青的嫩麥，於是我那



騾夫突然回頭對我叫道：『到啦！』

我放下了心，向前看去，只見有一個黃土的村落在一座小山的旁邊散置着。幾個高高的長手指似的泥煙肉映着岩壁直豎着，藍色的炊煙從裏面裊裊而出。數分鐘之後，我們就走到那裏了。

一個頭上包着一條白毛巾，腰上插着一支手槍的年輕農民，從村裏走出來，很駭異的對我看了看，問我是誰，到那裏去做什麼？

『我是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我說。『我要見見本地窮人會的領袖。』

他對我茫然的看着，回答我說：『*hai pa*』

這『*hai pa*』兩字，我聽見無論那個中國人說的時候，就只知道一個意思，就是說「害怕」。我因此想：如果他害怕，那末我這洋人該有怎樣的感覺呢？可是無論如何，看他的樣子就好像跟他的說話不相符合；他的神色自若。他回轉頭向着騾夫，問他我是什麼人。

那騾夫把我說過的話重說一遍，再添上一些花草。於是我就看見那青年農民的臉柔和下來了，於是我也放了心。並且看出他實在是個很美貌的青年，美麗的紅銅色的皮膚，雪白的牙齒。他似乎與中國別處那種胆怯的農民顯然有別。他那一雙閃爍有光的快樂的眼中含有一種勇敢的挑戰的神情。他慢慢的把手從他的手槍柄上拿開，向我微笑起來。

『我就是你所要見的那個人，』他說。『我就是窮人會會長。請進來喝口熱茶罷。』

陝西的山民自己有一種方言，但是他們也懂得「國語」（官話），外間人也大多懂得他們的。我跟那會長談了幾句之後，他就顯出有點領會的樣子，因而我們就談得投機起來了。不過在我們

的談話當中，偶爾要插進那 hai p'a 兩字。我一時也不便問他到底「害怕」的是什麼。後來我仔細研究一會，纔恍然陝西山民方言中的所謂 hai p'a 就等於官話中的 pu chih-tao（不知道）我獲得了這個大發見，就覺得異乎尋常地滿意。

我坐在那墊着棉花胎的坑上，和我的主人詳談起我自己和我的計劃來。過了一會兒，他似乎是明白了，我說我要到安寨（那鄉鎮的所在）去，因為我相信蘇維埃的主席毛澤東就在那裏，我可以看見他，我問他能不能替我找一個嚮導和一個騾夫。

他說那是一定可以的，不過我在那大熱裏面走是十分不妥的。我一看天氣，太陽正掛在中天，真是其熱難當，而且我也的確覺得很是疲倦。他問我喫過東西沒有，確實我是餓慌了，因而毫不客氣地接受了他的邀請，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跟一個「共匪」喫飯。我那騾夫急於要回延安，所以我就付了錢，向他告別。這就是我跟白色世界告別的最後一環，從此要有許多時候跟它斷絕來往。我既已踏入了紅色的境界，就決意要在那裏冒險了。

此時，我已完全被那位劉龍火先生（就是那青年農民）所左右，並且同樣地被他的那些樣子粗魯的伙伴所左右了。因為一會兒，他的伙伴們都從各處窰房裏陸續而來。他們和他的裝束相同，武裝相同，大家都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聽見我說話時的怪腔調，都哈哈大笑起來。

劉餉我以煙酒和茶，問了我許多的問題。他和他的伙伴們把我的攝影機，我的鞋子，我的毛襪，乃至我的棉布短褂的質料，一一仔細地加以檢查，看一件讚美一件，而對於我那茶色襯衫的抽鎖釦，則興趣尤濃，欣羨不置。我這全副行頭所給與他們的一般印象，似乎這些東西看起來雖是可笑，實用起

來卻頗適當。我不知道這班人對於「共產主義」在實踐上作何解釋，我是準備眼看著這些東西很快地讓他們「共」了去的——可是這樣的事情當然並沒有發生。據我看來，他們要把我的東西這麼嚴密的檢查，（不過與在別處邊境上所受的海關檢查比起來，我覺得舒服得多）其目的不過是證實他們從前的信念，就是說洋鬼子是難以索解的東西而已。

一小時之後，一大盤鷄蛋端來了，另外是熱氣沖天的麥捲，百滾的玉米，一些青菜，還有少許的烤肉。我的主人向我說道：「歉，說飯菜太簡陋了；我也向他道歉，說我的食量比衆不同。其實我那一個道歉是多餘的，因為我拿了一雙筷子，非得竭力追趕纔追得上那些窮人會裏的好朋友呢。」

龍火告訴我，說安塞離開此地不過「幾步路」，又叫我不要着急，等一會兒再走的好。及至一個青年嚮導和一個騾夫終於到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之後了。臨走時，我冒險要付飯錢給那位劉先生，可是他憤憤然地拒絕了。

「你是一位外國的客人，」他解釋說，「認識我們的毛主席的。而且你的錢在這裏也沒有用處。」他又對我的手裏拿着的紙幣看了一看，問道：「你有蘇區的錢嗎？」我回答說沒有，他這纔出了價值一塊錢的蘇區紙幣來付我說道：「這個你拿去，也許在路上用得到的。」

我拿一塊國民黨的錢和他掉換，他接受了我又謝了謝他，便跟在我的嚮導人和騾夫的後面爬上山道。

「好罷，」我一面喘着爬山，一面心裏忖道，「到目前為止，總算是順利的。」我已經衝進了紅色的大門。這是多麼簡單的一個手續呀！

但是在我的前頭，我卻遇到了一樁死裏逃生的意外，以致後來謠言蠶起，說我是被土匪綁去殺掉了。而事實是，土匪早已在那些靜默的黃土山壁後邊暗暗跟蹤而來——但那是「民團」而不是「赤匪」。

此  
页  
空  
白

## 第二章 赴紅都之路

### 一 被「民團」追逐

「打倒吃我們肉的地主！」

「打倒喝我們血的軍閥！」

「打倒將中國賣給日本的漢奸！」

「歡迎一切反日軍隊的聯合陣綫！」

「中國革命萬歲！」

「中國紅軍萬歲！」

這些刺激人的標語，用粗大的黑字寫出來，我就註定在它們下面消磨我在赤區裏的第一夜。可是這裏還不是安寨，也不在什麼紅兵的保護之下。因為我們那一天並沒有到安寨，在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只達到一個藏在河灣裏的小村莊，四面被山嶺陰沉地包圍着。溪旁一層層站着那些石板頂的房子，而那些標語就寫在房子的泥牆上面。五六十個農夫和睜大眼睛的兒童，擁出來看我這一匹驢子的旅行隊。

我的年輕的嚮導，一個窮人同盟會的祕密使者，他決定把我安頓在這兒。他說，他有一條母牛最近養了小牛，鄰近地方有狼，他得回去看管。安寨距此地還有三十多里路，我們在黑暗裏不容易趕到

那邊去。他將我託付當地窮人同盟會支會的主席保護。嚮導和驢夫都拒絕酬謝，無論白票或赤票都不要。

支會主席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青年，坦白的醬色臉下面是一件褪色的藍布衫，皮膚強韌的赤脚，上面是一條白褲子。他歡迎我，並且很親切。他將我帶到村會議室的一個房間裏，給我熱水和一碗小米粥。可是我不喜歡這個黑暗而有惡味的房間，請求他讓我用兩扇拆下來的門板。我將這兩扇門放在兩條長橙上面，攤開被褥將我的床舖在露天。這是一個燦爛的夜，明朗的天空上閃耀着北方的繁星，小瀑布在我下面奏着和平與寧靜的調子。長途步行使我精疲力盡，所以我立刻就睡了。

等我睜開眼睛已經黎明了。支會主席屈身站着搖着我的肩膀。我當然一驚，立刻坐起已經完全清醒了。

「什麼事？」我問道。

「你最好早一點離開此地，這兒附近有土匪，你得趕快到安寨去。」

土匪？我正是來見這些土匪的，我還想把這話答他，卻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說的不是紅軍，他是指「民團」。我不用他再勸告就起身。我不願意遇到在蘇維埃中國境內給民團擄去的可笑事情。民團，國民黨對付農民暴動的組織。他們在保甲制度裏是一個重要的部分，而保甲制度乃是統治農民的一個古法，這方法國民黨在中國也用，日本人在「滿洲國」也用。

保甲制度是每十戶人家要有一個甲長，人民對他敬畏，就使地方長官滿意。這是一個互相擔保的制度，一甲中有一戶做了錯事，其它各戶都要負責。這也就是蒙古人和滿洲人統治中國的方法。

這方法在阻止農民反抗的組織的上講，簡直是一種無上的妙策。保甲中的甲長恆爲富農地主，典當老板，或放債的人，他們是最起勁的國民，自然不願擔保那些有反叛思想的佃戶或債戶，而無人擔保，實在是一件十分嚴重的事情。一個沒有擔保的人，可以用任何藉口被人當做嫌疑犯而送到牢裏去。

這意思實在就是整個農民階級是由紳士階級來掌握的，他們隨時可以用拒絕擔保來殺害一個人。在保甲制度的作用之中，尚有一非常重要的作用，這就是收捐來維持民團。民團是由地主和紳士所挑選所組織所指揮的，它的基本職務是打共產主義，幫收田租，幫討債息，和幫助地方長官徵收那些一日日增高的捐稅。

所以紅軍佔領一個地方，它的最初和最後的敵人就是民團。因爲民團除了供養他們的地主而外，就沒有根基，可是紅軍一進來，他們就失了這個根基。中國真正的階級鬭爭在民團和赤游擊隊（即所謂「赤匪」）之間的鬭爭中最看得分明。因爲這兒常是地主和佃農債戶之間的直接的武裝衝突。拿餉的民團有數十萬人，是中國兩百萬左右正規反共軍隊的最重要的助手。

現在紅軍和國民黨軍隊之間雖然在這一線上停了戰，而民團對於赤游擊隊則仍舊繼續不斷來襲擊。在西安洛川及延安，我曾聽人說有許多逃來的地主，出錢供給或者親自領導那些民團在蘇維埃邊區活動。待紅軍主要部隊不在的時候，他們常常進攻赤區，焚燒搶掠，屠殺農民。農民領袖被捉了去，地主和白色軍官就大大酬勞俘獲「共產黨」的人。

爲了報復，爲了冒險以後立刻可以得到現錢酬勞，所以民團在紅白戰爭中實在做了最破壞的



工作，我是無論如何不願嘗試民團之「外交政策」的。我覺得我這一點少數的錢和衣服，再加上照相機，對於他們實在是太大的誘惑，因為他們趕掉一個孤單的洋鬼子，就可以得到他們了。

急忙吞下些熱茶和麥餅，我和支會主席所派給我的嚮導和驢夫，立即出發。我們沿着河床走了一個鐘頭，偶而經過小小的窖洞村子，毛茸茸的土狗，恫嚇地向我吠着，少年哨兵走出來要看我們的通行證。後來我們走到一個可愛的池，水面平靖，位於巨大的岩石所造成的盆池之中，這裏我看見了第一個赤色戰士。

他只一個人，此外還有美好的白色小馬在水旁喫草，身上披着一條鮮明的藍色毛絨靴子，上面有一顆黃星。這青年戰士正在洗澡，看見我們走近，他立即跳起，穿上天藍色的短衫和一條白布頭巾，巾上有一顆紅星。一枝毛瑟槍掛在腰旁，木盒子上威風地拖着一條紅綬。他手按着槍，等我們走到他跟前，向嚮導問我們是幹什麼來的。嚮導拿出他的通行證，簡略地解釋人家怎樣將我託給他，那位戰士便詫異地望着我，要聽更進一層的說明。

「我是來見毛澤東的。我知道他在安寨。我們還得走多少路？」

「毛主席嗎？」他慢慢地問。「不，他不在安寨。」於是他望望我們的後方，問我是不是只一個人。相信我只一個人以後，他的冷淡的態度就消失了。他好像有某種祕密的趣味似的微笑着說：「我要到安寨去。我就和你一同到縣政府去吧。」

他騎着小馬在我身旁走，我就自荐地告訴他許多關於我自己的事情，同時也問幾個關於他的問題，我才知道他在政治保衛局裏，這時正輪到在這邊區站崗。那馬呢？它是張學良將軍的「禮物。」

他告訴我，最近在陝北的戰役中，紅軍從張學良的軍隊俘獲到一千多匹馬。我又知道他姓姚，二十二歲，並且當紅軍已經有六年。六年他準有故事講！

我喜歡他。他是一個相貌誠實的青年，身材很好，紅星下面閃爍着一叢烏髮。在荒涼的山谷中遇見他，是令人安心的事。我的確竟然忘了問他關於土匪的事情，因為我們不一會就討論到紅軍在春天向山西的行進。我告訴他那次行軍在北平所生的影響，他就告訴我在那次「抗日之役」中他自己的經驗，在這一役中，紅軍在一個月內新招了一萬五千人。

兩小時以後，我們到了安寨，它位於黃河支流延水的對面。在地圖上安寨是一個大城，其實不過一圍很小的美麗的城牆而已。街道上完全荒廢，每樣東西都成了殘斷。最初我認爲這些乃是劫掠和殘暴的明證；可是仔細一看，全沒有焚燒的痕跡，很明顯的這些都是很古的殘跡，決不是紅軍所造成的。

「十年以前安寨完全給一次大水所毀壞了，」姚君說，「全城都淹在水裏。」可是安寨的居民，沒有把城重建起來，他們現在都住在城外不遠一座大岩表面的蜂房似的窰房裏。到了安寨，我們卻發現駐屯在那裏的一支紅軍，已經派出去追擊土匪，蘇維埃的委員已經到百家坪附近的一個村莊去向一個省委員有所報告。姚自願護送我到百家坪，這我們在黃昏時候才走到。

我已經在蘇維埃區域內住了一天半，可是我沒有看見戰時苦痛的現象，我只看見一個紅兵和十分定心在做農事的人民。不過，我是不會被外表所欺騙的。我還記得在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中日戰爭中，中國農民在戰爭之中繼續耕田，全不在乎。所以當我們轉個灣將走進百家坪的時候，聽到正在

我上面的最可怕最慘酷的喊聲，對於我並不是出其不意。

向那兇猛的吶喊聲望去，我看見十多個農民站在一高出道路的坡上，在一排營房似的房子面前，揮舞着長槍長戟和幾枝來福槍，動態是極其堅決。看來我這封鎖綫闖入者的命運——把我當作一個帝國主義者而執行槍決，或者當作一個誠實的訪問者而給以歡迎——是立刻就要決定了。

我一定對姚君露出一張很可笑的臉，因為他大笑「不怕」起來了。他格格地笑道：「不要怕他們就是游擊隊——在操練。這兒有一個赤游擊隊學校，不要害怕！」

後來我知道游擊隊的課程裏，包括一種古中國的戰爭吶喊的演習，正好像水滸所描寫比武的情形一樣，我因為不知道這種技術，所以經驗到脊骨發冷，即此我就可證明它在恫嚇敵人這一點上還是非常有效的。游擊隊往往在黑暗中襲擊，那時大聲吶喊起來，一定極其可怖。

我剛剛坐下，開始和姚君在百家坪介紹給我的一個蘇維埃職員談話，忽然來了一個腰束皮帶的青年司令，跨着一匹流汗的馬，跳下馬來，他詫異地看着我。從他那兒我知道了我自己冒險的詳細情形。

新來的人姓卞，他是安寨紅軍保衛團的指揮。他說他剛和約有一百人數的民團打了仗回來。一個農民兒童——一個少年先鋒隊——跑了好多里路，到安寨的時候，已經筋疲力盡，他警告他們說，民團已經侵占他們的區域。民團的領袖是一個真正的白匪——一個洋鬼子——就是我。

「我立刻領了一支騎兵隊，打一條山上的便道趕過去，一小時後，我們就看見了土匪。」卞君繼續說，「他們在追蹤你。」——他點着我——「只有兩里路，可是我們將他們包圍起來在山谷中襲

擊他們，俘獲幾個，內中有兩個領袖和幾匹馬，其餘的人都向邊境逃去。」他結束他底簡單的報告以後，他的幾個部下走進院子，帶着幾匹俘獲的馬。

我開始疑惑不決，究竟他是否真的認爲我是領導着民團。我竟然從白軍中脫逃出來——要是白軍在無人之境捉住我，無疑一定叫我紅軍——單是要給紅軍捉去，而將我當作一個白軍判罪嗎？這時忽然有一個清瘦的青年長官出現了，臉上有濃濃的黑鬚，他到我跟前，用溫和而文雅的口氣招呼我，「喂，」他說，「你找什麼人嗎？」

他用英文講！

頓時我就知道他是周恩來，「赫赫有名」的紅軍領袖，曾經是一個教會學校的榮譽學生，這兒他們決定招待我。

## 二 叛徒

我和周恩來談了數分鐘，並且把我的來歷告訴他，以後他就將我在百家坪安排宿夜，叫我第二天早晨到在附近一個村莊裏他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來和駐紮在這兒的交通部的一組人員一道吃飯，遇見了十數青年，他們是宿在百家坪的。其中有幾個是遊擊隊學校的教師，一個是無線電管理員，還有幾個是紅軍的軍官。我們這一餐吃的是煮熟的小雞，不發酵的蕎麥饅頭，白菜，小米和番薯，我飽飽吃了一頓。可是照例除了白開水以外，沒有其它的飲料，白開水燙得不能上口，我渴得要死。

飯菜由兩個態度淡漠的少年侍候——應該說送上——他們穿着比他們身材大數倍的制服，戴的是鴨舌頭常常垂下罩住眼睛的紅便帽。他們起先慍慍地望着我，可是在不多數分鐘後，我就逗出其中一個的友誼的笑容。這成功使我胆大，在他打我旁邊走過的時候，我吩咐他：「喂，來一點冷水。」

那少年簡直不理會我。數分鐘後，我又喊那另外一個，結果還是一樣。

于是我看見交通組長李克農在他的玻片凸出的厚眼鏡子後面望着我笑，他扯扯我的袖子：「你可以叫他『小鬼』。」他對我說：「或者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這兒每一個人都是同志。這些孩子是少年先鋒隊，到這兒來，乃因為他們是革命者，自願幫助我們。他們不是傭人，他們是未來的赤色戰士。」

正在這時候，冷水來了。

「謝謝你，」我抱歉地說。「——同志！」

那少年先鋒隊坦然地望着我。「不要緊，」他說，「你不用爲了這種事情感謝一個同志！」

可是這些孩子真了不得，我心裏想。我在中國少年中間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大的自尊心。這不過是少年先鋒隊所將要給我的許多驚奇事情的開頭，因為我越走進蘇區，我越在這些紅臉的「小鬼」——高興愉快，努力，忠實——中發現驚人的青年十字軍的活潑精神。

事實上，早晨護送我到周恩來司令部去的，也就是那些少年先鋒隊中人。那是一個能防禦轟炸的茅屋，四面圍着許多同樣的茅屋，這兒的農民一點都不覺得他們住在戰場裏，也不覺得東線的紅

軍司令是住在他們的中間。我心裏想，這就是得到農民好感的祕密，使他們這般毫無阻礙地深入農民的區域嗎？附近駐紮一些軍隊似乎絲毫也沒有擾亂農村的寧靜。

周恩來的司令部門前只有一個崗位，可是爲了周恩來的腦袋，蔣介石曾經懸賞八萬元哩。

房間裏很潔淨，陳設極其簡單。土坑上掛的一頂蚊帳，要算是唯一的「奢侈品」了。坑脚下放着兩隻鐵的文件箱，一張小小的桌子用作辦公桌。衛兵報告他我來到的時候，他正伏在桌子上看電報。「我得到一個報告，說你是一個可靠的新聞記者，同情中國人民，並且能夠把事實說出來，不致說謊。」周氏說，「這就是我們所要知道的。至于你是不是共產主義者，對於我們沒有關係。我們歡迎來觀察蘇區的任何新聞記者。阻止新聞記者到蘇區來的不是我們，而是國民黨。你看見什麼，可以寫什麼，你觀察蘇區，我們願給你一切的幫助。」

我有點驚奇，並且對於允許我自由行動的誠意，還有一點懷疑，我本預料即使答應我在蘇區旅行，而在拍照或彙集筆記或會談上總有某種的限制。他的話聽上去太理想，一定有什麼妙計……

關於我的「報告」顯然是從西安共產黨祕密總部送來的。紅軍和中國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漢口、南京及天津，都有無線電的交通。他們在「白」區城市內的無線電台雖常被破獲，國民黨雖然常在白區中搜獲紅軍的無線電台，可是不能長期破壞他們的交通。據周氏說，自從他們首次設立了無線電一部後，國民黨從沒有破壞他們的密碼，這些無線電的配備，完全是從國軍奪來的。

周恩來的無線電台設在他的司令部的近旁。他用牠來和蘇區各要地及每一個前線通消息。他甚至和那時候部隊駐紮在千餘里外的川藏邊境的紅軍總司令朱德直接通報。保安蘇維埃的西北

臨時首都，設立了一個無線電學校，在那兒約有九十個學生正在受無線電專家的訓練，他們每天從南京、上海及東京的廣播電台收取新聞，供給蘇區的報紙。

周氏蹲伏在小棒子上，把許多無綫電報擲在一旁——大多數是紅軍在山西對面黃河沿岸各據點的東戰線的報告。他爲我排了一個考察日程，一個九十二天的詳細的考察日程。

「這是我的意見。」他說，「你是否願意這樣做，那是你自己的事，我想你將發現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旅行。」

但是要九十二天啊！並且其中一半的日子幾乎完全在跑路。我們究竟可以看到些什麼呢！難道紅區竟這樣的遼闊嗎？我嘴裏雖不作聲，心裏對於他排的日程真是懷疑。可是事實上我化費的時間比他所預擬的還要長久得多，到末了因爲我實在看見的太少，還不願離開哩。

周氏答允用馬送我到保安去，到那裏有三天路程，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就出發，因爲這樣我可以同回到紅都去的交通組一起走。我知道毛澤東及其他蘇維埃要人都在那裏，周氏已同意發一個電報給他們，告訴我就要到保安去的消息。

同周恩來談話的時候，我曾經極有趣味地研究他，因爲他在中國像其他許多紅軍領袖一樣，也好像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是一個瘦個子，中等的身材，細小而結實的骨格，富於熱情的又大又深的眼睛，儘管有長而且黑的鬚鬚，外表上仍舊不脫孩子氣。他的確有一種動人的吸引力，那一種吸引力是謹慎，個人的魔力和堅決徹底的領導奇妙地交織成功的。他說的英語，雖然不怎麼流利，卻也很準確的，他告訴我，他已經有五年不講英語了，這是使我很詫異的。

我從周氏的一個老同學以及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時代這個外人稱之爲中國的「國民革命」和他同事的國民黨人那兒知道了他一些小史。我從周氏本人又知道了更多的事情。他有一點使我特別有興趣的。他顯然是中國人物中最少有一個，他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他的舉動與他的學識及信仰完全協調。他是由一個學者轉變爲叛亂者。

周氏是一個世家子，祖先是滿清時代的一個大官，父親是一個著名的學者，母親是一個才女，（一個讀書很多，實際上喜歡現代文學的女人。）他從小就顯出驚人的文學天才，所以他似乎是早就注定了要做一個學者。可是和他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在那民族意識覺醒的大時代中受教育，他對於文學的興趣是動搖了。經過第一次（一九一一年）的革命之後，中國「新文學運動」開始萌芽，逐漸長成起來，周恩來也就在那時候捲入了搖撼中國的社會革命運動。

他先進天津南開中學讀書，後來升入南開大學。南開大中學是美國教會在天津主辦的學校，他在那兒學習英文並獲得一種「自由」教育。他是全級的優等生，得到過三年的獎學金。後來日本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條件，袁世凱企圖稱帝，跟着來的是全中國的開始反抗，是民主革命和社會革命的運動，是一九一九年的學生運動。因爲周氏是學生領袖，他留在天津被捕，監禁一年。和他同時被捕入獄的尚有許多愛國青年，其中有一個是天津女子師範的學生，思想很急進，她現在做了周氏的妻子和忠實同志。

周氏出獄以後，就到法國去讀書。他受大戰後共產主義的學說所影響，幫着組織巴黎的中國共產黨，中國的共產黨也在同時成立，所以他成爲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他在巴黎讀了二年書，到英



國去了幾個月，又回到法國，然後在德國又讀了一年書。一九二四年他回到中國已經是一個著名的革命組織者，他立刻到廣東去贊助孫中山，那時候孫中山正在與中國共產黨及蘇聯合作，準備出師北伐。

在二十六歲的那年，周氏已經成爲廣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他是著名的黃埔軍官學校的祕書，是加命將軍——那時加命將軍是黃埔軍官學校的首席顧問，現在他是蘇聯遠東紅軍的總司令的心腹。——黃埔的校長蔣介石雖然把周氏視爲眼中釘，但是因爲他在急進的學生中間具有很大的勢力，也只好委他做軍校的政治部主任。

北伐開始，國民黨和共產黨公舉蔣介石做總司令，自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軍事上獲得空前勝利。周恩來奉命到上海組織民衆，援助革命軍奪取上海。那時候他還只有二十八歲，既沒有受過正式的軍事訓練，也沒有和勞工階級接觸的經驗（他是一個大家子弟，和勞工階級完全隔離的），既沒有怎樣預備暴動的指導著作，也沒有隨身的顧問（重要的俄國顧問都是和蔣介石在一起的）。周氏跑到上海，只帶了革命的決心和馬克思主義的健全的理論。

在三個月內，共產黨組織了六十萬工人，發動一次總罷工。工人的回答是全體一致的，這個對於各帝國主義在華最強大的根據地上的人們，是一個可怕的經驗。可是暴動是未曾實行的。工人沒有武裝，也沒有訓練，不懂得怎樣去「奪取都市」。他們還得從實際經驗中學習怎樣組織工人的武裝核心。當時的軍閥確也放縱了他們。

看輕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罷工的重要性，北洋軍閥僅僅砍了許多人的頭顱，沒有根本地壓平工

人運動。周恩來和上海著名的工作領袖如趙士炎、顧順章、羅亦農等到底組成了五萬人的糾察隊，在法租界某一個地方，祕密地對二千個幹部人員實施軍事訓練。偷運的步槍和訓練成功的三百個射擊手，這就是上海工人所有之唯一的武力。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產黨發動總罷工，上海的工廠完全停工（這樣的有組織有鬪爭精神是他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六十萬工人全體起來做革命的後盾。他們先佔據了警察局，跟着又佔據了兵工廠和警備司令部，終於獲得了勝利。五千工人武裝起來了，六營革命的隊伍組織起來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也跟着宣告成立了。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政變。

所以蔣介石在幾天以後到達上海近郊的時候，發現戰事已經勝利，就長驅直入接受了勝利的工人隊伍所獲得的權力。因此，大約在一個月之後，當蔣介石實行清黨的時候，他理會到周氏雖然給予他以勝利，却也可以使他失敗的。名單上的第一個也就是這個富有危險性的青年。到這時候，周恩來就離開國民黨過他的逃亡者生活，高擎了紅旗，成爲第三次革命的領袖。

趙士炎、顧順章、羅亦農、陳延年（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者之一——的兒子）以及周恩來的許多同志們，在上海相繼被殺。在「上海大屠殺」中，被犧牲的約五千人。周恩來自己也被蔣介石的第二師捉獲，由白崇禧下令槍決。但第二師師長的兄弟是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他想法使周氏逃走了。

他先逃到武漢，再從武漢逃到南昌，在那裏他幫助組織「八一暴動」，這是中國紅軍的歷史的

開端。後來他又到汕頭去，那裏的紅色工人已經佔領了華南的大海口，就由周恩來指揮着，抗抵外國砲艦和地方軍隊的雙重攻擊，整整地支持了十天，然後再到廣州去組織著名的「廣州暴動」。

因爲「廣州暴動」的失敗，他只得做祕密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纔衝破了封鎖綫，跑進江西和福建的蘇維埃區域。他先做紅軍總司令朱德的政治委員，後來做革命軍事會議副主席，在我們這次見面的時候，他仍舊擔任這個職務。他在華南經過了幾年的苦戰，用步槍、機關槍及鐵鎚，抵抗轟炸機、坦克車及裝甲軍，抵抗敵人所可利用的一切財富，用極大的努力來拯救這個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這是個缺乏海口甚至於缺乏食鹽的蘇維埃共和國，遭遇了無數的危險，所以就開始「長征」，衝到了中國西北部的新的紅色根據地。

丟開了中國的舊哲學，中庸和愛面子，秉着耐勞和吃苦的無上的能力，絕對忠於思想，不屈的精神——這一切好像都包含在紅軍的故事中，都包含在造成這故事的人物中。

周氏給我的印象是冷靜的，合理的和實際的頭腦。周氏的溫文的談風，却和最近九年來國民黨所宣傳的種種侮蔑共產黨形容詞如「無知的強盜」「匪徒」等等，完全相反。

當他同我沿着寧靜的小路，經過芝麻田和小麥田，回到百家坪的時候，任何關於破壞性的紅色土匪的那些形容詞，用到他身上去都不適合的。正好相反，他似乎是充滿了愉快和生命的愛戀，像精神抖擻地跟着他的「小紅鬼」一樣，他的手臂正靠着「小紅鬼」的肩膀。他現在似乎還有在南開時代的那種女性的風度，那時候他是很漂亮的，身段和一個少女一樣的婀娜多姿。

### 三 賀龍特寫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我同四十多個青年交通隊一起出發，他們是護送貨物運輸隊到保安去的。這一隊人中，我發現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紅黨的外交部——的專使，傅錦魁與紅軍司令李長林三人騎着牲口。這並不是說傅錦魁等有騎馬的特權，他騎的是一隻騾子，身上馱的東西已經是够重了，李長林騎的驢子也同樣地載重過分，只有我總算騎着一匹孤獨的馬，但是這匹馬是否還在我的胯下，我有時候竟也不敢十分自信。

我的馬有像彎月一樣的背，像駱駝一樣步伐。牠的瘦弱得可憐的腿蹣跚地走着，我深怕牠隨時會摔倒，嚙最後的一口氣。當我們順着峭壁所鑿成的狹路向前進的時候，牠就更加困頓。照我看起來，只要我的身體突然一側，我們就會一同跌到了山谷裏去。

李長林坐在行李上，嘲笑着我的侷促不安，說：「同志，你坐的是一副好鞍子，可是在牠的下面是什麼東西呢？」

在我的立場，是不應該抱怨的，因為無論如何我是什麼人，也應該騎馬嗎？可是，對於他的嘲笑，我禁不住要批評說：「只要回答我下面問題，李長林，你們騎在這種狗一般的馬上，怎麼能够打仗呢？你們紅色騎兵的馬就是這樣的嗎？」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應該知道！你的馬不是壞了嗎？因為我們在後方用這樣的壞馬，所以在前線我們纔有所向無敵的騎兵！如果有一匹強壯健走的馬，就是連毛澤東也不能把牠留在後方的。我們在後

方用的，只有這種狗一般的壞馬。各種應用東西都是這樣，槍礮、食物、衣服、馬匹、騾子、駱駝、羊，都把最好的東西供給我們的紅色戰士同志，假如你要一匹好馬，你得到前線去！」

我決定從速接受他的意見。

「但是，李長林，你自己怎麼不上前綫呢？你難道也壞了嗎？」

「我壞了嗎？不，決不會壞的！不過前線少用一個好人容易，少用一匹好馬却是很難的！」

的確，看起來，李司令真是一個好人，一個好的布爾什維克和好的講故事的人。他已經做了十年的共產黨員，是一九二七年——那是中國共產黨成爲獨立隊伍的第一年——的南昌暴動的主角之一。在這崎嶇不平的山西境內的山路上，我有時候騎馬，有時候步行，有時候氣喘，有時候口渴，跟着李司令，他把往事一件一件的追訴着，甚至於屈着身體講給我聽。

他還是一個年青的人，大約三十一二歲，可是當他逐漸地把他的往事揭開時，你就曉得他出生入死已有十多次了。從他身上，我開始發現一種特殊的性格，這種性格，後來我在中國的革命戰士中是常看到的。某種東西使個人苦痛與勝利，已成爲集體的負擔或大家的快樂，某種力量使各個人一律平等，使各個人都忘記了自我，大家在自由中，嚴肅中和艱難中共同努力。

倘若你認識中國的說法，這樣的事情恐怕你要以爲是不可能的，可是這個的確是事實，等我以後再來解釋。

李長林是湖南人，當中國國民革命開始的時候，他還是中學生。他加入了國民黨，一直到一九二九年清黨以後，他纔加入共產黨。有一個短期間，在鄧發領導之下，他曾經在香港組織工人。後來，他到

江西的蘇維埃區成爲遊擊隊的領袖。一九二五年，國民黨曾經命令他和一個宣傳隊去幹一件責任非常重大的工作，他們的任務是去會見匪首賀龍，說服他去參加國民革命。現在國民黨報紙上稱爲罪惡昭彰的賀龍，在當初，他的反正是國民黨極重視的。

一天我們在溪邊的樹蔭下休息的時候，李君告訴我說：「即使在那個時候，賀龍的部下也並不是土匪，他的父親是哥老會的一個首領。賀龍承襲了父親的威勢，在年青的時候，聲名就遍佈湖南全省。有許多關於他在年青時的勇敢故事，這個湖南人（李司令）全告訴了我。」

「他的父親是前清的一個武官。有一天，同僚宴客，他把賀龍帶去，在人家面前誇獎賀龍的膽大。有一個客人決定要試驗一下，便在桌子下面放了一槍。據說，賀龍連眼睛都沒有雲一雲。」

「當我們會見他的時候，他已經被收編爲省軍。他所管轄的區域正是雲、土、蓮往漢口的要道，他就徵收煙稅爲生，並不剝削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和舊軍閥的軍隊一樣的狂嫖濫賭。他不准兵士吸鴉片。他們都把他們的來福槍擦得很清潔。賀龍自己也不抽煙，但是拿鴉片來敬客却是他那裏的一種習慣。所以，當我們到達時，煙鎗和鴉片都擺在坑上，我們便在坑上談革命。」

「我們宣傳隊的領袖是周逸羣，他是共產黨和賀龍有着親戚的關係。我們同他談了三個星期。賀龍除了軍事以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可是他並不是一個無知無識的人，他很快地了解了革命的意義。但是他也經過了一番詳細的考慮，並且再和部下商議了，然後纔決定加入國民黨。」

「我們在他的軍隊中設立一個黨務訓練學校，主任是趙易生，他後來是被殺的。這雖然是一個國民黨的訓練學校，大多數的宣傳員都是共產黨員，許多學生後來都成爲政治上的領袖。除了賀龍

的軍隊以外，該校並培養第三師的政治工作人員，那時第三師師長是袁祖銘。袁祖銘是一個左傾軍隊的司令，被唐生智的部下暗殺，以後第三師就歸賀龍指揮，賀龍的軍隊擴充成爲第二十路軍，成爲國民黨左傾將軍張發奎所統率的第四集團軍的一部分。

李長林說賀龍是直到一九二七年南昌的八一暴動以後，纔加入共產黨的。在這個時期以前，他還效忠寧漢分裂的武漢政府。當唐生智、何健等鎮壓打倒地主的運動，開始「農民大屠殺」，國民黨的軍閥不僅屠殺共產黨，並且屠殺無數的農會領袖、工人及學生的時候，賀龍纔毅然決然的投入共產黨。他本身是一個農家子，他完全同情窮人，大屠殺激起他的憤怒。

何健，他現在是湖南的南京政府的官吏，是「反革命軍閥中最野蠻最殘酷的一個」，據李君說。「我不知道他總共殺了多少人——無疑地已經殺了好幾萬人。我知道在我自己的家鄉瀏陽縣，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中間，他殘殺了二萬餘農民、學生和工人。我也在那裏，所以我知道得很清楚。據說在他的本鄉醴陵縣，他也殘殺了一萬五千人。」

我奇怪李君本人怎樣能够脫逃，我問他。他拉開藍布短衫，指着一條長長的疤痕，笑着說：「你瞧，我沒有完全逃脫啊！」

「南昌事件以後的賀龍怎樣呢？」

「他的軍隊打敗了他和朱德向油頭移動。他們又打敗仗。他的殘餘部隊轉入內地，賀龍本人則逃到香港。後來他祕密轉到上海，化裝了重返湖南。」

「據說，賀龍是用了一把小刀把湖南的蘇維埃區建立起來的。這是一九二八年的事情。賀龍匿

居在一個鄉村，和哥老會中人密謀起事，恰好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縣政府的收糧員到來，他就率領着幾個農民，攻擊那些收糧員，親手用自己的小刀把他們殺死，並把他們的衛隊繳械，這樣，他獲得了手槍和步槍，第一次的把他的農軍武裝起來。」

賀龍在哥老會中的名望，是全國都知道的。紅黨中人說，他可以赤手空拳的走到任何一個鄉村去，通知哥老會組織起一支軍隊來。這種會裏的特殊禮節和術語，是很難通曉的。而賀龍對於這二方面，却最擅長。他的能言善辯，在國民黨中極爲有名。李司令說：「他講話時能够把死的說出活的來。」據說當賀龍的第二方面紅軍於一九三五年從湖南的蘇維埃區撤退的時候，共有四萬多枝步槍，他的軍隊在「長征」中所碰到的困苦艱難，遠過於江西的主力隊伍。許多人在雪山上凍死，許多人餓死，許多人給南京政府的飛機炸死。可是在中國的農村裏，賀龍的吸力和聲勢是極大的，他的部下都情願死在路上，而不願中途離開，他並且在「長征」途中，一路上有許多勞苦大眾參加進來，補充他的隊伍。他到達西藏的東部，與朱德會合。那時候他的隊伍，已經只贖二萬人左右，大多數赤着腳，光着腿，餓着肚子，弄得筋疲力盡了。在這裏休養了幾個月，他的軍隊又開始向甘肅出發，預定在幾個星期內到達那裏。

「賀龍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問李司令說。

「他是身材魁梧的人，像老虎一樣的強悍。他雖然已是五十歲出頭的人，他還是極其健壯。他從來不覺得疲倦。他們說在「長征」途中，他還攜帶了許多傷兵。即使在他做國民黨的將軍的時候，他的生活就和兵士一樣簡單的。除了馬以外，他對於個人的所有物絕對不放在心上。他頂喜歡馬。有一



次，他覓得了一匹很美麗的馬，他真愛護着牠。有一天那匹馬給敵人搶去了，他便追擊敵人，終於把那匹馬奪回來！

「雖然他的性子很粗暴，他也是很虛心的。自從加入了共產黨以後，他對於黨絕對忠實，從未破壞過黨的紀律。他常常請求人家批評，聽從人家忠告。他的姊妹很像他——是一個身高脚大的女人。她自己曾經親自率領了紅軍作戰，把受傷的兵士馱在她的背上。賀龍的妻子有和她一樣的本領。」

就在他的紅軍第一次組成成功的時候，就在湖南的共產黨尚未完全受中國共產黨控制的時候，賀龍憎惡富人這一件事情，在中國已經成爲一件稗史。許多農民因爲他們在「農民大屠殺」失去許多的親戚和朋友，許多農民因爲在何健的反動統治之下受着了無數的苦痛和壓迫，都存着復仇的心理去投奔賀龍。據說，地主和紳士們就是在南京軍隊嚴密保護的地方，只要一聽到賀龍到來，離開那裏還有二百里路的消息，也往往就逃避一空，因爲賀龍的敏捷的行動，是大家都知道的。

不久以後，賀龍拘獲了一個名叫布司哈（Bossard）的瑞士教士，因爲他是一個間諜，軍事法庭就判了十八個月的徒刑。所謂間諜大約是指將紅軍移動的消息報告國民黨的官吏而言。許多外國教士都有這種習慣。當賀龍的軍隊開始「長征」的時候，布司哈的刑期還沒有滿，所以叫他隨着軍隊出發。刑期滿後，賀龍就開釋了他，並且給他旅費到雲南去。奇怪得很，布司哈對於賀龍並沒有什麼怨言。正好相反，據說他曾經這樣說過：「如果農民知道共產黨到底是怎樣人，就再也不會逃走了。」

（註）

（註）這是陸克博士（Dr. Joseph F. Rock）告訴我的，他是布司哈回到雲南之後和他說起的。

正午時候，我們決定到涼爽動人的溪水裏去洗澡。我們躺在一條長而且平的石頭上，溪水的波紋漂過我們的身體。幾個農民走過去，趕着他們前面的一大羣羊，仰視天空，清朗碧澄。這裏佈滿了和平，美麗與滿足的空氣。

突然的，我問李長林結過婚沒有。

「我是結過婚的」他慢慢地回答說。「可是，我的妻子是在南方被國民黨殺死了。」

我這才有些明白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夠打得這樣的悠久這樣的不妥協，這樣非中國式。我更向前走了多少里路，關於這類事情，我從其他紅色人物知道得更多一些。

#### 四 紅色伙伴

陝北是我在中國所看到的最貧瘠區域之一。那裏並不是真的缺少土地，所缺少的，只是真正可以耕種的土地。陝西的農民往往有了一百畝土地還是一個老窮人。地主至少要有幾百畝土地，而其中一部的土地須在肥沃的區域裏，否則他就不夠稱爲一個財主。

陝西的農田可以用「斜面」這個字來形容它，有時候竟可用「陡坡」來描寫它，因爲那山地是常常會塌下來的。那農田大多數是位於山凹與小溪之間的一塊塊的山地。這些山地上有許多看起來很肥沃，但是因爲地勢崎嶇的緣故，對於穀類的生產，不論在量與質方面，都極有限。有些荒山只見無數的山頭。它們跟了陽光的轉動幻成光怪陸離的形態和色彩。到了黃昏時分，無數山頭又變成了一個紫金色的大海，像一塊深顏色的天鵝絨在收摺起來，逐漸地朝着無底的山谷中沉下去。

只有第一天我騎了馬。以後我就很少騎馬，並不是爲了可憐這匹瘦馬，乃是爲了大家都步行的緣故。在這一羣人中李長林是個最老的戰士，其餘大多數是十多歲的小夥子。我同內中一個綽號叫做老狗的一起走，在同行時，就問他爲什麼要加入共產黨。

他是南方人，從福建蘇維埃區轉輾到西北，他也參加了六千英哩（合中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這是外國軍事專家認爲不可能的事。但是老狗到底到西北去了，他今年十七歲，而就他的神態看起來，却還不過十四歲。他完成了那一次長征，一些也不把它放在心上。他說，假使紅軍再這樣做的話，他準備再走二萬五千里。

和他在一起的，是一個綽號叫做老表的童子，他是從江西來的，走了幾乎與老狗同樣遙遠的路程。他只有十六歲。

他們都喜歡紅軍嗎？我問過他們。他們驚奇地看着我，很明白的，他們從沒有想到有人會不喜歡紅軍的。

「紅軍教我讀書和寫字，」老狗說：「現在我又學習管理無線電和打靶子。紅軍是幫助勞苦大眾的。」

「就只有這些嗎？」

「紅軍待我們真好，我們從未挨打。」老表回答說。『這裏是人人平等的。在「白」區裏，勞苦大眾就是地主和國民黨的奴隸。這裏大家都幫着勞苦大眾共同奮鬥，來拯救中國。紅軍對地主作戰，對民團作戰。紅軍是抗日的。爲什麼有人會不喜歡這樣的紅軍呢？』

還有一個農家的孩子是在四川加入紅軍的。我問他爲什麼加入紅軍。他對我說，他的父母是窮苦的農民，只有四畝田，不夠養活他和他的兩個姊妹。當紅黨到達他的村莊上的時候，農民都歡迎他們，燒茶給他們喝，做點心給他們吃。紅黨的戲劇家上台做戲了。那真是一個快樂的時光。只有地主逃走。當把土地重行分配的時候，他的父母也分到了一份，所以他加入勞苦大眾的軍隊時，他的父母只會高興，不會傷心的。

另外有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以前他是湖南省某縣鐵匠店裏的學徒，他的綽號叫鐵老虎。紅軍一到，他就扔了風箱，爐子和學徒的事，只穿着一雙革鞋和一條褲子，立刻投效紅軍。爲什麼呢？因爲他要和使學徒挨餓的師傅們打仗，和剝削他父母的地主們打仗。他要爲了解放勞苦大眾的革命而戰。紅軍待老百姓很好，不像「白」軍那樣要搶劫他們，吊打他們。他撩起了褲腳管，露出一條長的白創痕，打仗的紀念品來。

還有幾個青年是從福建、浙江、江西和四川來的，但是大多數是陝西、甘肅兩省的本地人。有幾個已經從少年先鋒隊「畢了業」，看上去他們雖然還像小孩子，實際上他們都已經做了多年的紅黨了。有幾個人是爲了抗日而加入紅軍的，有兩個人爲了不願做奴隸而加入紅軍的，有三個人是從國民黨軍隊中逃來的，但大多數人的所以加入紅軍，是「爲了紅軍是一種革命的軍隊，他是要打倒地主和帝國主義的。」

我再同一個小隊長談話，他是一個年齡「較長」的人，二十四歲。他是從一九三一年起就加入紅軍。那一年，他的父親和母親都在江西給南京的飛機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毀。他從田裏回家，看見父

母雙亡，馬上丟了鋤頭，別了妻子，加入共產黨。他有一個兄弟是紅軍遊擊隊隊員，一九三五年在江西被殺死了。

他們是很雜的一羣，但是和通常依照省區分隔的普通中國軍隊比較起來，在組織上是更具有「民族性」的。不同省區的背景和方言似乎並不使他門隔閡，相反的却變成了善意的笑料。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們發生嚴厲的口角。事實上，我在紅區旅行的時候，我沒有看見紅軍兵士打過架。在年青人中間，我想這個的確是很不容易的。

雖然他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中幾乎都發生過悲劇，但他們也許是太年青的緣故，一點也不灰心，他們都很快活，這可以說是我所看見的第一個真正快活的中國無產階級的一羣。消極的知足，是中國的普通現象，但是像他們這樣對於生存懷着積極感覺的高度的快活情緒，却實在是少見的。

他們在路上差不多是整天歌唱的，歌的來源是無窮的。他們的歌唱不是出於長官的命令，而是自發的，他們唱得都很好。當一個人靈感激動，想到某一首歌曲，而猝然大聲歌唱的時候，長官或兵士也都加入合唱。他們在夜間也歌唱，他們從拉着陝西胡琴的農民那裏，學會了許多的新的民間歌曲。他們所有的紀律，似乎完全是自動的。當我們走過野杏樹林的時候，隊伍突然散開。每一個人的袋裏都裝滿了杏子（也有幾個人給了我好些杏子）。於是他們就歸隊加快的開步走來。補足他們採杏子時犧牲的時間。可是，當我們走過私人的果園的時候，沒有人採過一個果子。我們一路上所吃的飯米和菜蔬，都照價付錢。

據我觀察，農民對於我的紅色伙伴，毫無憎惡之心，正好相反，他們似乎彼此都很友好，很忠誠，這

種事實與最近重行分配土地和廢除苛捐什稅等舉動是有關係的。農民把所有可吃的東西賣給我們，毫不遲疑的接受蘇維埃錢幣。當我們在中午或日落時達到一個村莊，當地的蘇維埃主席就立刻替我們預備休息的地方，指定爐灶給我們用。我常常看見農婦或她們的女兒自動地替我們拉爐灶上的風箱，和紅色戰士說說笑笑。這個對於中國婦女，尤其是陝西婦女，是一個絕大的解放。

最後一天，我們在蒼翠欲滴的山谷中的一個村中吃午飯，全村的孩子都跑來參觀他們第一次看見的洋鬼子。我決定來盤問他們一番。

「什麼叫做共產黨？」我問他們說。

「幫助紅軍打『民團』和日本人的就叫共產黨。」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高聲回答說。

「還有呢？」

「他幫助紅軍攻打地主和資本家！」

「可是，什麼叫做資本家？」

一個孩子回答不出，另一個孩子說：「自己不做工作，光叫別人替他工作的人，就叫做資本家。」  
這個定義也許太簡單了，我接着問下去：

「這裏有地主或資本家嗎？」

「沒有！」他們齊聲喊着。「他們都逃走了！」

「逃走！他們爲什麼逃走？」

「怕我們的紅軍！」

「我們的」紅軍，一個農民的兒童竟會談到「他的」軍隊！很明白的，這不是中國，但是，不是中國，這又是什麼呢？我認爲這是不可致信的。什麼人能夠這樣教他們的呢？

後來我看到紅色中國的教科書，會見前任湖南長沙師範校長，現任蘇維埃教育部長，徐特立的時候，纔發現那些兒童的是什麼人。

事實上，在那天下午，當我們這一批人走下最後的山坡，踏進紅色中國的臨時首都的時候，我就見到了他。

## 第三章 在保安

### 一 蘇維埃的巨頭

在西北小村莊很多，但是各式的城市却少見，除了紅軍始創的工業外，全是農業區，有多處則爲半遊牧地帶。因此，一登崎嶇山岡，俯視蜿蜒在葱翠的山谷中的保安古城，就令人有出塵之感。（註）

當唐宋兩朝時，保安曾爲防禦北狄南侵的要塞。至今在一條小徑旁邊，還留着堡壘的殘蹟。閃爍于午後的陽光中，當年蒙古族征略軍，就是由這條小徑開到山谷裏的。那裏還有一座駐紮過邊防軍的內城，以及一座高大的磚堡，最近曾由紅軍改造圍着約一英方里的土地，就是現在保安城的所在地。

我在那裏終於找到了南京跟他作戰十年的紅軍領袖——毛澤東，就是「中國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這是新近採用的正式頭銜。那「中國工農蘇維埃共和國」的舊名已在紅軍開始實行「聯合陣線」新政策時取消了。

周恩來的電報已經收到，他們正等着我，在「外交部」裏已替我預備了一個房間，我就暫時成了蘇維埃政府的上賓。我到了後，頓然增加了外僑的人數。另外的西僑就是一位被稱做李德同志的德國人。他以前是德國的高級軍官，現爲紅軍唯一的外籍軍事顧問。

我到後不久，就會見了毛澤東，他是一位頗長而帶有林肯式的人物，身材高於一般普通的中國



人，背有些駝，披着一頭長而濃的烏髮，睜着一雙大而銳敏的眼睛，高鼻梁高顴骨。我在一霎那間所得的印象，是一個非常敏銳的知識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幾天裏，我總沒有機會能證實這點。我第二次見他正當黃昏時候，他光着頭在街上閒步，熱切地做着手勢和兩個年青的農民談着。我不知道是他，直到家指出纔知道。南京雖然出了二十五萬元的賞格購買他的首級，可是他仍無顧慮地和旁的人們一起散步呢。

關於毛澤東我就可以單獨地寫一本書。我曾跟他談了許多夜，談到多方面的廣泛的問題，我也從士兵和共產黨員那裏，聽到許多關於他的軼事。我所寫的毛澤東訪問記，總共有兩萬字。他告訴了我，他幼年和青年時代的狀況，他怎樣成爲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領袖，成爲共產主義者的原因，以及紅軍發展的經過。他敘述長征西北的情形，並且寫了一首舊詩給我。他又告訴我許多旁的著名赤色份子的軼事，從朱德以至那位背着藏有蘇維埃政府檔案的兩隻鐵文件箱隨軍長征的青年。

我怎能用寥寥數百字，從如此豐富而沒有發表過的材料裏，寫出這個出身農家的知識分子轉向革命的故事呢？我實無嘗試這樣的縮寫的希望。毛澤東生平是全時代一個豐富的橫切面，是理解中國運動源流的指針，而且，我還將根據他所告訴我的話，將他個人的富有刺激性的歷史寫了出來。但在這裏，我希望說一些主觀的印象，以及幾件關於他的有趣味的事實。

你千萬不要以爲毛澤東可以成爲中國的「救主」。根本沒有這句話。中國決沒有什麼「救主」。

（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紅軍佔領陝北延安（府施）就遷都于此。

「但是不可否認地，你會覺有命運的某種力量存在他的內心。這並不是瞬息即滅的東西，而是一種堅實的單純的活力。你又會覺得在這個人的身上成長着一種非常的特質，他綜合地說出了中國大衆特別是農民階級的渴望——這些人是貧困的，飢餓的，被壓榨的，不識字的，然而馴良的，忠實的，勇敢的，現在又很革命的，佔着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人類。假使這些企求以及那正在推動他們向前的運動是可以作爲改造中國的動力，那末在這深刻的歷史意義上，毛澤東或許能成爲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但我可沒有在此宣告歷史的功罪的動機。同時，毛澤東除了政治生活以外，他是一個有趣的人物，因爲他的名字雖則同蔣介石一樣爲中國人所熟悉，可是一般人對於他卻很少知道，因此對於他發生了各種奇怪的傳說。我是第一個訪問他的外籍記者。

毛澤東有着「神怪生活」的名聲。南京曾經幾次宣告他是死了，可是沒有幾天以後的報上又發現了國民黨也會幾次正式「槍斃」了並埋葬朱德，而那些具有神視力的傳教士又時時加以證實。這兩個名人無數的死訊，可並不能阻礙他們許多艱難偉大的歷險，這次長征也在內。當我訪問紅色中國的時候，報上正盛傳毛澤東的確死了，但我發覺他實在好好的活着。不過，關於他的「神怪生活」的傳說，似乎有一些兒根據，因爲事實上，他確身經數十戰，他確曾被俘而脫逃，他確曾有世界上最高的賞格購買他的首級，可是在這許多年間，他從不會受過一次傷。

一個晚上，我偶然走到他的屋子裏，他正在受一赤色醫生——一個熟悉醫理的歐洲留學生——檢驗體格，結果他的身體是非常健康。他從不會生過肺痛或旁的「不治之症」，像有些荒唐的旅

行家所謠傳。(註)他的肺部是健全的，雖然他跟大部分赤色領袖不同，就是他是一個過量的吸煙者。在長征西北途中，毛澤東和李德（另一個煙癮很大的人）到處作新的植物學的研究，遍嘗各種葉子，尋求煙葉的替代品。

毛澤東現在的夫人賀芝蓮以前是學校教員，今為共產黨的組織者，卻不及她丈夫的幸運。她受有十幾處的飛機炸彈的彈片傷，不過都是輕傷。我離開保安以前，毛氏夫婦新生了一個女孩。毛澤東的前妻楊開輝曾養了兩個孩子。楊氏是中國一個名教授的女兒，幾年前給何健槍斃了。

毛澤東今年（一九三七）四十四歲。在代表當時生活在赤色法律（註）統治下的九、〇〇〇左右的人民的第二次全中國蘇維埃大會中，他被選為中央蘇維埃臨時政府的主席，在這裏，我要插入幾句話。毛澤東估計在（一九三四）中央蘇維埃政府所直接管轄各區最大的人口數是這樣的：江西蘇區三、〇〇〇、〇〇〇；鄂皖豫蘇區二、〇〇〇、〇〇〇；湘贛鄂蘇區一、〇〇〇、〇〇〇；贛湘蘇區一、〇〇〇、〇〇〇；閩浙蘇區一、〇〇〇、〇〇〇；湘鄂蘇區一、〇〇〇、〇〇〇。

（註）弗理明 Peter Fleming 在其一個人的伴侶（One's Company）一書中，就散播着這種謠言。

（註）參閱中國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九三四年英國勞倫斯書局出版）一書。其中包括蘇維埃政府的臨時憲法，並說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基本目標。又可參閱紅色中國——毛澤東對於中國蘇維埃共和國進步的報告一書（一九三四年倫敦出版）。

、〇〇〇共計九、〇〇〇、〇〇〇。如果照空想家的估計，把紅軍或紅軍遊擊隊所活動的每個區域的人口也算了進去，那末就有這個數目十倍。當我對毛說到在中國蘇維埃治下的人民有八千萬之衆的時候，毛就笑了起來，並且說，假使他們真的有這樣廣大的面積，革命早就可以獲得實際的勝利。不過在紅軍遊擊隊所佔領的區域，那時當然也有好幾百萬的人民呢。

如今，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領域裏的勢力，也許比任何人都要大。他幾乎是各種委員會的委員——如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政治局、經濟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公共衛生委員會以及其他。他實際的勢力是在於統制有決定黨政軍政策大權的政治局。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而且敬重他，但至少還沒有人將他作為英雄偶像而崇拜。我從未碰到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滿口的「我們的偉大領袖」，「我曾聽到有人把毛的名字當作是中國人民的同意語，但是，我卻也從未碰到一個不喜歡「主席」——個個人都這樣叫他——或不佩服他的人。他個人在這運動中的任務明顯地是很大的。

在我的目光裏，毛澤東是一個極有趣味而複雜的人物。他具有中國農民質樸的不做作的性格，並且富有生動的幽默風趣，愛好樸實的笑。他常笑着自身的問題和蘇維埃的缺點——這種孩子氣的笑是決不會動搖一些他對於他目標的內心的忠誠的。他說話坦直，生活簡單，也許有些人以為他簡直是粗野而庸俗。然而他綜合着這些不同的性質：鄉野的質樸，加上了最銳利的智慧和處世的機巧。

我以為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賦機智這一點——大概是對的。毛澤東並且是一個中國舊學的學者，一個無所不讀的讀者，一個哲學和歷史的深切研究者，一個善於辭令的演說家，一個

具有非常記憶力而非專心的人，是一個傑出的作家，他雖毫不留意個人的習慣與外表，但對責任上瑣碎的事情却都關心到，一個精力不竭的人，同時又是一個很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的策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在最能幹的戰略家，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當我在那邊時，紅軍在保安建造了幾所新的建築物，但是設備是非常之簡陋的。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窰房裏，四面壁上只掛了一些地圖。他知道有的地方比這更壞，然而因為他是一個湖南「中」農的兒子，他也知道有比這更好的地方。他們足以誇耀的主要貴重品，只是一頂蚊帳。此外，毛澤東的生活，便和紅軍全隊士兵們完全相同。做了十年紅軍的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員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只是一床毛毯，幾件個人的用品，包括了兩套棉制服。他雖則是紅軍的領袖而又兼主席，他所佩的領章，也不過兩條紅帶，這是普通紅軍兵士所佩的。

我曾幾次同毛澤東去參觀村民和紅軍的羣衆大會，以及紅色戲院。他毫不觸目的坐在觀衆的中間，盡量地享樂。記得有一次在抗日戲院裏，當換幕的時候，羣衆一致要求毛澤東和林彪來一次合唱。林彪是一個二十八歲的紅軍大學的校長，以前他是蔣介石參謀部裏一個著名的年青的人員。林像一個小學生似的漲紅着臉，只好登台表演，用一番流利的演說，請女同志代歌一曲。

毛澤東的食物，也同每個普通人一樣，但因為是湖南人，他歡喜吃辣。他甚至用辣椒夾麪包喫。除了這種嗜好之外，他不留意於所喫的東西。有一次喫晚飯的時候，我曾聽他發揮愛喫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論。他第一舉出他的家鄉湖南，就是因產生革命家而著名的。他又列舉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國和法國來證明他的理論，可是後來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他又笑着自認失敗了。意大利人歡喜紅辣

椒與加釐的例子駁了他的理論。出乎意料地「赤區」裏最風行的歌曲之一，是一支叫做「熱熱的紅辣椒」的小調。這個小調說辣椒怨恨着自己是植物界裏愚笨的東西，等待他人去喫，並且說到它如何譏諷那些自足於無脊骨的一生的捲心菜，菠菜和蠶豆。結果他領導了蔬菜的革命。這「熱熱的紅辣椒」是毛主席非常愛聽的一支小調。

他沒有自大自誇的毛病，但是具有很高的自尊心，同時，他又有當機立斷的力量。我從未見過他發脾氣，可是我聽到人家說，他有時也會激起強烈的嚴厲憤怒。那個時候，他所發的譏刺和痛罵，是深刻而能致人於死的。

他對現代世界政治是極熟悉的。就是在長征時期中，紅軍似乎也在收取廣播的時事消息，在西北，他們還發行着自己的報紙。毛澤東對於世界史很有研究，而於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一個切實的概念。他對於英國的工黨很感興趣，熱切地問我關於工黨現行的政策，馬上把我所知道的問題。我覺得他似乎難於了解為何像英國這樣工人有參政權的國家，為什麼仍然沒有工人的政府。我恐怕我的答案是不能使他滿意的，他表示對於麥唐納極端的輕視，他以為麥唐納是背叛英國人民的「英奸」。

他對於羅斯福總統的見解，是極有趣味的。他深信羅斯福是反法西斯主義者，並以為中國可以同這種人去合作。他又問到許多關於美國藍鷹運動和羅斯福外交政策的問題。這種詢問，足以表示他對於這兩個對象都有很明白的概念。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當做走方郎中，但以為墨索里尼是個較有才能的人，一個懂得一些歷史知識的實際的陰謀家，而希特勒，只是個資本家的沒有意志的

傀儡。

毛澤東讀過許多談到印度的書，對於印度問題也有一些肯定的見解。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認為不經過土地革命，印度的獨立，是無法實現的。他又問到甘地、尼赫魯、却多巴蒂亞 (Suhasini Chakravarty) 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領袖。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而不正確地把黑人和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互相比較。後來我指出美國的黑人和蘇聯的少數民族，在歷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種很大的異點，對於這點，他雖也頗加注意，但與我的意見相左。

毛澤東是哲學的熱心研究者。有一次，我正在晚上和他討論共產黨黨史，一個客人帶了幾本新的哲學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我改期再談。他費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這幾本書，在讀書時候，他似乎是什麼都不顧問的。他所讀不僅限於馬克思派的哲學，而且也讀些古希臘的斯賓諾莎、康德、哥德、黑格爾、盧梭以及其他著作。

我時常驚奇毛澤東自己的對於威力，暴力以及「殺人必然性」等問題的責任性。年青的時候，他就很有着自由主義的和人道主義的趨向，他從理想主義轉到現實主義，大概只是出於哲學思想上的一種轉變。雖然他出身農民，但在幼年時候，卻不會怎麼受過像有許多赤色分子所遭受的那樣的壓迫；還有雖然馬克思主義是他思想的核心，然而據我推想，階級仇恨在他的哲學體系中一種主要的機構，而不能說是行動的基本衝動。

在他的內心裏似乎沒有所謂宗教情感；因為他的判斷全以理性和需要為根據。因此，我以為他對於生死相關的共產主義運動，大約是有中庸的影響的。就我看來，他正在竭力地研究他的哲學，即

「長期觀察」的辯證法與他在任何巨大行動過程中的軌範，在這種思想領域中，人類生命的寶貴只是相對的。這顯然是與歷來總是把利害主義爲先而以道德觀念爲後的那些中國領袖不同了。

毛澤東每天要做十三、四小時的工作，常常直到深夜二、三點鐘纔休息。他似乎有鐵一般的體格。他回憶到他的少年時代，他曾在父親的田野中做過艱苦的工作，回憶到他在學校讀書的刻苦時間，當時他曾與幾個同志組織類如斯巴達俱樂部的團體。他們慣常到華南叢林的山中作長距離的步行，在最冷的日子去游泳，赤了膊在雨雪中跑步——這一切都是鍛鍊他們自己。他們直覺的深信將來的中國，正需要有忍受巨大的艱難困苦的能力。

毛澤東有一次，曾經費了一個夏天，走遍湖南全省。他挨戶替農家做工，以求一飽，有時候竟其行乞。有一個時候幾天不喫東西，只喫些硬豆和水——這又是一種「鍛鍊」腸胃的方法。他在這次早期旅行中所得到的友誼，對於他以後是有很大價值的。大約十年以後，他開始把湖南千萬農民組成了著名的農民協會，在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成爲蘇維埃最初的基礎。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深情的人物。我看見他的眼睛是潤濕的，在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不幸事件的時候。這不幸事件，就是湖南米穀暴動和饑饉，而有幾個饑饉的農民因到衙門求食而被斫了頭。有一個兵士對我說，他曾親眼看見毛澤東把自己的短衫脫給一位在前線受傷的同志。他們又說在紅軍戰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願意穿鞋的。

然而我很懷疑，假使他能夠博得全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敬仰，這不全是因爲他有了特別的思想，而是因爲他含有農民的個性。巴萊托的（Parsons 通俗資本論的作者）中國弟子們也許要以爲



他是粗魯的。我記得有一天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看見他不經心的解了褲帶，找尋什麼寄生動物，——巴萊托如果生活在同樣的環境中，他或許也要找尋一下。但我可以斷定，巴萊托卻決不願當着紅軍大學校長的面前解下褲子的。——當我訪問林彪的時候，毛澤東確曾這樣做過一次。這是一間非常悶熱的小房間。毛澤東向牀上一躺，屏住了呼吸，對着壁上的軍用地圖，細心地研究了二十分鐘。

——林彪突然問起日期和人名，毛澤東全知道。他冷淡的習慣完全和他不修邊幅的外表相配，雖然他也可以很便當地打扮得同巧格力糖匣上的「將軍」和中國名人錄中的政治家的照相一樣。

在長征的途中，除了幾星期生病以外，毛澤東大部份是和全隊弟兄一樣步行的。近年來，在任何時期中，毛澤東只要向國民黨投降，儘可以得到高官厚祿，大部份的紅軍領袖也都是如此。你難於充份估量共產黨十年來忠於主義的堅定性，除非你懂得中國『銀鎗彈』的掌故，旁的叛徒們照例是用這一套手段被收買了的。

據我看，他是一個誠實而忠於他所說的人。我曾經證明他許多的主張，而我認為都是對的。我受到了他的政治宣傳的溫和劑，這不是我在非「蘇區」所受到的可比，無論我寫文章或拍照片，他從來不干涉我，這樣的善意，是使我非常感激的。他竭力要知道我所搜集的關於能夠說明蘇維埃生活的方面的材料。

因為共產黨在今天中國政治背景上的重要性，他的關於共黨政策的主要宣言，是值得加以仔細的研究的。在今天，西北全部以及其他各地武裝和非武裝的中國人民，都對他們的許多政策似乎表示着同情，所以在中國國運基本的轉變中，這些政策也許將成爲必要的工具。

## 二 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中國紅軍今日的基本政策是什麼？關於這個問題，我曾經和毛澤東及其他共產黨領袖談了多次。但在研究這些政策之前，我們對於共產黨跟南京長期鬥爭的性質，必須先有一些概念。如果我們只想知道一些紅色西北最近的情形，我們也必須先看幾件歷史的事實。

在下列各節中，我將部分的闡明洛甫的見解，洛甫是一位曾經受過美國教育的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年青書記，我曾在保安會見他。這似乎有些麻煩，但我以為這是值得的。

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是在一九二一年方始產生的，它很迅速地長成着，直到一九二三年國民黨的創始者孫博士發表了著名的聯俄宣言後。那時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沒有政權在握，而且兩黨都因企求建立民主政權而奮鬥。因此他們很易於達到一個諒解的。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於俄國顧問的協助之下，根據列寧的黨的路線，改組了一次。國民黨與共產黨形成了一個聯盟，共產黨很活動的領導和組織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這次革命結果推翻了腐敗的北京獨裁政權。

在共產黨方面說，這次合作的基礎，總合起來是在於孫總理和國民黨的接受兩大革命原則。第一是承認一個反帝政策的必要——用革命的方式恢復全部政治的領土的以及經濟的主權。第二是對內要求一個反封建制度和黷武主義的政策——實行民主革命，以剷除地主和軍閥，並建立新的方式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一點，國共兩黨都同意必須是民主性質的。

共產黨當然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性」革命的成功，是將來建立任何社會主義社會的先決條

件，因此在維持一個「民主性的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運動中，他們的地位是合乎邏輯的。

不幸，在一九二五年，孫總理於革命尙未完成前死了。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合作結束了。從共產主義者的觀點看來，國民革命也可說是在那時候結束了。國民黨右翼，因受了新軍閥主義的支配與某些列強，銀行家和地主的支持，實行與那合法選出的武漢政府宣告分裂。他們在南京建立了蔣介石統治的政權，這當時共產黨和大多數的國民黨認為是「反革命的」，他自身就是違反「資產階級民主性革命」的。

國民黨不久與南京言歸於好，而共產主義卻成了處死的罪名。共黨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兩要點——反帝運動和民主革命——實際上已被放棄了。接着就是軍閥的內戰，和遏制那些初起的土地革命的戰爭。無數的共產黨和從前農工的領袖，遭了殺戮。各種農工會都被取消解散。所謂「開明的獨裁政權」用武力剷除各種敵黨。然而即使這樣，軍隊中却遺留無數的共產主義者，而整個的共產黨遭受了一個極端恐怖主義的時期。國民黨雖然花了幾十萬金錢於撲滅他們的內戰，可是到了

一九三七年，紅軍却在西北佔領了他們從來未有統治過的一塊整個的最大的土地。

當然，赤色分子相信着，一九二七年以來十年的歷史增強了他們的論題，對外不實行反帝政策，對內不實行土地革命，中國的民族獨立和民主政治（國民黨也把這認做他們的目的）是不能達到的，這裏無須詳細闡明他們的意見。不過，假使我們要知道共產主義為什麼能夠，尤其在愛國青年中間，不斷地增加它的羣衆，為什麼當這個時候，它還能在歷史上表演遠東大動亂的事實，我們就必須注意它主要的理論。他的理論是什麼呢？

最主要的，共產主義者說，自從南京拋棄了革命的生活力以後，中國很迅速地失去很多的土地。一次連一次的妥協，土地革命的失敗，結果激起了廣大的不滿，以及全國許多地方農民的公開叛亂。在過去十年中農民貧窮和困苦的一般情形，更形惡化。沒有一個經濟學家不知道中國現在也有了幾條已通車的公路，有了精銳的飛機隊和新生活運動，而對於中國未來黯淡的前途，不覺得悲慘的。每天所發生的災荒報告，在許多國家中要算是大禍患了，但在中國多少是常事。舉例說，甚至在我執筆的時候，報上就登載着從中國的中部與西部寄來的可驚的消息。

豫、皖、陝、甘、川、貴各省災情，續有所聞。全國顯已遭逢多年來最嚴重之災饑，而千萬人已歸死亡。據最近川災救濟委員會之調查，該省災區現有災民三千萬人，樹皮與觀音土，俱已為食料。據傳，陝西現有難民四十萬人，甘肅百萬人以上，河南約七百萬，貴州約三百萬人，貴州災况波及六十縣，中央社認為百年來所未見之最嚴重之災饑云。（註一）

四川的賦稅已經預徵到六十年或者不止此數，農民因無力納稅繳租和付高利貸的利息，幾千畝的田地都任它荒蕪着。在我六年來所搜集的材料中，也顯示着許多別省相同的悲慘的情形，但却很少顯示這種災難發生可能性有漸減的傾向。

當農民大眾迅速的趨於破產的時候，田地和財富却隨着獨立農業衰落的比例而集中到少數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手中。（註二）李滋羅斯博士（Leith Ross）說中國沒有中產階級，只有赤貧和大富；假使這句話在過去不對，將來也許會如此的。苛捐什稅，舛誤的穀物分配方法以及社會政治和經濟全部的傳統制度，這是維脫富格爾博士（Dr. Karl August Wittfogel）所稱的「亞細亞生產方

法，」使得沒有田地的農民，永遠的負着重債，毫無積蓄，而當碰到旱災、饑饉、水災等大禍患到來的時候，就絕對不能應付了。

毛澤東在一九二六年當國民黨農民委員會的祕書（在國共分裂之前當時毛氏是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曾經管理二十一省田地統計的搜集。據他說，這種調查說明了土著地主、富農、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貸者，總共佔有中國所有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十，然而他們人口的總和只有全部農民的百分之十。中等農民擁有百分之十五的土地。但是那佔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貧農、佃戶和雇農，却只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

據毛澤東說，「自從反革命以後，這些統計全被禁止發表了，在十年後的現在，我們仍然不能從南京方面得到一些中國土地分配情形的報告。」

共產黨以為農村的破產，爲了放棄反帝鬥爭而更加迅速，所謂反帝鬥爭，在目前大多數中國人的意思就是「抗日鬥爭」。南京政府對日實行「不抵抗政策」的結果，中國失去了五分之一的領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鐵路，百分之八十五的未耕地，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鐵礦，百分之三十七的最良好的森林地和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輸出貿易。日本現在控制了中國全部百分之七十五的生鐵和中國所有的鐵礦企業，以及半數以上的紡織業。東三省從中國其他各省的輸入，佔其總輸入

（註一）見“Democracy”，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北平。

（註二）近來關於研究和分析這種發展最精當的著作，是陳翰笙《中國的地主和農民》（一九三六年紐約出版）。

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到一九三五年，中國對「滿洲國」的貿易，卻只佔它的輸入的百分之四。這是把中國最適宜於發展工業的區域給了日本——使日本可以阻止這種發展，而把原料移作它自己的工業之用。這是把大陸上的根據地給日本，而從這裏它可以毫無顧忌地繼續不斷地壓迫中國。許多人覺得，即使中國其餘部分不再受侵略，而這種的變動，已足以抹去南京所望於將來改革所必需

的利便。

那末，南京九年來勦共的結果是什麼呢？西北方面最近曾把這結果在一個反對第六次反共「清剿」運動的宣言中綜合起來。它告訴我們，在第一次「清剿」運動中，失去了東三省，再一次發生了上海事變，第三次熱河是失守了，再一次割去了冀東，第五次「肅清殘匪」運動中，冀察的主權又蒙了極大的損害。西北方以為，如果蔣介石再來一次新的勦共運動，綏遠一定又將失去，這是跟日本侵入該省北部的行動完全呼應的。

當然，南京不會停止內戰的，如果紅軍仍是想用武力推翻政府。但早在一九三二年，紅軍就主張和平，在抗日計劃上與南京攜手。他們的提議是被拒絕了。現在紅軍雖然在西北發展的地位已得到了軍事上很大的利便，然而他們卻在全國抗日軍隊和愛國團體的合作之下，又重申舊議，要求合作，停止內戰，並建立全國的「反日陣線」來抵抗侵略者。它不惜把紅軍和蘇維埃區全部歸中央政府來統治，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代議政府，對日抗戰，給人民以選舉權，保障人民的一切法權與自由。換句話說，共產黨準備與國民黨「破鏡重圓」，只要它能重新採用反帝國主義與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政策。在這兩個基本目的中，他們認定求民族生存而鬭爭是至高無上的。

甚至情願放棄內部土地問題的鬭爭；他們又認定階級矛盾能併到外部對日矛盾的最後解決中，因為不解決外部的矛盾，這當然是不能成功的。

把毛澤東在我訪問時候所發表的談話，引幾段如下：

『目前中國人民基本的論點，就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我們蘇維埃的政策，是完全把這種鬭爭的條件作爲基礎。日本的黠武主義者希望征服全中國，而使中國人民成爲他們殖民地的奴隸。反抗日本的侵略，反抗日本經濟和軍事的征服——這些就是在分析蘇維埃政策時所必須記住的要點。』

『日本帝國主義不單是中國的敵人，而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者的敵人，特別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關係諸國，即美英法和蘇聯各國人民的敵人。日本的大陸政策和海上政策，不僅對着中國而發，而且也是對着那些國家的……』

『我們對於列強各國希望的是什麼？我們希望友邦各國至少不要「助紂爲虐」而採取一個中立的地位。我們盼望他們能够積極的幫助中國反抗侵略和征服。』

在運用「帝國主義」這個名詞的時候，共產黨明顯地把它現在積極侵略中國的日本和目前與中國友好的互不侵犯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分了開來。毛澤東解釋說：

『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我們看出在列強中間，有許多表示不願意捲入新的世界戰爭的漩渦，有許多不預備坐看日本佔領中國，如美、英、法、荷、蘭和比利時諸國。此外還有永遠在強國侵略的威脅下的國家，如暹羅、菲列賓、中美諸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荷屬東印度等，這些國家都』

多少受着日本的威脅。我們都把他们引爲朋友，而要求他們的合作……

『因此，除了日本和那同日本帝國主義一鼻孔出氣的國家以外（毛澤東到處發表意見，就是指意德兩國），上述範圍中的各國，可以組成一個反戰反侵略和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在過去，南京曾從美英和其他各國接受了許多的幫助。可是這些借款和供給，大部分消耗於內戰。每殺一個紅軍的兵士，等於殺了許多的農民和工人。據銀行家章乃器在最近發表一篇論文中的估計，南京每殺一個紅軍的兵士，必須耗去中國人民八萬元的金錢。（註）因此，在我們看來，這樣的「援助」於中國人民是無利的。

『只有在南京決定停止內戰，發動對日本帝國主義抗戰，與革命的人民聯合建立一個民主的國防政府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這樣的援助對於中國民族纔有實際的利益。』我問毛澤東蘇維埃是否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他指出有許多不平等條約，實際上已爲日本所破壞，特別就東三省的情形而言。講到對於中國代議政府的未來態度，他說：

『那些援助中國或並不反對中國爲獨立解放而戰爭的列強，應該請他享有中國密切的友誼關係，那些積極援助日本的列強當然不能給予同等的待遇。譬如德國和意國，他們早已同「滿洲國」發生了特殊的關係，是不能算做中國人民的友邦的。

『對於善意的列強，中國願意和平談判互惠的條約。對於其他的列強，中國準備與之維持範圍更廣大的合作……關於日本，中國卻必須以解放戰爭的手段，來廢止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所有的財產，取消日本在我國的特殊利益租界和勢力。至於我國對於其他列



強的關係，我們共產黨人並沒有什麼能使中國在抗日鬪爭中處於不利的國際地位的計劃。

『當中國真正獲得了獨立時，那末，合法的外國商業利益也可以得到比從前更大的機會。四萬五千萬人民生產和消費的力量，已不能算爲中國獨佔利益的事情，而必須與各國同享受的。我們幾萬萬的人民，一旦真正的解放了，則以他們解放出來的潛在的偉大的生產能力，作各方面創造性的活動，一定有利於改善全世界經濟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準。然而中國人民的生產能力在以前卻很少發現，相反的，它還受着本國軍閥和日帝國主義的雙重的壓迫。』

最後我問：『中國與民主的資本主義強國締結反帝的聯盟是否可能呢？』

毛澤東回答說：『反帝，反法西斯的聯盟，與共同防止好戰國家的和平聯盟性質相同。中國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締結的反法西斯公約，是完全可能而且必須的。這種國家的加入反法西斯陣線，也正爲着自衛……』

『假使中國不幸變爲殖民地，那就是長期的恐怖無人道戰爭的起始。爲了它自己，中國人民將選擇對壓迫者抗戰的路，我們希望外國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跟我們同一步伐，而不重踏帝國主義又以血的歷史所建造的黑暗的途徑……』

（註）人民和黨人被殺的，要比正式紅軍兵士被殺的多得多。章君的估計，除了實際軍事費用外，包括着勞動損失、穀物損失以及村莊農田破滅的耗費。

『要抗日成功，中國也必須找取其他列強的援助。然而這不是說，沒有外力的援助，中國就不能抗日。』中國的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和中國的人民，準備與任何的一個列強聯合，以縮短這次戰爭的時日。但即使沒有人能參加我們，我們也決定要單獨地幹下去的！』

紅軍是真的想像中國可以擊潰日本這樣強大的戰爭能力的麼？我能斷定他們是的確這樣想着。那末，他們能得到勝利的假定是根據那種特殊邏輯呢？這就是我向毛澤東所提出的十幾個問題中的一個。他的回答確是一種鼓動的也許是預言的東西，雖然正統派軍事家的意思，要以爲這是一種幻想。

### 三 論對日戰爭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晚上九時後，我坐在毛澤東屋子裏面一條沒有靠背的方檯上，那時熄燈號已經吹過，所有的燈火也快全部熄滅了。毛澤東家裏的天花板和牆壁都是堅硬的石塊做的，下面是磚地。窗戶也是用石壁挖成，半窗裏挂着一幅棉質的窗簾，我們前面是一張鋪有一條清潔的赤色抬布的，未加髹漆的方桌，蠟燭在上面爆着火花。毛夫人正在隔壁房間裏，把那天買來的野桃子製成蜜餞果。毛澤東兩腿交叉着坐在岩石鑿成的檯上，吸着一支前門牌香煙。

坐在我旁邊的是吳亮平，他是一位年青的蘇維埃「公務員」，担任着我對毛澤東的「正式」訪問時的譯員。我把毛澤東對我所提出的問題的回答，統統用英文記下來，然後又譯成了中文，由毛氏修改。毛澤東對於極細碎的地方也必力求準確的。靠着吳先生的幫助，把這訪問錄再譯成了英文。

經過了這樣仔細的修正，我相信這些報告的錯誤也許能比較少些。

吳亮平是浙江奉化——蔣介石的故鄉——一個大地主的兒子。幾年以前，他從家庭裏逃出來，因為他那位趨炎附勢的父親要叫他和這位總司令的一個親戚訂婚。吳是上海大夏大學的畢業生，在上海，吉文斯（參看第一章）曾經拘捕他，在華德路西牢裏坐了兩年監。他曾經留學法國、英國和蘇聯，他還只二十六歲，因為努力工作，他受到了軍服、居室和食物的獎賞——後者主要是粟米和麵包片等。

毛開始回答我提出關於共產黨對日政策的問題，我的問題是這樣的：『假使日本打敗了，而且被逐出了中國，你是不是以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大問題大體也就可以解決呢？』

『是的。假使別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像日本那樣幹，假使中國果真打敗了日本，那就表示中國的羣衆是驚醒了，動員了，而且建立起他們的獨立了。因此，那帝國主義的主要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

我問：『在什麼條件之下，你以為中國人民能够打敗而且消滅日本的武力呢？』

他回答：『三個條件可以担保我們的成功：第一，建立中國民族反日聯合戰綫；第二，建立世界反日聯合戰綫；第三，發動目前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下被壓迫人民革命。中心點當然還是在中國人民自身的聯合。』

我問：『你想這次戰爭要多少的時候呢？』

毛答：『這要根據中國民族戰綫的力量，要根據中日兩國的許多因素，要根據國際對華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革命發展的速率而定。如果中國民族的戰綫是有力的和諧的，如果縱的橫的兩方面

都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那些了解自身利益已感受日本帝國主義威脅的國家能對華予以可觀的援助，如果日本革命迅速的爆發，那末這次戰爭的時期是很短促的，而且勝利立刻可以得到。（註）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實現，那末戰爭的時期是很長久的，但結果，日本還是同樣的失敗，只是犧牲重大，而全世界將忍受一個痛苦的時期。」

問：『關於這次戰爭的軍事和政治的發展的過程你的意見怎樣？』

答：『這包含着兩個問題——列強的政策和中國軍隊的戰略。』

『現在，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決定了而且誰都知道的了，那些以爲再犧牲一些中國的主權，再作政治上和領土上的妥協與讓步就可以阻止日本前進的人們，簡直是沈溺于烏托邦的夢想。南京過去所採取的錯誤政策，就是因爲根據了這種戰略，我們只要看一看東亞的地圖，就可知道結果是怎樣了。

『我們熟知不僅是華北，連揚子江下流和我們南部的港口，都包括在日本的大陸計劃裏面。同樣我們明知日本的海軍還想封鎖中國海，並謀攫取菲列賓、暹羅、安南、南洋羣島和荷屬東印度。一旦戰事爆發，日本必企圖把這些地方作爲軍事根據地，截斷英法美和中國的聯絡，同時並獨霸南太平洋的幾個海。這種行動都包括在日本海軍作戰計劃中，而且我們曾經看到過這方面的紀錄。這種海軍的戰略，是必將與日本陸軍戰略相調和的。

『有許多人以爲一旦日本佔領了沿海的幾個軍事要點而實行封鎖以後，中國就沒有力量再繼續對日抗戰了。這是胡說。我們只要看紅軍的歷史，就可以推翻這種荒謬的議論。在某些時期中，我

們的力量要比國民黨的軍隊小過十倍或二十倍，同時他們的軍器也遠勝我們，他們的經濟資源超出我們好幾倍，他們還接受國外物質上的援助。可是，爲什麼紅軍還能節節的戰勝那些白色軍隊，牠非但能夠存在到今天，而還能增加它的力量？

『這解釋就是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已在他們區域內的羣衆裏，建造了一個磐石般的堅強團結，因爲每一個蘇區中的人都預備爲他們政府反抗壓迫者而戰，因爲每一個人都是自願的，有意識的，爲着他們本身的利益和真理而戰。第二，在蘇維埃的鬥爭中，人民都是受着有能力和有決心的人的領導，他們對於他們的地位在戰略上、政治上、經濟上以及軍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刻的了解。紅軍獲得了許多次的勝利——在開始的時候幾個有決心的革命者只有幾十枝的來復槍——因爲它在人民中有堅固基礎，所以它能從平民方面甚至從白軍方面吸引許多的同志。敵人在軍事上固然大的勝過我們，可是在政治上，它却是無能爲力的。』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所可獲得的利益，要比紅軍對國民黨鬥爭時候所有的更來得巨大。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它不能說是被征服了，除非每一寸的土地都是統治在侵略者的刀刺之下。就算日本能夠佔據中國的一大塊土地，擁有一二萬萬人口的土地，我們還不見得就此打敗。我們仍舊有着偉大的力量來抵抗日本的軍閥，而且在整個戰爭中，它還得時時的用重兵防衛他的後方。』

（註）共產黨在一九三二年就已「正式」對日抗戰，那時蘇維埃政府就已在江西發表對日戰爭的宣言。這宣言爲國

民黨所禁止發表。參閱紅色中國毛澤東主席的報告第六頁。（一九三四年倫敦出版。）

「關於軍火，日本不能奪取我們內地的兵工廠，而這是足以供給中國軍隊用許多年的；她也不能阻止我們從她自己手中奪取大量的軍火，紅軍就是用這種方法從國民黨那裏奪取而擴充它現在武力的，九年以來，國民黨成了我們的一軍火運輸隊。」如果全中國人民聯合抗日，那末，利用這種策略來奪取我們的軍火，當然有更大的可能性了！

「從經濟上說，當然中國不是統一的。但是中國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在對那極度經濟集中的日本抗戰的時候，却反而是有利益的。譬如將上海與中國其他部分隔絕，對於中國，不會發生多大的影響，決不會像將紐約從美國隔絕這樣的嚴重。而且，日本要使中國全部隔離是不可能的，因為她是一個海軍國，她不能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

「因此，這問題的中心點，又要歸到全中國人民的總動員和統一，以及聯合陣綫的建立，而這就是共產黨從一九三二年以來所主張的。」

問：「在中日戰爭中，你想日本會不會發生革命呢？」

答：「日本的革命不僅是一個可能性，而且是必然性。在日軍遭受到第一次大敗後，革命就要不可避免立刻爆發了。」

問：「你想蘇俄和外蒙古，是否會參加戰爭，來援助中國呢？在那種情勢之下，纔有這種可能呢？」

答：「蘇聯當然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她不能不顧及遠東的事件。她不能永遠居於被動地位的。她還是滿意的靜觀日本征服全中國，作為進攻蘇聯的根據地呢？還是幫助中國人民抵抗他們的侵略者，獲得獨立，而與蘇聯建立友善的關係呢？我們以為蘇聯一定是選擇後一條途徑的。」

『我們相信中國人民一旦有了他們自己的政府，一旦開始抗戰，並且需要與蘇聯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善的同盟時，蘇聯一定是跟我們合作的先鋒。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鬭爭，是一個世界的責任，蘇聯既是世界的一部份，她是不能比英美更守中立的。』

問：『中國人民是否要即刻克復全部的失地，還是只將日本逐出華北與長城？』

答：『中國必須立刻收復全部的失地，不僅在保護我們長城以內的主權。這意思是東三省是必須收回的。但我們並不包括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然而在我國失去的土地都能恢復了獨立時，假使朝鮮人要想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桎梏，我們一定誠意的幫助他們的獨立鬭爭。對於臺灣也是如此。至於內蒙（註）那是漢人和蒙人什居的地方，我們一定要把日本從那裏驅逐出去，幫助內蒙建立一個自治國家。』

問：『在實際上，蘇維埃政府與紅軍，怎樣方能跟國民黨的軍隊合作抗日呢？在對外戰爭中，所有的中國軍隊是必須歸於統一指揮之下的，那末，假使紅軍可以派員出席最高軍事會議，紅軍是否願意從它政治和軍事的決議？』

答：『是的。我們當然十分願意遵守這個會議的決議，只要它是能真正的抗日。』

（註）在另一次訪問中我問起外蒙的問題，毛澤東發表意見如下：『外蒙和蘇聯的關係，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以完全

平等的原則為基礎的。當人民革命在中國勝利的時候，外蒙將由他們自決成爲中國聯邦的自治區。回民和藏民，也同樣組成中國聯邦中的自治共和國。』

問：「紅軍是否同意除了最高軍事會議的許可和命令之外，決不開入國民黨軍隊的防區？」  
答：「是的。我們當然不會把我們軍隊開入任何抗日軍隊的防區的，——我們在過去從沒有這樣的做過。紅軍決不願意利用戰時的情勢來投機。」

問：「那末，共產黨對於這樣合作的交換條件是什麼？」

答：「那就是堅強的徹底的對日抗戰。此外，它還要求實行那在籲請建立民主共和國和國防政府宣言中所提出的幾點（註）」

問：「怎樣纔能有有效的武裝人民，組織人民和訓練人民來參加這樣的戰爭？」

答：「政府必須將組織和武裝自己的權利交給人民。這種自由，蔣介石在過去是不肯給予他們的。譬如以紅軍情形說那麼這種壓迫方法可沒有完全成功。還有，北平、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學生雖受了巨大的壓迫，可是仍能把自已組織起來。學生和革命的抗日羣衆還沒有獲得他們的自由，他們還不能動員，不能訓練和武裝。反過來說，當大衆取得了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自由，他們的力量就將增強千百倍，到那時候，我們民族真正的力量纔可以表顯出來。」

「紅軍自身的奮鬥從軍閥手中獲得了自由，而成爲一個不可屈服的力量。抗日的義勇軍也同樣的從日本侵略者那裏取得行動的自由，武裝了他們自己。如果中國的人民能够訓練起來，武裝起來和組織起來，他們同樣可以成爲不可征服的力量。」

問：「在這次「解放戰爭」中，你以爲應該運用怎樣的主要戰略？」

答：「這戰略應該是一種運動戰，在一條廣大的飄忽不定的戰線上，戰略的成功完全依靠艱險



地帶中的高度流動性，就是敏捷的進攻和退却，迅速的集中和分散。這將是一種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壕、重兵和堅壘的單純陣地戰。我們的戰略必須根據戰地的形勢來決定，而這是適宜於運動戰的。

『這並不是說放棄軍事上的重鎮，如果這要點能夠堅守而有利的，那麼還是要守。但中心戰略却必須是運動戰，而着重於別動隊和遊擊戰略。深壘戰必須利用，但只是輔助的和次要的戰略。』

這種戰略也頗為非共產黨的中國軍事領袖所共同贊許。南京向國外購買的飛機，固然強固了保衛內部的力量，但許多專家對於空軍在對外戰爭中的價值，並沒有怎樣過份的期望。中央軍所置備的空軍和機械化設備，有許多人，甚至視為非必需的玩具，認為在戰爭初期中，它固然有驚人的價值和輔助防禦的力量，但不能持久，因為中國可以說是沒有基本的軍需工業，足以維持和補充空軍以及其他高度機械化的新式軍器。

白崇禧、李宗仁、韓復榘、胡宗南、陳誠、張學良、馮玉祥、和蔡廷樞都有這種意見：就是他們以為中國戰勝日本，的唯一希望，全在於把大軍分為許多的別動隊，保持着高速度的流動性，並且在廣大的遊擊區域中，維持綿長的防線，這樣從經濟上漸漸地擊破日本。然後在軍事上克服她。這至少是他們的原則。

毛澤東繼續說：『從地理方面說，戰場是這樣的廣大，我們儘有以最大的效率來採取運動的戰』

（註）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蘇維埃政府和紅軍曾送了幾種意見書給國民黨，其中就討論着這幾點。

略的可能，像日本那樣動作遲緩的作戰機構，它還得隨時防禦後方的受攻擊，這一定可以發生極大效果的。在狹狹的前線上集中了重兵，拚命防禦一二處的要點，那完全是拋棄了我們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優點，而再步阿比西尼亞錯誤的後塵。在戰爭初期中，我們的戰略應該力避主力戰，而應該逐步的消滅敵軍的軍紀，士氣和軍事的效率。

『阿比西尼亞的錯誤，除了內部政治上的缺點之外，就是在於他們想保持一條深入的戰線，反而使法西斯蒂軍隊利於轟炸，利於散放毒氣，便於將技術上較強的戰爭機構集中，給阿國以致命的重傷。』

『除了中國正式軍隊之外，我們還應在農民中組織指導並在政治上與軍事上訓練大量的遊擊隊和別動隊。在東三省的這種抗日義勇軍的成績，只不過是全國革命農民中可以動員的潛在力的極小的表演。如有適當的領導和組織，這種隊伍可以使日本人一天忙二十四小時，怨得他們要死人。』

『要曉得這次戰爭是在中國境內進行的。這就是說日本人的四周都是仇視的中國人民。日本人必須積藏他們所有的給養，而加以保護；各交通線上都要駐兵，同時在他們根據地的東三省與日本也須駐紮軍隊。』

『在戰爭過程中，中國可以奪獲許多日本的俘虜，槍枝軍火和重軍器。到了某個時候，我們可以漸漸地用堡壘和深壕跟日本作陣地戰。因為戰爭延長下去，抗日軍隊的技術設備一定會大大的改善，同時還可以從重要的外援中加以補充。在長期佔領中國的糜費重壓下，在無數不定的戰爭中，日本的經濟是要崩潰的；日本的軍心是要分散的。當日本帝國主義的洪水在中國抗戰的暗礁上打散』

了以後，中國革命人民中潛在的大量人力，却還可以送出無數情願爲自己的自由而戰鬥的人民到前線來！

『這一切以及其他的因素，注定了這次戰爭，使我們可以向日本的堡壘和軍事根據地作最後而有把握的攻擊，將佔領中國土地的日軍驅逐出去！』

『我們將歡迎並優待被俘的和被解除武裝的日本軍官與士兵。我們決不殺害他們。我們將待兄弟一樣地對待他們。我們對於日本無產階級的士兵毫無仇恨，我們盡力設法使他們覺悟使他們起來，反對壓迫他們的法西斯軍閥。我們的口號是：『聯合起來反對我們共同的法律法西斯壓迫者！』法西斯的日本軍隊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目標是沒有衝突的。』

這時已是早晨兩點過後，我真是困怠了，然而在毛澤東的白而帶黃的臉上，却還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吳亮平翻譯我記錄的時間內，他在兩個小房間中來往踱着步，一會兒坐着一會兒躺着；一會兒倚着桌子讀一束報告。毛夫人也沒有睡。忽然他們兩個一齊撲向一隻在躺在蠟燭旁的飛蛾而歡呼起來。這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小東西，淡淡蘋果綠的翅膀還鑲着一條鬱金色和玫瑰色的溫柔彩虹，毛澤東揭開一本書，把這片彩色的翅膀夾了進去。

誰能想到這樣的人，會在很厲害地想着戰爭啊？

我忽然想起明天早上八點還約定去參觀紅軍大學，這也許是一個好地方去研究「中國共產黨人反日情感的誠意。」

## 四 共價兩百萬元的許多腦袋

關於紅軍大學確有許多非常希奇的事情。

這個大學的校長是二十八歲的據說從未打過敗仗的軍隊指揮官。這個大學中有一件足以自豪的事，就是在一班經驗豐富的戰士們的研究裏，平均年齡二十七歲，每人平均有八年的作戰經驗，以及三處的傷痕。世界上可還有什麼學校因紙張缺少而利用敵人宣傳品的空白的背面來做筆記簿的麼？或者，每個學生的教育費用，包括着衣食及一切設備開支，每月不到十五塊錢的麼？或者收買它的學生的首級賞格的總數達到二百萬元以上的麼？

此紅軍大學之所以爲紅軍大學了。

說到最後，這個大學大約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最高學府」，課室是在窑洞裏，桌椅是磚頭和石塊，黑板是石夾牆與泥牆，而整所校舍完全可以不怕轟炸的。

在陝西和甘肅，除了普通房屋以外還有築在山洞裏的住宅，廟宇以及幾百年年紀的古堡壘的牆洞。千百年前，有錢的官吏和地主們建造了這些奇怪的建築物，以備水災、強盜和飢荒，並且在這裏屯積了糧食和貴重物品以防不測。許多圓頂房子在黃土層和岩石裏掘得很深，有的分成好幾間，可以容納好幾百人。這些山邊的住宅現在變了周全的防空壕，防備中國人民送給蔣介石去打日本的新轟炸機來轟炸他們。紅軍大學設在這等古老的住宅，似乎有些古怪，然而倒十分安全。

我一到之後，就因介紹得見紅軍大學校長林彪。他邀我對他的學生講演一次。他提出「英美對

華政策」這講題。我爲難了。我對於這兩國的對華政策實在知道得太少。而且我又沒有能力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解釋。然而林却堅邀着。他說他們自己會參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當時他特地爲我預備了一頓麵食，這使我覺得受之有愧，只好唯唯從命了。

林彪是湖北省一個工廠主人的兒子，生於一九〇八年。他的父親因苛捐什稅而破產了，然而林却設法在初級小學卒了業，就到了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去念書。他在那兒成績很優秀。他在蔣介石及其首席顧問俄國加侖將軍之下受了政治和軍事訓練。畢業不久，國民革命軍北代就開始了，林彪升做陸軍上尉。一九二七年，他二十歲，在著名的張發奎的第四軍那裏當上校。當年八月，在南京右派政變以後，他帶了一團人加入賀龍、葉挺所統領的第二十軍，在南昌暴動，這就是共產黨在中國的反抗的開始。

林彪是極少數從沒有受傷過的紅軍指揮官之一。他在前線參加了百餘次的戰爭，在疆場上指揮了十多年，飽受了他部下所熟習的困苦，南京方面又懸賞了十萬元緝拿他的正身，可是他還是好好的生活着，沒有掛過彩。

在一九三二年那年，林彪任紅軍第一軍團總指揮，這一軍團在那時有兩萬枝步槍，是紅軍中最有威力的一部。因爲林彪的非常的軍事天才，這一軍團把政府派來勦共的軍隊一一擊破，打敗，或繳械，而本身從沒有失敗。據說政府軍往往只消一發覺他們的對手是紅軍第一軍，他們就敗退了。然而關於這有名的「鐵軍」的事跡，且等我將來到了前方再說。

林彪同許多善戰的紅軍指揮官一樣也從未出過國，除了本國語以外，他不能讀不能講任何國

家的語言。然而，不到三十歲的年紀，他已經博得了在紅軍範圍以外的稱許。他發表在中國共產黨軍事雜誌鬪爭和戰爭與革命上的文章，在南京的日本以及蘇聯的軍事雜誌上都轉載過，批評過。他被稱做突擊戰術的發明者——這種戰術馮玉祥將軍曾詳細地註釋過的。紅軍第一軍的許多勝利據說都是因為善於運用「突擊」戰術的緣故。

一天早上，我同林總指揮及其教職員們走到離保安城不遠的紅軍大學去。我們到那裏，是在課餘時間。學生們有的在兩個有設備的球場上打籃球，有的在圍繞保安邊界的黃河支流畔，用泥土填平的球場上打網球。還有好些學生在打檯球、寫字、閱讀新書和雜誌，或者在他們簡單的俱樂部裏讀書。

這是大學的第二部，學生有兩百多。這大學在蘇區時稱爲「紅大」，共有四部，八百多學生。保安附近，在教育委員會管理下的，除了「紅大」還有無綫電報騎兵、農業及醫藥等學校，以及一個共產黨訓練學校和一個民衆教育訓練所。

聚集了二百多學生聽我講演「英、美政策」。我把英、美的態度作了一個簡略的概括的歸納，並且答應解答他們所要問的問題。我當時就覺得這是大大的失着，而那頓麪食難以抵償我的窘態。那些向我提出的問題，雖有韋爾士那樣的急智和辯才，大概也要覺得難以作答的罷。你想，你怎樣回答下面這樣難倒我的問題呢？

「英國政府對於親日的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以及日軍駐防華北這兩件事採取何種態度？」

『美國藍鷹運動的方案的结果怎麼樣？對於工人階級有何利益？』

『如果中日開戰了，德意可會援助日本的麼？』

『如果日本得不到別國的援助，你以為日本有多少時候能支持對中國的大戰呢？』

『國際聯盟爲什麼失敗的？』

『在英、美兩國，共產黨都是法律所許可的，可是兩國卻都沒有工人政府，這是什麼緣故？』

『在英、美兩國反法西斯陣綫的發展情形怎樣？』

『以巴黎爲中心的國際學生運動的前途怎樣？』

『就你的意見，李滋羅斯這次訪問日本可會釀成對華政策上什麼英、日協定的麼？』

『等到中國開始對日本抗戰了，英、美會援助中國呢，還是日本？』

『請問英、美兩國既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爲什麼把軍艦和軍隊長駐在中國呢？』

『英、美工人對蘇聯的觀感如何？』

在兩個鐘頭的討論時間裏，可以談到的範圍就不小了，其實呢，時間並不限於兩個鐘頭。早上十

點鐘開始，一直繼續到下午三四點鐘光景。此番討論到底得不到什麼結論，徒然浪費了一天的工作。

過後我參觀了各個課室，與林彪及其他教職員談天。他們把「紅大」的投考情形告訴我，還拿

了印就的章程給我看，這種章程已有好幾千份祕密地分散到全國各處了。『凡是志願與日本帝國

主義作戰，志願爲民族解放獻身的投考者，不問是屬於什麼階級，不問其社會思想或政治思想有什

麼不同，』紅軍大學的四部一律招收。年齡的限制是十六歲到二十八歲，『不論性別。』『投考者必

須體格強壯，無傳染病，而且——這一句似乎十分籠統——『不沾一切不良嗜好。』

據我所知，大學第一部的學生，實際上大多數是營旅或師的軍官，受着高級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這一部所授的課程需時四月，照紅軍的規則，每個軍官或政治委員，每服公務兩年，必須在紅軍大學過這麼四個月。

第二及第三部招收着排長、連長和營長，以及紅軍裏經驗豐富的戰士和「從中學或同等程度的學校的畢業生挑選出來的新入伍生，失業的教師和官吏，抗日義勇軍反日遊擊隊首領和從事於組織及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人員。」在紅軍向山西省進軍期間，該省有六十餘中學畢業生參加紅軍的。

第二及第三部的課程需時六個月。第四部以專門訓練工程師、騎兵、學兵和礮兵隊為主。我在這一部碰見了幾個以前做過機械工人和學徒的學生。後來，我離開蘇區的時候，我走上長途汽車，還遇見從上海、北平趕來投考的學生。林彪告訴我該大學一張報名單子上開列着從中國各處來投考的二千餘名，最重要的問題是入境的問題，因為每一學生都得祕密入境。

『紅大』各部的課目都是兩樣，可是第一部學生所學習的東西也可以表示其大概了。政治講話，所包括的課目有政治知識，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黨的建設，策略問題，列寧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歷史基礎，日本的政治社會力量等。軍事科目所包括的有對日戰爭的戰術問題，對日的運動戰，抗日戰爭中游擊隊戰爭的發展等。

這些科目中，有幾種備有特殊的教本。他們對我講一部分教本是從江西蘇維埃印刷局運來的，



在那印刷局的總廠裏，有過八百以上的印刷工人。又有幾種科目把紅軍軍官及共產黨領袖們關於俄國革命及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的演講稿子作為教材，或則利用所奪獲的政府的卷宗文件和統

計。  
紅大這些科目也許足以解答「紅黨是不是真正要與日本作戰呢？」的疑問。這可以表明紅黨怎樣預知着，怎樣積極地規劃着他們認為無可避免的對日的中國「獨立戰爭」。要不是日本爲了什麼奇蹟，現在日本發着戰爭狂的軍部在廣大的中國領土裏決不能撤兵。

這想像不是愉快的。投資在中國的外國資本家有的認爲這是不可能的狂妄的預想。但是有的却能坦白地說，中國已有幾千萬人民變成日本所征服的奴隸，假使中國人現在能夠不再因不抵抗而再把本國的自由犧牲一些，而都抱着寧爲玉碎不願瓦全的決心，他們就不責難中國人了。

至少紅軍已堅決地打定了主意要抗戰，而且我們能相信他們在戰事開端時會站在最前綫，這事實非但在紅軍領袖們激昂的談話裏，在紅軍嚴格的實際訓練中，在他們要與其十年敵人國民黨結成「聯合陣綫」的建議中間表示出來，而且在蘇區裏觸目皆是的深刻的宣傳工作上，也有着明顯的表示。

負着領導民衆的使命感的是許多的青年隊伍，就是「抗日劇社」，他們在蘇區裏不斷地作巡迴的旅行，散佈抗敵的宣傳，激發農民的民族意識。

第一次參觀了紅軍大學以後，我不久就去看這麼一次動人的兒童劇社的公演。

## 五 紅色劇社

當我同那位青年軍官出發到「紅色劇社」的時候，人們早已向古廟裏臨時搭成的露天戲台推動了。那天是星期六，在下午三四點鐘光景，整個保安城好像都奔往那裏去似的。

紅大的學生，趕脚的，軍服廠及鞋廠的女工，合作社及紅色郵務局的職員，士兵，木匠，帶着孩子的農民，都向那河畔大草原上的戲場湧去。這或許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民主化的集會了罷。連距離不遠的網球場上也只有山羊在喫草呢。

不用戲票，那邊沒有「包廂」之類，也沒有什麼預定的座位。我注意到中央委員會祕書洛甫，財政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官員和他們的太太們，都同別人一樣散布在羣衆中間，坐在有彈性的草網上。演劇一開始，就誰也不怎麼理會他們了。

一大幅粉紅的綢幕橫掛在臺前，有「中國人民抗日紅色戲劇社」這九個漢字，連同拉了化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紅黨因為要促進民衆教育，所以正在提倡着。戲目定三小時完畢。這戲目是短劇、跳舞、歌唱——一種錯綜的表演，大半用反日及革命爲中心題材而加以連貫的。這種戲劇顯然是充滿着宣傳的性質，全不做作而富有「骨子」的。可是也有種種特點，是從那刻板的鑼鼓喧天的舊戲裏解放出來，只探討新鮮的現實的材料，不像頹廢的中國舊劇那樣，專門表演那些無聊的歷史上的把戲。

最後，這種戲劇所缺少的細膩及精密的表情，因爲他的健旺的活力，其生動的幽默以及演員和

聽衆間一種共鳴，却有一部份得到了補救。紅色劇社的看客好像真正細聽着台上所說的台詞：與中國舊戲的聽衆相比，這才是驚人的事。中國看舊戲的人們所耗費的時間多半在吃水果，嗑瓜子，談天，拋熱手巾，在包廂上踱來踱去，難得間或向台上瞧這麼一眼。

開幕第一齣戲叫做「侵略」。開場是在一九三一年東三省一個村落裏，日本軍隊開到了，把「不抵抗」的中國軍隊趕跑。第二幕，日本軍官們在農舍裏舉行宴會，把中國人當椅子坐，醞釀然調戲他們的妻女。另有一幕表演着販毒的日本人售賣嗎啡和白面，強迫每個農民購買。一個不肯買的青年便被帶去審問了。

拷問他的人厲聲地說：「你不買嗎啡，你不遵守滿洲國的衛生條例，你不擁護你的聖主溥儀，你不是好人！你是反日的土匪！」於是把這青年立刻處死了。

村市上的一幕表演着小商人們安靜地販賣貨物。突然間，日本人又來搜查「反日土匪了。」他們急着要檢查護照，凡是忘記帶護照的人就被槍決了。過後兩個日本軍官就拿一個小販担上的豬排大嚼一頓。等到小販向他們要錢的時候，他們便詫異似的向他瞧了一眼。「你要錢？什麼錢？蔣介石把滿洲熱河察哈爾塘沽停戰協定，何梅協定，冀察委員會都給了我們，也不要我們一個銅子。這一點點豬排倒要我們付錢了麼？」這一來，他們把他作爲「土匪」釘死在木樁上了。

這一切不必說，村上的人們是不能忍受的。小販們收起了他們的攤子和布棚，農人們帶了他們的長槍直衝，婦女與孩子們也拿了刀趕上來，大家吶喊着：「跟「東洋鬼子」去拼命！」

這齣短劇滿佈着幽默與土話，厭惡日本人及憎恨日本人，這些咀咒引起了觀衆一陣陣的鬨笑。

他們是十分感動了。這對於他們不好說算是什麼政治宣傳，也不好說算是熱鬧的悲劇，只不過是刺人的真理。觀衆專心於劇中所提示的思想，也就完全忘掉了演員們多半是陝西、山西十幾歲的孩子。雖然用一種喜劇的手法演出的，這個劇情的慘痛的現實，並不因爲它的小聰敏及幽默而模糊，至少劇中有一個士兵是不會使其模糊的。完場時，那青年兵士站起來，用激昂的聲音吶喊着：『打倒日本強盜！』『打倒屠殺中國民衆的劊子手！』『打回老家去！』整個人羣跟着他大聲地喊口號。我打聽到這少年是東三省人，他的父母是給日本人殺死的。

戲日上的第二個節目是收穫舞，由劇社的十二位女演員表演的。裸着腳，穿着農民的褲子短襖及背心，頭上包着綢布，她們舞得很整齊很美妙。我探悉，這他們中間有兩個是從江西一路步行來的，她們在江西瑞金紅色戲劇學校學過跳舞。她們具着真正的天才。

又一項別出新裁而富有風趣的是『聯合戰綫舞』。這闡明發揚中國抗日的總動員。我不知道他們用什麼妙法得到他們的服裝，忽然間台上就有幾隊少年穿戴着白色的水手服裝——頭一隊扮騎兵隊登場，第二隊扮步兵，最後則扮海軍。他們的台步及動作——在這上頭，中國人原是天生的藝術家——很充分地實地發揮出跳舞的精神來。過後是稱爲「紅色機械舞」的一種跳舞。用音節及手勢、臂、腿及頭部的動作，這批小小的跳舞家巧妙地去演出唧子的推動，大小輪子的旋轉，發動機的沉重的聲響——以及未來中國機械化時代的新氣象來。

在換幕的時間，就有一片呼聲，要台下的觀衆客出歌唱。五六個本地的陝西青年女工應了羣衆的邀請，上台去唱一支陝西古曲，一個陝西農夫彈着他的琵琶伴奏，接着一個紅校學生被邀請而表

演了一回口琴，另一個學生應了大衆的請求上台去唱一支南方的流行歌。後來惹得我手足無措窘態畢露，他們要求『外國新聞記者』來一個獨唱了。

他們不肯放過我。天哪！除了狐步舞、爵士舞、波希米舞及國歌以外，什麼也記不起來，而這些又對於這批硬性的聽衆似乎都是不適宜的。我甚至連『馬賽曲』也記不得。他們堅決地要求着。我終於在十分的惶恐中唱出了蓋鞞鞞的人！他們這纔很體諒我了。不要求再來一個。

等我看見了下一幕開始了，心裏才放鬆。這顯然是採用革命題材的社會劇——一個帳房姘上了他的老闆娘。接着是又是一種跳舞，一種探討着從西南傳來的新消息的「活動報告」以及兒童合唱國歌，合唱時，戲台當中閃閃的圓柱四周掛有一串一串的萬國旗，少年跳舞員就在這圓柱周圍斜倒着身子。他們隨着唱句慢慢地抬起身子來。等到唱完，高高地舉起了握緊的小拳頭，直挺挺站着。

曲終人散了，然而我的好奇心却仍舊存在着。因此，到第二天，我便去訪問人民抗日紅色劇社的指導員危拱之。

危拱之女士於一九〇七年生在湖南，參加紅黨已經十年了。她本來參加過「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宣傳部，可是到一九二七年馮玉祥同南京妥協了以後，她就合了許多青年學生脫離了那宣傳部，在漢口加入了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共產黨派她到歐洲去，她在法國讀了幾時書，後來又在莫斯科讀書。一年後她回到中國，很艱難地通過了國民黨對蘇區的封鎖線，就在瑞金開始工作。

她把紅色劇社的歷史對我講了一遍。戲劇隊好像是於一九三一年纔在江西產生的。據她說，紅

黨在瑞金著名的高爾基學校，訓練了一千多從蘇區各地招去的學生，編成六十個戲劇隊，他們的足跡印遍了各鄉村，走過了前線。各隊都有很多從蘇維埃鄉區來投效的預備演員。農民在他文化飢荒的生活裏，對於隨便什麼的娛樂，心裏總是感激的，因此戲劇隊下鄉時，農民都自動地替他們運輸，供給他們的膳宿。

在南方的時候，危女士原是助理指導員。但在西北她却担任着戲劇組織的全部責任。她是數十個完畢了從江西出發的長征的全程的蘇維埃婦女之一。南方的隊伍沒有開到時，陝西蘇區就已設立了好幾個戲劇隊，可是江西的新人才一到，戲劇藝術顯然增加了新生命。危女士告訴我，陝西現在有着這樣的旅行戲劇隊，大概在四十隊以上，甘肅還有幾隊。我在後來的旅途上就遇見了不少。

危女士說：『每支軍隊都有隨軍的戲劇隊，各區差不多也都有戲劇隊。演員們大部都是本地招收的。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現在大都担负了指導員的職務。』

我碰到了幾個少年先鋒隊，他們是長征的老手，年紀還只有十幾歲，他們負責組織和訓練各鄉村的兒童戲劇團體。

『農民路遠迢迢的趕來看我們的紅色戲劇，有時候，我們接近白區的邊境，國民黨的士兵秘密派人邀我們的演員們到邊界區域的市鎮上去。我們去做戲時，紅軍和白軍士兵雙方把武裝解除了留在後邊，到這市鎮來看我們的表演。然而假使給國民黨的高級軍官曉得這事情，他們可就絕對不准許了，因為許多國民黨士兵只要看過我們表演，他們就不願意再與我們紅軍開仗了。』

然而使我對這些戲劇隊覺得驚異的並不是他們把什麼有藝術價值的貢獻給世界，而只是他

們設備這麼簡陋，居然能夠滿足真正的社會需要。他們的道具及服裝都很缺乏，可是靠着這些簡單的材料，他們卻能設法表演出戲劇的正確的印象來。演員所得到的只是伙食、衣服以及很少很少的生活費用，但是他們卻天天讀書，他們相信自己是在替中國及中國人民工作。他們什麼地方都能睡，樂意地喫人家給他們備好的食物，老遠地從這一村趕到那一村，從物質享受上說，他們無疑地是世界上最報酬最少的伶人，可是在我卻還沒有見過比他們更幸福的人。

紅黨所用的劇本及歌曲差不多都是他們自己寫的。有的是有文才的軍官們所供給，但是大部卻出於宣傳部裏小說家及藝術家之手。有幾本紅色諷刺劇是三年前加入紅黨的文學批評家成仿吾所寫作的，最近出版的幾本則是中國素負盛名的女作家丁玲的作品。她現在是跟紅軍住在一起。在其黨運動裏，紅色戲劇隊是最有力，而且運用得最巧妙的武器，因為劇目的時常變更，因為「活動報告」劇的幾乎每天的在改變，新的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問題成爲戲劇的材料，而農民心中所懷疑的疑點和問題，也就從幽默的容易體會的戲劇裏得到解答。當紅黨佔領着新的區域時，爲要得到人民的信仰，安定人民的恐怖心理，把紅色綱領的基本觀念灌輸給他們，把大量的革命觀念傳播開去的，也是紅色劇社。例如，在最近紅軍長征山西的期間，成百的農民聽到紅軍裏有紅色演員，便聚集着來看他們，情願接受那些在可喜的戲劇形式裏的宣傳作用。

總之，這就是「藝術上的宣傳」發展到了頂點，好許多人也許會說，『爲什麼把藝術應用到這上頭呢？』可是在最廣義上講，這是藝術，因它把人生的憧憬傳授給觀衆，假使說這是淺薄的藝術罷，那是因爲所應用的活的資料與所企求的活的人們，在追求人生問題的程度，都是淺薄的。在中國

大眾的心上，藝術和宣傳間沒有精細的分別。只有人類經驗上所理解者，卻不能理解者的區別。

在某種意義上，你可以把中國共產黨運動的全部歷史作爲一個偉大的宣傳旅行，又可以想像紅黨始終保衛自身的生存權，大約比之於保衛某種思想的絕對權利爲大。倘然紅黨結果是失敗了，被擊潰了，我以爲那段過去的歷史一定可以算是最有永久性的紅黨的成功。數百萬的青年農民已經聽到了那班沒有鬚鬚的青年們——他們中間有好幾萬現在是死了——所宣揚的馬克思主義。此後中國文化上陳舊的思想對於那些農民，永不會再發生十分效力的了。在這批紅黨出神入化的移動中，無論命運支配他移動到什麼地步，他們總是熱烈地要求社會的徹底改革——這是農民們從別方面不會領略到的——而且給那些窮人們及被剝削者以對於行動的新信仰。

無論他們有時犯着多大的錯誤，無論他們的過火的含有悲劇性的舉動，無論本書上所提起的各點怎樣免不了誇張，總之，他們誠意的宣傳目的卻在促進，喚起千百萬中國農民自身對於社會的責任；喚醒他們對於人權的信仰，排斥道教及孔教中懦怯，被動及無爲這等信仰；教育、勸導，而且，有時候挑動，強迫他們因爲「民主政治」，這是中國農村裏的新的意識，去作戰；根據共產黨的看法，那麼是爲公道、平等、自由作戰。中國農民經過了兩千年的酣睡，現在一醒，就慢慢地站立起來，從他們身上所發揮出來的日增月長的力量，遠超過了南京所通過的一切穩重的，同時也是無聊的決議案，這種力量也許會促成中國大轉變的實現的。

同這一種「共產主義」相彷彿的歷史上重要的事實，就是：幾千萬受過教育的青年們給他們所知道的科學知識的領域激發了偉大的夢想，他們「回到了民間」，回到了祖國的下層基礎，把他



們所學的嶄新的學問來「開發」那些渾渾噩噩的，過着黑暗生活的鄉下農民，想要與農民聯合起來，創造這「更豐富的生活。」他們深信一個好世界只有他們可以把它造成，他們把他們的公理的理想也是他們的方案帶回去，請求人民的認可與擁護。他們便得到了驚人的成功。他們用宣傳以及實際的行動把關於國家、社會及個人的新觀念散播給人民大眾了。

在紅黨裏，我常有一種奇怪的感觸，我彷彿是在一羣學生中間，他們過着鬧風潮的生活，因為古怪的歷史命運使他們覺得鬧風潮的生活實在比足球比賽、教科書戀愛，或是別國青年們所關心的各種主要問題不知重要得多少。有時候我幾乎不敢相信：十年來那領導大眾跟南京所有的軍隊鬪爭的只是這個抱有某種思想而百折不回的青年集團。這神祕的團體是如何發動起來，結集起來，而從那裏產生出力量來的呢？為什麼它畢竟還不能達到成熟期，為什麼這根本上似乎還像青年們的大示威，還像一個宗教運動呢？

假使你懂得過去二十五年來，中國歷史所經過的明顯的「孕育期」，這問題纔能夠得着解答，這孕育期的法定的產兒無疑地是這紅軍。幾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竭力要爬到民衆上面，攀附一批官僚，這批官僚高高在上地統治大眾，他們用「等因奉此」式的漢文及其淺薄的一些知識作爲武器來統治鄙寒的鄉村，却永不願使鄉村開明。然而新的孕育期却產生了一個新的孩子，他要把自己的知識分給「落後的大衆」，同時要使他們理想化。

我在「保安」時，我時常懷疑着：這震動中的中國的胎的深切而劇烈的自然的變亂，我怎麼能夠加以解釋呢？我怎樣能夠描寫其漸漸的受胎，其胎兒的生長，以及生產時痛苦與結果呢？我能夠寫出他

的赤裸裸的歷史事實；但是人間的苦痛，我當時却不能描寫出來。毛澤東對我所講的他個人的歷史，我一夜一夜的寫下來時，我體會到這不僅是他的故事，還是共產主義生長過程中的記錄——他的各式各樣的狀態對於中國都是確切的，我體會到共產主義並非像那些淺薄的作家所想像的僅僅是從外國領來的孤兒——我又體會到共產主義所以取得了千萬青年男女的信仰及擁護的緣故。毛的故事也就是我後來在許多旁的紅色領袖的自述裏所聽到的故事，不過有着許多不同的地方。我想這也許是人們所愛讀的故事罷。這就在後面。

此  
页  
空  
白

## 第四章 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

### 一 童年時代

我交給毛澤東一大張問題表，是關於他個人生活的，要求他答覆，我自己覺得很是抱歉，因為我提出的都是很瑣屑的問題，其次缺禮貌，正如日本的移民官吏。但是他卻毫不在意。他對於我所提出的對於各方面五六類問題，費了十幾個晚上答覆我，但是關於他自己和他對於這些事情的作一點點提到得很少。很明顯地，他認為個人是無關重要的，所以我想要他給我一些關於他私生活的一件事，是絕望的了——正像我所遇見的其他的紅黨一樣，他只喜歡談委員會、團體、軍隊、議決案、戰鬥、戰術、辦法等等，而不談他個人的經驗。

有一個時期，我以為他之所以不談主觀或個人的事情，是爲了禮貌客氣，或是爲了對我不信任，或者是爲了他們的頭上懸有資格而恐懼的緣故。後來我纔發現了事情並不如此。事實是因爲他們這些人實在都認爲這些私人的瑣事是並不重要的。當我開始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常常發現：共產黨員大都能夠把青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娓娓地說出來，但只要他和紅軍一發生關係，他就把他自己置之腦後了。如果你不固執地問他，那末關於他自己的任何事情，你就不會聽見的了。你所能夠聽到的只是一堆關於紅軍的，蘇維埃的，黨的故事。他們能够一一列舉每次戰鬥的日期和經過，以及千百個他們曾經來往過，造成的歷史，而只是因爲他們的紅軍曾經到過那裏。在這紅軍後面有

一種他們正在鬥爭着的觀念形態的整個有機力量。我對於這個發見感覺到頗爲有趣，可是我的報告卻因此而更加困難了。

有一天晚上，當毛氏滿意地把一切別的問題答覆了我以後，翻到我這張以『個人歷史』爲標題的問題表。『你結婚幾次了？』他一見這一個問題，不禁笑了。——後來外面竟有謠言說我問毛氏有幾個妻子。他對於供給自傳是否必要的問題總是懷疑着，但我和他抗辯着，說從某種原因看來，這是比別種事情的報道更爲重要。我說：『當人們有機位讀了你所說的話，他們當然更想知道你是怎樣的一種人。而且你對於外邊流行着關於你的謠言，也該加以糾正。』

於是我報告他外間關於他的死亡的各種傳說。有些人說他法文講得很流利，又有一些人說他不過是一個無知的農民而已，又有人說他肺病已達第三期的了，另外又有人竟說他是一個發狂的瘋人。他很和藹地驚奇着，人們竟費了這許多的時間來幻想他，於是同意了我糾正這些風傳的主張。把我所預備好的那張問題表看了一下說：

『比方說，我並不依照你的這些問題回答，只把關於我的生活的一個大略告訴你，你以爲怎樣？我想這樣更容易明白我的爲人，而同時也回答了你的問題。』

『我正需要你這樣！』

我們就開始談話，費了幾個晚上，談話的時候，我們真像祕密陰謀家一樣，躲在一个洞裏，伏在一只用紅布罩着的桌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着，我奮筆疾書，從晚上開始，直到要倒下去睡覺時爲止。吳亮平坐在我旁邊，時時打斷毛氏的柔和的南腔——「鷄」不是像很好的北方的“chicken”那樣沉

重，而變成了很浪漫的“Shih”，「湖南」不是“Hunan”，而變成“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Cha”，還有許多更奇怪的變音。毛氏憑他的記憶來述說一切，我則照他所說的用英文記下來。以後又把這個筆記重譯成中文請他改正。下面就是這個談話，我並不想寫成很好的文藝作品，只是都會經過耐心的吳先生修正過，所以自信是不會失真的了。

我在一八九三年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韶山。我父親的名字是毛仁生，我母親未出嫁時的名字是文其美。

我父親是一個貧農，在年輕的時候，爲了負債過多而被迫當兵。他當了很多年的兵。後來回到了就是我生下來的鄉村裏，做小買賣和一些別的事業，克勤克儉，稍稍積集了一筆小小的款子，他便買回了他自己的土地。

那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從這幾畝田上我們每年可以收六十担穀。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以每人七担計，這樣一年有二十五担的積餘。用這一點剩餘，我父親又積蓄一筆小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田，這樣一來我家就成了『富農』了。那時我家每年可以有八十四担穀的收入。

當我只有十歲，家中只有十五畝田地的時候，家中的五個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一個弟弟和我。我們增加了七畝田地的時候，祖父去世了。却添了一個小弟弟。可是我們依舊每年有四十九担穀的積餘，這樣我的父親慢慢地得發起來了。

當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他開始做販運穀米的賣買。用這種方法他又賺了一些錢。當他

成了富農之後，他繼續這樁買賣，而且作爲主要事業，用了大部分的時間。至於田地的管理則僱了一個長工，此外再叫孩子和妻子都到地上勞動。當我六歲的時候，我就開始做地上的工作。我父親並不開商店，他只是從貧農們那裏把穀米收買下來，轉售給城裏的商人，如此他賺到了錢。在冬天做米正忙的時候，他便添僱一個短工，所以在這個時候，喫飯的人便增加到七個。我們喫的很省，但終是喫的很飽。

當我八歲的時候，我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校裏讀書。在那裏我一直讀到十三歲。早上和晚間我在田間工作。白天我讀孔子論語和四書。我的國文教員是頑固派，粗暴而嚴厲，常常痛打學生。爲了這個緣故，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我不敢回家，因爲怕挨打。我莫名其妙地走向縣城去，以爲縣裏是在某處的一個山谷裏。瞎跑了三天之後，終於被我家裏找到了。我這纔知道我這次旅行，只是兜了幾個圈子，走了這許多時候，還沒有離開我家八里之外。

可是，在我回家以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情形有點改善了。我父親的暴厲態度比從前稍微好一點，而教師也溫和多了。我的反抗行動得到如此的結果，使我深受了影響。這是一個勝利的「罷工」啊！

等我學會了幾個字之後，我父親開始叫我記家裏的帳。並且叫我學習打算盤。因爲我父親固執着要我學這些事，所以在晚上我就開始學習這些東西了。他是一個很嚴厲的教師，對於我的懶惰，常常表示厭恨。假如沒有帳記的時候，他仍叫我到田間去工作。他爲了性情暴戾，所以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們。關於錢這樣的東西，他不給我們，而且給我們吃最不好的東西。每月十五日，他對於他的工人

們特別開恩而給他們雞蛋和飯吃可是永遠沒有肉。而對於我則既無肉又無蛋。

我母親是個和善的女人，寬厚而富於情感，永遠願意把所有分給別人。在飢荒的時候，她可憐那些窮人們，常常送米給他們。但當我父親在面前的時候，她不能這樣做，因為他不贊成慈善的。關於這一件事，在我家裏常常有口角發生。

我們家裏分爲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在朝的執政黨。我的母親，我的兄弟，有時候甚至工人們所組成的，是在野的反對黨。可是在反對派的「聯合戰線」上，意見不能一致。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她反對任何明顯的情感的表现，也不贊成對統治力量的公開反叛。她說這不是中國人的辦法。

但當我十三歲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方法，便是引用經書或是用父親自己的話，作爲我自己有力的辯護。我父親慣用不孝和懶惰兩種罪名來責備我。我卻引用經書上的話來說服他，說父慈則子孝。說我懶惰，則我用長者應該比後輩多做些事的話來反駁。我說你年紀比我大三倍以上，所以應該多做工作。而且我宣言：等我到他這樣年紀的時候，我的力氣要比他大得多。

這個老年人——我的父親——繼續「積聚財產」。後來大家竟稱他爲這個小鄉村裏的大財主。他不再用購買的方式來增多土地，卻接受了許多別人田地的抵押。他的資本增加了二、三千元。

我對於他的不滿繼續增高。在我們家庭裏，辯證法的鬥爭是始終不斷地發展着。(註)我特別記起一件事。當我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我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裏來。正當他們還在的時候，我們兩人發生了爭論。我父親當着大家的面，責備我，說我貪喫懶做。這事觸怒我了。我責罵他，而且要脫離家庭。



我母親跑着追我，竭力勸我回去。我父親也勸我，可是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了一個池子旁邊，用自殺來要挾，說若是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投水。在這種僵局之下，爲了停止內戰起見，雙方提出了要求和反要求。我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賠罪，作爲求饒的表示。我同意如果他允許不打我，則我可以跪一隻腳磕頭。於是戰爭便在這樣的條件下停止了。從此我知道了，當我用公開反叛的方法來保護我的權力的時候，我的父親就寬和了些了；反之，當我保持馴善服從的時候，他只是罵我打我更甚。

回想到這一點，我以爲我父親用嚴厲態度作爲教子的政策失敗了。我學會了去仇恨他，我們反對派真正建立了一個聯合陣線去對付他。因爲這樣總是對我有利。如此之後，我的工作也勤快些；我很仔細地記帳，他也沒有批評責備我的口實了。

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認識一些字，記帳一事是足以勝任的。我母親是目不識丁的。他們兩人都從農家出身，所以我成了家庭裏的「學者」。我讀會了經書，可是不喜歡經書。我最喜歡讀那些中國的傳奇小說，而對於那些關於叛變的故事則尤其喜歡。我讀過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志和西遊記。那時候我還年幼，是在我的老教師謹慎提防之下偷讀的。我的老教師恨這些非法的書籍，認爲都是壞書。我常常要把這些書帶到學校裏去讀，當老師走過的時候，就用一本經書把牠們掩住。我的許多同學也都這樣做。有許多這樣的故事，我們幾乎都能背誦了，而且常常再三地討論。像這種故事，我們所知道的比鄉村裏的老人還要多。他們也愛聽這些故事，而且常常和我們互相交換講述。我相信

(註)毛氏追述到這些事，老愛引用這些幽默的政治名字，來當做說明，而一邊大聲笑着。

這些書對於我後來影響很大，因為這些都是在記憶力強盛的年紀裏讀的。

最後我離開了小學，其時我是十三歲。我開始整天在田間幫助僱工工作，白天做一個成人所做的全部工作，晚間就替我父親記帳。可是我還能夠繼續讀書，除了經書之外，我一有機會就吞嚥一切我所能夠找到的東西。這事使我父親很懊惱，他希望我能熟讀經史，特別是在他有一件訴訟失敗了之後。事實是如此的，他的對造在法庭上引用一句很適合的經典，結果他敗訴。我常常在半夜裏，把我房子裏的窗戶遮沒，使我父親看不見燈光。就用這樣的方法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書我非常喜歡。這書的作者們是一些老的改良主義者，他們以為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是因為缺乏西洋的工具、鐵路、電話、電報、汽船等等。他們想介紹這些東西到中國來。而我父親卻以為看這些書籍，是徒然費時失業。他想我學一些經書一樣的實用東西，可以使他在訴訟中得到勝利。

我繼續閱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發現到一件事，就是不知為什麼，在這些小說裏面，沒有關於耕種土地的農民的事蹟。所敘述到的人物，不外是些戰士、官吏，或者文人。永遠看不見一個農民人物。對於這一件事，整整有兩年，我得不到解答，後來我把小說的內容加以分析。我發現了：小說裏面的人物們都是有武力的名人，人民的統治者，他們都不必從事操作，因為他們土地的所有人，很明顯地是有着農民們在代他們工作的。

我的父親毛仁生，早年中年，都不是一個信神的人。可是我的母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她把佛教的教訓給予她的孩子，而我們也曾對於父親的不信神表示焦慮過。當我還只九歲的時候，我會經和母親鄭重其事地把我父親不相信神的問題加以討論。那時和那時以後，我們用了許多方法想

勸醒他，可是結果失敗。他只罵我們，我們受了他攻擊的威脅，只好讓步，另想別法。但是他總是不願意和神們有所往來。

可是，我所閱讀的書籍，開始慢慢地在我的思想上發生影響，我自己也慢慢地對神的信仰開始懷疑了。於是我母親爲我憂慮，責備我對於信仰儀式的不虔誠。可是我父親毫無表示。後來，有一天，他出門去收賬，在路上，他遇見了一隻老虎。這隻老虎看見他，忽然慌張地逃跑了。可是我的父親更覺得驚恐了，事後他對於這次神祕的脫險，總是不能忘懷。從此以後，他開始虔信佛教了，並且常常燒香點燭。但是對於我的與日俱增的無神論，老頭兒仍然置之不問。只是當他遇見困難的時候，自己向神祈禱。

盛世危言使我發生了恢復學業的願望。對於在田地上的工作漸漸感覺到厭倦。我父親當然反對我。我們常常爲了這件事而爭論，最後我脫離了家庭。我走到一個失了業的學法律的學生的家裏，在那裏讀了半年書。此後，又從一位中國老學者讀了些經史古籍，也讀了許多時務文章和一些新書。在這個時候，湖南發生了一件事情，那事情影響了我的整個生活。在我讀書的那個小學校外面，我們學生看見了許多豆商從長沙回來。我們問他們爲什麼都離開了長沙。他們告訴我們城裏面的一件大事變的始末。

那年有一次嚴重的飢荒，長沙有成千成萬的人流爲餓殍。災民們派了一個代表到撫臺衙門裏請求救濟。但撫臺粗暴地回答他們說：『爲什麼你們沒有飯喫？城裏多得呢。我常常喫得很飽的。』當人民聽到了撫臺這樣的答覆，他們怒吼了。他們舉行了一個羣衆大會，並且發動了一個游行示威。

他們攻打滿洲衙門，斫斷了作爲官廳的標誌的旗杆，逐走了撫臺。事後，戶部派了一位姓張的大員，騎馬出來，曉諭人民，說政府正在想法幫助他們。很明顯的，這個姓張的約言的確是很誠意的，可是皇帝不喜歡他，責備他和「亂黨」勾結。受到斥職的處罰，接着來了一個新撫臺，立即下令逮捕事變的領袖，許多的人被梟了首，掛在旗桿上示衆，作爲對將來「謀反者」的一種警告。

對於這件事變我們在學校裏有好幾天的討論，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大多數學生們，對「謀反者」表示同情，但他們都只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觀點來看。他們不明白這是對於他們切身的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他們之感覺興趣的原因，只是因爲這是一件驚人的事變。我却覺得「謀反者」們都是些像我自己一樣的普通人民，所以我對於他們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非常痛恨。

不久之後，在韶山的哥老會（註）和一個地主之間發生了一種衝突。這個地主到法院裏去控告他們，因爲他很有勢力，所以很容易地得到了一個對他有利的判決。哥老會敗訴了。可是他們不但不屈服，反而反叛了地主和政府，逃到本地一個叫做瀏山的山裏，建築了一個強固的根據地。政府派官兵去攻打他們，那個地主並且散佈謠言，說當哥老會舉起造反之旗的時候，曾經殺死了一個小孩去祭旗。反叛者們的領袖，是一個叫做龐鐵匠的。最後他們被壓制下來了，龐鐵匠被逼逃跑。後來他終於被逮捕，殺了頭。可是在我們學生看來，他確是一個英雄，因爲他們都同情這一次的叛變。

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在我們鄉裏糧食異常缺乏。窮人們向富農要求幫助，他們開始了一種叫做「喫大戶」的運動。我父親是一個米商，雖然糧食缺乏，可是他仍然從我們鄉裏把大批米穀運到城裏去。他運出的一批米被窮苦的鄉人扣留了，於他的忿不可當。我對他不表同情。可是同時我對

於鄉人們的方法也不滿意。

在這個時候，在我們本地的小學堂裏出現了一個「維新派」教員，他在我思想上產生了另一種影響，他是「維新派」，因為他反對佛教，要想驅除神和上帝。他勸人民把廟產興學。他是一個遭受指謫的人物。我稱讚他，同意他的意見。

這些接連發生的事情，在我年青的心靈上，留着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我的心靈早已是反叛的了。在這個時期中，我也開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識，特別是在我讀過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我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這本小冊子開頭就是那麼一句：『嗚呼，中國覆亡有日矣！』它敘述日本如何佔領高麗、臺灣和中國在安南、緬甸等地方主權的喪失。在我讀到了這些話的時候，我對於祖國前途，覺得非常可憂。我開始認為努力救國，是每一個人民的天職。

我父親已經決定把我送到湘潭一家米店裏去當學徒，這家米店他很熟識。在起初我也不反對，覺得這或者會是很有興味的事。可是後來我聽到了一個有意思的新學校，我便不管我父親的反對，決意要到那裏去。這學校是在湘鄉縣我外婆家地方。我的一個表弟是那裏的學生，他告訴我這個新學校和「新教育」的改革情形。那裏不注重經書，而注重西方的一「新學」。教的方法，也是很「維新的」。

我和我的表弟到那裏去報了名。我說我是一個湘鄉人，因為我誤以為這個學校是專為湘鄉人

(註)就是賀龍曾經加入過的祕密團體。

開的。到後來，當我發現了這學校是無限籍貫的，我又改用了湘潭人的真籍貫。在這個學校裏，我繳了一千四百銅元，作爲五個月的膳宿費及書籍用品費。最後我父親對於我進這個學校的事同意了，因爲許多朋友竭力主張這個學校可以增加我的賺錢能力。這是第一次我走到離開家裏五十里路遠的地方。那時我是十六歲。

在這個學校裏我讀到了自然科學和一些西方學問的新科目。另一個可注目的事情是其中有一位教員是日本留學生。他戴着假辮子。可是很容易看出來辮子是假的。人們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沒有看見過有這許多兒童們在一塊。他們大多是地主們的弟子，穿着很值錢的衣服；農民們能够供給子弟們到這樣的一個學校來是很少的。我穿戴比別人寒酸，我只有身較爲體面的衣服。學生們不穿大褂，只有教員們纔穿，而洋服則只有「洋鬼子」纔穿。許多闊學生都看不起，因爲我平常穿的衣服總是破爛不堪。可是我也有闊學生做朋友，有兩個同伴特別知己。這兩個中有一個是現在的作家，住在蘇聯。

我不被人喜歡的另一原因是因爲我不是湘鄉人。在這個學校裏，湘鄉人是很關重要的。而屬於湘鄉的某鄉則更重要。湘鄉有上、中、下三鄉，而上下兩鄉爲了地域關係，總是不斷地鬥爭。這一鄉的人不肯與另一鄉的人並存。我在這一個鬥爭裏的局面裏嚴守中立，因爲我並不是湘鄉人。結果三方面的人都瞧我不起。我覺得精神上非常痛苦。

在這個學校裏我進步很快。教員們都喜歡我，特別是那些教古書的教員們，因爲我寫得一手好

古文。但是我卻無心於經書。我正在讀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種書報，敘述着康有爲的維新運動。一本叫做新民叢報，是梁啓超主編的。我讀了又讀，直到差不多背得出來了。我崇拜着康有爲和梁啓超，對我的表兄非常感激——那時候我以為他是很進步的，但是他後來變成一個反革命者，土豪劣紳階級的一份子。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參加了反動營壘。

許多學生不喜歡那個「假洋鬼子」爲了他的那個假辮子；可是我喜歡聽他講述關於日本的事情。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一個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我還記得幾句美麗的句子：

小雀唱歌，

夜鶯跳舞，

春天的綠色田野是可愛的，

石榴花紅，

楊柳葉綠，

彷彿是一張新的圖畫。(註)

在那個時候我只感覺到日本的美，在這個歌裏感覺到她戰勝帝俄的一些驕傲和威力。我沒有想到也會有一個野蠻的日本——像我們今天知道的一樣。

這便是我在「假洋鬼子」那裏所學到的一切。

(註)這首詩歌，顯然是日俄戰爭終了之後，春天開慶賀勝利宴會中所唱的。

到這個時候我纔知道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兩人都死了——雖然新皇帝宣統（現在的溥儀）已經統治了兩年。那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君主制度的人；實在，我還認為皇帝以及官吏們都是很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他們只要康有為維新的幫助。我那時埋頭讀古史，對於堯、舜、秦皇、漢武等的政績大為嚮往。那時候我也讀了一些外國史地。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論文裏，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一名詞，裏面有這樣的句子：『在八年的艱苦戰爭之後，華盛頓獲得了勝利，建立了他的國家。』在一本叫做「世界英傑傳」的書裏，我也讀到了拿破侖、喀德鄰、女皇、彼得大帝、衛靈頓、格蘭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和林肯。

## 二 長沙時代

毛澤東接着說：

我開始想要到長沙去。這是一個大城，湖南省的省會，離我家有一百二十里之遙。聽說這個城是很大的，裏面有許多許多的人，許多的學校，以及撫台衙門。總之牠是一個很繁華的地方。那時候我想到那裏去，進一個專為湘鄉人設立的中學。在那年冬天，我請求我的一個高等小學裏的教員介紹我到那裏去，他允許了。我步行到長沙，非常地興奮，又恐怕也許會不准我進城，根本不敢希望我真會變成這個大的學校裏的一個學生。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居然毫無困難地進去了。但政治急變，我在那裏只住了半年。

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這是一種民族革命的日報，登載着廣州反對滿清的起



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殉難。這件事情是由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的領導發動的。我被這故事深深地感動了。覺得民立報充滿了富於刺激性的材料。這報是由于右任主編的，他後來變成一個著名的國民黨領袖。在這個時候我也知道了孫中山先生和同盟會的綱領。國家這時正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興奮得如此，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裏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我的政治意見，思想是很混雜的。我還沒有放棄我對於康有為、梁啟超的崇拜。並且也不十分明瞭他們中間的不同。所以我的論文裏，我主張應該把孫中山先生從日本召回來就任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做國務總理，梁啟超做外交部長。

反對外國投資運動因了川漢路的建築而開始發動了。同時人民對於立憲的要求普遍地傳播着。皇帝對於這個回答，只是下旨設立一個咨政院。在我的學堂裏的學生愈來愈趨激烈了。他們用反對豬尾巴（辮髮）的手段來表示他們排滿的情緒。我和一個朋友把我們的豬尾巴先行剪去，但別的一些起先答應也要剪去的人，到後來都遲疑地反悔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而且後來用強迫手段把他們的辮子剪去，做我們的犧牲者有十餘人之多。這樣子，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假辮子，一躍而為主張取消一切辮子的人。政治思想之改變人的觀點的力量真大啊！

我和一個在法律學堂的朋友發動了對於豬尾巴故事的大辯論，雙方都提出相反而對立的論據。這個法律學生以經書為辯論的根據，堅持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但我自己和其他反對者，站在排滿的政治立場，提出了一種反對的理論，駁得他們體無完膚。

在黎元洪領導下的武昌起義發生之後，湖南宣佈了戒嚴令。政治局面變得劇烈。有一天一個革命黨得到了校長的允許，到中學堂裏來作了一次驚人的演講。在大會上七八個學生站了起來，對滿清加以猛烈的攻擊，擁護他的主張。並且號召建立民主國家。人們都全神灌注地諦聽着。當那個革命的演說家——黎元洪的一個官吏——在被激動起來的學生前演說的時候，會場裏面差不多連呼吸的聲音都停止了。

聽了這一次演說之後四五天，我決定要加入黎元洪的革命軍。我和幾個朋友從同學那裏集了一些錢，決定到漢口去。聽說漢口的街道是很潮濕的，非穿雨鞋不能行走，我就到一個在軍隊裏的朋友那裏去借皮鞋，這軍隊駐紮在城外。我被駐防的軍隊攔阻住了。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很緊張。兵士們已經發給了子彈，他們正向這邊衝過來。

叛軍已經沿着粵漢鐵道線前進，戰爭發爆了。在長沙城外發生了一次大戰。同時城裏而起了一個叛變，城門被中國工人攻佔。我得了其中一個工人的援助，得以進了城。接着我便爬到一個高地上去觀戰。直等到我看見了「漢旗」在衙門上飄揚——所謂漢旗也者是一塊白布中間有一個「漢」字——我才回到校裏，其時牠已經在軍隊守衛之下了。

第二天一個都督府組織了起來。哥老會裏兩個有名的會員被舉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是設在以前省諮議局的房屋裏，議長是譚延闓。原來的省諮議局被取消了。在革命者所搜查出來的滿清文件裏，有幾份請求召開國會的呈文。原稿是徐特立用血寫成的。徐氏現在已經六十歲了，現在是蘇維埃政府的教育委員。那時候他把他的手指斬斷，以表示他的誠懇的決心。他的呈文的開頭是下列

兩句話：『請求召開國會，予向諸君（派到北京去的省代表）斷指告別。』

新都督和副都督其存在的時期很短。他們倆並非壞人，的確頗有些革命意志的。但他們很窮，代表被壓迫階級的利益。於是地主和商人對他倆表示不滿。沒有幾天之後，當我去拜訪一個朋友的時，我看見他們兩個人的屍身躺在街上。譚延闓對他們發動了一個有組織的叛變。原來譚氏是湖南地主和軍閥們的代表啊。

這時候有許多學生投軍。一隊學生軍已經組織成功。在這些學生軍裏有唐生智。我不喜歡學生軍，牠的基礎太混雜了。我決定改變方針參加正式軍隊，真實地幫助革命。那時候清帝還沒有退位，所以這個戰鬥時期經過得相當長久。

我在軍隊裏的餉銀是每月七元——可是這已經超過我現在在紅軍裏所得的餉銀了。這七元錢我按月用去二元伙食。我還要買水。因為兵士必須要到城外去挑水進來，但是我是學生出身，不願意去挑，只好向挑水夫買水用。我每把餘下來的錢，都費在報紙上，我對於讀報一件事簡直有些兒瘋狂。鼓吹革命的報紙有湘江日報。裏面常討論「社會主義」，我就在這欄中，第一次學習了這一名詞。我也和別的學生們和兵士們討論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只是「社會改良主義」而已。我讀了一些江亢虎的關於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理的小冊子，我很熱心地寫信給好幾個同級的同学，討論這一問題，可是他們中間只有一個寫回信給我並且表示同意。

在我那一隊裏，我最喜歡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其餘的都是鄙俗不堪，甚至於有一個是流氓。我會勸說了兩個學生參加軍隊。我和營長以及士兵之間，建立了很好的友誼關係。我能寫，讀過

不少書，他們對於我的「大學問」都表示尊敬。我可以幫助他們寫信，或是諸如此類的事情。

革命到這時還未定局。清朝還未完全放棄政權。而在國民黨中，却發生了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人們都說湖南免不了要爆發第二次的戰爭。有許多的軍隊組織起來，反對滿清，反對袁世凱，湖南軍隊也是其中之一。可是當湖南人準備開始行動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成立了和議，預定的戰爭取消了，南北統一了，南京政府被解散了。我覺得革命已經過去了，就決定退出軍隊，回到書本上去。我只當了半年兵。

我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廣告。那時候正有許多學校在開辦起來，而以報紙為媒介，吸引新的學生。我對於學校的好壞沒有一定標準來評判，對於進什麼學校也毫無主見。可是當我投考以前，我看見了一個「肥皂製造學校」的廣告。不需要什麼學費，供給膳宿，並且還稍有津貼。這是很引人注意而且足以鼓舞人的廣告。它說了許多關於製造肥皂如何與社會有利的話，說它會如何能富國利民。於是我便改了我的投考警察學校的方針，而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我在那裏也交了一塊錢的報告費。

在這時候我有一個朋友，成了一個法政學生，他催促我進他的學校。這個法政學校，我也讀到了它的一則誘人的廣告。這廣告預約着許多美妙的事情。牠允許在三年中教完一切關於法律知識的學程，並保證三年畢業之後，學生會立即變成京官。我的朋友不斷地在我面前讚美這個學校，直到最後我寫信給家裏，把廣告上所預約的一切複述一遍，請求他們寄學費給我。我把將來做法官和京官的前途，對家裏描畫成一幅光明的圖畫。我就在法政學校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一方面等候着我父

親的回信。

命運又由一個商業學校的廣告形式來攔阻我了。另一位朋友向我建議，說國家現在正是在經濟戰爭之中，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立國家經濟的經濟專家。他的議論打動了我，我也在這個商業中學裏付了一元的報名費。結果我投考而且被錄取了。可是同時我還繼續看廣告，有一天我讀了一則廣告，述說一個公立高級商業學校的好處。這是由政府主辦的。課程很豐富，聽說教員們也都很能幹。我決定了最好是能在那裏學成一個商業專家，就又付了一元錢的報名費，以後寫信給我父親告訴了我的決定。他很高興。我父親是素來讚美經商的。我進入了這個學校，只住了一個月。

我發現了我和這個新學校之間有困難存在，因為那裏有許多功課的講授是用英文的。我和許多別的學生不同，英文程度甚低，簡直只知道字母。覺得這種局面是很討厭，便在一個月的末尾退了學。我又繼續着翻閱廣告。

我第二次的學業冒險，是在省立第一中學。我用一塊錢報名，經過了入學考試，發榜時以第一名錄取。這個學校很大，學生很多，畢業生也是很多的。那裏有一個國文教員，對我很有幫助。因為我愛好文學，所以很喜歡和這位教員接近。這一位教員借一部御批通鑑給我，這部書裏面有乾隆皇帝的聖旨和御批。

正在這個時候，長沙的官辦火藥廠爆炸，起了很大的火，可是我們學生都覺得這件事新鮮有趣。好幾噸的子彈和炸彈都爆發了，火藥燃燒起來變成一片很強烈的火焰，比起爆竹來要好看得多了。一月以後，譚延闓被袁世凱所驅逐。袁氏那時正操縱着民國的政治機構。湯薌銘代替了譚延闓，而他

我對於第一中學不大喜歡。牠的課程限制得很嚴，規則也是一無足取。在讀了御批通鑑以後，我得到了一個結論，如果我自己讀書自己研究，也許對我更爲有益。六個月以後，我便離開了學校，自己排了一個自我教育課程，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裏去讀書。我對於這件事很規矩很認真。在這樣的方法之下，所耗去的半年，我認爲對我是極有價值的。每天早晨當圖書館開門的時候，我就進去，在正午的時候，我僅僅休息片刻，去買兩個糕餅吃。這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停留在圖書館裏，直到牠關門才出來。

在這個自我教育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讀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在這裏我第一次看見了世界地圖，並且很有興趣地加以研究。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和一本穆勒名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莎的羣學肄言和一本孟德斯鳩寫的法意詩小說，古希臘的故事，和關於俄美英法以及別的國家的歷史和地理的研究，我把他們胡亂混在一起了。

這時我冒充了湘鄉縣人住在同鄉會館裏。有許多兵也住在那裏，都是些從縣裏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兵士。他們毫無事事，而且都是很窮。在會館裏學生和兵士常常吵架。有一天晚上，這種怨仇爆發，繼之而用武。兵士攻擊並且想打殺學生們。我躲避到廁所裏，直等戰爭結束以後纔出來。

那時候我沒有錢，我的家裏不肯供給給我，除非我進學校。因爲我不能夠再在會館裏住下去了，便開始找尋新的住所。同時我正在認真地思索我的前程，認爲我最適宜於教書。我又開始留意廣告。這時候湖南師範學校一則很動人的佈告，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興趣勃勃地研究牠的好處，不需要學費，

膳宿費也很低廉等等。我有兩個朋友，也鼓勵我去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試驗的論文。我把我的計劃，寫信告訴我的家庭，並且得到了他們的允許。我替我兩位朋友寫了論文，自己也寫了一篇。結果三個人都錄取了——所以實際上我錄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以為我為朋友捉刀的行爲並不是不道德的，只是一件友誼事情而已。

我在師範學校做了五年的學生，對於後來一切的廣告的引誘，不再注意。最後我確實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這裏——湖南省立第一師範——的生活中遭遇了不少的重要事情，而在這個時期中的我的政治觀念也開始形成了。在這裏我把在社會行動中的最後的經驗學會了。

在這個新學校裏有許多的規矩，而我對於這些規矩贊成很少。我反對自然科學定為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我特別不感興趣，我不願意讀，所以在這些課程裏我得到的分數都很低。我所最恨的是靜物寫生的必修課程，以為這是極端愚蠢的事。我往往只想些能夠畫的最簡便的東西，很快地畫完了就出教室。我記得有一次我畫了一條直線，上面加上一個半圓，說是代表李白詩『半壁見海日』一句。又有一次，在圖畫考試中，我畫了一個橢圓形，說這就是蛋，自己認為滿足了。圖畫這門課程我得了四十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會科學課程都很好，所以一平均我的別種低級分數都給扯過了。

這裏的一個中文教員，學生們替他起個綽號叫袁大鬍子。他嘲笑我的文章，說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瞧不起梁啟超，認為他是一個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氏曾經是我崇拜的人。我被迫只好改變我的文章作風。我就閱讀韓愈的文章，學習了舊的古文辭藻。所以，敬謝袁大鬍子，假使是需要的話，我

今天還能夠寫出一篇可觀的古文。

對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是英國留學生，他的生活，後來和我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他教的是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有高尙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堅決地信仰他的倫理學，努力把一種公正的、道德的、正義的而有益於社會的人的志願，灌輸給他的學生們。受了他的影響，我讀了一本關於倫理的書，是蔡元培翻譯的。我讀完了這本書之後寫了一篇論文，題名叫做「心智的能力」。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我的論文很受楊昌濟老師的稱讚。他給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從他的唯心觀點來批評的。

一個姓唐的教員常常給我一些舊的民報看，我讀牠的時候興趣極爲濃厚。在這上面我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的綱領。有一天我看見民報上登載着兩個中國學生徒步旅行中國一直到了西藏邊境的打劍爐的事。這件事非常地鼓動着我。我想要摹倣他們，但是我沒有錢，所以我想我應當先辦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於是第二年夏天我步行游歷湖南省，走遍了五縣，和我一起的有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我們走遍了這五縣，不費一文錢。農民們供給我們喫食，供給我們睡覺地方；我們足跡所至都受很好的招待與歡迎。這個和我一同旅行的蕭瑜，後來成爲在易培基手下的一位國民黨官吏。易氏那時就是湖南師範的校長。後來成了南京的高級官吏，他替蕭瑜謀得到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監守的職位。蕭氏盜賣了博物院裏一些最寶貴的寶物，在一九三四拐款潛逃了。現在他在大連藏身。

爲了感覺到要向外發展非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伴侶不可，有一天我就在長沙報紙上登了一個



廣告，邀請那有志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絡。我特別提出能耐艱苦有決心而能為祖國犧牲的條件。後來我收到了三封半響應的信。一封是羅章龍的回信，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以後又叛變了。兩封是從兩個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寄來的。那所謂半封回信是一個沒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所說的一番話之後，他自己並沒有什麼具體的建議。我們的友誼那時沒有發展起來。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圍聚集了一羣學生，這羣學生後來就是新民學會的核心，這個學會對於中國的國事和命運，有着廣大的勢力。牠是一小羣態度極為認真的人，絕對不討論身邊瑣事的。他們所說所做，必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來談情說愛，而且認為時局是太危急了，學問的需要是太逼切了，要討論女人或私人事情根本沒有時間。我對於女人不感覺興趣。在我十四歲時，我父母替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同居過——後來也一直沒有。我不承認她是我的妻子，而在這個時候，我一點兒也不想念她。關於女人的「媚人」的討論，在那時候的青年生活中，常常是佔有重要的一頁的，可是我的同伴們不僅不討論這個，即使是日常生活普通事情，也拒絕討論。我回憶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裏，這位青年對我談起要買些肉，他在我的面前把他的僕人喚來，向僕人討論了半天買肉的事，纔叫他去買一小片肉。我心裏非常不安，以後就不再和這位青年見面了。我和我的朋友們，只高興談論大事情——中國人類的本性和人類社會，世界，宇宙！

我們也成了熱烈的體育鍛鍊者。在冬季假期裏，我們在田野裏走着，上山下山，繞行城牆。渡河過江。假如遇見下雨，我們就把衣服脫下，說這就叫「淋浴」。當太陽很熱的時候，我們也把衣服脫下，說

這就是「日光浴」在春風裏我們大聲叫着說這是一種叫做「風浴」的新遊戲。已經下霜了的日子，我們還要露宿，甚而至於在十一月裏，我們還在冷水裏游泳。這些一切都是在「鍛鍊身體」這一個名詞之下進行的。也許這件事對於我的體格的確有不少幫助，因為後來我在華南許多次的進退行軍裏，以及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裏，受賜匪淺的。

那時候我和許多在別的鄉鎮城市裏的學生和朋友們，組成了一種很廣大的通信關係。慢慢地我開始覺得需要一種更嚴密的組織。一九一七年我和幾個別的朋友，發起組織新民學會。這學會有七八十名會員。這七八十人中有許多人後來都變成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曾經加入過新民學會的較爲著名的共產黨員有羅邁——現在黨組織委員會書記；夏曦——現在第二方面軍裏面；何叔衡——中央蘇區中最高法院高等推事；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槍殺；郭亮——有名的工人運動的組織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槍殺；蕭子璋——作家，現在蘇聯；蔡和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槍殺；葉立雲（譯音）——中央委員，後來叛變投降國民黨，變成資本家工會組織者；蕭錚（譯音）——黨的著名領袖，黨成立時最初綱領的六個簽名者中之一，不久以前病故。新民學會會員的大多數，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槍殺了。

大約在同時，另一團體組織成功了，這是湖北的「社會福利社」（譯名）是類似新民學會的一種組織。牠的許多會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員。其中有溫得應（譯音）——該社社長，在反革命中被蔣介石槍殺；林彪——該社社員，現任紅軍大學校長。同樣，張家（譯音）——現任白軍工作負責人。在北平也有一個會社，叫做「互社」（譯音）有些會員後來也加入共產黨。在中國別的地

方，主要是在上海、杭州、漢口、天津，一些青年戰士，組織了好幾個急進的團體，開始在中國政治上確立了一種勢力。(註)

這些會社的大多數，多少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響才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當我還是在師範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我特別喜歡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梁、康二人我早已拋棄了。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等等思想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關於「十九世紀的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等，我都有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確定地反軍閥與反帝國主義的。

我一九一二年考入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畢業。

### 三 革命的前奏

在毛澤東講着他過去的一生事蹟的時候，我注意着一個旁聽者，至少是和我同樣地發生興趣。這就是他的夫人賀紫蓮女士。很明顯的，他丈夫所告訴我的許多關於他自己以及共產黨運動的事實，是她從前所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而且不止她一人，毛氏在保安的許多同志，也都如此。後來，當我向

(註)這樣的團體在天津的是「覺悟學會」，吸引一些急進的青年到組織裏來。周恩來是創立人之一。此外還有鄧英超女士——現在的周恩來夫人馬鈞，一九二七年在北平被槍殺；孫驥俊——現任國民黨官吏。

別的紅色領袖們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他們的同志，常常圍攏來，興趣極濃地初次聽到這些故事。雖然他們在一起共同工作了許多年，可是他們並不知道彼此在參加共產黨以前的生活，這些日子他們是認為黑暗時代，人們只有在加入共產黨以後纔開始真實的生活。

這是另一夜裏，毛氏兩腿交叉着坐着，背靠在兩個鐵的行軍箱子上，燃着了一支紙煙吸着，找着了前一天所講故事的線索，接下去說：

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當中，總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塊錢——許多次數的報名費也包括在內！從這個數目中我要把三分之一耗費在報紙上，因為通常定一份報紙，總是按月一元。我還常常在書攤子上買些書和雜誌。我父親責罵我這種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面。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就是在我沒有走上井崗山以前，我對於北平、上海和湖南的各種日報的閱讀，從未中輟過。

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裏，母親死了。這樣我回家的興趣更加淡薄了。我決定那年夏天到北平——那時候是北京——去。湖南有許多學生都計劃着要到法國去，用「工讀」的方法去讀書。法國在歐戰中用這種方法招募中國的青年去爲她做工。在離開中國以前，這些學生預備在北平學習法文。我幫助把這種運動組織起來。在這一羣出洋的學生中間，有許多是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他們大部分後來都變成著名的急進分子。徐特立也受了這一個運動的影響，放棄了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員位置，跑到法國去，當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可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纔加入了共產黨。

我陪了一些湖南學生來到北京。可是，雖然我幫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還有補助，我

卻不願意到歐洲去。我覺得關於國家的事，我知道的太少了，假使我把時間化在中國，那時祖國是更爲有利。那些決意要到法國去的學生，從李石曾——現在中法大學的校長——學習法文，可是我沒有。我個人另有計劃。

我在北平覺得費用太大：我是從朋友那裏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非馬上找尋職業不可。楊昌濟——從前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現在是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找尋一個職業，他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殺了。李大釗爲我找到了工作，是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八塊錢——數目不算少。

我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人們都不屑和我接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到圖書館來看報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們，都瞧我不起。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像傅斯年、羅家倫之類，我對於他們特別感覺興趣。我想去和他們交換一些關於政治和文化問題的意見，可是他們都是忙人，沒有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的南方士話。

但是我並不失望。爲了要旁聽大學裏的功課，我參加了哲學會、新聞學會。在新聞學會我遇見了好幾個同伴，像陳公博，他後來是南京一個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加入了共產黨，又一躍而成了所謂「第三黨」的一份子；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氏，給我很多的幫助。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充滿了熱情理想，是性格良好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槍決了。

當我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的時候，我也遇見了張國燾——後來却是國民黨的走狗了；康白情——他後來加入了美國加利佛尼亞州的三K黨（「！！！」——斯諾）還有段錫朋——後來

是南京政府教育次長在這裏我也遇見了而愛上了楊開輝女士。她是我從前的倫理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氏對我最有影響，並且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最真摯的朋友。

我對政治興趣繼續增高，我的思想也越加急進。我已經把這種情形的背景告訴你了。可是在這時候，我還是很混沌，用一句時髦的話，就是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到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小冊，很受了一些影響。我常常和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北大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牠在中國的可能性。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可是在另一方面，這座古城的美給我了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一間小屋子裏共有七個人擁住着。晚上我們七個人挨得緊緊地睡在一個坑上，挨得透不過氣來。當誰要翻身的時候，必須預先警告睡在兩邊的人。但是在公園裏，在故宮的廣場上，我對於北方的早春，生了嚮往之情。當北海上面正結着堅冰的時候，素色的寒梅盛開着。楊柳枝頭懸掛着水晶似的冰柱子倒垂在北海上，使我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海冬天珠玉樹的名句：『千樹萬樹梨花开。』北京的無數的樹木喚起了我的好奇和讚美。

一九一九年之初，我和要到法國去的學生一同到上海。我的錢只夠買到天津去的車票，到了天津以後，我就沒有辦法向前進了。可是，正像中國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之人路，』很幸運的，有一位同學從北平孔德學校得到了一些錢，他借了十塊錢給我，使我能夠買一張到浦口的車票。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仰孔子的墳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曾經洗過脚的那條小溪邊，也到了聖人渡他的幼年生活的小鎮。曲阜大成殿旁邊有一顆古樹，相傳是孔子手植的，靠近後代爲他所

立的歷史上有名的廟旁邊，我居然看見了這顆樹。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個弟子——顏淵所曾經住過的河邊停留過，並且也去拜訪了孟子的生長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東的神聖的山，馮玉祥曾在這裏隱居而且寫過些愛國的詩句的。

可是當我到了浦口，我又分文不名了，也沒有車票。沒有人可以借錢給我；我不知道如何能離開浦口。可是禍不單行，車上一個賊又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了。噫呀！怎麼辦呢？但是，又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又遇着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位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皇菩薩」。他借給我買鞋子以及買一張到上海去的車票的錢。這樣我安全地完畢了我的旅途——同時對於我的新鞋特別當心了。上海我知道已經有一筆款子募集好了送學生到法國去，同時爲我還預備了一筆錢回湖南。我送我的朋友們上了輪船之後，我就向長沙進發。

我所記得的，我第一次到北方去所值得紀念的旅行是這些：

我在北海溜過冰，曾經繞洞庭湖走過。又在保定的城牆上繞着走了一圈。在三國志裏有名的徐州的城牆以及歷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繞過一個圈子。最後我登過濟山，謁孔墓。這些事情，那時候我覺得是步行遊湖南以外的有價值的成績。

當我回到長沙的時候，我的政治工作比以前更爲積極。五四運動之後，我把大部分時間，化在學生政治活動上面。我主編湘江評論，一種湖南學生辦的報紙，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還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一個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而且特別是新民學會，都猛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一個壞極了的人。我們領導了一次學生總罷課，反

對張敬堯，要求他去職，並且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那時孫中山在那邊已經很活動——鼓動反對他。於是張敬堯禁止了湘江評論的出版，作為學生反對他的一種報復行動。

此後我又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裏發動了一種反軍閥運動。新民學會又把反張鬪爭，擴大而為普遍的反軍閥的運動，我擔任一個通訊社的社長，來策進這個工作。在湖南這個運動是得到相當成功的。張敬堯被譚延闓所推倒，在長沙建立了一種新的統治局面起來。正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分裂而成了兩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堅持一種更遠見的社會、經濟、政治的改革。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裏我又遇見了陳獨秀。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北京，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之影響也許比任何人還大。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曾經去拜訪他，請他能贊助湖南的學生運動。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關於組織「湖南改造聯盟」的計畫。然後我回到湖南開始着手組織。在那裏我覓得了一個教員位置，同時繼續我在新民學會裏的活動。那時新民學會有一個湖南「獨立」的綱領——意思是真正的自治。對於北方政府非常不滿，相信假使能夠和北京脫離關係，那末湖南的現代化當更為迅速。所以我們的團體竭力鼓吹和北京政府「分離」。我那時是美國的門羅主義與門戶開放主義的堅決的擁護者。

譚延闓又被一個名叫趙恆惕的軍閥逐出湖南了。趙恆惕以「湖南自治」為號召達到攫取他私人利益的目的。他假意擁護自治，提出中國「聯省自治」的一種主張。可是當他一攫取了政權之後，卻用着大力壓制民主運動。我們的團體要求男女平權和代議制政府，贊成一種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政綱。我們在自己辦的新湖南報上，公開鼓吹這種改革。有一次我們領導了一次搗毀湖南省議



會的活劇，省議會的大多數議員都是軍閥指派的地主豪紳。這一次暴動的結果是把省議會裏所張掛的充滿着胡說霸道和吹牛的詞句的對聯匾額，都扯了下來。

搗毀省議會這件事被認為是湖南的一件大事變，把那些統治者們都嚇慌了。可是，當趙恆惕握得了政權，他背叛了他以前所倡議的一切主張，反而特別猛力地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們的學會把攻擊的目標轉向了他。我記得在一九二〇年有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學會發起了一個慶祝蘇聯十月革命三週年紀念的示威運動。這示威被軍警鎮壓下來了。有些示威者曾經試想在會場升起紅旗來，可是被軍警所禁止。示威者指出依照當時的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但是軍警們置諸不理。他們說他們不管什麼憲法不憲法，只知道執行趙省長的命令。從這次以後，我漸漸相信只有由羣衆行動得來的羣衆政治力量，纔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實現。

在一九二〇年的冬天，我第一次以政治爲目的把工人組織起來，並且開始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所指導。在我第二次北遊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近況的書，並且熱烈地搜尋一切那時候能夠找得到的中文共產主義的著作。有三本在我的思想上影響特別大，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接受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的最正確解釋之後，便從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者）翻譯的，是用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考思基的階級鬥爭和刻兒枯樸的社會主義史。到了一九二〇年的夏天，在理論上——某種程度地也在實踐上——我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以後，我便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同年我和楊開輝女士結了婚。（註）

(註)毛氏以後再沒有提到他和楊開輝女士的生活。從種種方面看來，她是一個很聰明的女人，她是北京大學的一個學生。後來成了大革命中的一個青年領袖，最活動的女共產黨員之一。他們是被當時湖南新青年所慶賀着，認為是「最理想的浪漫史。」這好像是由一種「試婚制」開始的，而很明顯地他們彼此是很專愛而忠實的。後來楊開輝女士，大約是在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槍殺了。

## 四 國民革命時代

毛澤東當時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原因是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那樣的組織存在着。到一九一九年，陳獨秀纔和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繫。一九二〇年馬麟——第三國際的一個能力很強的長於煽動的代表——到了上海，接洽和中國黨的聯絡。不久之後陳獨秀在上海召集了一個會議，而差不多同時，一羣中國的留法學生，也在巴黎開會，建議在那裏設立一種共產主義的組織。

我們想起了中國共產黨到現在還不過是十六歲的青年，那麼牠的成績實在已經很可觀了。除了蘇聯，牠是世界上最強有力的共產黨。並且也除了蘇聯以外，是唯一有着足以自豪的自己的強大武裝隊伍的黨。

又是一個晚上，毛氏繼續講他的故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在這個組織中間主要的領袖人物是陳獨秀和李大釗，兩個人都是中國最有名的知識界的領袖。當我在北大任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

在李大釗領導之下，我就很快地發展，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我對於這方面的興趣的發展，陳獨秀的助力也不小。在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時候，我曾經和陳獨秀討論過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書籍。而陳的堅決的信仰在我生活中，這一個轉變的時期對於我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

在上海這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之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其餘的出席會議的人物中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個人。那一年的十月，共產黨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而我是委員之一。接着在別的省分和城市中也組織起來。在上海的黨中央委員會裏有陳獨秀、張國燾（後來叛變而投到國民黨裏了）、楊民哉（譯音）、譚平山、陳公博（後來成爲了漢奸）、劉燕青（譯音）、殷秀松、施存統、沈玄廬、李漢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被殺）、李達、李森（譯音）等在湖北的黨員有項英、惲代英、董必武——（現任保安共產黨學校主席）、許白吳、施洋。在山西的黨員有高宗裕（譯音）和一些有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的是李大釗、鄧中夏、羅卓龍、劉仁靜（現爲托洛茨基派）和一些別人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委員）、彭湃（一九二七年被殺）、王精美（譯音）和鄧恩明（譯音）是山東支部的發起人。

同時在法國，許多工讀學生們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牠的成立差不多是和在中國國內的組織同時開始的。那裏的黨的發起人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敬子（蔡和森的妻子，是發起人中唯一的中國女子）。羅邁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發起人。在德國也有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不過時間稍遲一些。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莫斯科支部的發起人有豐秋白和一些別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那時是書記——已經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工會，包含礦工、鐵路工人、僱員、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等。那年冬天一個猛烈的勞工運動開始了。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而在農民中做的工作很少。大的礦廠的大部分工人，而學生則幾乎是全部被組織起來了。在學生與工人兩方面都有好幾次鬥爭。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長趙恆惕下令槍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譯音）和龐人龍，結果是引起了對於趙恆惕的普遍的公憤。被槍殺的兩個工人之一——黃愛——是右派勞工運動的領袖，這一派的基本人員是工業學校學生。是和我們反對的。可是在這一件事件中，以及其他許多鬥爭中，我們是援助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當中也有勢力。這些工會那時候組織湖南省總工會。可是我們對無政府主義者妥協，經過磋商之後，阻止了他們所幹的許多躁急而無謂的行動。

我被派遣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趙恆惕運動。第二次黨大會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在上海開會，我本想要去參加的。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碰不到同志，所以錯過了機會。我回到湖南，猛烈地推動工會的工作。下一年春天，湖南發生了幾次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與承認工會的罷工。大部分都勝利了。五一勞動節湖南全省舉行一次總罷工，而這次罷工，表明了中國的工人運動，已經到達了空前成功的地步。

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是一九二三年在廣州舉行的。通過了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建立了反抗北洋軍閥的聯合陣線。這時我到了上海，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我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的第一次全代大會。三月裏回上海，一面擔任共產黨黨部的工作，一

而又擔任國民黨黨部的工作。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執行委員，除我之外，還有汪精衛和胡漢民。我和他們共同工作，調整國共兩黨的行動。那年夏天，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了。加倫將軍來任顧問，別的蘇維埃顧問也從蘇聯來了。國共的聯盟開始領導普遍全國的革命運動。那年冬天我在上海抱病，回湖南休養。可是回到湖南以後，我把本省偉大的農民運動的核心組織了起來。

在從前我還沒有充分了解在農民中階級鬥爭的程度，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及接着的政治運動的大波浪當中，湖南農民的鬥爭性纔十分明顯。我離開我在養病的家，開始農村組織工作。在幾月之中我們組織了二十多個的農民協會，惹起了地主們的仇恨。他們請求當局逮捕我。趙恆惕曾派軍隊追尋我。我便逃往廣州去。我到那裏，正是黃埔學生戰敗雲南軍閥楊希閔，廣西軍閥劉震寰的時候，廣州城市和國民黨內部充溢樂觀空氣。正當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後，蔣介石被任命為第一軍總司令，汪精衛為國民政府主席。

我擔任了政治週報編輯，這是國民黨政治部的喉舌。牠後來在攻擊和批評戴季陶所領導的國民黨右派，有很活動的勢力。我又負責擔任了訓練農民運動組織者的工作，並且為這種目的開設了一班訓練班，由二十一個不同的省分的代表來參加聽講，其中有從內蒙來的學生。來廣州不久，我擔任了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其餘林伯渠是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個共產黨員譚平山是工人部長。

我那時文章寫的很多。在共產黨內，擔任農民工作的特別任務，根據着我的研究和我在湖南組織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叫做中國社會的階級分析，另一本叫做趙恆惕的階級基礎。

和我們當前的任務。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裏所發表的意見。那本書主張一種急進的土地政策和在共產黨內加緊農民組織。陳獨秀拒絕由共產黨中央機關發行這一本小冊子。這本冊子後來在廣州農民月刊和中國青年上發表的。第二篇論文是在湖南以小冊子的形式發行的。大約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和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不滿意。我們慢慢地分離了，雖然我們中間的鬥爭要到一九二七年纔達到最高潮。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工作，直至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企圖實行他的第一次政變。在國民黨左右兩派協調，國共聯合陣線重行確立之後，我又到上海，是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這年五月由蔣介石領導召開的。我在上海負責主持共產黨的農民部，從這裏又被派到湖南去視察那邊的農民運動。同時，在國共兩黨的聯合陣線之下，在一九二六年秋天，開始了歷史上有名的北伐。

我在湖南視察了五縣——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做報告給中央委員會，催促在農民運動裏採行新路線。次年早春，當我到了武漢的時候，舉行了一個各省農民聯席會議。我出席提出建議，主張普遍地把土地重行分配。在這次會議上，有彭湃、方志敏和兩個俄國共產黨員——約克（York）及窩隆（Volen），決議接受了我的建議，提交共產黨五次大會討論。可是中央委員會加以否決了。

當共產黨中央第五次全會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召開的時候，黨還是在陳獨秀操縱之下。雖然那時候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行動，在上海、南京開始向共產黨進攻，可是陳獨秀還是抱溫和

態度與武漢的國民黨相妥協。而且抑制了各方面的反對，採行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那時候我對於黨的政策，非常不滿意，特別是關於農民運動一方面。我現在想起來，假使那時的農民運動，能更澈底地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對地主鬥爭，那麼蘇維埃也許能早一步而更有力的在全國發展起來。

但是陳獨秀竭力反對。他不了解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並且把農民革命在這時候的可能性估計得太低。結果在大革命危機的前夜舉行的第五次全會，不能通過一種完美的土地政綱。我的農民運動應該加速深入的主張，甚至沒有提出討論，因為那時的中央委員會爲陳獨秀所操縱，拒絕提出來考慮。全會議決以「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爲地主，這樣就把土地問題拋開了。用這一個地主的定義，要想發展階級鬥爭是完全不完備而沒有事實根據的，而且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土地經濟的特殊性。可是會議之後，一個全國農民協會組織成功了，我成了第一任會長。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不管共產黨對牠的態度如何萎縮，和國民黨對牠如何岐視，已經發展到驚人的程度，高級長官和軍隊司令們開始要求鎮壓這種農民運動，他們稱農民協會爲「流氓協會」，認爲牠的行動和要求都太過火。陳獨秀把我從湖南調開，認爲我應對湖南所發生的那些事情負責任，並且猛烈反對我的意見。

四月間反革命運動在南京和上海開始，在蔣介石領導之下的舉行了對於有組織的工人們的大屠殺。廣州也實行了同樣的舉動。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生了許克祥事變，好幾個農民和工人被反革命份子所槍殺。不久以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取消和共產黨的合作，把共產份子從國民

黨裏以及武漢政府裏驅逐出去，可是這武漢政府不久也消聲匿跡了。

這時候許多的共產黨領袖們接受黨的命令離開中國，到俄國、上海或別的安全地方去。我被命令到四川去。我請陳獨秀派我到湖南去做湖南黨省委書記。可是十天之後，他又急急地下令叫我回來，責備我組織反抗唐生智的暴動。唐那時是武漢的統治者。黨務在這時候混亂不堪。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最後武漢國共合作的崩潰，促成了陳獨秀領袖的沒落。

## 五 蘇維埃運動

有一次我和毛澤東談到關於一九二七年春天那些爭辯不決的事情，在這裏提到牠，我覺得很有趣。他對我說，這不是他自傳的一部分，但是作爲一個中國共產黨員生活中的轉變經驗的個人回憶，是頗爲重要的。

我問毛氏，他認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的失敗，武漢國共合作政府的解體，以及南京獨裁政府的整個勝利，誰應該負最大責任。毛氏把最大的罪過放在陳獨秀身上，他的『動搖的機會主義，使黨失去了決定的領導權，等到當繼續妥協明顯地將要有大禍的時候，又使黨失去了自己的路線。』

對於失敗的第二個負責者是鮑羅庭——蘇聯籍的首席政治顧問。毛氏說鮑羅庭臨時完全轉換了他的立場，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贊成急進的土地重行分配政策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時，他又竭力地反對了他的動搖徘徊，是絲毫沒有邏輯根據的。毛氏說：『鮑羅庭站在陳獨秀的右邊一點點，



他準備不顧一切去討資產階級的歡心，甚至以爲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也無不可，而結果果然下令解除。』依照毛氏說法，羅埃 (Roy) —— 共產國際的印度代表，是『僅僅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庭兩人的左邊一點點，而且只是站着而已。他只能口裏說說，可是議論雖多，卻並不提出任何實施的方案來。』毛氏以爲在客觀地看來，羅埃是只飯桶，鮑羅庭是個誇大狂者，而陳獨秀是一個自己意識不到的出賣黨的人。

『陳獨秀實在見工人們有點怕，見武裝起來的農民尤其怕，最後遇到武裝暴動的實現，他竟連知覺都失掉了。再也看不清事情的真相。他的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害了他，使他走向驚惶和失敗。』

那時候，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完全獨裁者，甚至於不和中央委員會磋商就採取重要的決議。『他不把共產國際的命令，拿出來給其餘黨的領袖看，甚至也不和我們討論。』最後還是羅埃促成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分裂。共產國際把一件文件交給鮑羅庭，要求黨暫行沒收土地。羅埃得到了這文件的一份，他立即拿去給那時的左派武漢政府的主席汪精衛看。這一幕滑稽劇的結果，是人人皆知的。共產黨被武漢當局從國民黨裏驅逐出來了，牠的勢力倒了，而且不久武漢政府本身也被蔣介石推倒。

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有直接的指揮權，不是貢獻「意見」而是命令，而且中國共產黨是無權否決的。於是武漢的失敗，形成了俄國對於世界革命性質的一個爭執的轉點，這個時期的不久之後，俄國的反對派被打倒了。托茨基的「永遠革命」理論被駁倒了。蘇聯開始認真地「在一國裏建立社會主義」——從這一點爲出發點，牠現在已到達保障世界和平的

地位了。

可是毛氏也承認即使當時共產黨採取了一種更積極的政策，即使在和國民黨分裂以前，就在工人和農民中創立了共產黨武裝隊伍，那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的勢力也未必能被擊敗。『可是蘇維埃要是能在南方有一個很大的發動，能夠得到一個根據地，那末以後無論如何不會被消滅的。』

在他的自敘中，毛氏已經說到蘇維埃的開始。蘇維埃是在革命的廢墟中建立起來的，赤手空拳地鬥爭着，要從失敗中重建新的勝利。他繼續說：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賀龍、葉挺領導之下的第二十軍，和朱德合作，發動了歷史上有名的南昌暴動，這就是紅軍組織的開始。一星期後，八月七日，黨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開除了陳獨秀的書記職務。我從一九二四年廣州第三次會議以來，一直是黨政治局的一員。對於這個決議，我是主動的。在這次到會的其他十個人之中，有蔡和森、彭孔塔（譯音）和瞿秋白。黨採取了新路線。一切和國民黨的合作的希望，是暫時放棄了，因為國民黨已經十足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能再負起民主革命的責任來了。長期的政治權力的公開鬥爭就此開始。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爲「秋收暴動」的這個運動。我在那裏的計劃是要實現下列五點：（1）省黨部完全脫離國民黨；（2）組織工農革命武裝隊伍；（3）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4）在湖南建立共產黨的勢力和國民黨脫離關係；（5）組織蘇維埃。第五點在那時候爲共產國際所反對，直到後來，牠纔把這一點提出來作爲口號。

當九月間，以湖南的農民協會爲出發點，在發動普遍的暴動上，我們已經成功了。工農軍隊的基本單位也已成立。入伍者有三個主要來源：農民，漢陽礦工，和國民黨軍隊中的譁變部隊。這早期的革命武裝隊伍，被稱爲「工農第一軍第一師」。其中第一旅是由漢陽礦工組成的，第二旅是由平江瀏陽醴陵以及湖南另外兩個縣分裏的農民保衛隊組成的。第三旅是由叛棄了汪精衛的武漢警衛隊的一部分組成的。這一支軍隊組成是得到湖南省委員會的准許的，但湖南省委員會及我們的軍隊的一般綱領爲黨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那時候的中央委員會只是一種觀望政策，並不積極反對。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在漢陽礦工和農民保衛隊之間奔走的時候，我被與國民黨通聲氣的一些民團捕獲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手段正達到牠的最高點，整百的有嫌疑的紅黨被槍決了，我被送到民團總部去，那是一定要遭槍決的。我從一個同志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想賄路押送人員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唯利是圖的，我的遭受槍決，對於他們沒有特別利益，他們已經答允釋放我了，可是負責的隊長不肯，所以我決定打算脫逃，不過直到離民團總部不過二百碼的地方，我纔得到了脫逃的機會。在這個地點，我把繩子扭斷，逃到田野裏去躲着。

我走到一個高地地方，在一個池子的上面，四周有長得很高的草，在那裏我躲着直到日落。兵士們搜尋我，並且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我。有好幾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碰到他們了。可是我始終沒有被發覺，雖然有五六次，我認爲已經無望，覺得我是一定要再被捕獲了。到後來黃昏到了，他們不再搜尋我了。我馬上出發，爬山越嶺，整夜地跑着。我沒有鞋，腳上起了泡。在路上我碰到了一個農民，他待我很好，允許我借宿，後來又領導我到了鄰縣。我身邊還有七塊錢，用來買了一雙鞋。

子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保衛隊那裏的時候，袋裏只剩兩個銅板了。

新軍成立以後，我擔任了黨前敵委員會的主席，武漢衛戍司令俞瀉都（譯音）擔任第一軍總司令。俞氏多少是受他的部下逼迫而勉強出來擔任的，不久以後他背叛了紅軍，參加了國民黨。他現在在南京爲蔣介石工作。

這支小小的軍隊，一面領導農民暴動，一面向南移動穿過湖南省。牠必須擊破千萬的國民黨軍隊的防線，打了許多次的仗，敗退了幾次，紀律很壞，政治訓練的水準很低。在士兵和長官之中有許多動搖分子。有許多逃兵。俞氏逃走之後，軍隊到達寧國，便又改編了一次。鄭蒙（譯音）被任命爲殘留軍隊的——約有一旅之衆——指揮，可是後來他也叛變了。不過在第一隊裏有多數人，自始至終忠實不渝，直到今天他們還在紅軍裏——如羅榮桓，第一軍團政治委員楊錄生（譯音）現爲紅軍司令。當這一小隊，最後爬上井崗山的時候，人數只剩一千名左右。

因爲秋收暴動的綱領沒有得到黨中央委員會的批准，又因爲第一軍遭受了一些嚴重的損失，又從城市的角度來看，這種運動無疑是要失敗的，所以中央委員會這時候決定排斥我。我的政治局與前敵委員會的職位均被免職。湖南省委會也攻擊我們，稱我們是「槍桿子運動」。可是我們還是把軍隊在井崗山團結着，十分相信自己所走的路線是正確的，而且後來的事實也充分爲我們證明了。新兵參加了，這一師人又補充了，我擔任了總指揮。

從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師在井崗山打定了基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湖南邊境茶陵地方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第一個蘇維埃政府也選舉完成牠的主席是杜仲賓（譯音）在

這個蘇維埃中我們實行了一種民主政綱，採取一種遲緩而能正常發展的溫和政策。這樣井崗山得到了黨內盲動份子的責難，他們要求一種恐怖政策，焚掠殺戮地主來喪他們的膽。第一軍前敵委員會拒絕採用這種戰略，所以頭腦熱烈的人就稱我們爲「改良主義者」。他們對我攻擊最烈，因爲我不採行一種較爲「急進的」政策。

兩個以前在井崗山附近的土匪的領袖，名叫王佐、袁文才，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加入了紅軍。使紅軍實力增加到將近三旅之衆。王、袁都被任爲旅長，而我是軍長。這兩個人雖然是土匪出身，可是曾經投降過國民革命軍，現在他們準備對反動勢力作戰。當我在井崗山的時候，他們倆可算是忠實的共產黨徒，執行着黨的命令。可是後來，當他們單獨被留在井崗山的時候，他們回復了土匪脾氣，結果是被那時已經組織化蘇維埃化的有自衛能力的農民們所殺。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到達了井崗山，我們的隊伍會合了。我們共同起草了一個計劃，組織一個六縣的蘇維埃區。慢慢地把共產勢力在湖南、江西、廣東邊境各縣中穩定團結起來，以此爲根據地，再向更廣大的區域發展。不過這個策略是與黨的建議相衝突的，因爲黨有着急速發展的偉大理想。在軍隊裏面，我和朱德要同兩種傾向鬥爭：第一種是立即進攻長沙，這我們認爲是「冒險主義」的；第二種向南撤退到廣東邊境，這我們認爲是「敗退主義」。那時候我們所看到的主要工作有二：（1）分配土地，（2）建立蘇維埃。我們想把羣衆武裝起來加速這些步驟。我們的政策，主張自由貿易，寬和地對待被俘虜的敵人部隊。一般地說來，是民主的溫和主義。

一九二八年秋天，井崗山上召集了一個代表會議。到會的是井崗山以北的蘇維埃代表。關於上

而所說各點，蘇區裏的黨代表中，意見還是很紛歧，在這次會議中，各種不同的意見是充分地發揮出來。少數人說：在這種基礎上，我們的前途很狹窄。大多數人，則相信我們的政策會成功。當議決案提出來，並且說明蘇維埃運動將來如何會得到勝利的，議案是很容易地通過了。可是黨中央委員會還沒批准這一個運動。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次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開會報告書到達了井崗山的時候，這批准才算接到了。

在這次會議裏所採取的新路線，朱德和我是完全同意的。從此以後，黨的領袖中，和在農業區域裏的蘇維埃運動的領袖中的意見的不協調，纔消除了，黨的一致重又建立了起來。

第六次會議的議決案，綜合了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南昌暴動、廣州暴動和秋收暴動的種種經驗，下了贊成對於土地運動應該重視的結論。大約在這時候，紅軍開始在中國別的地方發現。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東部發生了暴動，這些暴動奠下了新蘇區的基礎。在西方的賀龍和在東方的徐海東，開始組織他們自己的工農軍隊。徐海東活動的區域，成了鄂、豫、皖、蘇區的核心，後來徐向前和張國燾也加入了一九二七年冬，方志敏和邵式平在江西的東北部沿福建邊界也開始了一種運動。這後來就發展成爲一個有力的蘇維埃根據地。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彭湃率領了一部分忠實的部隊，到海陸豐組織了一個蘇維埃，可是因爲接受了盲動主義的政策，不久就被消滅了。不過它的軍隊的一部分，在古大存指揮之下，離開那區域，與朱德和我取得了聯絡，後來成了紅軍第十一軍的基本隊伍。

一九二八年春天，游擊隊在李文龍、李紹祖（均譯音）領導之下，開始在江西的興國、東固一帶

活動。這一個運動，以吉安的周圍為根據，這些游擊隊，以後成了第三軍的中心幹部，而吉安本縣，則成了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根據地。在福建西部，由張鼎丞、鄧子恢（謠傳被殺）、傅柏翠（後變成社會民主黨）等主持組織了蘇維埃。

在井崗山「反對冒險主義之鬥爭」時期中，第一軍擊退了白軍兩次爭奪山寨的企圖。井崗山的確是我們所要創造的這種活動部隊的絕好根據地。牠有很好的天然屏障，而且所產的穀物，足夠維持小小的軍隊。它周圍有五百里，直經約八十里。本地名稱是叫大小五井（真真的井崗山是附近的一個小山，已經早已放棄了。）這是從周圍五個大井得名的——大小上、中五個大井，在山上的五個村子，就跟着這五口井而命名的。

我們的軍隊在井崗山會合之後，重行改編了一次。有名的紅軍第四軍創立了，朱德任總司令，我是政治委員。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何健的部隊暴動講變以後，井崗山又增加了許多軍隊。紅軍第五軍就從這些部隊中產生出來，總司令是彭德懷。除了彭以外，還有鄧平（在長征貴州遵義遇害）、黃公略（一九三一年在廣西被殺）和滕代遠。

來了這些軍隊以後，山上的情形，變得很壞了。軍隊沒有冬天的服裝，糧食也非常稀少。有好幾個月我們差不多靠吃紅薯過活，士兵們呼喊着他們自己作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紅薯！」——在他們看來，所謂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紅薯。把彭德懷留在井崗山上，朱德衝破了白軍的封鎖陣線。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第一次在山上的逗留，就此告終了。

這時候第四軍開始打通江西南都的鬥爭，發展得很快很成功。我們在東固建立了蘇維埃，和本

地的紅軍會合了聯合起來。我們把軍力分開繼續向永定、上杭和龍岩進發，在這幾縣裏，都成立了蘇維埃。在紅軍未到以前，在這些區域裏舊有的武裝民衆運動，保證了我們的勝利，幫助我們把蘇維埃政權很快地建立在一種穩定的基礎上。靠了農村羣衆運動和游擊戰，紅軍的勢力伸張到幾個別的縣分，但是共產黨則到後來纔完全握到這權力。

紅軍的情形在物質與政治方面都開始進步了，但還有不少壞的傾向。譬如說：「游擊主義」是一種弱點，反映着缺乏紀律，誇張民主觀念和組織的渙散等等。另一種需要克服的傾向是「土匪性質」——不肯安靜下來，認真去做政府指派的工作，好動、好變、好新、好事。此外還有軍閥主義的遺留，有些司令官虐待甚至鞭打士兵，憑個人的好惡，對部下妄加軒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西部紅軍第四軍舉行了第九次黨會議之後，許多弱點都被克服了。在這次會議上，討論了改善的方法，釋除了許多誤會，採用新的方法，這在後來奠定了紅軍高級意識形態的領導的基礎。在這以前，上面所說的那些傾向，是很嚴重的，而且被黨和軍事領導中的托洛茨基派分子，利用了來破壞這一種運動的力量。對於這種壞的傾向的一種猛烈的鬥爭開始了，有幾個人因此被取消了黨裏的地位和軍事指導權，其中以劉恩空（譯音）——一個司令，為最好的例子。一度發覺他們企圖把紅軍領導到抵抗敵人更爲困難的地位上去的一種方法，破壞紅軍，幾次失敗之後，他們的陰謀明顯地暴露了出來。他們竭力攻擊我們的綱領以及其他我們所贊成的一切。經驗證明了他們的錯誤，他們被免除了職位，福建會議之後，他們的勢力完全消滅了。

這次會議，準備了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道路。下一年就有一些光明的勝利。江西南部，差



不多全部爲紅軍所佔領。中央蘇維埃區域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集了一個重要的地方黨會議，討論蘇維埃的將來的綱領。出席的分子是本地的黨軍政府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土地政策經過一次長時期的討論，對於「機會主義」——由那些反對重行分配土地的人們所領導着的——的鬥爭戰勝了。會議又決定實行重行分配，加速組織蘇維埃。到那時爲止，紅軍只是組織了地方和縣區的蘇維埃。在這會議上，決定了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對於這一個新政策，農民報之以熱烈興奮的擁護，這擁護在幾個月之後幫助紅軍擊敗了國民黨軍隊的圍剿。

## 六 紅軍的生長

毛澤東的陳述，至此開始從「個人歷史」的範疇裏出來，把個人不知不覺地昇化於一個大運動的事業之中，在這個大運動裏，他雖然佔着一個主要的地位，可是你不能清楚地看見有他個人存在着。這裏不再有「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有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有個人生活經驗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旁觀者作爲歷史材料敘述的有關集體人類命運的客觀記載。

當他的故事快要結束的時候，我要追問關於他自己的事，似屬更爲需要了。「他」在那裏做了什麼事？「他」在那時候擔任什麼職務？「他」對於這種情形保持何種態度？我的質問，引出了一些有關他自己的一些參加，寫在這故事的最後一章裏。

慢慢地紅軍的對於羣衆的工作改進了，紀律嚴謹了，在組織方面的新技術也發展了。各地方的

農民階級開始自動來幫助革命了。在井崗山時代，紅軍已經叫士兵們堅守三條簡單的維持紀律的規則，那是：（1）迅速服從命令；（2）不許沒收窮苦農民的任何物品；（3）一切從地主階級沒收而來的物品立即直接交給政府處置。一九二八年會議以後，爲了要獲得農民階級的擁護起見，曾作重大的努力，在上面所歷舉的三條以外，又加上八條規則，這八條是：

（1）離開一家人家時，把門板（睡覺用）放在原處。

（2）把你們睡時所用的草蓆捲好交還。

（3）對老百姓要溫和客氣，隨時幫助他們。

（4）一切借用的物件都要歸還。

（5）一切損壞了的東西都要賠償。

（6）和農民交易要規矩。

（7）買東西要付錢。

（8）要講衛生，廁所要設在離人家很遠的地方。

最末兩項是林彪所添加的。這八項實行的成績日見進步，到今天還是紅軍士兵的軍紀，牢牢記着，常常能背誦出來。另外還教三項別的责任，作爲紅軍的基本目的：第一、對敵人要抵抗到死；第二、把羣衆武裝起來；第三、要募集款項幫助鬥爭。

一九二九年初，有幾隊在李文龍、李韶九領導下的游擊隊，被改編加入了紅軍第三軍，由黃公略任指揮，朱瑞任政治委員。同時朱培德的一部分民團譁變加入了紅軍。他們是由一個國民黨司令羅

炳輝領導着來投共產軍的。這一位羅司令對國民黨感到幻滅而願意加入紅軍。現在他是紅軍第二方面軍第三十二軍軍長。從福建的游擊隊和正式的紅軍幹部組織成了紅軍第十二軍，由伍仲豪任指揮，譚震霖任政治委員。後來伍仲豪在戰爭中陣亡而由羅炳輝接任的。

就在這個時候紅軍第一軍團組織成功了，朱德任總司令，我任政治委員。牠包含了由林彪指揮的第三軍，第四軍，和羅炳輝指揮的第十二軍。黨的領導權交付給前敵委員會負責，而我是該委員會的主席。那時候第一軍團已經有了一萬人以上，編成了十師。除了這支主力軍以外，還有許多的地方的獨立旅，赤衛隊和游擊隊。

對於軍事之勝利的發展，除了這一個運動的政治基礎之外，紅色戰略也很有關係。我們在井崗山上採取了四個口號，這四個口號，供給了紅軍藉以生長的游擊戰術所採的方法的總線索。這些口號是：

- (1) 敵進我退！
- (2) 敵止我擾！
- (3) 敵避我擊！
- (4) 敵退我進！

這四個口號，最初為許多有經驗的軍事家所反對，他們不贊成我們所主張的這種戰術。但是後來許多的經驗，證明這種戰術是正確的。大致說來，紅軍一放棄了這種戰術，就不能勝利。我們的軍隊是很小的，敵人的力量要強過我們十倍至二十倍，我們的財源和軍火也是受限制的。只有巧妙地混

合運動戰術和游擊戰術，纔有希望在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中獲得勝利。他們是有廣大的資源和優越的基礎來作戰的。

紅軍的最重要的唯一的戰術，不論現在或將來，是在攻擊中力能集中牠的主要力量，而以後又很快地散開。這意思是要避免陣地戰，而用一切方法去迎擊在行動中的敵人隊伍而殲滅之。在這種戰術的基礎之上，紅軍的驚人的活動力和敏捷有力的一「突擊」力發展出來了。

在擴大蘇維埃區域這一點上，紅軍的綱領是主張波浪形，或潮汐形的發展，而不主張採用不穩的跳躍式推進方式，以至在佔領區域裏沒有深強的穩固力。這種政策很合實用，正如上面所說過的戰術一樣，牠是從多年的集體的軍事與政治經驗中得來的。這些戰略，有些人激烈地反對着，而主張集中一切武器於紅軍的手裏，並吸收一切的游擊部隊。故喜歡攻擊而不喜歡穩健；喜歡前進而不喜歡保守後方；喜歡對大城市加以聲勢盛大的攻擊，輔之以暴動與極端的行動。那時候李立三路線操縱了黨與蘇區以外的地方，勢力很強大，在某種程度上，足以迫使紅軍，違反臨陣經驗而去接受牠。這路線底一個結果，是對長沙的攻擊，另一結果，是向南昌的進軍。但是這兩次冒險中紅軍不願停止游擊隊的活動，而把後方暴露給敵人們。

一九二九年秋天，紅軍移到江西西北部，攻擊並且佔領了許多城市，給予國民黨軍隊許多打擊。到離南昌很近的時候，第一軍團突然轉向西方，向長沙前進，在這一進軍中，第一軍團匯合了彭德懷的部隊，彭底部隊曾經一度佔領過長沙，但為避免為擴大優越的敵人軍隊所包圍，是被強迫撤退了的。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德懷不得不離開井崗山，在江西南部活動，結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部隊。一

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聯合了朱德和紅軍的主要部隊。經過了一度會議之後，決定彭德懷的第三軍應在江西、湖南邊境活動，而朱德和我則向福建推動。一九三〇年六月，第三軍和第一軍團重行建立了聯繫，開始第二次進攻長沙。第一和第三軍團合併了成爲第一方面軍，以朱德爲總司令，我爲政治委員。在這種領導之下，我們達到了長沙城外。

大約在這時候，中國工業革命委員會組織成功了，我被推爲主席。紅軍在湖南的勢力是很普遍的，幾乎和在江西一樣。我的名字在湖南農民中很有名，國民黨政府爲要捕獲我，不論殺死或活捉，曾懸了很大的賞格，朱德和別的紅黨領袖也是如此。我在湘潭的田地，（註）被國民黨沒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我兩個兄弟——毛澤洪、毛澤丹——的妻子，以及我的兒子，都被何健逮捕了。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槍決了，其餘後來得到了釋放。紅軍的威名甚至伸張到我自己的鄉村裏，因爲我曾聽見人家講，說當地的農民深信我不久就要回到我自己的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天空飛過，他們一定說裏面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正耕種着我的田地的人，說我要回來視察我的田莊，來看土上的樹木有沒有被伐。假如伐去了，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的。

但第二次攻擊長沙失敗了。大批的援軍開到城裏，防衛得甚爲堅固；九月間，外加有新軍隊開到湖南來攻打紅軍。在這一次圍攻中，只有一次重要的戰爭，這一役紅軍消滅了兩旅敵軍。可是紅軍不能爭得長沙，幾星期後，便向江西撤退。

（註）從這些土地上所得來的租金，在大革命時期中毛氏用來進行湖南的農民運動的。

這次的失敗，促成了我們內部的大團結，阻止了紅軍去攻打武漢而免遭損失——這是少數人要求的。那時候紅軍主要的任務是招募新兵，新的農村區域的蘇維埃化，而最主要的是在佔領區域裏，徹底鞏固蘇維埃的政權。在這一種綱領之下，攻擊長沙顯見是不需要了，而且這種攻擊的本身是含有冒險的成分的。如果把第一次的佔領作爲一種暫時行動，並不企圖守住城市，建立國家政權，那麼這種努力，也許可以認爲有益的，因這在國民革命運動上所產生的反動是很大的。當蘇維埃政權在後面還沒有穩定的時候，企圖把長沙當做一種根據地，這是一種軍事和戰術上的錯誤。

我此時只得無禮地暫時打斷毛氏的敘述，再提到一些關於李立三的有趣的批評。李立三是湖南人，留法勤工儉學生，在學生時代已經參加革命了。那時候他常來往上海、漢口兩個地方——在這兩處，共產黨有牠的「地下」總部，直到一九三一年以後，才把共黨的中央委員會搬到蘇區去的。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員中最聰明的一個。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間，他領導着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職務，派到莫斯科去「研究」。他留在那裏很長久。

現在繼續講下去：

但是有人那時候把紅軍的軍事力量和本國政治背景中的革命因素估計得太高了。他相信革命將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掌握全國的政權了。他這個信念，是被那時候正在進行的蔣介石與

馮玉祥之間的長期而喪元氣的內戰所鼓勵，表面上看來，彷彿是對我們十分有利的。但是依照紅軍的看法，敵人們是正在準備對蘇維埃大舉進攻，只要內戰一停止，敵人就會發動。所以紅軍應該加緊戒備，決無餘暇來從事那可以得到慘敗的盲動主義和冒險主義。這一估計後來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在湖南方面失敗了，紅軍退回江西，特別在吉安佔領以後，紅軍裏的『恐怖主義』被克服了。少數人在被證明是錯誤了以後，立即在黨裏失去了勢力。但是在『恐怖主義』被確定地埋葬以前，軍隊發生了一個危機。第三軍團的一部分，贊成執行恐怖路線，要求和其他軍隊脫離。可是彭德懷竭力和這種傾向鬥爭，在他指揮之下的軍隊保持了團結，服從最高當局的意志。但是由第二十軍少數人起來反叛，逮捕了江西蘇維埃的主席，逮捕了許多軍官和政府官吏，對我們作政治的攻擊。這事發生在富田地方，稱爲『富田事變』。富田是靠近那時的蘇維埃區域的中心吉安縣的，所以這件事變產生了很大的震動，許多人看起來覺得革命的命運，就靠這一個鬥爭的結果如何而定。幸而這叛變，不久就被壓平了，這全仗第三軍的忠誠，黨和軍隊的團結，以及農民階級的擁護。領導反叛者被逮捕了，別的反叛者也被繳械肅清了，我們的路線重又建立了起來，恐怖主義被確定地鎮壓下去了，結果是蘇維埃運動以後得到了偉大的勝利。

但是這時南京方面已徹底明瞭了江西蘇維埃的革命潛勢力，在一九三〇年之末，開始了向紅軍舉行第一次圍剿。（註）敵人的軍隊的總數超過十萬，開始包圍了紅色區域，在魯滌平的總指揮之下，分五路進攻。紅軍那時能動員的軍隊，總數約四萬人。我們巧妙地運用運動戰略，迎擊並克服了這第一次的圍剿，得到了很大的勝利。沿用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戰略，以主要軍力向每一個單位分別攻擊。我們讓敵人的軍隊深入蘇區，然後用超越的人數突然對這些孤立的國民黨軍隊，集中兵力攻擊，我們獲得了便利游擊的地位，包圍他們，這樣把數目遠過我們的敵人所享受的軍事優勢逆轉過來。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圍剿完全被擊敗了。我相信假使紅軍在這次圍剿開始以前不能成就三個條件，這勝利是不可能的。這三個條件是：（1）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在集中的指揮之下，團結起來；（2）偏激的路線的清算；（3）黨對A B團（反布爾什維克集團劉地藻等）以及其他在紅軍中和蘇區裏的積極的革命份子的勝利。

僅僅休息了四個月以後，南京又在何應欽——現任軍政部長——的最高指揮之下，開始第二次圍剿。兵力超過了二十萬，分七路向蘇區推進。那時一般認為紅軍的情形是很不利的。蘇維埃政權所管轄的區域很窄狹，財源有限，設備簡陋，而敵人的物質力量，在任何方面都大大地超過紅軍。可是，迎擊這次的進攻，紅軍仍舊握住牠以前賴以取勝的戰略，讓敵人的軍隊深入蘇區，我們的主力突然集中，攻擊敵人的第二路，擊敗了他們好幾旅人，消滅了他們的進攻能力。接着我們很快地接連攻擊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依次擊退了他們。第四路沒有作戰就撤退了，而第五路的一部分被殲滅。在十



四天之內，紅軍作了六次戰爭，進軍八天，以決定的勝利結束之。其他六路被擊潰和敗退之後，由蔣光鼐、蔡廷楷指揮的第一路軍，沒有經過重大的戰爭就撤退了。

一個月之後，蔣介石自己指揮着三十萬大軍，來作肅清「赤匪」的最後努力。他有最有能力的指揮官幫助他，像陳銘樞、何應欽、朱紹良等，每人都負責一主要路線前進。蔣介石希望用一鼓佔領蘇區急速地把「赤匪蕩平」開始以一天八十里的行軍，深入到蘇區的中心。這供給了紅軍最有利的作戰條件，不久就證明蔣介石戰略的嚴重錯誤。主力只有三萬人，輔以一連幾次的機警的游擊戰，在五天之內攻擊了五股不同的敵人在第一次戰爭中，紅軍俘獲了許多的敵人軍隊，大批的軍火槍械和其他設備。到九月裏，蔣氏第三次的圍剿證明失敗了，在十月裏便把軍隊撤退了。

這時候紅軍進入了一個比較和平發達的時期，勢力擴張得很快。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召開了，中央蘇維埃政府也組織了起來，我被選為主席。朱德被選為紅軍總司令。在同月裏，發生了寧都大暴動，國民黨的第二十八路軍有二萬人以上，叛變了來加入紅軍。這些軍隊是由董振堂、趙博生率領的。趙氏後來在江西陣亡，董氏則今天仍是紅軍的第五軍團司令。紅軍第五軍是從寧都暴動的軍隊產生出來的。

紅軍現在開始牠自己的進攻了。一九三二年在福建漳州打了一次大仗，佔領了這個城池。南方則在南雄擊敗了陳濟棠，在蔣介石的陣線上，則大舉攻佔樂安、黎川、建寧、泰寧等縣。一度攻打贛州，但

(註)這一次圍剿在楊前 (譯音——譯者) 所著的中國的真黨真狀一書 (一九三一年南京出版) 裏寫得很詳盡。

沒有佔領。一九三二年十月以後，直到西北長征開始，我自己把我的時間差不多全部用在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上，而把軍事的指揮交給了朱德和其他的人們。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開始了第四次——也許是最慘敗的一次——圍剿。（註）在這一期間的第一次作戰中，紅軍繳了兩師人的械，俘獲了兩個師長。第五十九師的一部分被消滅，而第五十二師則完全消滅。這次作戰是在僅僅在樂安縣的大籠坪和橋匯一戰中，紅軍就俘虜了一萬三千人的敵人軍隊。國民黨的第十一師——蔣介石最精銳的部隊——幾乎等於全部消滅，差不多全部繳械，他的師長又受了重傷。這一次作戰，有決定全局的力量，第四次圍剿隨即告終。蔣介石當時寫信給他底前敵總指揮陳誠——認這次的失敗，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恥辱』。陳誠是不贊成這樣急速地推進軍隊的。他那時候對人說，從他的意見看來，和紅軍作戰，是一種『終身的任務』而且是一種『無期的徒刑』。這話傳到蔣介石那裏，就把他革去了最高指揮的職位。

爲了他的第五次即最後一次的圍剿，蔣介石動員了將近一百萬人，採取最新的戰術和戰略，在第四次的圍剿中經他的德國顧問們的建議，蔣介石已經開始採用封鎖和碉堡制度。在第五次圍剿中，他把他的全部力量放在這上面。他用他的軍隊，實行嚴厲的封鎖，整個包圍了蘇區，他很小心地前進，建築汽車路，碉堡和戰壕。他避免把他的主力軍隊接近紅軍，他們謹慎地在防禦工事後面作戰，他們只作短距離的前進，並用飛機、大砲和機關槍掩護着。

在這一時期中，我們犯了兩個重要的錯誤。第一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叛變中，沒有飽和蔡廷鍇聯合。第二個錯誤是放棄了我們以前的運動戰術，而採用了錯誤的單純防衛戰略。在陣地戰

上，迎擊廣大優越的南京軍隊，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這種戰爭上，紅軍的技巧和精神都是落後的。這些錯誤的結果，加上蔣介石圍剿的新的戰略和新戰術，以及國民黨軍隊的驚人的數目和優越的技術，到了一九三四年，紅軍乃不得不改變牠在江西的情形了。其次，民族的政治情形，影響了整個局面，迫使我們決定將主要活動遷移到西北去。隨着日本的進攻滿洲和上海，蘇維埃政府已於一九三二年二月，正式對日宣戰。這宣言爲了國民黨軍隊封鎖包圍着蘇維埃中國而不能實行。接着牠又發表宣言，號召中國所有的武裝軍隊結成聯合陣線，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一九三三年初，蘇維埃政府宣布，在下列三個條件之下，願意和任何的自軍合作：（1）停止內戰和對蘇維埃與紅軍的攻擊；（2）保障民衆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權利；（3）武裝民衆舉行抗日戰爭。

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五次圍剿開始。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中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開會於蘇

（註）關於對蘇維埃區域征討的次數，在反共戰爭的許多記載上，說得非常紛歧。有些作者，總計「圍剿」的次數有八次之多，可是這幾次南京的大動員中間，有若干次，純粹是自衛性質。紅軍指揮官們，只說有五次主要的反共「圍剿」。這五次中南京軍隊直接參加作戰的大概人數如下：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人數十萬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人數二十萬；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人數三十萬；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人數二十五萬；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人數四十萬。（「動員了」九十萬人以上，進攻三個主要的蘇區。）在一九三二年中，南京沒有發動大規模的征剿，但是那年蔣介石在紅色區域的四周，動用了約五十萬人防禦。這反是紅軍大舉進攻的一年。顯然，一九三三年的南京軍的防衛戰，因爲被當作反共「圍剿」來宣傳，就被許多作者，誤解爲大「圍剿」了。紅黨們並不這樣地加以討論，蔣介石也一樣。

維埃都城瑞金，舉行了革命成績的檢閱。在這會議上我提供了一個長的報告，就在這會議上選舉了現在這一批中央蘇維埃政府人員。不久以後，我們開始準備長征。這長征開始於一九三四年十月，正是蔣介石發動他最後一次圍剿的一年以後。在這一年中，差不多毫不休止地作戰和爭鬥，雙方都遭受到很重大的損失。

一九三五年正月，紅軍主要部隊，達到了貴州遵義。接着的四個月中間，紅軍不斷地向前行進，並舉行了最猛力的搏鬥和戰爭。經過了許多的困難，渡過了中國最長最深而最危險的河流，爬過了一些最高而最崎嶇的山道，經過了兇猛的土人區域，穿過了曠無人烟的大草原，受盡風暴雨雪，被中國白軍軍隊的半數所追逐，經過了一切自然障礙物，和當地的軍隊作戰，衝過了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西康、四川、甘肅、陝西，最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達到了陝西北部，在中國的大西北，擴大了現在的根據地。

紅軍勝利的長征，到達了甘肅、陝西，而沒有損傷主要軍力，是有兩種原因的：第一是由於共產黨的正確的領導，第二是由於蘇維埃人民的基本構成份子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和超人的忍耐力與革命的熱情，中國的共產黨過去，現在，將來，永遠是忠實於馬克斯、列寧主義，繼續對一切機會主義傾向鬭爭。在這種決心之中，牠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和最後的決定的勝利獲得了解釋。

牠的不可征服的另一原因，是由於革命幹部的異乎尋常的幹練、英勇與忠實。朱德、王明、洛甫、周恩來、博古、王稼穡、彭德懷、羅邁、鄧發、項英、徐海東、青雲（譯音）、林彪、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賀龍、蕭克等許許多多優秀同志們，還有許多已把生命獻給革命的人們，——他們都為同一目的而工作，創造

了紅軍和蘇維埃運動——以及今後新起來的別的許多人，定會把這一個運動領導着，達到最後的勝利。

現在我們正企圖在中國造成一個統一戰線，請求各黨各派，各種職業的人們，以及有誠意抗日的各軍隊，和我們聯合起來，擔當民族解放的共同任務。爲了對日本帝國主義鬪爭，爲了救國造成這一種戰線，和建立徹底的中國民主政治，都是必要的。我的工作和目的，也正和黨和紅軍的工作，目的，一樣，此後要盡全力以求達到這一個鵠的。(註)

(註)在這裏附帶聲明，毛澤東口述的自傳，是用第一人口氣的，和這裏發表的一樣。但毛本來要我用第三人口氣發表。如果這樣一改，就失掉了許多價值，準確性和趣味。有一家美國雜誌願意分期登載這些稿子，但提出一個條件，就是要作爲自傳的形式，而不用傳記的形式。那時我無法與毛見面，得到他的許可，而且這些稿子，如果因爲毛澤東個人這一點謙遜態度而不能在美國發表，這實在犧牲太大。所以，由我個人負責，保持原來自傳的形式。後來就在亞細亞雜誌 (Asia) 分期發表，曾引起各方面廣大的注意和評論。現在就把這已發表過的，作爲本書的一章。

——斯諾。

## 第五章 長征

### 一 第五次圍剿

在這裏我甚至於不能把華南的六年蘇維埃運動所經過的動人而僅爲人片斷寫過的歷史——長征的序曲——加以約略的敘述。毛澤東曾簡單地說過蘇維埃的有機的發展和紅軍的產生。他說過共產黨如何從幾百個衣衫襤褸飢餓線上的，然而而是青年堅決的革命者，建造起數萬的工農軍隊來，到一九三〇年，他們成了嚴重的政權爭奪者，使南京不得不發動第一次對他們大規模的進攻。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次的圍剿，紅軍都沒有失敗。在每一次圍剿中，紅軍們擊潰了國民黨的許多旅，甚至於幾個整師的軍隊，奪獲了他們的軍器和彈藥，收得了許多新戰士，擴大了他們的區域。

同時我們要問，在紅色的非正規軍的衝不破的防線以內，人們過着怎樣一種生活？在華南蘇維埃存在的整個時期中竟沒有一個抱中立態度的外國的考察者，進入過這個赤區——世界上除了蘇聯以外唯一的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國家——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因此，凡爲外國人所寫的關於南方蘇區的故事，都是間接的材料。不過在這些的記載中，有幾個要點是可以從別的不論是善意的或惡意的記載得到了印證。而這幾點，正清楚地表明了紅軍之所以得到擁護的根基所在。土地是被重行分配了，捐稅是減輕了，集體事業是大規模地產生了；到一九三三年時，只是江西一區內就有了一千以上的蘇維埃合作社。失業、鴉片、賣淫、童奴，以及強迫的婚姻，都被消滅了，在非戰事區域內，工人

與貧農的生活狀況大大地改善了。民衆教育在幾個穩定的蘇區裏也有顯著的進步了。在有幾個縣分裏，紅黨們以三四年的時間，提高了農村大衆的識字程度，要其成績高過於中國其他的任何農村，甚至於連由晏陽福主持的在河北定縣所進行的那個有洛克菲洛基金爲助的平民教育實驗區也在內。在蘇區的模範縣興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識字——比洛氏補助區的百分比要高得多。

至少有這些成就，現在已可以有中立的人證來證實。關於這小小的蘇維埃共和國的其他方面，雖有很多的文獻可徵，但是要討論他們，不免要引起爭論，這不是本書的範圍所及。如果紅黨們能在南方久佔下去，而且能鞏固它，那末他們能有什麼成就？講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免要踏入純粹預言的誤境，主觀的因素當然要影響所下的結論。

推斷南方蘇區的將來如何，在目前只是一件學術研究範圍以內的事了。因爲一九三三年十月，南京發動了第五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反赤圍剿，一年以後，紅軍被迫作總退卻。當時，每個人都以爲這是紅軍命運的終結——牠的喪葬進行曲。他們推斷的錯誤之重大，差不多到兩年之後才顯示出來，那時候紅黨的聲勢到達了歷史上少有的非常好轉的局面，其最高點就是西安事變，連總司令的生命都落在紅黨的掌握之中。這位總司令是曾經自信他已經『消滅了赤禍了。』

直等到討共戰爭的第七年，南京方面的消滅紅黨的企圖，纔獲得了顯著的 success。這時候紅黨們在江西省底大部分，在福建和湖南底大片區域中，有着實際的行政統治權。還有其他在地理上與江西區不相連接的蘇區，在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川、陝西等省分裏。

在第五次討赤圍剿中，蔣介石動員了將近九十萬人，內中大概有四十五萬人——約三百六十個

潮——在江西福建區域裏實際參加前線戰爭，另外三十萬則去攻打鄂豫皖區域的紅軍，而江西則是整個圍剿的中心。至於紅軍方面，則可以共同動員正式軍隊十八萬（包括一切後備軍團）外加二十萬遊擊隊與赤衛隊，但是總共只有不到十萬枝槍枝的作戰力量，沒有重砲、手榴彈、小炮彈及槍彈的供給也很有限——一切都只在瑞金的紅色兵工廠裏製造。

蔣氏用了一種新的戰略，來充分利用他的最大的財產——超越的財源、技術的設備，從外界取得的無限制的供給的便利（紅黨們對於外界沒有交通線）機械化的戰術，包含有將近四百架戰鬥機的現代的空軍力量。紅軍曾經俘獲過幾架蔣氏的飛機，並且也有三四個駕駛員，可是他們沒有汽油、炸藥與機件。這次蔣氏不用超越的軍力去進攻赤區，想一鼓佔有之，這種方法在過去已是證明失敗了，而改以大部分軍隊來包圍『赤區』，並對他們實行一種嚴密的經濟封鎖。所以這實在是一種消耗的戰爭。

這是很費錢的。蔣介石建築了幾千里的軍用公路。幾千個小碉堡，都可用機關槍或炮火來連接起來。他的攻勢防禦的戰術和戰略，使得紅軍所擅長的運動戰，失其效能，並且把他們人數少資源缺的不利條件強化起來。在他底有名的第五次圍剿中，蔣氏在蘇區的四周實際上建築了一道長城，慢慢向裏推進。牠的最後目的是在圍繞着紅軍，而以堅如大石的老虎鉗來消滅牠。

蔣氏聰明地避免把大量的部隊，暴露在他的公路網和碉堡網之外。他們只在重砲、鋼甲車、坦克車、和很厲害的空軍轟炸的掩護下才向前進。而且所進也不過超過了碉堡聯線以外幾百碼便停止。這種碉堡伸展在江西、福建、湖南、廣東、廣西一帶。紅軍們既失卻了引誘、埋伏，以及襲擊他們的敵人的



機會，乃不得不計畫新的戰略。他們開始倚靠陣地戰了——這一個決定的錯誤，以及牠的原因，後來是要提到的。

據說第五次圍剿，大部分是由蔣介石的德國顧問計劃的，特別西克脫將軍，他以前是德國國社黨軍隊的總參謀，有一個時期曾是蔣總司令的首席顧問。這種新的戰略是很澈底的，但同時也是非常緩慢而非常浪費的。軍事行動拖延了好幾個月，但是南京方面對於牠的敵人的主要軍力，還沒有下過致命的打擊。可是封鎖的效力，在蘇區裏已經嚴重地感覺到了，特別是鹽的完全絕跡，這個小小的紅色根據地，漸漸變為不能反抗那種加在牠的身上的軍事和經濟的雙重壓力了。雖然紅黨們否認，可是我敢說，在這次圍剿中，紅軍艱苦地抵抗這一年，一定在農民身上徵發了不少的人力與物力。同時我們應該記着他們的戰士大部分是有了選舉權的農民。而且是取得了不久的驕傲的土地所有者。單單爲了土地，中國的許多農民，會願意作戰到死的。江西的人民知道國民黨的歸來，就等於地主們的歸來。

南京相信牠的勦除的努力，是將奏成功了。敵人已成了籠中之鳥，不能逃跑了。成千成萬的農民被每天的空中轟炸機與機槍掃射所慘殺，也是成千成萬的農民在國民黨重行佔領的區域內因『肅清』而被殺。依據周恩來說，紅軍本身在這一次的圍剿中損失了六萬人以上，而普通人民生命的犧牲則簡直是可怕。有許多整個區域裏的人口被消滅了，有的是爲了強迫的掃數移民，有的是簡單的槍殺。國民黨自己承認，在收復江西蘇維埃的過程中，大約有一百萬人民，被殺或餓死了。然而第五次圍剿並不能根本解決。牠在要消滅紅軍的主力這一個目的是失敗了。一個紅軍

事會議在瑞金召集了，決定退卻，把主力移到一個新的根據地去。這一次經過了整整的一年之久的偉大出征的計畫，是非常完備而有效的。他們表現了在他们進攻時期中所未曾表現過的某種軍事天才。因為指揮一支戰勝的前進的軍隊，是一件事，而要貫徹一種計畫，在重重難關之下實行退卻，是另一件事。這許多難關在目前著名的西北長征中，是一一列在前面的。

從江西撤退，是非常迅速而秘密。紅色部隊的主要部隊（估計約九萬人）已經開走了好幾天之後，敵人的總部，纔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在江西南部動員，從北方前線上把他們的正規軍隊大部分撤回，而代之以游擊隊。這些行動總是在夜間實行。當實際整個紅軍已經完全集中在江西南部等附近時，長征的命令纔發下來。這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夜間開始的。

在三個晚間，紅黨們以兩支兵力向西方和南方推進。在第四天晚上，他們不約而同的差不多同時攻打湖南和廣東的碉堡防線。他們應用猛烈的襲擊把兩方的防線佔領下來，把驚愕不置的敵人趕跑。他們一刻也不停止，直等到把南方前線上的封鎖戰壕和碉堡線佔領了下來。這樣就打通了到南方和西方的道路，沿着這個道路，他們的前鋒部隊開始牠驚人的進軍。

除了軍隊的主力以外，成千成萬的紅色農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兒童們，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也開始了這種長征。兵工廠都解散了，一切的工廠都拆卸了，機器都裝運在牲口的背上——一切東西，只要能够移帶而有價值的，都和這支奇怪的行軍一同行走。當行軍日久以後，有許多笨重的物件，不得不拋棄了，到今天紅黨能告訴你有幾千枝步槍和機槍，許多機器，許多軍火，甚而至於許多白銀，都埋藏在從南方一路來的路上。他們說，在將來，現在被成千的白色的監視軍隊所包圍著的紅色

農民們，有一天會挖出這些東西來，重新建立他們的蘇維埃的。他們只在等着警號。

自紅軍主要部隊從江西撤退之後，更隔好幾個星期，南京軍隊纔能夠佔領紅色城市。成千的農民保衛隊，游擊隊聯結在一起，由少數紅色正規軍隊領導著，實行一個堅強的抵抗到底。許多這些紅色領袖們，自告奮勇地留下來犧牲，他們的英勇精神，至今爲紅黨們用許多方法來紀念着。他們盡了掩護退卻的責任，在南京還不能動員充分的軍力去在路上實行包圍消滅之前，他們使主要部隊能夠很好地前進。甚至於在一九三七年，在江西、福建和貴州，有一些區域還被這樣的紅軍殘部所佔領着，就在最近南京政府又宣稱要在福建開始另一個『最後肅清』的反赤圍剿了。

## 二 整個國家的遷移

紅軍勝利地衝破了第一道碉堡防線之後，就開始到西方和到北方的費時一年的行軍。這是一個五光十色而帶有許多故事的長征，在這裏只能用最簡單的綱要式來敘述。關於這個長征，共產黨們正在編著一種集體記載，由參加了長征的數十個作家供給稿子，已經收集到五十萬字了，而還沒有一部分全部完成。冒險、開闢、發現、人類的勇氣和畏縮、發狂和歡欣、遭難、犧牲和忠心——一切像一團火焰，照耀着這成千累萬的青年們的熱情、希望和革命的樂觀主義。他們永不承認失敗，不管牠是由於人力，自然或死神。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事情，都包含在這當世無匹的奧德賽的歷史中。

紅黨們自己普通稱牠爲「二萬五千里長征」。從福建的最遠點出發，直到陝北道路的終點，中間有許多曲折回轉的前進後退，在參加長征的戰士之中，有一部分，確實走過了二萬五千里，甚至

於不止這些紅軍第一軍團所製的一個準確的逐步行軍紀錄（註）指明路程共計一萬八千零八十八里或是六千英里——約美洲寬度的兩倍——而這個數目可以信爲主要部隊行軍的最低限度。並且，我們還須要記着，這次整個的旅行，都是徒步的，越過了世界上最難行的道路，大部分都是不適宜於手輪車行走的，他們越過了亞洲最高的山和最大的河，這是徹頭徹尾的一個長期的戰爭。

有四條主要的防衛線，用一串一串的水泥築成的機關槍巢和碉堡支持著，包圍著華南的蘇維埃區域。紅軍必須先粉碎這四道防線，纔能達到西方沒有封鎖的區域。第一道防線是在江西，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擊破的；第二道在湖南，是十一月三日被佔領的；一個星期以後，第三道，也是在湖南，經過了一場血戰之後，也落在紅軍手裏；十一月二十九日，廣西和湖南軍隊，自動放棄了第四道，也是最後的一道防線，紅黨們就長驅向北，上入湖南，開始循直線向四川行軍，打算進入那裏的蘇區，與徐向前領導下的第四方面軍合併。在上面所提到的日期之間，一共打了九仗，在這幾次接戰中，南京各省的軍閥如陳濟棠、何健、白崇禧等共同動員了一百一十團之衆來阻上他們的前進。

在經由江西、廣東、廣西、湖南的進軍中，紅黨遭受了很重大的損失。當到達貴州邊境的時候，他們的人數減少了三分之一。第一個原因是因爲有一批的輜重運輸，行動不便，僅在這一件事上，工作的人員就有五千。在許多的情形之下，前鋒隊伍常常被拖延停留着，使敵人有時間準備來堵截阻礙。第二是因爲從江西出發後，紅黨一直保持着一條筆正向西北的路線，這使南京能夠預料到紅軍許多的行動。

這些錯誤的結果所造成的嚴重的損失，使紅軍在貴州採取了新的戰略。他們不再像箭頭式的

前進，開始採用許多分散的游擊，使南京的飛機，漸難察知紅軍主力部隊每天的動向。兩枝，有時候甚至四枝軍隊，在中央部隊的兩側，從事於閃避的運動戰，而前鋒隊伍造成了一種狹形前線。只把最低限度的輕便必需器械保留，這種大大地減輕了的輜重軍隊，爲避免白天的空中轟炸起見，普通只在夜間行軍。

蔣介石預料到紅軍渡江入川的企圖，他乃從湖北、安徽、江西撤來了數萬的軍隊，急向西方運送，想從北方來切斷紅軍前進的路線。一切的交叉路口都用重兵防守着，一切的渡船都撤到江的北岸來，一切的道路都堵塞了；許多區域裏的穀類都被收割了。另有數萬的南京軍隊，湧入貴州，增援軍閥王家烈的一支鴉片軍隊，這軍隊到後來是被紅軍完全擊得潰不成軍了。此外還有一些軍隊，開到雲南邊境，在那裏布置障礙工事。所以在貴州紅軍遇見了幾十萬的聯合軍隊，道路的各處都是障礙。這使紅軍舉行了兩個大的回軍行動——穿過全省，以及圍繞省城的廣大的迂迴行動。

在貴州的游擊佔去了紅黨四個月的時間，在這個期間，他們擊潰了五師敵軍，俘獲了王家烈的總司令部，佔據了他在遵義的西洋式的宮殿，集得了將近兩萬的新戰士，拜訪了本省大部分的鄉村和城鎮，召集了羣衆大會，在青年中建立了共產黨組織。他們的損失都不是重要的，但是他們仍舊解決不了越過揚子江的問題。蔣介石用迅速手段集中軍隊在貴州、四川邊境，巧妙地把到長江的那條短而簡捷的道路堵塞。他那時把他的消滅紅軍的主要希望，放在阻止紅軍的在任何地方渡江這一

點上希望把他們逼到西南邊疆和西藏的荒地裏去。他發電報給他的各個司令官們和地方軍閥們，說「國家與黨的命運」就依托在把紅黨封閉在揚子江以南這一著上。

突然地，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初旬，紅黨們重渡烏江，轉向南方，以一部分兵力向東佯動，主力則突破貴陽以東四十里（龍里、貴定之間）的封鎖線，折向西南，攻入雲南。這時蔣氏正在貴陽坐鎮，老以爲紅軍要向東，便把追勦部隊都往東調。而紅黨們用四天神出鬼沒的進軍，來到了離雲南省城昆明三十里附近，所有的官軍都落後了五天以上的行程。雲南軍五個旅都在貴州，昆明城內只有一個教導團。軍閥龍雲驚慌得不顧一切，要逃往安南去。蔣氏直到接得龍雲的告急電，纔把軍隊從貴州向西調動，派遣大隊的轟炸機，不停地在紅黨們頭上下着蛋，但他們依然前進。突然這種空襲的恐怖終止了。原因是南京方面發覺這種對雲南的襲擊，只是由紅軍的很少數的部隊所執行的一種分散行動，而主要的紅軍部隊正在向西推進，分明是打算在麗江——揚子江上游僅有的幾個渡口之一——渡河。

在荒僻多山的雲南境內，揚子江在廣大無垠的山峽中很深而且很急地流着。大的山峯在山峽上聳起，連綿數里之遙，陡峭的石壁在兩岸垂直地立着。少數的幾個渡口，已完全爲政府軍隊所佔領了。蔣介石是很高興的。他下令把所有的渡船都撤到江的北岸，準備「燒燬」牠們。然後他調動他自己的和龍雲的軍隊，向着紅軍取包圍形勢，他希望在這個歷史上有名的險惡的江岸上，把紅軍永遠消滅。

紅黨們好像不顧他們的命運似的，繼續急速地分三股西向麗江趨進，麗江上所有的渡船都已

經被燒燬了，南京的飛機駕駛員報告說，紅軍的前鋒已經在開始建築竹橋。蔣氏更加放心了；因為築橋工作，非數星期不辦。但是有一天晚上，十分從容地，一團紅軍戰士突然地改變了牠的方向。在一個驚人的急行進軍中，他們一天一夜走了三百里，在黃昏時候，來到了綏平渡——附近的唯一可渡的地方。他們穿着從南京方面奪取來的軍裝，在黃昏的時候，這一團人進了城，沒有引起人們任何的注意，靜靜地把手衛兵的武裝解除了。

船已經撤到北岸去了，可是沒有燬壞（爲什麼要把船燒燬呢？紅軍還在好幾百里以外，而且並不向這裏來——政府的軍隊是這樣推想着。）但是如何能找一隻渡船到南岸來呢？天黑了以後，紅軍們護衛着村裏一個官吏走到河岸邊，強迫他向對岸的守衛兵高喊，告訴他們說來了一些政府軍隊，需要一隻船。對岸毫不疑惑地送了一隻船過來。一隊這樣的『南京』軍隊就裝進這隻船裏，他們很快地登了北岸——終於到了四川了。他們靜靜地走進守衛隊的司令部，看見敵軍正在安靜地打馬將，槍枝很安全地靠在牆上。當紅軍命令他們『舉起手來』時，他們嚇得目瞪口呆，交出了武器。他們無論如何想不到，自己已經成了『土匪們』的俘虜了，他們以爲這些土匪至少還有三天路程哩。

同時紅軍主力，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攻擊進軍，在第二天中午，前鋒部隊已經到達了防地。過河是一件簡單的事了。六隻大船不斷地工作着，整整九天，紅軍的全部軍隊運入了四川，沒有損失一條性命。這動作終了以後，紅軍們立即把船毀壞了便躺下來睡覺。兩天以後，蔣介石的部隊達到河邊時，他們的敵人的後隊，從北岸向他們歡呼請他們過河。政府的軍隊，無法可想，只得繞了六百里，走到最近的渡口，這樣紅軍就把他們扔在後面了。這使蔣總司令大大地生氣，他飛到四川，在那裏動員新的

軍隊來阻攔前進的敵人隊伍，希望能在另一個險要的河流上——大渡河，把他們切斷。

### 三 大渡河上的英雄

強渡大渡河是長征中最關緊要而絕無僅有的一件事。如果紅軍在那裏失敗了，牠是十分可能會被消滅的。這種命運，歷史上不乏先例。在古代的大渡河兩岸，三國時代的英雄們，以及後來的許多戰士們，都遭遇失敗。十九世紀時就在這些同樣的山峽之間，太平天國底最後一批的殘留者，那由翼王石達開所率領的十萬大軍，被有名的曾國藩指揮下的滿清軍隊所包圍而完全擊潰。那時蔣總司令拍電報給軍閥劉湘、劉文輝，以及他在四川的聯軍，和他自己的指揮追擊隊部的軍官們，教他們重演太平天國的歷史。在這裏，紅軍是難免要消滅的。

但是紅軍也知道關於石達開的事，石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一種浪費的延緩。當他開到大渡河沿岸的時候，翼王石達開停留了三天的工夫，來慶祝他兒子的誕生。這幾天的停留給他的敵人以集中軍力攻他的機會，敵人們以很快的行軍，達到他的後方，封鎖了他的退卻的路線。等到石達開發覺了他底錯誤的時候，已經是嫌晚了。他想擊破敵人的重圍，但是在這種狹窄的山峽地帶，要活動也是不可能了。結果他在地圖上消滅。

紅軍決定不再蹈他的覆轍。他們從金沙江（揚子江的上游）急速地北向入四川，不久便到達了好戰而未開化的蠻夷區域——黑白羅羅的獨立區域。這些叛逆的羅羅，從來沒有被征服過，也從來沒有被在他們四周住着的中國人所同化過，數百年來他們佔據着四川的這一個森林和多山的



爪形地帶，牠的邊境，正在西藏的東方，被揚子江向南流的大弧形所包圍。蔣介石很放心，因為他計算紅軍在這裏一定有一個長期的停留，以至於衰弱，這使他能從從容容在大渡河的北岸，集中兵力。羅之仇視中國人是傳統的，中國軍隊進入他們的邊境去的，沒有不遭受重大的損失或被消滅的。

但是紅軍是有方法的。他們已經平安地通過了貴州、雲南的苗民、僑民等未開化民族的區域，獲得了他們的友誼，甚至於募有幾個蠻民加入到隊伍裏來。因此他們先派了些專使去和羅羅開談判。在前進的路上，他們佔領了許多在獨立的羅羅區域附近的城池。在那裏，他們發見了許多羅羅酋長們，他們是被中國軍閥們拘押起來作爲人質的。紅軍把他們釋放了，送他們回家去，當然，他們要稱讚紅軍了。

紅軍的先鋒隊伍裏有指揮劉伯承，他從前是四川軍閥隊伍裏的一個軍官。他熟悉這種民族的，知道他們內部的爭鬪和不滿。他特別知道他們對中國人的仇恨，而且他會說一些羅羅話。於是他負了和羅羅們交涉及友誼聯盟的使命，到他們的區域裏去和他們的酋長們會議。他說羅羅們既然反對軍閥劉湘、劉文輝和國民黨，紅軍也是如此。羅羅們既然要保持獨立，紅色政策正贊助中國一切少數民族的自主。羅羅們仇恨中國人，因爲中國人壓迫他們，但是中國人也有「紅」「白」之分，正如羅羅有黑白之分一樣，而屠殺和壓迫羅羅民族的乃是「白」中國人。「紅」中國人和黑羅羅是不是應該聯合起來，反對他們的共同的敵人「白」中國人呢？羅羅們頗感興趣地聽着這些游說。他們很狡猾地要求槍械子彈來保衛他們的獨立，並且幫助紅色中國人打白中國人。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紅軍們竟順從他們的要求。

所以這交涉結果不但完成了一種安全的借道，而且是頗爲愉快的。好幾百羅羅加入了一「紅色中國人」向大渡河進發去攻打共同的敵人。其中有許多羅羅們竟一直走到西北。劉伯承在羅羅的高級酋長面前，喝了一杯新宰殺了的鷄血，酋長也喝了，他們用原始民族的儀式，宣誓結成血族的兄弟。用這種誓辭，紅軍說，誰違背了他們聯盟的條件，誰就和他們剛宰殺了的鷄一樣地軟弱膽怯。

這樣紅軍第一軍團的前鋒部隊，由林彪統帶着，達到了大渡河。在這行軍的最後一天，他們從羅羅區域的森林地域裏（在這種樹林裏，南京的飛機駕駛員，完全迷失了他們路線）出現了，突然地來到了河邊的城鎮安順場地方——正如以前他們來到皎平渡一樣地突厄。由羅羅們領導着，他們過了狹窄的山道，前鋒部隊悄悄地爬上了這座小鎮，從高處下望河岸，不禁驚奇高興，因爲他們看見了渡上的三隻渡船，有一隻竟繫在「南岸」！命運之神又一度對他們表示友誼了！

這是怎麼一會事呢？那時在對岸，只有劉文輝將軍（四川省的協助獨裁者）的一旅軍隊駐守着。別的四川軍隊，以及南京來的增援部隊，正悠閒地向着大渡河前進，但是在目前，這一旅人已經夠了。真的把船只都撤到北岸來以後，一連人也未嘗不夠。可是這一旅人的指揮官，是這一區域裏的土著，他知道紅軍所必需經過什麼地方，也知道要穿過這一帶地方而達到河岸來需要多少時候。他對他的兵士說，紅軍到來還有不少日子哩。而且，他的老婆是安順場本地的人，所以他必須渡河到南岸來拜訪他的親戚朋友和他們謙會。結果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紅軍突然地佔領了這座城池，俘獲了這位指揮官，他的船，以及到北岸去的交通。

有五大隊每隊裏各有十六人自告奮勇，要乘坐第一隻船渡河過去帶回那另外兩隻來，同時在

南岸上紅軍就在山邊佈置好機槍陣地，用一道掩護的火網，向對岸敵人暴露地位密集掃射。這時候正是五月天氣，水從山上傾瀉下來，河流湍急，而且比揚子江還寬。從很遠的上游出發，要費兩個小時纔能達到對岸。安順場的居民在南岸屏息望着。他們以為這些人一定會被消滅的！但是別忙。他們看見過河的人差不多在敵人的槍彈之下登了岸。他們以為現在他們一定完了。可是……南岸紅軍的機關槍不停地卜響着。這些看熱鬧的人看見這一小队人爬上了岸，很快地找到了掩護物，然後慢慢地爬上了下臨着敵人的地位的一座陡削的山壁。在那裏他們安上了他們自己的輕機關槍，對着沿河的敵人們的防地，向下傾瀉着子彈與手榴彈。

突然地，白軍停止了放槍，放棄了他們的陣地，逃跑到第二道，接着又逃跑到第三道防線。南岸發出一陣嘈雜的聲音，和「好呀！好呀！」的叫喊，聲音在河水上漂浮，傳到那已經奪得了渡口的這一小队人。這時候第一隻船回來了，拖着其餘兩隻船，第二次渡河，每船載着八十人。敵人完全跑走了。於是乎白天晚上，第二天，第三天，安順場的三個渡口往返地工作着，到後來，竟有了將近一師人輸送到了北岸。但是河水流得越加湍急了，過河也越加困難。在第三天，載一船人從此岸到彼岸，要費四個鐘頭！如果依照這樣的速度，要整個的軍隊，牲口以及給養等全部渡過，繼續前進，需要好幾個星期。在這種行動還沒有完成以前，他們是要被包圍的。第一軍團這時已經擁到了安順場，後面緊跟着左右兩翼的大隊，輜重和後衛隊。蔣介石的飛機已經發現了這地點，猛烈地來轟炸。敵人的軍隊從東南追趕過來，還有的從北面趕來。此時林彪急忙召集了一個軍事會議。那時朱德、毛澤東、周恩來和彭德懷也已經達到了河岸。他們定下了一個決議，立即執行。

在安順場進西約四百里的地方，山峽十分高，河床窄狹，水流深而且急，那裏有一座有名的鐵鏈懸橋，名叫瀘定橋。這是西藏以東大渡河上最後的一個可渡的渡口。赤着腳的紅黨們，現在向着這個地點出發前進，沿着一條盤繞着這些山峽的窄狹山道，有時候需要爬上好幾千尺，又走下水流的平地，有時還要在深與腰齊的泥濘中打滾。假如他們能夠佔領瀘定橋，那麼全部紅軍就能夠進入四川中部。如果失敗了呢？如果他們失敗了，那末必需循着來時的老路，經過羅羅區域，重入雲南向西作戰，投奔麗江（靠近西康邊境）要迴轉在三千里路以上，這樣，也許少數還能夠有希望生存。

當紅軍的主力部隊沿着南岸向西推進的時候，已經在北岸的紅軍也同時前進。有時候他們中間的山峽甚為狹窄，使兩支紅軍隊伍能夠隔岸相呼；有時候他們中間隔離得很遠，使他們恐怕大渡河也許會把他們永遠分開，這樣他們便前進得更快。在夜間，當他們像一條龍似的沿着峭壁轉，一萬多枝火把的尖頭形的光焰斜射在黑暗的深不可測的水面上。這些前鋒隊伍日以繼夜地用加倍的速度前進着，只停留短短的十分鐘來休息和喫飯，這時兵士們聽着他們的已經疲倦了的政治工作人員的演說，反反覆複地解釋這一個行動的重要性，鼓勵每一個人獻出最後的一息呼吸，最末的一點力量，爭取擺在他們前面的試金石的勝利。這裏不容許有鬆懈的步伐，不容許有沮喪，不容許有疲倦的。勝利則生，失敗，一定是死亡。

第二天，右岸的前鋒隊伍落後了。四川軍隊在他們的道上佈置了陣地，發生了前哨的衝突。南岸部隊更加緊着向前推進。突然地，對岸出現了新的軍隊，紅軍用望遠鏡望去看，看出他們是白軍的增援部隊，正在急速地向瀘定橋趕去！整整一天，這兩種部隊彼此沿岸賽跑，但是慢慢地紅軍的前鋒部隊

——紅軍的精銳——把敵人的疲倦了的兵士扔在後面了。因為白軍的休息比較長，比較多，他們的精神好像費得比較多，總而言之，他們畢竟不十分熱心，去為一座橋而犧牲。

瀘定橋是幾百年前所建造的，形式與中國西部深河上其他的橋樑一樣。十六條很粗的鐵鏈，長約三四百尺，橫越河底兩岸，兩頭釘在兩岸的岩石之下。很厚的木板，捆在鐵鏈上面，做成了橋的踏步。但是當紅軍來到這裏的時候，他們發現這些木板，一半已經被移去了，只剩光光的鐵鏈子，曳在河的中流。在橋的北頭，一個敵人的機關槍巢正對着他們，後面便是一師敵人軍隊的陣地。當然，這座橋是應該毀壞的。但是四川人對於牠非常愛惜。因為重造新橋是不很容易而且是很費錢的。單說這座瀘定橋，相傳是由「十八省捐來的錢建造的。」而且，誰能想到紅軍會發瘋地就在鐵鏈子上過河呢？可是他們卻正這樣做了呢！

時間是一刻也不容許浪費的。橋必需要在敵人的增援部隊到達以前佔領下來。這時又徵求敢死隊了。紅色戰士一個一個站上前來，要把生命來冒險，就在這自告奮勇的一羣中，選擇了三十個人。他們背上捆上了手榴彈和毛瑟槍。立刻他們手握鐵鏈，懸空在奔騰的流水上面，移動着兩手往前推進。紅軍的機關槍對着敵人的陣地掃射，子彈灑在橋頭。敵人用他們的機關槍回擊，伏兵更對着向他們慢慢地近來的，高懸在水上的紅軍敢死隊射擊，第一個紅色戰士中彈了，掉到下面的水流中。第二個也掉下去了，接着第三個。可是當他們漸漸挨近鐵鏈時，那些沒有被毀去的橋板，彷彿在保護這些敢死的人們，子彈大部分都飛過了，或者打在對岸的懸崖上。

四川人，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中國戰士！這些原來不是專為吃飯而當兵的人，而是一些為

爭取勝利而願意自殺的青年！他們是人類？是瘋人？還是神呢？——迷信的四川人奇怪起來了。他們自己的精神也感受到影響了；或者他們已經瞞不準了；或者在他們之中有人在祈禱着，盼望這一次冒險能夠成功！最後有一個紅色戰士爬上了橋板，揭開了手榴彈的保險蓋，十分準確地向敵人的防地擲去。軍官們完全着慌了，令把橋上沒有毀掉的橋板完全炸毀。可是這時已經太晚了。更多的紅軍已經爬上來了。橋板上倒了許多的煤油，開始延燒起來。在這時候，大約二十個紅軍正用手和膝蓋爬上前去，手榴彈一個又一個地向敵人的機關槍巢扔去。

突然地，在南岸的他們的同志們開始大聲歡呼起來。『紅軍萬歲！革命萬歲！大渡河上三十位英雄萬歲！』因為白軍正在退卻了，亂七八糟地逃命了！衝鋒的紅軍們，在那一段沒有燬掉的橋板上，用全力跑上前去，撲過了向他們噴過來火焰，敏捷地跳到敵人的設防地，掉轉了敵人們所放棄的機關槍，對準敵人追擊着。

這時候更多的紅軍擁上鐵鏈，來幫助撲滅橋上的火，重新安置橋板。沒有多久，在安順場渡河的紅軍的一師人也出現了，他們從側面攻擊敵人的那些還保留着的防地，這樣沒有多少時間就把白軍完全趕跑了。——這就是說；或者是逃走了，或者是加入了紅軍，因為有將近一百名的四川兵士，拋下了他們的來福槍，轉身過來聯合了追趕他們的人。一兩點鐘之後，全部的紅軍軍隊，很快樂地邁着大步，一壁高聲唱着走過大渡河，來到四川境內。蔣介石的飛機高高地在他們頭上發怒而無力地號着，可是紅軍卻快樂到發狂地向他們挑釁。當共產黨軍正躊躇過河的時候，這些飛機想努力擊中橋樑，可是牠們的炸彈只能在河裏濺起許多好看的水花而已。

爲了他們驚人的勇敢，安順場和瀘定橋的英雄們，都得了紅星獎章，這是中國紅軍最高級的獎章。後來在寧夏的時候，我遇見了幾個這樣的英雄。他們的年青使我驚異，因爲他們都是不滿二十五歲的人。

#### 四 通過大草地

平安地渡過了大渡河以後，紅軍達到了比較自由的四川西部，那裏碉堡制度還沒有完成，而且作戰的發動權大部分操在他們自己的手裏。不過戰爭以外的困難，還是沒有過去。還有六千里的行軍中間有七個大山嶺，站在他們的面前。

在大渡河之北，紅軍爬上了二萬尺高度的大雪山，從空氣稀薄的山頂上，向西望去，可以看見一片帶雪的山峯——即西藏。已經是六月天氣了，在低地上是很熱的，可是常他們爬過大雪山的時候，這些服裝破爛血液稀薄的南方人，不習慣於高空的地帶，有許多竟因禁不住風霜的打擊而死亡了。更難攀登的是荒無人煙的炮銅崗，在這上面，他們實在等於開闢了自己的道路，他們砍下長的竹桿，放在彎彎曲曲的深與腰齊的爛泥地上，鋪成一條過道。毛澤東告訴我：『在這個山峯上，一軍團中損失了三分之二的運輸牲口。好幾百倒了下來，便永遠不再爬起來了。』

他們繼續往上爬着。第二個是耶徠山脊，損失了更多的人和牲口。然後他們登上那可愛的夢筆山和打鼓山，這兩座山又奪去了他們不少的生命。最後，在一九三五年的七月二十日，他們進入很富足的四川西北部的毛兒蓋區域，而和第四方面軍及松潘蘇維埃區域取得了聯絡。在這裏他們終於

停留下來長期休息了一下，清算一下他們損失的數目，改編一下他們的隊伍。

第一、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軍團，在九個月以前，從西江出發的時候，人數有九萬，現在能夠在斧頭鐮刀旗幟下集合起來的，不過四萬五千人。這所缺少的人數並非全是損失的，逃跑的或是被俘的，紅軍作爲防禦戰略的一部分，在湖南、貴州、雲南等處前進的路線後面，留下了許多小股的正規軍隊，叫他們在農民中組織游擊隊伍，以便在敵軍的兩翼發動擾亂並執行分散軍力的活動。成千的由紅軍奪的來福槍，沿途散發，在從江西到四川的一路上，造成了許多新的足以威脅南京的區域。賀龍那時在湖南北部仍舊保有他的小蘇維埃區域，而且蕭克的軍隊也加入進去了。這許多新產生出來的游擊部隊開始慢慢地向那一區域前進。南京化了整整一年的工夫，還不能把賀龍驅逐，直到後來，紅軍總司令部命令他們開入四川才離那裏。這一個開赴四川的行動，是需要克服種種驚人的困難——經由西藏——纔能完成的。

從江西來的紅軍一路而來，得到了許多回想的材料。他們得了許多的新朋友，——也造成了許多兇狠的仇敵。沿路上他們「沒收」富人們——地主、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們——的財產，來供養他們自己。他們保護窮人財產沒收完全是依照蘇維埃法令有組織地執行的，而且只有財政委員會沒收部纔有權力分配這些沒收來的東西。這個委員會主管着軍隊的財源，各種沒收都由無線電報告委員會，每一支長征部隊的給養數量都由牠支配，這些隊伍是常常像一條長達五十哩的長蛇，在山上蜿蜒着的。

常常有大宗的「過剩的東西」——多到紅軍帶不動——就分配給本地的窮人。在雲南紅軍



從富足的火腿棧房中，沒收了好幾千隻火腿，就有數十里外的農民來領受這一份不要錢的火腿——這是火腿業歷史上一件新奇的事情。他們又照這個辦法分配了幾十噸的鹽。在貴州的時候，從許多地主和政府官吏們那裏沒收了許多鴨田，紅軍天天吃着鴨子，直到吃厭了。從江西出發時，他們用自己的國家銀行裏，帶來了大批的南京政府的鈔票、銀元與銀塊，在他們路上的窮苦區域裏，他們就用這些錢來買所需要的東西。地契都毀了，捐稅都廢除了，窮苦的農民都武裝起來了。

紅軍告訴我，除了他們在四川西部的經驗之外，他們走到任何地方，都受農民大眾的歡迎。他們的名聲，在他們軍隊沒有到達之前就傳播着，常常有被壓迫的農民，推派一羣代表來要求他們繞道到他們的地方去「解放」他們。他們對於紅軍的政治綱領當然是不大明瞭的，他們只知道，紅軍是「窮人們的軍隊。」這就夠了。毛澤東帶着笑告訴我，說有一次一隊代表團到來歡迎蘇維埃先生，可是這種鄉村的農民，未必比福建軍閥盧興邦來得更愚蒙，因為盧興邦有一次在他的防區裏遍貼佈告，懸賞「捉拿蘇維埃——不論死活。」盧氏在佈告上說，這位匪徒，在多處做了無數的罪惡，所以必須處以極刑！

南方的紅軍在毛兒蓋與懋功休息了三個星期。在這個期間，革命軍事會議、黨及蘇維埃政府的代表們，討論將來的計畫。我們當可記得紅軍第四方面軍，一九三三年春間，在四川已經有了根據地。這第四方面軍原是在鄂、豫、皖、蘇區裏組成的。牠過河南到四川的進軍，是由徐向前和張國燾兩個紅軍老將率領的。關於這兩位將來我還要提到。驚人的勝利——和悲劇的掙扎——使他們在四川出了名，四川的整個北部，曾經一度在他們控制之下。他們在毛兒蓋和南來的布爾什維克會合的時候，

徐向前的軍隊約計有五萬人。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七月裏，集中在四川西部的紅軍聯合力量將近有十萬人了。

在這裏這兩支軍隊又分開了，南方軍隊中的一部繼續着北上，其餘的和第四方面軍一起留在四川。關於這要實行的正確路線，黨裏面意見頗有不同。張國燾和徐向前贊成留在四川，打算在長江南部重新建立起共產黨的勢力來。毛澤東、朱德和中央委員會的大部分人，決定繼續到西北去。這個猶豫期間，終於爲了兩個因素的影響而告終了。第一個是蔣介石軍隊的包圍形勢的迅速完成，他從東方北方把軍隊推進到四川。在這兩支紅軍中間，插進了一隻木梢。第二個是四川的一條水流湍急的河突然漲水不能過渡，於是把兩支軍隊分開了。此外還有黨的一些別的因素，在這裏是毋需討論的。

八月間，從江西來的紅軍主力，以第一軍團爲前鋒，繼續向北前進，把朱德留下來和徐向前、張國燾在一塊，在四川指揮。第四方面軍後來在這裏以及在西藏又停留了一年，然後和賀龍的第二方面軍聯合起來，大舉直入甘肅——這是我將來要敘述的。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向四川、西藏邊境的大草地前進的紅色隊伍前頭，是林彪、彭德懷、左權、陳賡、周恩來、毛澤東等指揮官們，江西中央蘇維埃政府委員的大部分，以及黨中央委員的大部分。他們率領三萬大軍開始長征的最後階段。

最危險而最驚人的路程，擺在他們的前面，因爲他們所選擇的路程要通過獨立的蠻子種族和游牧的西番——西藏東部一種好戰的部落——所居住的地方。經過蠻子和西藏人區域的時候，紅黨們第一次遇見了一種聯合對他們採取敵意的居民，他們在這一段長征中所受的損失，超過了過

去的一切。他們有錢，可是買不到食物。他們有槍械，可是他們的敵人是看不見的。當他們走進遼密的森林之中，越過十幾條大河的源頭的時候，這些蠻族的人民，向後撤退離開了他們。他們把房子裏的東西都帶走了，把一切可以吃的東西都運走了，把牛和雞類等家畜都趕到高原上去，這簡直把蠻族的區域撤清了。

可是在路的兩旁半里路開外，是非常不安全的。許多的紅軍戰士，冒險去放一隻羊吃草，就不再回來了。這些山民埋伏在深的樹林裏，向着前進的「侵入者」襲擊。他們爬上了高山，等紅軍排隊走過那深而窄狹的石路的時候——那裏有時只能一個或兩個人並肩走過——蠻子們就從山上滾下大塊的圓石頭，攻打紅軍的士兵和牲口。在這裏根本沒有機會去「解釋紅黨們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沒有機會去進行友誼的聯絡。蠻子們的女酋長，對於任何中國人，有一種不可解的傳統上的仇恨，而又不辨明「紅」「白」之間的分別。她恫嚇他的屬下如有幫助那過路的人，她要把他活活煮死。

紅軍除了用搶奪的方法以外，不能得到任何食物。他們用戰爭來搶奪一些牛。那時他們有一句話：『買一隻羊，要以一個紅色戰士的生命作代價。』可是從蠻子的田地上，他們收割了綠色的西藏麥子，和甜菜、蘿蔔等蔬菜。據毛澤東說那些蘿蔔很大，可供「十五個人吃。」用這樣少得可憐的給養，他們渡過了大草地。毛澤東很滑稽地對我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將來我們一定要把這筆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這裏搶奪過來的給養償還給苗子和西藏人。』只有俘獲了蠻族人，他們纔能得到引路的人。紅黨們和這些引路人，結成了很好的朋友，這些人，出了蠻子邊境，還繼續跟着紅軍前進。有一

些現在是陝西黨學校的學生，將來有一天他們會回去時，會告訴他們底人民，「紅色中國人」與白色中國人之間是有分別的。

在大草地中，走了十天，不見人煙。十天中幾乎不斷地下雨，下在這一帶濕地上。只有循着本地山裏人所走過的一些縱橫交叉的脚印，纔能穿過牠的中部。在這裏紅軍又損失了一些人和牲口。有許多人沈沒入這種濕草的海裏，在他們的同志還沒有來得及援救的時候，他們已經沒入水草而看不見了。這裏沒有柴火，他們不得不吃青麥和生蔬菜。這裏甚至沒有樹木來藏身，而行軍輕便的紅軍們又都是不帶帳篷的。在晚上，大家擁擠在一塊蘆葦下過夜，這簡直是不能遮雨的，可是從這種艱苦鍛練中，他們也勝利地通過了草地——至少比起那些追趕他們的白軍們來可以這樣說。那些白軍迷失了路，等到摸索回去時，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沒有損失。

紅軍現在到達了甘肅邊境。前面還要有好幾次的作戰，這幾次戰爭中任何一次的失敗了就是決定的滅亡。更多的南京軍隊，東北軍隊和回民軍隊，已經在甘肅南部動員來阻攔他們的前進，但是他們終於衝破了一切障礙，而且在戰爭的進行中，他們從回族的騎兵隊，奪取了好幾百疋馬，這些騎兵軍隊，驍勇善戰，人們預料他們一定會把紅軍一舉消滅的。脚走痛了，人疲倦了，一切已經達到了人類所能忍受的限度了，紅軍最後進入了陝北，直達長城之下。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正是江西動身的一年以後，第一方面軍的前鋒隊伍，和紅軍第二十五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十七軍會合起來——這三軍，在一九三三年，已經在陝西建立了一個小小的蘇維埃政權的根據地。這些不到二萬的戰爭的殘生，現在才停留下來領略他們所成就的事業的重要意義了。

關於長征的一種統計的敘述，是頗爲動人的。牠揭出，在沿路上，平均幾乎每天有一次小接觸，有十五個整天的大戰。在路上的三百六十八日中，二百三十五日，耗在白日行軍中，有十八日，耗在夜間行軍中。在停留的一百日中——有許多是用在作戰上的——之中，有五十六日是在四川西北部度的一萬五千里路的行程，只有四十四天的休息，平均每走三百五十里才有一次休息。每天的平均行程是七十里即二十四英里。

紅軍一共過了十八個大山嶺，有五個是終年積雪的，他們渡過了二十四條河流。他們經過了十二個行省，佔領了六十二縣，除了打敗逃避或包圍了派去攻打他們的中央政府的各種軍隊以外，他們還衝破了十省不同的地方軍閥的圍攻軍隊。他們走入並且成功地通過了六種不同的未開化民族的區域，深入了數十年來中國軍隊從未到過的地方。

不管人們對紅軍怎樣想法，也不管人們對於他們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東西怎樣認識（在這一點上，是很有辯論的餘地的）可是無論如何不能夠否認，他們這次長征，是軍事史上的鬪爭。

在亞洲只有蒙古人曾經勝過他們，至於最近三世紀來，則除斯文赫定在他的帝皇之城，熱河（Jehol, City of Emperors）一書中所說的「韜格脫之逃亡」（Flight of the Torgut）外，從沒有過和紅軍相同的「整個國家的遷移」。漢尼拔（Hannibal）之越過阿爾卑斯山和紅軍的長征相比，直是假日旅行而已。一個更有趣味的例子乃是拿破崙之莫斯科敗退，而他的大軍乃是完全被擊破而潰散了的。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一個大衆的遷移，是歷史上最大的武裝宣傳游歷。紅軍所經過的各省，人

口超過二萬萬。在戰爭與小衝突之間，在每一個佔領下來的城鎮裏，他們召集了羣衆大會，舉行了戲劇的公演，向富人們大敲其「竹槓」，解放了許多奴隸（有許多加入了紅軍），宣傳着「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原則，沒收了漢奸們（即官吏、大地主、捐稅徵收者）的財產，把他們的貨物分散給窮人。有千百萬的農民，看見了紅軍，並見聽見他們說話，他們再也不懼怕紅軍了。紅軍向他們解釋土地革命的目的，和他們的抗日政策。他們武裝了千萬的農民，留下了小隊，去訓練紅色游擊隊，使南京軍隊從此忙個不休。在這個長期的驚心的進軍中，有數千人落後了，可是另外有數千人——農夫、學徒、奴隸、國民黨軍隊的逃兵、工人，以及一切沒有權位者——參加並補充了空缺。

關於這種驚人的長征，將來有一天會有人寫成全部的史詩的。這種征戰，即使把政治和戰事除掉，也是近代歷史中，青年們的一種動人的成就。可是我現在必須要繼續我的故事，因為我們已經把紅軍匯合在西北了。現在我把毛澤東主席所寫關於這一次二萬五千里的長征的一首古詩，寫下來作爲結束，這位叛逆者既能領帶十字軍，同時又寫得一首好詩。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山千水只等閒。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懸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此  
页  
空  
白

## 第六章 西北的紅星

### 一 陝西蘇維埃的開始

在江西、福建和湖南的共產黨慢慢地建立了他們反對南京政府的根據地時，同時中國其他各地也發現了共產黨紅軍。佔地最廣而又完整的，是豫、皖、鄂、蘇區，這區包括揚子江、中部、流域三個出產豐富的省分的大部，並且居有二百多萬的人民。這一帶的紅軍初歸徐海東指揮，後來改歸徐向前統領，他是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的畢業生，前粵軍的校官和『廣州公社』的老將。

在遠、離、豫、皖、鄂、蘇區的西北叢山間，另有一個黃埔軍校的幹部劉子丹也替現在陝、甘、寧、蘇、區、安下了一塊奠基石。他是一個現代新的騎士，抱着西北山居者憎恨富人的情緒，劉子丹因此在西北一般窮人中成爲他們的救星，在地主與高利貸者中則變了可怕的禍害。

這個亂世的騎士，生在陝北 保安山村中一家小康的農家。他到離、長、城不遠的陝西與蒙古隊商交易最盛的榆林受中等教育，然而不久又離開榆林，考進廣州的黃埔軍官學校。一九二六年畢業後，即參加共產黨，在廣東軍隊中服務。在北伐時他隨軍直至漢口，國共兩家正在此時鬧翻。

一九二七年南京『政變』時候，他在『清黨』的大屠殺之中逃到上海，進行共產黨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回陝西之後，與當時在馮玉祥將軍的『國民軍』裏的幾位過去的同志重新發生了關係。第二年，就在陝南發動一次農民暴動，發動的地點即在最近西安事變後，南京轟炸機轟炸東北軍某



前鋒部隊，而會給與很重大損害的華縣。這次的暴動雖然殘酷地被鎮壓下去，可是在陝西卻產生了第一支游擊隊的核心。

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間，劉子丹的生活是一面萬花鏡，有失敗、崩潰、挫折、流亡、冒險和幾次的死裏逃生，有時候撤了職，有時卻又升了官。他率領的幾個小部隊已經消滅殆盡。有一次他被任爲保安民團團長，於是他利用民團槍斃了幾個當地的地主和高利貸者。一個民團團長竟幹出這種事情。保安的縣長因此革職，劉子丹也同着三個伙伴跑到鄰縣去。那裏一個馮玉祥將軍的官員請他赴宴，在席上劉子丹竟和他的朋友繳了他們的主人的武裝，得了二十條槍逃到山裏去招兵買馬，不久招募了三百個人。

這小部隊當即被國民黨的軍隊所包圍，於是劉子丹向他對方求和。他們接受了他的要求，他自己一變而爲國民黨軍隊裏的軍官，衛戍陝西西部某地。他又在反對地主了，他的行爲又復越軌，這一次即被捕，但是因爲他在陝西哥老會內有很大勢力，所以當局又寬赦他，把他的部隊改編爲運輸隊，仍由他率領。現在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又再度發生：劉子丹第三次又犯了同樣的過失，在他區裏劉子丹逮捕了許多因一向不納租稅而拒不納稅的地主。結果他們竟武裝起來，請求西安省府把他撤職查辦。他的部隊也因此被圍繳械。

最後當局懸賞通緝他，他跑回保安，他的部隊裏許多信仰共產主義的官員與士兵也跟他同走。一九三一年，他畢竟建立了一支有組織的獨立軍，紅旗高擡，佔領了保安和中陽兩縣，後來更加速度的推進到陝西北部。奉命勸他的政府軍隊，如果一經接戰，大多反而歸順了他，甚至有許多從山西渡

越黃河到陝北投順他的叛兵。劉子丹的名字因為他的勇敢堅毅和激烈，馬上傳遍西北，並且起了一種普遍的傳說，說他槍彈不入。

從我所得到的公允的證據裏觀察陝西，最初一兩年的鬪爭，對官員、稅吏和地主的屠殺無疑是過分的。武裝的農民，一自長時期被壓服的憤恨裏解放出來，就姿意搜捕、搶掠、綁架勒贖，他們的行為簡直是與普通的土匪相彷彿。然而到了一九三二年，劉子丹的部隊已佔領了陝北十一縣，共產黨就在榆林建立一個政治局，指導他的部隊。一九三三年初，建立了第一個陝西蘇維埃和正式的行政組織，並實施與江西的相仿的政策。

一九三四和三五兩年，陝西的紅軍有很大的擴展，加強了他們的部隊的力量，同時也多少穩定了蘇區內的情形。在安定設立了一個陝西省蘇維埃政府，一個黨訓練學校，和一個軍事總部。蘇維埃創辦了他們自己的銀行和郵政局，同時開始印行紙幣和郵票。在完全蘇維埃化的區域內，蘇維埃經濟便已在生長，地主的私人土地被沒收而重行分配，廢除一切的苛捐雜稅，着手開設合作社，黨部發出聘書延請小學的教師。

同時劉子丹從蘇區再向南推進，直迫西安。他佔領了離西安極近的臨潼，並圍攻西安數日，但並不能達到目的。另一支紅軍則直下陝南，佔領了好幾縣，而建立了蘇維埃。他們曾經與楊虎臣將軍（後來他成爲紅軍的盟友）開過幾次仗，互有勝負。因為軍紀提高，土匪的成分已經消除，農民大衆更加擁護紅軍。到了一九三五年夏秋之間，蘇維埃已統轄了陝甘兩省二十二縣，人數超過五千的。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兩支紅軍，此時都歸劉子丹率領，並且利用無線電與南部、西部紅軍主力取得聯絡。然

而當南部紅軍開始從江西福建的根據地撤退時，這些陝西的紅軍的力量已大為增強，因此直至一九三五年，蔣介石就不得不調派他的副總司令張學良將軍率領大軍來圍剿他們。

一九三四年末，紅二十五軍八千人在徐海東指揮之下，跑出河南。同年十月，牠抵達陝南，與當地一千紅游擊隊員取得聯絡。徐在該處過冬，幫助游擊隊編立一隊正規軍，又幾次的打勝了楊虎臣的部隊，同時武裝了陝南五縣的農民。一個臨時的蘇維埃政府也成立了，以陳惠三（譯音）一個二十三歲的陝西省政治保衛局委員為主席，又任李龍葵（譯音）和陳山壽（譯音）兩人為兩支獨立紅色部隊的指揮員。徐海東安排下這些部隊以防衛本區之後，他便帶領紅二十五軍侵入甘肅，在千萬政府軍堵截監視之下，直入蘇區，沿途佔領了五個縣城，並且解除了馬鴻賓將軍所指揮的兩團回軍的武裝。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軍在陝北延長附近集合，全部改編為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任總指揮，劉子丹為副總指揮兼陝甘晉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這軍團與王以哲指揮的兩師東北軍遭遇而擊退了他們，補充了許多新兵和急需的軍火。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八月，一位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表到了陝北，這是一個矮胖的青年紳士，名叫張慶佛。據報告我的人——他當時是劉子丹的參謀——所說，這位張先生（綽號張胖子）奉中央之令以『改組』當地的黨和紅軍，他是一個高級按察使。

張胖子開始搜集證據以證明劉子丹沒有循照『黨的路線』。他『審問』他，要他辭卻一切本兼各職。現在這事如果不是荒謬的，便是不可思議的，也許既荒謬而又不可思議。然而無論如何這是

『黨的紀律』的卓特的明證。劉子丹並未同這個敢批評他的干涉者爲難，反而默然地接受他的裁判，辭去一切職務，回到保安在他的窯洞裏，過着憂鬱的生活。張先生還發令逮捕並且監禁了黨內及軍隊裏別的一百多個『反動分子』，然後這件事非常滿足地結束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由林彪、周恩來、彭德懷和毛澤東所統率的南方紅軍先鋒部隊開入陝西之後，纔發覺這件離奇的事。他們都爲這驚人的局勢所震動，要重新加以檢查，發覺大多絲毫沒有根據，張慶佛已經越權，而且他本身曲解了『反動』的意義。他們立即恢復劉子丹和他的同伴的職權。張胖子被捕受訊之後，監禁了相當時日，然後派他幹下級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初，聯合紅軍發動他們著名的『抗日』遠征，渡黃河侵入鄰省山西，此時劉子丹又重握了軍權。在紅軍於兩個月內佔領了『模範省』境內十八縣，這卓著的戰績中，劉子丹自己就建立了奇功。但他在前線陣亡的消息，在國民黨的新聞紙上，只當作一種傳聞。一九三六年三月，他領兵進攻敵方的碉堡時，受了致命的重傷，但那碉堡的佔領，卻使其餘的紅軍能夠安然渡河。他載回陝西，戀戀地注視着他兒時遊踵所及的丘陵，在那些跟着他走向那革命鬪爭的道上，去的山居者中間，劉子丹從此脫離了這世界。他葬在瓦窑堡，蘇維埃又把蘇區內的某一縣改爲子丹縣以紀念他。

我在保安碰到他的妻子和他的遺孤。一個可愛的六歲的小孩，共產黨給他縫了一身特殊的制服；他佩着武裝帶，帽子上綴着紅星。當地所有的人都敬愛他。小劉自己裝出一個元帥的樣子，並且以爲他有那樣的『匪』父是很光榮的。

但是，西北的蘇維埃雖由劉子丹建立起來，不過引起這場民衆叛亂運動的，卻不是劉子丹，而是

生活狀況本身。要了解他們得到的任何成功，現在非但要明瞭這些人是爲什麼而戰，而且還需要考察他們是對什麼而戰。

## 二 死亡與捐稅

在西北大饑饉時，我於一九二九年六月考察蒙古邊境的綏遠災區。這災荒幾乎延續了三年擴大到四個巨大的省分。至於餓死的災民確數，我不知道，大概也永遠沒有人會知道，這事現在已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據半官的報告是三百萬人，但我卻相信另外一個統計，認爲被災人數約有六百萬。

西方各國甚至在中國沿海各地都忽視了這災荒，只有「華洋義振會」中幾個見義勇爲的人物——幾個中國人和若干外國人如愛德華 (Edwards)、O. J. 托德 (O. J. Todd) 和堪欽佩的英格朗老博士 (Dr. Ingram) 等——曾冒險到這猖獗扶斯的災區去，想法減少一點人類的災難。我與他們一起過了若干時日，經過許多死城，越過以前是沃原而現成荒蕪的田野，踏進一個真正恐怖的世界。

我那時是二十三歲。我到遠東，目的是在探尋『東方之謎』。我相信我已把自己看作一個探險家，而這次到綏遠的遠行，也就是這一類行爲的起始。然而在那裏竟無意的碰到了我有生以來所未經見的事件——當我在綏遠所過那些如在惡夢中的日子裏，我親眼看見千萬男女老幼，因絕了食糧而流爲餓殍！

你曾見過一個人——一個勤懇工作的老實人，一個『奉公守法的』良民，從未嚴重地損害過他人，當他已有一個多月沒有飯喫的時候？這是一個最最悲慘的景象。他們鬆弛的皮肉已經起了摺皺，眼球凸出而看不清楚東西，身上骨頭都露了出來，而一個二十歲的年青人，走路時候竟會一步一拖地，像一個龍鍾的老婦人。如果他有過運氣的話，他也早已把妻子兒女賣掉了。他們賣去了他們所有的東西——搭屋子的木材和大部分的衣服。有時甚至於賣掉他最後的一條褲子，而他就坐在炙膚的日光下蹣跚地走着，那對翠丸像兩顆乾癟的橄欖似的垂下來——這殘酷的現象是提醒你，這就是一個曾經做過人的人。

孩子們更爲可憐。細小的骨骼已經彎曲地變成敗形，腳脛和手臂彷彿是小樹枝，滿塞着樹皮和木屑的棕色的小肚，像鼓一樣凸出來。婦人們蜷伏在牆角裏待死，翹起他們扁平的屁股，乳房像一個洩氣的袋子。但是那裏的娘兒們爲數已經不多，她們早被賣掉了。

我無意搬演當時的恐怖情形。這些是我目擊而終身不能忘卻的事情。幾百萬的中國人已這樣地因飢荒而死了。但今日的中國仍然有幾千萬人要同樣地死去。我在薩拉圖的街上看見許多死了不久的屍體，然而在別的許多村莊裏，我也看到無數掩埋着幾十個死於飢荒與疫癘者的屍體的土堆。然而這些還不是最駭人聽聞的事，最使人驚駭的卻是在那些城鎮裏，仍有許多富人，囤米囤麥者，高利貸者和地主們，以武裝的警衛來防護他們，在飢饉中獲得巨大的利潤，使人驚駭的是在城市裏——官吏們，就在那裏跳舞，逛窯子——都囤滿米糧，足夠幾個月的米糧，而在北平、天津和其他各處，由「華洋義振會」募來（大半是從國外募來）的千萬噸大麥小米，竟無法運進災區。爲什麼

無法運輸？因為西北的軍閥扣住機車，不讓有一輛開到東面來，而東面的許多國民黨的將軍們，也一樣不肯把機車開到西面去，恐怕被對方扣留。

當這災荒一天天的嚴重，華洋義振會就決定移用美國的捐款開鑿一條運河，使乾枯的田地得以灌溉。官吏們竭力與他們合作，另一方面又立即以幾分錢一英畝（約當六華畝——譯者）的代價收買那些能夠得到灌溉的旱田。一大羣吃人的守財奴就蜂湧到窮僻的村落裏以從前的欠款或幾分錢的地價，從災民手裏奪取了幾萬畝田，然後霸住牠等待雨天，等待地租。

然而這現在已死去的民衆，都大半沒有任何反抗！

我問我自己，『爲什麼他們不謀叛？爲什麼他們不成羣結隊的前進，攻擊那些只知殘酷地收地稅而又不能救濟他們，只知收買田地而又不能濬疏運河的惡漢？爲什麼不衝進大城市裏，搶劫那些惡漢——那些買他們的妻女，在好多人飢餓的時候却吃着三十六道大菜的酒席的惡漢的財產？他們爲什麼不呢？』

他們這種冷靜態度，非常使我奇疑。有一個時候我竟想到再不會有一件事能挑撥起中國人的爭鬪了。

我這種觀念是錯誤了。中國的農民是並不消極的，他們不是懦弱胆小的人。當他得到了方法、組織、領導，一個切於實際的綱領，和一個光明的希望以及武器時，他們就會發動爭鬪。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就能證明這一點。在這種條件之下，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在西北特別發展，分明是必然的。西北農民生大衆的生活狀況，較之中國其他各處，是更沒有得到最低限度的改善。

這許多事實，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竟生動地記載在官方的文件裏。這裏我要介紹A斯丹巴爾博士 (Dr. A. Stampar) 的報告 (註) 他是一個著名的衛生專家，由國際聯盟派來做南京政府的技術顧問的。斯丹巴爾博士的報告在這方面是很可引用的材料。不久之前，他周歷過陝甘等國民黨統治的區域，而他的報告是根據他本人的考察所得和官方供給的材料寫成的。

他說『在紀元前二百四十年，一位叫鄭谷的水利專家據說已發明了一個可以灌溉「前陝西渭河流域——中國民族的發源地」一百萬英畝田地的方法，但這方法並未應用。自決隄之後，雖然時時實行新的灌溉工作，但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被灌溉田地的總數還不到二萬畝（約合三千三百英畝）』從斯丹巴爾博士所得到的數字，陝西某縣在大饑饉中，死亡率佔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二；另一縣則為百分之七十五，其餘類推。他摘錄官方估計，表示出只甘肅一省餓死者已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一——即二百萬人。這些死者，如果政府禁止囤積米穀，如果軍人不扣留機車，使災糧無法運輸，其中大半是可以活命的。

現在我把這位國聯派來的考察者對在紅軍未到之前的西北狀況的敘述，摘錄幾段於後：

『在一九三〇年的大飢饉裏，二十英畝（約合一百二十華畝）的田地只能掉換三天的食糧。本省（陝西）資產階級就利用這個機會購置了大批田產，而自耕農的數目遂大大的減少。後面所引的是一九三〇年華洋義振會芬德來·安得列夫 (Findlay Andrew) 的報告，由此對於本年本省的情形可得一明白的印象：

『……從本省的表面看來，已比去年改進不少。爲什麼呢？因爲在我們工作的甘肅省這一特



殊部分，由於二年來的疫癘，飢荒與兵災，死亡激增，人口驟減，食物的急迫，要求大見和緩。」  
現在有許多田地已經荒蕪，有許多則集中於地主和官僚的手裏。甘肅未耕的可耕地的數目，尤其『大得驚人』。『一九二八——三〇年的饑饉中，地主以極賤的價格買進的田地，在實施涇水灌溉計劃時，得利頗鉅。』

『在陝西，不付地稅是認為是一種光榮的記號。因此富有的地主照例不納地稅。……然而另一個最不合理的事實，就是政府又向災荒時期內放棄土地的農民，徵收災荒期中各地未納的欠稅。地稅不納，則將所有田地沒收，直至繳清後始行發還。』

斯丹巴爾博士又發現陝西的農民（當然不包括『照例不納』的地主在內）繳納地稅及其附加稅，佔其全部收入之百分之四十五。其他捐稅『則又佔百分之二十。』『不僅是課稅如此苛重，而牠的稅額似乎又是不一定的，至於徵收的方式則更是浪費的，酷虐的與很多流弊的。』

關於甘肅斯丹巴爾博士這樣寫着：

『甘肅的稅收在最近這五年中每年平均在八百萬以上……比中國最富饒而課稅最繁重的省分之一的浙江，還要來得繁重。還有一點可以看出來的，就是這種稅收——尤其是甘肅——並非得自一二樣大的稅源，而是從許許多多零星的雜稅聚積而成。差不多沒有一種用品，一種生產品或

（註）見斯丹巴爾博士所著西北各省及其發展的可能性，一九三四年七月由『國民經濟委員會』在南京非公開地印行。不幸，跟斯丹巴爾博士許多卓越的報告，又跟別的國聯專家關於華南的報告一樣，這本書是不公開的。

一種營業是沒有稅的。而人民實際所繳納的稅類，要比公佈的數字還要多得多。第一、收稅者會在總收入中扣下一部分——在某種情形之下，而且這是極大的一部分。其次，除由省及縣徵收的賦稅外，還有由軍隊所收的特稅，以甘肅一省而論，照政府的估記，每年當在一千萬元以上。（註）

『人民另外一種負擔就是民團的經費。民團本來是用以防衛土匪的，但在許多情形下，牠卻成爲一羣依賴鄉村供養過活的地痞流氓。』斯丹巴爾博士引用了許多數字，說明維持民團的經費竟遠當地地方政府總預算之百分之三十至四十。這些自然完全在供養巨大正規軍的擔負之外。對後者的負擔，據斯丹巴爾博士說來，竟分去了陝甘兩省總稅收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曾經聽一位住在陝西的傳教士說，他親自看見農民們拆下他們屋裏的板壁（木材在西北是一種貴重東西）載到市上去賣，拿這筆錢去納稅。他說就是一些『富有的』農民，對共產黨原無好感的，但於紅軍到時卻都毫不猶疑，相信『世上再沒有比那更壞的政府了。』

然而在經濟上西北絕不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區域，土地大半都很肥沃，人口又不很多，牠能夠容易地生產出較牠所要消費的還要多多的生產品。只要把灌溉的方法加以改良，有一部分即可成爲『中國的烏克蘭。』陝甘兩省，蘊藏非常豐富的煤礦，陝西還產煤油。斯丹巴爾博士以爲：『陝西，尤其是西安四周的平原，可以建立爲一個工業中心，其重要僅差於揚子江流域，並可採用牠自己的煤礦。』

（註）這的確是個極端穩健的數字，因爲牠並未提到陝甘兩省主要的非法軍人特稅（多年來都是鴉片稅）當鴉片××將軍統治這地區時，依我在西安所得到的數字說，他每年從這一項抽取了八千萬元。自從南京實行鴉片專賣之後，這種收入無疑要大爲減少，但是每年仍然可以弄到幾百萬的。

甘肅青海和新疆的礦產，據說非常豐富，然而幾乎全沒有開採。單只黃金一種，據斯丹巴爾博士所說，『這地帶可變成第二個克隆狄克 (Klondyke)』

這裏的確，有的是急待改革而且似乎已過熟的條件！這裏的確，有的是需要人民抗爭，甚至無目的地抗爭的事情！因此，當紅星一在西北發光時，千萬的民衆就起來迎接牠，以爲牠是希望與自由的象徵，這自然不是偶然的事。

然而共產黨果真比較好一點麼？

### 三 蘇維埃社會

不管在中國南部一帶共產主義有什麼成就，把我在西北所見到的情形而論，說牠是實行了農村的平等，這比說牠是馬克思主義的標準產物更爲妥帖。這在經濟制度的表面上看得非常清楚，雖然，即使在蘇區裏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也是很浮淺的，而隨處可見到很顯明的物質條件的限制。

我們上面已經詳細談過，西北是完全談不上機械工業的；這區域所受工業化的影響，與中國東部相差得遠；雖然經濟上種種衰落的狀態無疑地反射着幾個半工業化的城市的經濟的改革，但西北區域主要是耕種與畜牧事業，牠的文化幾世紀來都停留在不進的狀態中。然而紅軍本身卻是中國『工業化』所造成的獨特的產物，而牠所傳入的各種新思想的震盪，對於腐敗陳舊的西北文化確實是一種革命。

外來的條件無論如何阻止紅軍對初期的社會主義經濟，除建立政治的組織外，有其他建設的可能。要建設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當然，只有等將來他們抓住了大城市的政權之後，把外國勢力範圍內的工業基礎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根基，方能建立起來。同時，在農業區域裏，他們活動的中心是在於解決許多目前迫切的農民問題，例如土地與租稅等問題。這政策很似俄國民粹派（Narodniks）的反動綱領，但是兩者卻有極大的差別。中國共產黨只把土地的分配作為建立民衆基礎的一種方法，是用來發展革命的鬥爭以取得政權，和求取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革的最終實現——而在這過程中，集體化或為必然的趨向。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基本法（Fundamental Law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註）中曾記載一九三一年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詳細地規定中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工作綱領』。從那綱領，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最後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真正的完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同時，我們必須記着：現在各蘇區裏的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組織，始終只是一種暫時的組織，就是在江西的時候也是相同的。因為蘇維埃自從創立之後，即不得不從事爭鬪，以求自身的存在。他們的中心工作是在建立一軍事和政治的基礎，使革命的勢力能夠逐漸普通，逐漸深入，而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以為牠企圖在狹小的封鎖區域內，『作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驗。』

共產黨在西北之所以能得到直接的擁護，顯然並不是因為牠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或是標榜孫中山所主張的『耕者有其田』。在共產黨所可贊賞的各種經濟政策中，下列四項顯然是最有利於農民的：即重行分配土地，剷除高利貸，取銷苛捐雜稅，掃除特權階級。

在理論上，蘇維埃是一個「工人」與「農民」共有的政府，但在實際上，西北蘇維埃的全部選民，在性質和數量上，農民卻佔絕對優勢，因此政治制度本身便不能適應這種現象。爲着平均全體農民的勢力，共產黨把蘇區的民衆分成下列各類，即（一）大地主，（二）中小地主，（三）富農，（四）中農，（五）貧農，（六）佃農，（七）僱農，（八）手工業勞動者，（九）流浪無產階級，和（十）自由職業者，包括教師、醫生、技術人員等所謂「農民知識階級」。這種區分是經濟的，同時也是政治的，在蘇維埃選舉時，佃農、僱農和手工業勞動者等可比其他各類推舉較多的代表，他的目的顯明地是在建立一某種性質的「農村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然而在這些被區分的階級裏面，我們卻很難尋出牠們在根本上有什麼重要的差別，因爲他們都是與農業經濟直接發生關係的。

雖有上列的各種限制，但在政治制度穩定的區域裏，蘇維埃的工作倒很有成就。代議政府的組織是以村蘇維埃作爲最小的單位而建立起來，在村蘇維埃之上是區蘇維埃，縣蘇維埃，省蘇維埃和中央蘇維埃。每一村蘇維埃能推選出他們代表參加高一級的蘇維埃，依此一直推選出全蘇大會的代表。十六歲以上的人都有選舉權，但這並不是完全平等的，他的理由已在上面說過。

在每一區蘇維埃下設有各種委員會。全權委員會就是革命委員會，時常是在紅軍佔領一地之後，首先舉行熱烈的宣傳運動，然後召集民衆大會而推選出來的。這委員會與共產黨密切地合作，負責辦理初選或複選等事宜。在區蘇維埃之下，由牠任命的各種委員會，計有教育、合作、軍事訓練、政治

訓練、土地、公共衛生、游擊訓練、革命防衛、擴大紅軍、農村互助、紅軍耕種及其他委員會等。從區蘇維埃起直至中央政府都設有上列各種委員會，但調整政策及決定國家大計的權力，都歸中央政府。

共產黨的組織工作的範圍並不是僅限於政府本身，牠在各村各鎮的農民和勞工中間，就有着廣泛的黨員組織。除此之外，還有青年團，牠把大多數的青年羣衆組織成『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也把一般婦女羣衆加以組織，把她們編入少共團、抗日會、看護學校、紡織學校和婦女耕種隊等組織裏面。成年的農民也使之參加『窮人會』和抗日會，甚至從前的祕密會黨『哥老會』也使之參加蘇維埃生活，給牠公開及合法之工作。而『農民隊』、『游擊隊』等，也是嚴密的農村政治的和社會的一部分的組織。

所有這一類組織和各種委員會的工作，都同時要受中央蘇維埃政府、共產黨和紅軍的指導。這裏不必瑣碎地來解釋這些團體間的有機的聯絡，但大體地說來，雖然組織、會員和工作的決定似乎從農民自身以民主的方式來執行，但都受某些黨員的直接指導，而各團體間也維持着密切的聯絡。這種蘇維埃組織目標顯然是設法使每一個成年男女與兒童成爲某一種組織的分子，並且做他被派定的工作。

共產黨對於增加生產和利用荒地所應用的方法和牠的努力，都是很有特色的。我曾經抄錄許多佈告，是土地委員會分發到各支會去指導牠們宣傳和組織農民以參預懇殖的工作的方法的。佈告範圍的普遍與內容之切於實際行動真使人驚奇。例如，我曾在某土地委員會支會中尋到一道關於指示春耕命令，牠指示牠的工作人員『不取任何強迫命令的形式，用普遍的宣傳，誘導農民大眾

自動加入春耕。』同時提出詳細的辦法，指導達到春耕時期的四大要求的辦法（這是蘇維埃在前一年的冬天便已決定了的）即第一、更普遍的利用荒地和擴大紅軍的耕田；第二、增加農作物的生產；第三、加多農作物選擇種類，尤其注重在蔬菜與瓜類的新種種植；第四、擴大棉田。

這命令（註）詳細指示應怎樣去增加勞力，尤其是使婦女們能直接參加農業生產（特別是那些因參加紅軍致男子數量銳減的區域裏面）其中有一段是非常有趣，因此可以見到共產黨利用每一有利條件時所收的實效，那一段命令是這樣的：

『動員婦女、小孩、老人應一起參加春耕，各視其能力分担生產過程中主要的或輔助的工作。例如大腳（天足）及年青婦女應動員他們組織生產教導隊，並担任清除耕地以至農業生產的主要工作。至於小腳婦女、小孩及老人應動員使從事佈種、拾糞以及其他各種輔助工作。』但是農民們本身對這種工作指導有怎樣的感覺呢？我們總是認為中國的農民是厭惡組織紀律，和各種超出家庭範圍以外的社會活動的。可是如果你對共產黨員這樣講，他們會對你發笑。他們認為中國的農民是不會厭惡組織或社會活動的，只要他是替他自身工作，而不是爲着民團、地主與稅吏。我也不能否認與我交談過的農民中，大部是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的。其中也有人毫無顧忌地加以批評，並且時露不滿，但只要問到究竟比從前如何，幾乎都會異口同聲地說那比從前好。我還留心到大多數的農民談到蘇維埃時，總是說『我們的政府』在中國的農村裏，這是簇新的，使人覺得奇

（註）土地委員會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五密堡所發指令。

異的。

在所有各個歷史較久的蘇區裏，地方上的警衛和防守工作差不多全由農民組織自己負責。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在民衆中間共產黨已有了穩固的基礎。蘇區內簡直沒有真正的紅軍留守。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前線。地方防衛的職守都由村鎮革命保衛團、農民赤衛團和游擊隊等分別担任。這事實足以證明紅軍之所以能博得農民的愛戴，因為他們不像其他的軍隊，把農民作爲他們壓迫與剝削的對象，而是始終立在最前線，爲當地的食糧而爭鬪，並且回擊敵人的進攻。在另一方面，農民的嚴密組織，也建立了堅固的後方，使紅軍無後顧之憂，而可以充分地在前方自由活動。

但是我們真正認識共產主義運動之所以獲得農民的擁護，必須深切地着眼在經濟的基礎上的。上面已經說過，西北農民在過去負着重載。現在，紅軍所到地方佃農、貧農、中農以及一切「一無所有」的人的境遇，無疑地跟着起了一種劇烈的改變。新區裏一切的租稅第一年完全豁免，使農民們能夠甦醒一下。而在舊蘇區裏，也只徵收一種土地累進的單一稅，以及一種只值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商業單一稅。其次把耕地分給無地的農民，同時把無主的或地主已逃走的大量的可耕的「荒地」加以開墾。末了，他們沒收富有階級的田地與牲口分散給窮人。

土地的重行分配是共產黨的基本政策。這是怎樣執行的？後來因爲國內政治動員的關係，蘇維埃土地政策已大大的讓步。但當我在西北旅行的時候，他們施行的土地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西北蘇維埃政府所頒佈者）規定着，凡地主與富農自己不耕種的耕地一律沒收，但地主與富農仍能佔有他們自己的能力所能耕種的耕地。在土地不愁缺乏的區域裏——在西北這樣的區域土地爲



數極多——居留的地主與富農的土地實際上並未全數沒收，只有荒地和無主的耕地纔全被沒收，加以分配。有時，土質肥沃的土地也重行划分，使貧農們得到較好的，而地主們却只分到數量相等的土質較差的耕地。

怎樣纔有資格算是地主呢？依照共產黨的解釋，大體上說來，就是一個人大部分的收入非靠自己勞力而靠地租的就是地主。從這定義上看，高利貸者和土豪（註）也歸在地主的範圍內，而受到同樣的待遇。據斯丹巴爾博士的調查，西北一帶高利貸的利率從前達到百分之六十，在災荒的時候還要大大地提高。甘肅陝西寧夏各省大部分的土地本來都很便宜，但是一個沒有財產的農民或佃農想要積蓄足夠的錢財來購買自己夠用的田地，實際上都完全是夢想。我在蘇區裏遇到許多農民，他們從前都是沒有田產，雖然有些地方每一英畝耕地的地價只值兩三元。

除上述那些地主階級所有者外，其餘的都免被沒收，因此大部分的農民立即享有土地重行分配的利益。貧農、佃農和農村勞動者都取得足以維持他們生活的田地。蘇區裏似乎並不想使每個人都取得數量相等的土地。據王觀瀾（二十九歲，俄國留學生，西北三省蘇區的土地委員）對我說明，蘇維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在使每一個人都有足以維持他及他的家屬的普通生活的土地，然而這正是農民們最迫切的要求。

土地問題——沒收與重行分配——在西北非常簡單，因為事前已被官僚、稅吏和現已逃走的

（註）「土豪」在蘇區所指的，是從貸款和押款所得，也佔收入的大部分的地主而言。

地主們佔有的大量耕地一經沒收就可以立即滿足貧農們的迫切的要求，用不着對於那些居留的小地主或富農加以麻煩。因此共產黨不獨是建立了一種經濟基礎，使貧窮和無地的農民因取得田地而擁護他們，而且在某種情形下，因為賦稅的剝削已經廢除，也使中農感激他們。此外，甚至於更因為與上述相同的原因或抗日運動的號召，又博得了小地主們的幫助。陝西有幾個著名的共產黨員就是出身於地主家庭的。

共產黨對於貧農還給予特種的幫助，給他們低利息或無息的放款。高利貸完全取消，至於私人的借貸，如年利最高不過一分，則仍被准許。政府普通貸款的利率是五釐。赤色兵工廠裏出產了千萬的農具，政府又供給大量的種子，使無地可耕的農民能夠從事墾荒。蘇區裏已設立了一所初級的農科學校，據說又籌備創辦一所畜牧繁殖學校，只要從上海請到一位專家，便可以馬上開學。

合作運動的推進非常積極。這一類活動，除了生產和分配合作外，尚有許多在中國從未見過的合作方式，如牲畜與農具的集體應用——尤其是在耕種公地和紅軍耕地時——以及勞動互助會的組織。而最後的一種方式，使大量的耕地能夠迅速地集體地耕種收穫，省去了個別勞動所浪費的時間。共產黨督促每個人，使他不要荒廢他所分得的新土地。在農忙時節，就應用『星期六突擊隊』的制度，這時候不但所有的兒童組織，即所有的蘇維埃長官、共產黨員、赤衛軍、婦女團體，以至適在附近的各紅軍部隊，都一致動員起來，每星期至少要從事農作一天。這工作連毛澤東也得參加。

這時候共產黨就利用這機會播下集體勞作，這猛烈的革命思想的種子，並進行將來集體化實現時所必需的基本教育工作。同時，又把更普遍的社會生活的觀念逐步地灌輸進農民們的心中。在

農民中所建立的組織，就是共產黨所謂三位一體，即溶合了政治的、經濟的、和實用文化的三種而成。在這些民衆中共產黨所做的推進文化的事業，由前進的西方的標準看來，自然是不足道的。然而，中國其餘各地盛行的種種顯著的惡習慣，在陝北蘇維埃化時間較長的區域中，卻早已完全消滅，而在新蘇區裏也正做着大規模的宣傳運動，以求達到同樣的基本改革。鴉片在陝北已完全禁絕，這是一件特有的成功，而事實上我進入蘇區以後，我就從未看見過罌粟花。官吏貪污的事件簡直全沒有聽到過。要飯和失業，正如共黨所宣佈的一樣，似乎已完全絕迹。我在蘇區旅行時，自始至終從未見過乞丐。纏足和溺嬰是一種犯罪的行爲。童奴和賣淫已經消滅，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都已完全禁止。

『公妻』和『婦女國有』等無稽荒唐的傳說，實在不值一駁，但婚姻、離婚、和繼承等的更革，與中國其他各處那種半封建的法律和實際相比，自然是極爲激烈的。婚姻法（註）中包括下列有趣的條文，即姑婆虐待媳婦，買賣式的婚姻，以及『代辦婚姻』的習俗等全被禁止。婚姻須雙方本人同意，法定結婚年齡男子是至少二十歲，女子則爲十八歲。妝奩的習俗也被禁止，男女雙方如向縣市或鄉蘇維埃登記爲夫婦時，即可免費得一結婚書。男女實際上已經同居的，即認爲合法，不管是否已經登記，他們所生的子女也是合法的，因此也無所謂私生子了。

男女雙方只須一方不滿而要求離婚，可以免費得到蘇維埃登記處的許可。但是如果紅軍的妻

（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翻印本，保安，一九三六年七月。）

子要提出離婚，事先必須得對方的同意。財產由離婚者平分，就是雙方對於子女都有撫養的義務，但如有債務，則歸男方負擔（！）同時男方必須負擔子女生活費用三分之一。

教育在理論上說來是『義務與普及的』，但是子女的衣食自然仍歸父母負擔。而實際上，『義務和普及』的教育還沒有做到。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徐特立老先生曾經對我說，只要西北平靜地過幾年，他們在教育方面的成績，將使全中國震驚。在後面，我將詳細地談到共產黨肅清蘇區裏可怕的文盲的成就和計劃。但事前我們先要知道蘇維埃政府在實行教育綱領，以及這蘇維埃社會的表面似很簡單，而實際卻非常複雜的整個組織所需要的財政，是用什麼方法取得的。

#### 四 貨幣的解剖

蘇維埃至少必須完成供養和武裝紅軍，與及時救濟貧農這兩個主要的經濟任務，如果兩項中有一項不能實行，那麼蘇維埃的基礎也即隨着崩潰。爲求完成這兩大任務，共產黨必須着手於某種經濟建設，甚至於在蘇維埃建立最初的時候也是這樣。

西北的蘇維埃經濟是私有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和初期社會主義三種不同制度的奇妙的混合。他們准許或鼓勵私人的企業，而私營的土地與其產品，雖被允許，卻受相當的限制。同時油井、鹽池、煤礦等事業，及牲畜、皮革、食鹽、羊毛、棉花和紙以及其他原料的買賣，則歸政府經營與佔有。但政府並不實行專賣，私人的企業可以實行競爭，然有某種限度。

初期社會主義經濟因合作社的成立而實行了。政府與民衆都加入合作社爲社員，牠非但與私

有資本主義競爭，同時也和國家的資本主義競爭！但我們得記着，所有這些合作社都在極小極簡單的規模下經營的。因此，雖然在這種情形下很顯然地表示根本的對立，而且在經濟較爲發達的地方更有發生破產的危機，但在蘇區以內，這三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卻多少是互助的。

蘇維埃合作運動的動向分明是社會主義。共產黨闡明合作社是『對抗資本主義和發展一種新的經濟制度的手段』並列舉牠的五大任務：『與商人對大衆的剝削鬪爭；與敵人的封鎖鬪爭；發展蘇區國民經濟，提高大衆經濟政治的水準；和準備社會主義建設的條件』——在這時期內，『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將建立強有力的，足使這革命轉化爲社會主義的條件』（註）

這些過分重大的任務的最先兩項，實際上只是說合作社可以幫助羣衆組織他們的『突破封鎖線隊』用以協助政府作破壞封鎖綫的活動。本來蘇區與白區間的貿易是南京政府所禁止的，但利用了曲折冷僻的小徑和買通了邊防士兵，共產黨的出口貿易進行得非常活躍。爲國家貿易局服役的輸送隊，或合作社，將各種原料運出蘇區，以交換國民黨的貨幣與必要的製造品。

在村、區、縣、省各處都沒有運銷生產和信用合作社。這許多合作社全受合作社中央局監督，而中央局又歸財政委員會和國民經濟部管轄。這些合作社都是利用種種方法鼓勵社會最窮的民衆參加。只須加入五角的，有時甚至只消二角錢的股份，主顧便能獲得社員的資格，而合作社的義務又是

（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陝西五密保，國民經濟部的合作社發展大綱第四頁。

那麼廣汎普遍，幾乎使每個股東都能參加合作社的經濟的或政治的生活。每個社員入股的數目不受限制，但每人只有一票的權利，而不以股票的數目作投票的單位。每個合作社在中央局監督之下，選舉牠的管理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中央局還派熟練的職工與組織者爲合作社工作。每社分立業務、宣傳、組織、檢查、統計等股。

當局用各種獎品發給管理完善的合作社，並且作普遍的宣傳，以鼓勵與開導農民們，使得他們能認識這新運動的效用。政府又予以經濟上和技術上的援助，而牠和一般社員相同也在分利的立場上加入這些營業。蘇維埃政府對陝、甘兩省合作社已免息貸與七萬元之借款。

除邊區各縣外，其他各處蘇維埃的貨幣與白區的貨幣同時通用。在江西、安徽和四川的蘇維埃，曾經鑄造過銀元和銀的銅的輔幣，這些大都帶到西北來。但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南京政府沒收全國存銀之後，牠的價格便立即高漲。共黨也就收回銀幣，作發行紙幣的準備金。現在中國國內存銀，尙有一小部份還沒有給國民黨收回。

南方的紙幣用考究的鈔票紙精印，票面上印着『中國工農蘇維埃國立銀行』的名稱。但在西北，因爲技術的落後，結果是粗劣地印在劣紙上，有時甚至印在白布上。在各種票面上都印有牠們的口號，而陝西發行的紙幣，則印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和『中國革命萬歲！』等口號。

蘇維埃的貨幣在穩定的蘇區內各處都能通用，也有充分之購買力，而物價反而比白區爲低。怎樣會達到這一點呢？我不曉得共產黨發行的紙幣有多少準備金，也不曉得紙幣的發行總額。但顯然，是因爲沒有兌現的可能，所以農民們不得不用牠，在某幾個地方，也許要強迫行使，不過我自己還沒

有看見這一類事實的發生。在邊界的農民們時常拒絕收受蘇維埃貨幣，共產黨就付以國民黨的紙幣，軍隊的給養就是用國民黨的紙幣換得的。無論在什麼地方，蘇維埃貨幣似乎因普遍的政府信用與貨幣自己在市場上確有真正購買價值而得到民衆的信任。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牠尙藏有國民黨的銀洋。

但是商人們怎肯收受他們顧客的非蘇區不能通用的貨幣購買他們由白區販進的商品呢？這個困難問題已由國民經濟部解決，牠規定了貨幣的交換率：國民黨貨幣一元合蘇維埃貨幣一元二角一分。並且明文規定：『一切由白區輸入之商品，凡直接賣給國家貿易局者，付以外幣（國民黨的）一切必需品，如非直接賣給國家貿易局，而由合作社或商人承銷者應先向國家貿易局登記，其販賣所得之蘇維埃貨幣可換外幣。其他交換在必要時亦可給予。』（註）據此，實際上一切從非蘇區裏輸入的貨物都必須付以『外幣』。但輸入的製造品在蘇區極感缺乏的價值，超過蘇維埃輸出（主要是原料，而且全數被認爲私貨，故售價尤特別低廉）的價值總是很大的，因此這種對外貿易時有不利的趨向，換句話說，就是破產。這一點是怎樣能避免的呢？

大體上講，並非完全如此。然而據我所知道這問題是因林伯渠這位白髮的財政部長的精明幹練而解決的。林氏的任務是在設法使蘇維埃收支平衡。他曾經做過國民黨的財政部長，他的平生是一個動人的故事，現在我只能簡單的寫一寫。

（註）一九三六年保安出版黨的工作第十二期中關於蘇維埃貨幣政策一文。

一八八二年林伯渠生於湖南，他的父親是一個塾師，他唸完經書之後，考進了彰德府的師範學堂，後來又出國到東京留學。他在日本時候認識了當時被滿清政府放逐的孫中山，就加入中山先生領導的祕密的革命組織同盟會。當孫中山將同盟會與其他的革命團體合併改組爲國民黨時，林伯渠也是發起人。後來他又結識了陳獨秀，而受他的影響很大。一九二二年他就加入共產黨，但他仍舊繼續密切地跟孫中山博士一起工作（孫博士是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做了國民黨總務部的主席和財務部長。孫中山博士在北京逝世的時候，林伯渠當時也是與他在一起的。

國民革命開始時，林氏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裏幾個元老之一。在廣州時，他是農民部長；北伐時期，是程潛將軍——後來是南京的總參謀長——指揮的第六軍的政治代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動手清黨時，他劇烈的反對他，因之逃到香港，隨後又到蘇俄，在共產主義學院研究了四年。回國後也祕密地安全地潛入江西，卽被任爲財政部長。現在他是一個獨身者，從一九二七年起就不曾看見過他長成的兒女。他是在四十五歲的時候，放棄他優越的地位而與年青的共產黨員一起賭他的命運的。

一天早晨，這位五十五歲的長征中的老將，滿面笑容地走進我在外交部的房子裏來，他穿着一套褪色的軍裝，戴一頂已折破的遮陽鏡，綴着紅星的帽子，在他那對慈祥的眼睛之前，架着一副用小繩子套在耳朵上以代替一只斷腳的眼鏡。這樣的一位財政部長！他坐在坑沿上，我們就談到蘇區的稅源來。我知道蘇維埃政府實際上不徵收任何捐稅，國營工業的收入又極微小，那麼，從什麼地方取得他們的財源呢？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



林伯渠他開頭解釋：『我們說我們不向大衆抽稅，這是的確的。但我們對於那些剝削階級卻課以重稅，沒收他們盈餘所得的現款和貨物。因此我們的課稅方法都是直接的。這一點與國民黨所實施的卻完全相反，在他們那種徵稅方法下，結果還是貧苦工農對於捐稅的負擔最大。這裏納稅的人不到全人口百分之十，全是那批地主與高利貸者。我們也向幾個大商人徵收一筆小稅，但小商人則全部豁免。以後我們也許有向農民收低率的累進稅的可能，但目前大衆的一切捐稅早已完全廢除。』

『另外一種收入是由民衆自動捐稅。在戰爭進行時，革命的，愛國的情緒萬分高漲，民衆知道他們將要失去自己的蘇維埃，於是自動捐助大量的衣服、食糧和現金給紅軍。我們也從國有貿易、從紅軍土地、從國營工業、從合作社、從銀行貸款取得相當收入。但從沒收的方法上，得到我們最大的財源。』

『得自沒收，』我打岔說，『你的意思就是指普通所謂的劫掠！』

林笑了一下，『國民黨說牠是劫掠。不過，假如對剝削羣衆者收稅是劫掠，那麼，國民黨向羣衆徵稅也是劫掠。但紅軍從未做過白軍所說的那種劫掠。沒收是由負責人員，在財政委員會的指導之下執行的，每一件都應列成清單，報告政府；而所沒收的也只作為增進社會公益之用。私人的劫掠要受重罰，你可以探聽探聽人民，紅軍買東西是不是給錢！』

『是的，你說的不錯，不過你得看回答的是一個地主呢，還是一個農民。』

『要是我們的戰事能不必再繼續下去的話，』林接着說，『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此地建立起自足經濟來。我們的預算非常細心地精密地製成，而每一種在可能範圍的節省都已做到。因為蘇維埃官員都是革命者和愛國者，所以我們不要薪俸，只求有飯喫，我們就可以生活，我們預算之微小也』

許要叫你吃驚。現在整個蘇區（註）每月的費用是三十二萬元，這數目代表着商品的價值，與貨幣的價值。在這總額中，有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得自沒收，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得自自願捐，包括在白區內擁護我們的人捐助的現款。其餘的稅源則來自貿易，經濟建設，紅軍土地和銀行貸與政府的款項等。」

據共產黨說他們已訂製了一個防止舞弊的收支預算的方法。我曾經讀過林伯渠的預算編製大綱的一部分，其中對於這種辦法和各種預防法都有詳細的說明。牠的完整是着重在收支的集體的控制。從最高機關到最低的組織單位村，各管理財政人員要把收支兩項向監察委員會說明。因此爲私利而偽造數目的事情是十分困難的。林氏對這種辦法覺得非常得意，並且確定在這方式下舞弊是完全不可能的。這也許是事實，但是無論如何，在蘇區裏，目前最重要的問題顯然不是舞弊的問題，而是如何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在那次會面之後，我不管林伯渠的愉快的樂觀主義，我在日記裏這樣記道：

『林伯渠的任何數字或者都是準確的。但當我們想起紅軍游擊隊在這作戰區域裏屢進屢退已有五年之久，而牠的經濟始終保持得住；蘇區裏沒有鬧過饑荒；所有農民都肯收受，並且信任蘇維埃的貨幣——當我們想起了這幾件事實時，我們覺得完全是中國的一個奇蹟。事實上不能單靠財政來說明，應該從社會的和政治的基礎上着想，方能理解的。』

『然而，目前的情勢卻非常嚴重，甚至連這個以那麼有限度的財源支持的組織也感受威脅，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在最近，蘇維埃經濟必須要有下列三種改變之一：第一完成一部分機械

工業化，供給必需的製造品；第二，建立與外界某些現代經濟根據地間的良好關係，或奪取比現在所有的較高經濟水準的經濟根據地，如西安或蘭州；第三，蘇區與現在在白軍管轄下的這一類根據地取得密切的聯絡。」

共產黨承認上列各點，但可沒有我那樣悲觀。他們說：『的確會找到一條出路，』而在幾個月之內，竟以『密切的聯絡』的形式找到了他們的『出路』！

附帶一句，在經濟上，林伯渠自身並沒有比人家富裕，作了一個財政部長他每月的『薪俸』是蘇維埃幣五元！

## 五 生活在五十歲開始

我叫他老徐——教育部長——因為蘇區裏的人都這樣叫他。雖然六十一歲正是東方各國最高政府官員的平均年齡，但在紅色中國裏，和別人比起來，老徐卻像一個年老的祖父了，然而他毫無龍鍾的老態，和他的同僚謝覺哉一樣（你時常可以看到這一對『白髮土匪』像中學生一樣手牽手的走着），他有力的步伐，明亮而愉快的眼睛，和兩條曾在長征中帶他渡過中國許多高山大河的健腿。

徐特立是一位受人家敬重的教授，在五十歲的時候，他竟驚人地拋棄他的家庭，他的四個孫子，

跟長沙一個師範學校校長的職位，而與其他的共產主義者共同賭他的命運。老徐是在一八七六年生于長沙，與彭德懷的生地相近，他是他父親的第四個孩子。他的貧窮的父親忍受一切的犧牲，竭力設法使他在私塾裏讀了六年古書，後來他做了一個滿清政府時代的教師。直到二十九歲的時候，他纔進長沙的師範學校，畢業後，當一個數學教員。

毛澤東就是他中學校裏的一個學生，他還有許多青年學生後來成爲共產黨員。在毛澤東能够分別共和派和專制派之前，老徐自己已經負起政治上的使命。直到現在，他還留着他在帝制時代與封建政治鬥爭的痕跡，當時他曾斷下一個小指，表示他誠摯要求政府把議會給予人民。在第一次革命以後，湖南暫時有了個省議會，老徐是省議員之一。

大戰後，他跟着『湖南工學代表團』到法國，在里昂讀了一年書，課餘時間就在當地的五金工廠做工，藉此維持自己生活。後來又在巴黎大學讀了三年書，教了幾個中國學生的數學，籌得他的學費。一九二三年他回湖南，在長沙創設了兩個新式中學，四年中積下了相當資產。一九二七年他纔成爲一個共產黨員，一個資產階級社會裏的被放逐者。

在國民革命時期中徐特立在湖南省國民黨內很活動，但他總同情於共產黨。他公開向他的學生講演馬克思主義。清黨之後，他便成了一個被注意的人物，他的行動不得不祕密起來，可是因爲他與共產黨沒有聯絡，他就不能不找尋他自己的世界。『我要做一個共產黨員，』他惘然地告訴我，『但沒有人來叫我加入，我已經五十歲了，我可確定共產黨一定認爲我是太老了。』但是有一天，一個共產黨員竟到他藏匿的地方尋他，要他進黨。這老匪徒這就大樂起來，他對我說，當時他想到在建立

新的天地的事業中他還有一點用處他竟感動得哭起來。

共產黨派他到蘇俄去，他在那裏讀了兩年書。回來之後，他祕密地偷越過江西的封鎖線，不久就成爲瞿秋白主持的教育部的副部長，瞿秋白被殺之後，執行委員會就委他代理部長的職位，從此他就成爲『老師』——教育部長。因爲他的多方面的豐富經驗——在專制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下生活與教授的經驗，他特別適宜於擔任現在這種工作。老徐是很有朝氣的，他始終不曾沮喪過。他努力在尋求新的經驗，以應付那些繁重的西方教育家所躊躇而不敢接近的工作。

有一天，在我們會談的時候，他很幽默地列舉他所碰到的困難。他肯定地說：『照我們所能估計的來說，事實上，在我們未來之前，整個西北除了幾個地主、官僚和商人之外，差不多沒有一個人有閱讀的力量。文盲大約要佔據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此地是世界上文化最最落後的地方之一。你想得到陝北和甘肅的民衆竟以爲水對他們是不利的這回事嗎？這裏普通人一生只洗兩次澡——一次是在出世的時候，一次是在他結婚的時候！他們懶於洗手、洗足、洗臉、剪指甲、腳甲、剪頭髮。此地是中國人留辮子的最多的地方。』

『但所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偏見都是因爲智識淺薄，而我的工作就是在智慧上開發他們。這些人比起江西來，真的落後得多。江西文盲雖也佔到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但文化水準卻比此地高得多，我們也有較好的物質條件以輔助工作的進行，並且又有許多比較受有良好訓練的教師。在我們的模範縣——興國，我們有過三百所初級小學和八百個教師——這數字就與現在陝、甘、蘇區所有的相等。當我們最近從興國撤退時，當地文盲已減到不足百分之二十！』

『這裏工作進行得非常慢。所有的事情都要我們從頭做起。我們的物質資源又受到很大限制。甚至自從我們的印刷機損壞了之後，我們現在一切的印刷品都不得不用複寫版和石印石來印刷。封鎖使我們感到紙張的缺乏，雖然我們現在已開始自己造紙，但紙質的惡劣到了極點。不過對於這種可不必擔心，我們已經能夠實施某種工作了。只要我們有時間，我們的成就就能够使全中國的人大喫一驚。我們現從民衆間訓練出了幾百個教師，我們的黨又在訓練別些人，其中有許多就要成爲民衆教育學校的教師。我們的結果告訴我們此地的農民只要給予機會，他們的求知慾是相當的大的。』而他們可不是呆笨的。他們學習得很快，而且只要說出充分的理由來，叫他們這麼做，他們立即把舊有的習慣改過來。在本地成立較早的蘇區裏，你不會看見纏腳小女孩了，同時你還可以看見許多剪了髮髻的青年婦女。男人們已慢慢地把髮辮剪去，有許多已跟青年們和少年先鋒隊學習讀書和寫字的技能了。』

這裏我要說明，在臨時的蘇維埃教育制度之下，有三個部分：學校的、軍事的和社會的。第一項多少歸各蘇維埃辦理，第二項歸紅軍，第三項則歸共產黨組織。他們最注重的是初級的政治常識——甚至小孩們開始學習認字時，就是認些簡單的革命標語，然後進一步唸些共產黨與國民黨、農民與地主、勞工與資本家間的矛盾的故事，其餘依此類推，大都是敘述青年團與紅軍的英勇，以及未來的蘇維埃——這世界上的極樂園的希望等文字。

學校教育方面，共產黨說已經成立了大約二百所小學，一所專門訓練小學教師的師範學校，一所農業學校，一所紡織學校，一所分爲五班的商業學校，和一所約有四百學生的黨校。所有這些學校

的課程，全部在六個月內完畢。

最着重的當然是軍事教育，這方面的工作，二年來雖然這個細小的被圍攻的國家發生了許多障礙，但是仍然獲得了很大的成績，蘇區內有紅軍大學和騎兵步兵軍校，這些上面已經說過。有無線電學校和實際上只訓練看護的醫科學校；有工科學校，在那裏初學者的確得到各種基本的技能。與整個蘇維埃組織的本身相同，一切都帶有臨時性質的，而主要的目的就是作為一種後方的活動，用以增強紅軍和增加牠的幹部。有許多教師甚至中學還沒有畢業，而最有趣的就是對他們所有的任何知識的應用都是集體的。這些學校不僅在意識上是共產主義的，就是在應用他們所有的各種極瑣屑的技術經驗，以『提高文化水準』這一點上，也是共產主義的。

在社會教育這方面，蘇維埃的主要目的也是政治的。他們沒有時間和機會來教農民們研究文學或園藝。共產黨都是些最注重實際的人。他們把簡陋的『識字』發給列寧俱樂部，青年團和游擊隊，並協助羣衆組織他們各自的自學團，而由共產黨員或他們中間的識字者領導。當少年們有時甚且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們，開頭誦讀那些短句時，他們自身就從那些文字裏吸收了新的思想。因此，當你走進山裏這些小的『社會教育中心』時，你就可以聽見這些人大聲地自言自語道：

『這是什麼？』

『這是紅旗。』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窮人。』

『什麼是紅旗？』

『紅旗是紅軍的軍旗。』

『什麼是紅軍？』

『紅軍是窮人的軍隊。』

就這樣唸下去，如果他最快地唸完那五六百個字，他就可以得到紅色書籤或鉛筆以及別的獎品。自然，這是一種幼稚的宣傳。然而當農民們和農民的孩子們女兒們讀完了那本書，非但這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能夠讀書，而且知道誰教他們，和爲什麼教他們。他們已抓住中國共產黨的基本鬥爭觀念了。

而且無論如何，我總覺得這種教法比之從『這是貓兒，這是老鼠』和『貓兒做什麼？貓兒捉老鼠』教起的方法要有趣得多。爲什麼要用寓言教給現實的人呢？

因爲要替民衆找尋一種更快的識字方法，共產黨開始運用拉丁化新文字於某種限度。他們應用了二十八個字母，據他們說，這些字母幾乎能夠拼出中國所有的發音，同時還印行了一本譯成拉丁化的文字中國簡易成語袖珍字典。紅色中華報有一部份也用拉丁化新文字印刷，老徐還在保安選擇的青年所組成的一班中，做實際的工作。他以為在大規模的民衆教育上，最後必須廢除複雜的中國方塊字。他還有許多的理由，是爲他這個已實行了幾年的教育方法。

對這些效果，不問是拉丁化的或是別的教育上的努力，徐特立毫無自詡誇大的地方。他說：『這裏的文化水準真是再低沒有了，因此我們自然有了相當的進展』。至於將來呢，他認爲只是時間問



題。同時他希望把研究集中在紅軍本身的教育方法上，他相信到那裏就可以看見真正的革命的教育。這簡直是海外奇聞。『作戰不忘學習』這口號對任何一種軍隊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但是紅色中國裏，牠卻能立即博得你的信仰。共產黨對我說，只要我到前方去就可以看出『作戰不忘學習』的成就來。不久我果真動身到前線去——然而我的動機並不是爲着要研究他們的教育方法而上前綫去的。

## 第七章 到前線去的途中

### 一 和紅色農民的一夕談話

我到甘肅的邊境和前線去，經過保安城外，就耽擱在農人簡陋的茅舍裏，睡在他們的土炕上（假使沒有舒適的板門可關時），喫他們的飯，跟他們交談。他們都是窮困而好客的馴良的鄉下人。有些人知道了我是個『外國客人』，就不肯要我付錢。我現在又想起一個要照料五六個孩子的小脚的老婆婆，他一定要把她的六隻小雞，殺一隻來請我。

我聽見她告訴我的一個同伴說：『我們不能叫一個洋鬼子在外面對人家說，我們共產黨不懂得規矩！』我知道她不會想到這是沒有禮貌的，因為她除了『洋鬼子』這含有侮辱性的字眼之外，實在無法形容我了。

當時跟我同行的是傅錦魁，他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員，蘇維埃外交部派他跟我到前線去。同後方所有的共產黨員的心理相同，他一聽到有機會與紅軍們會面，他就不禁笑顏逐開，把我當做一個從天而降的寶貝；然而同時他又直截爽快地認為我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以坦白疑慮的眼光監視我的全程。然而，他照料我真是無微不至，在旅行的時間內，我們便已成爲知己了。

有一天近黃昏的時候，到了陝北靠近甘肅省界的周家村，傅錦魁和我找到了一個宿處，住着五六家人家的，圍着棚欄的院子。一個年約四十五歲，要照顧一羣頑皮跳跟奔跑的孩子的農夫，很客氣

地允許接待我們。他給我們一間打掃乾淨的房子，土坑上鋪着新的毛氈，還把草料飼餵我的牲口。又賣給我一匹小雞和幾隻雞子，只要了二毛錢，房金他一定不要。他以前到過延安，見過外國人，但那住在一起的人統沒見過，所以所有的男人們，婦女們和小孩們此刻全都惶惶地好奇地圍攏來瞧一瞧。有一個孩子看見我這付怪相，竟然嚇得哭起來。

飯後，許多農民們到我的屋子裏來，送一些烟草給我，大家開始談起來。他們問我在我們國內有沒有牲口和五穀雜糧，是不是用羊糞做肥料。（有一個農民問我們那裏有沒有小雞，我們的主人便不屑地哼了一聲說：『有人的地方就有小雞』）再問我們那裏有沒有窮人和富人，有沒有共產黨和紅軍，解釋給他們聽，我們那裏只有共產黨而沒有紅軍，恐怕這一種解釋，他們是全不會了解的。

回答了他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之後，我便提出我自己的幾個問題來問他們。他們對於紅軍的態度是怎樣呢？他們立刻抱怨地說軍馬的食量太大。據說紅軍大學最近搬移騎兵部時，曾經在這村裏停留過幾天，結果幾乎把他們所有的稻草、豆子都喫個光。

傅錦魁問：『他們不出錢嗎？』

『是的，是的，這不成問題，他們都出錢買的。可是你曉得我們只有那麼幾擔雜糧和稻草，夠我們自家用，雖然也許還賸點兒，我們還沒有過冬呢。來年正月裏合作社賣給我們嗎？那我們可就不知道，蘇維埃票子能夠買什麼？連鴉片也買不到！』

這幾句話是一個衣衫襤褸的拖着一條辮子的老頭兒所說的，眼睛無神地掛下，沉鬱裏望着他的刻着許多皺紋的鼻子，跟那支長約兩尺的旱烟筒。他在訴說的時候，青年們都切切地私笑。傅錦魁

承認他們買不到鴉片，然而他們在合作社裏可以買到一切必需品。

『現在我們可以買嗎？』我們的主人問，『我們可以買到跟這一樣的碗嗎？』他拿起我那隻從西安買來的，價廉的紅色電木碗（我想也許是日本貨）。老傅他承認合作社裏沒有紅碗賣，可是他說牠們有很多很多的五穀、布匹、石蠟、洋燭、針線、火柴和油鹽。他們要買些什麼呢？

『我聽見人家說，一個人最多只能買六尺布，現在還是這樣？』一個農民在問。

老傅對於這情形不十分清楚，他以爲布匹本來是極充足的。於是他捐出他的看家本領，抗日的主張來，他說：『談到生活，那你我是同樣的苦的，紅軍是在替你們這班農民們工人們爭鬪，在日本和國民黨進逼下保護你們。如果你們常常買不到夠用的衣料，買不到鴉片，然而你們用不到納稅，這是一件事實是不是你們不欠地主的債，你們不會喪失你們自己的房子和田地，是不是那麼，老哥，你喜歡白軍呢，還是喜歡我們紅軍呢？——你們只要想，白軍拿了你們的糧草可是給的是什麼呢？』

說到這裏，所有的怨苦好像全部消除了，所有的意見也就歸一致。『我們的確不喜歡白軍，老傅的確不喜歡！』我們的主人同意地點着頭說。『要是隨我們揀選，那麼我們一定選紅軍，我有一個孩子就是當紅軍，是我送他去的。這是那一個不贊成呢？』

我問他們爲什麼喜歡紅軍。

在回答我的問題時，那個剛纔不滿於合作社沒有鴉片賣的老頭兒，發揮了他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說。

『白軍來後的情形怎樣呢？他們要那麼多的糧食，錢呢，哼！一個字兒都沒有。要是你不肯的話，就

把你抓起來，說你是共產黨。要是都給他們呢，我們可就沒有錢繳租！繳不起租，好！他們把我們的牲口牽去賣。去年，紅軍不在這兒，白軍回來的時候，他們牽了我的兩條騾子和四口豬去。騾子值三十塊一隻，豬都是我自已餵養大的，一口也值得兩塊錢。他們給了我什麼呢？

「破喲，後來不得了啦！他們說我欠了八十塊捐稅。把這些牲口作價抵除四十塊錢，他們還要我找四十塊！我到那裏去設法這筆錢？我所有的東西都讓他們搶光了。他們就迫我賣我的女兒，這是真的！在此地我們許多人都逼得這樣幹的。那些既無牲口又無女兒的人，就押在保安的監牢裏，活活的凍死……！」

我問這老頭兒有多少地。

「地？」他啞着聲音淒切地說；「那邊就是我的地，」他指着那生滿着豆子、小米和青菜的小土坵，恰巧在我們院子隔河對過。

「多少地價呢？」

「除了水田這裏的地不值錢，」他說。「像那樣的小山，費了二十五塊錢就可以買到。值錢的東西是騾、羊、豬、雞、房屋和傢具。」

「那麼你這一塊地值多少呢？」

他仍舊不肯說出他的地值多少錢。「只要一百塊錢就可以買到所有的財產：我的房子、牲口和傢具——連那座小山都在內。」這是他最後的估價。

「你那塊地要繳多少租稅呢？」

『四十塊錢一年！』

『在紅軍沒有來之前吧？』

『是的，現在我們不再納稅了。然而誰曉得下年的情形呢？紅軍一跑開，白軍就趕緊回來。一年紅軍，一年白軍。白軍一到，他們說我們是赤匪。紅軍一到，又說我們是反動分子。』

『然而就在這一點上已經不同了。』一個年青的農民搶着說：『假如我們的鄰居說我們沒有幫助白軍，紅軍也就滿意，什麼也不同我們難過。然而假如要我們只有一百個誠實人的名字，而沒有一個鄉董的名字時，白軍可仍舊把我們當赤匪！這不是真的嗎？』

那老人點點頭。他說白軍最後一次光臨時，就把剛在山那邊的一家貧農殺個精光。因為那家人不肯說出紅軍藏匿的地方。『從那一次起，我們都帶着牲口逃難，離開這裏。回來是跟紅軍一起回來。』

『要是白軍又回來了，你還會逃嗎？』

『哎喲！』一個長着長頭髮，而牙齒卻很整齊的老頭兒叫起來。『這一次我們準得逃走的，他們會殺我們！』

他起始敘述他的村人們的罪孽。他們參加窮人會，他們選舉區蘇維埃，他們把白軍的行蹤告訴紅軍，有二個人的兒子當紅軍，另外一個人的兩個女兒進看護學校。這些不是罪孽麼？他保險只有一樁他們一定會給槍斃的。

然而現在一個光着一雙脚的十多歲的孩子站起來，忘記了洋鬼子也在座，懇切地辯論着說：『公公，你以為這些是罪孽嗎？這些是愛國的行動！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幹呢？不是因為紅軍是我們窮

人的軍隊，爲我們的幸福而打仗？」

他熱烈地繼續着說：『我們周家從前有過義務學校麼？在紅軍沒有帶給我們無線電收音機以前，我們聽得過世界上的一切消息沒有？那個曾經告訴過我們世界是怎樣的？你說合作社裏沒有布賣，然而從前有過一個合作社麼？至於你的田地呢，又不是大半押給那姓黃的傢伙？我的姊姊三年前餓死了，但是從紅軍到了這兒，我們不是都有足夠的食糧吃飽我們肚子麼？你說日子難過，然而我們這班年青人，要是認識了字會讀書，我們覺得這日子一點也不苦，有一天我們少年先鋒隊會使來福槍，去跟那些漢奸和日本人拚命，這日子真過得有趣呢？』

他確實提起過日本和『漢奸』那些以爲一般的中國農民對於日本的侵略是無知（不是不關心）的人，是根本不會相信的。但我可當真從那些農民口中聽見過，不僅是從共產黨員的辭句裏，共產黨的宣傳已經有非常普遍的印像，連許多居住在山鄉裏的思想文化落後的人都相信他們馬上就有變爲『日本矮鬼』的奴隸的危險。

那個激昂的年青人坐下去，他幾乎透不過氣來。我看看傅錦魁，笑容湧上他的臉。有許多個農民同意地叫好，但大半只默默地微笑着。

一直談到快九點鐘光景，早過了上床睡覺的時間。而最使我感到有玩味的，就是農民們好像一點也不懼怕傅錦魁，這位共產黨的『官吏』。他們似乎把他當作自家人——而他呢，真的也是一個農民的兒子。

末一個離開我們的，是那個拖着辮子，嘮叨而專門訴苦的老頭兒。他走出門的時候，他又靠着門

低地對傅說：『老同志，保安有鴉片麼？現在，還買得到嗎？』

他走開了，傅錦魁厭惡地轉身對我說：『你相信嗎？』他問：『這老傢伙是此地窮人會的主席，而他還要買鴉片！這村子真迫切地需要更多的教育工作。』

## 二 蘇維埃工業

離開了保安向西北走了幾天的路程，我停留下來訪問吳起鎮，這是陝西蘇維埃工業的中心。吳起鎮之所以著名，並不是因為牠在工業科學上有什麼動人的成就，像美國的底特律或英國的曼徹斯特一樣的成就，只是因為牠是那裏獨一無二的工業城鎮罷了。

在牠四周幾百哩之內，只是半畜牧的地帶，人民的生活與他們幾千年前的祖先是一樣，住在洞穴式的屋子裏，許多人還留着挽在頭上的髮辮，唯一交通工具是馬、驢和駱駝等能負重的牲口。這裏人們點燈用菜油，蠟燭是一般普通人所不用的，電燈是無人知道的东西，而外國人的稀少，簡直如在非洲的愛斯基摩人。

在這過着中世紀生活的世界中，突然發現了蘇維埃的工廠，看見了許多機器在轉動，許多工人忙碌地在生產紅色中國的貨物和工具，這實在是使人驚愕的事。

我知道共產黨在江西時，曾不顧巨艱（缺乏海口，遭受封鎖，以致與現代一切重要工業根據地相隔離），而創設了幾種茂盛的工業，譬如他們開採中國蘊藏量最豐富的鎢礦，每年的產額約一百萬磅，並且偷偷地賣給陳濟棠將軍所經營的廣東鎢砂專賣處。設在瑞金叢山中的中央蘇維埃印刷



廠僱用了八百個工人，印刷許多書籍、雜誌，和一家大規模的『全國性』機關報——紅色中華日報。在江西還有紡工廠，和小規模的機器製造廠。各種小工業生產的出品足以供給他們簡單的需要。共產黨說他們在一九三三年曾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的『對外出口貿易』。這些出口貨大部分是由南方負着極大風險的商人經手販運的，他們偷過廣東的封鎖線，因此獲得了厚利。然而製造品的大部分還是手工業和家庭工業的出品，而由各生產合作社所承銷。

據毛澤東報告（註）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蘇維埃一共有千四百二十三家『產銷』合作社。國際聯盟調查員的證明文件也說共產黨在這集體經營的方式上是有相當成就的——甚至在他們的政權還未得到穩固的時候。國民黨本身也想在華南仿效這種集體經營的辦法，然而在絕對放任的資本主義底下，要實行這種合作制度，如果非完全不可能，便是極度的困難。

但在西北，我完全不曾想到有什麼工業存在。共產黨在這地方碰到比在南方更大的困難，因為在蘇維埃建立之前，這裏連小規模的機器工業都沒有。在整個的西北，包括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和綏遠各省，牠的面積幾乎等於全歐，連俄羅斯也包括在內，而機器工業的投資總額，的確還比不上一個大工廠——例如福特汽車公司——的一組大機件的價值。

西安和蘭州有幾家規模很小的現代工廠，但大部分還是靠着遼遠的在東部的幾個較大的工業中心。假如從外面能夠輸進技術與機械，大規模的工業在西北一帶纔有發展的希望。如果西北兩

（註）見紅色中華毛澤東主席對蘇區發展的報告（頁二六）。

個大城市——西安與蘭州的情形是這樣的，那麼佔領了甘肅、陝西和寧夏各省比較更落後的地域的紅軍，其所達到的困難當然更不必說了。

國民黨封鎖的目的不用說使蘇維埃政府無法從外面輸進機械和技師。關於後者，共產黨說現在他們還有很充分的供給，機械與原料反而是比較嚴重的問題。紅軍曾經爲了幾架車床、幾架織布機械引擎與礦鐵等跟國民黨打過幾次仗。當我在那兒時，該處所有堪稱爲機械的東西全是『搶奪』來的。譬如，去年進攻山西時，他們奪得了不少機器、工具和原料，而這些戰利品全用騾子馱載，越過陝西境內那綿延不絕的山脈，運回他們那奇特的，挖在山裏的洞穴的工廠裏去。

南方的共產黨一到西北之後，就興起了『工業的繁榮』。他們隨軍帶來了許多車床、迴轉機、提淨機、鑄模機等，這些東西都跟他們走了六千英里的路程，經過了世界上最難行的道路。他們又帶來了十幾架的勝家縫紉機，現在就依賴這些機件設立了好幾個縫紉工廠。他們從四川的赤色區裏帶來銀子和黃金，又帶來了石印石和小型的印刷機。共產黨對於馬和騾子都很愛惜，尤其是對那些跟他們從南方馱載了重擔的有力的牲口們，這當然是無用奇異的。

我在蘇區時，蘇維埃工業包括保安和河連灣（甘肅省）的縫衣廠、軍服廠、製鞋廠和造紙廠，靠近長城的定邊的毛氈廠，出產中國最價廉的煤炭（註）的永平（在延安附近）的探礦工業，和其他幾縣的毛織廠和紡紗廠——所有這些工廠都沒法能生產足夠的物品，以供甘肅、陝西、蘇區四百家合作社的需要。據國民經濟委員毛澤民所說，現行『工業計劃』的目標，是在使紅色中國在『經濟上自足自給』——就是加強到在國民黨嚴密封鎖下也能生存，假如南京政府拒絕接受共產黨

提出的『聯合戰線』的建議，而廣續進行內戰的話。

最大和最重要的蘇維埃國營企業就是鹽池——在甘肅邊境沿長城的大鹽湖——的精鹽工廠和永平延長的油井。後者生產汽油、揮發油、凡士林、白蠟、蠟燭和其他的副產品。鹽池的藏量是中國最豐富的，牠生產了巨額的潔白的晶鹽。因此各蘇區的食鹽比中國其他各地價廉而充足。紅軍佔領鹽池之後，即突破了國民黨對全部鹽產的壟斷，允許長城以北的蒙古人分得一部分食鹽，因之很得他們的好感。

中國僅有的陝北的油井，以前各井的出產是賣給一家美商公司，這公司還租借了油區裏其他各藏油池。紅軍佔領延安之後，又添掘了兩個新的油井，據說現在永平與延長產油量已比在『土匪』的統治下的任何時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這就是說，在三個月期間內，增加了『汽油二、〇〇〇斤，一等油二五、〇〇〇斤，三等油一三、五〇〇斤』。(註一)

此外尚努力利用剷除了罌粟花的田地上種植棉花。共產黨在安定創立了一所紡織學校，每期招收女生一百名。這些工讀的女生每日上普通課程三小時，其餘五小時研究紡織。三個月前，全部課程完畢，各女生被派至各區主持開設紡織廠，毛澤民曾說『二年以後，陝北全部衣料即可自給』。(註二)

(註一)蘇區煤炭售價，每八百斤(約合半噸)售洋一元。見陝西保安出版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門爭中毛澤民氏所撰陝甘蘇區的經濟建設一文。

(註二)見上註。  
(註三)見上註。

至於吳起鎮則爲蘇區產業工人最大的集中地，而且又因牠是紅軍主要兵工廠的所在地，所以更覺重要。這裏控制着一條到甘肅去的重要貿易路線，而在附近的兩個舊堡壘的廢墟，已證明牠是在先前軍事上的重要據點。現在的吳起鎮是高高地建築在一座峻峭的泥堤上，下臨急流，鎮上有一半是『洋房』——陝西土著對有四壁和一面屋頂的房子名字——一半則是『窰房』。

我到吳起鎮已經入夜，人是非常疲乏。供給前線部隊的給養委員會的領袖事前已接到我來來的消息，所以他騎馬出來接我。他把我安頓在一所土人的『列寧俱樂部』裏——這是一間泥地的『窰房』，有着乾淨和粉刷的牆壁，屋內懸着一幅不朽的列寧肖像，四周圍着以彩色紙條綴成的綵飾。

熱水，乾淨的毛巾——上面印着『新生活』的標語——肥皂立即擺上來，隨後便是一客豐盛的晚餐，還有烤得很到家的麪包。我方感覺到舒適。打開行李，把牠鋪在一張兵兵棹上，我燃起了一支香烟。然而人到底是一種難以滿足的動物。所以我雖受到闊綽和殷勤的招待，我還渴慕着美好的飲料。

真是出人意料之外，這位給養委員竟拿來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弄來的——一些濃冽的咖啡和白糖。吳起鎮真堪使我懷念。

『我們的五年計畫的生產！』給養委員笑起來。

『你意思是你們的沒收部的出產吧？』我替他修正着。我想那裏一定還有水果，因爲一切過分的享用品那裏是全備的。

### 三 『他們唱得太多』

我在吳起鎮耽擱了三天，訪問在工廠裏做工的工人，『考查』他們的工作條例，參觀他們的戲院，參加他們的政治討論會，閱讀他們的壁報和原稿，與他們談話，還跟他們作一次體育競賽。在吳起鎮三個體育場中的某一個場上，我們臨時湊成一隊籃球隊，由外交部的交際員傅錦魁，一個英文專修學校學生現在政治部工作的青年，一個紅色醫生，一個兵士和我五人組成。兵工廠的籃球隊接受我們的挑戰，結果我們被打得一敗塗地。

那些兵工廠的工人會造槍械，又會打球。我曾經在他們那不經見的工廠裏住了一天，並且在他們的『列寧俱樂部』裏吃過飯。

這兵工廠，與紅軍大學相同，是隱藏在一排挖在山洞裏的穹形的房子裏。房子全都陰涼，很通氣。光線從一排與牆壁成角度鑿穿的斜洞裏射進來，而最大的好處則在牠全不怕轟炸。在廠裏我看見一百以上的工人在製造手榴彈、迫擊砲、手槍、小礮、彈藥以及少許傢具。修理部則在修理損壞的來福槍、機關槍、自動步槍和輕機關槍。然而兵工廠的出品很拙劣，大半是武裝游擊隊員所使用，紅軍正規軍的槍械與彈藥，幾乎全數都是從敵人那裏俘獲來的。

兵工廠的廠長何錫揚領我參觀廠裏各部分，給我介紹廠裏的工人，還簡略地把他們和他自己的情形告訴我。他今年三十六歲，沒有結婚，日本侵佔東北之前，是著名的瀋陽兵工廠的技師，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後，他跑到上海，就在那裏加入了共產黨，後來再到西北，祕密地偷進蘇區，廠裏的機師

大半是外方人，有許多曾經在中國最大的漢陽鐵廠做事，有幾個則爲廣東兵工廠的職員。我曾會見兩個年青的上海機師和一個裝配專家。這位裝配專家曾把怡和洋行、慎昌洋行和上海電力公司等著名的英美商的公司，竭力推薦信給我。另外一個會做過上海某機械工廠的監工。此外還有從天津、北平和廣州來的機師，有的竟是跟隨紅軍一起西征。

我知道兵工廠一百一十四個機師和工人裏，只有二十個人結過婚。這些人同他們的家眷同伴在吳起鎮，妻子們不是工人便是共產黨的職員。在兵工廠工會裏——這可以代表蘇維埃區裏的最熟練的工人，黨員的百分比非常高，共產黨員或青年團員佔據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吳起鎮，除兵工廠外，還有幾家織布和制服工廠，一家鞋廠，一家襪廠，和一家由一個醫生主持的藥房兼配藥處。他是一個青年，不久才從山西醫校畢業，他那位年青美麗的太太常看護。他倆都是在去年冬天紅軍進入山西時加入紅軍的。附近還有一家由三個軍醫主持的醫院，收容的大部分是受傷的士兵。此外還有一個無線電臺，一間設備簡單不全的實驗室，一家合作社，與紅軍的供養總部。除兵工廠和制服工廠外，其餘各廠的工人大半是年齡在十八歲至二十五歲或三十歲之間的青年女工。其中有幾個已嫁給當時正在前線工作的紅軍，他們幾乎全是甘肅、陝西和山西的女人，頭髮一律剪去。『同等工作，同等待遇』這是中國蘇維埃的一句口號，據此，對於女工的工資諒無差別。工人的經濟待遇似乎比蘇區裏任何一種人都高，連紅軍指揮也比不上他們，因爲紅軍指揮員得不到有定額的薪金，只分到爲數很小的一筆生活費，而這生活費還要以財政的情形來決定。

美貌的劉羣先女士，今年是二十九歲，以前是無錫和上海的紗廠工人，牛蘭 (Rhena Prohm)

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學生，現在是紅色工會女工部的主任，總部就設在吳起鎮。劉女士把工人的狀況告訴我。每個工人每月可得十元到十五元的工資，膳宿概由政府供給。工人們都得到免費醫藥和撫卹傷害的保證。女工產前與產後有四個月的休養期間，工資照數拿到，還有一家收容工人的小孩的設備簡陋的『育兒院』。然而這裏所收容的小孩大概都是還不能走動。母親們可以得到她們應得部分的『社會保險費』。這保險費是從每月工資中扣下百分之十，加上政府津貼的同等數目而成的。政府並且補助與總工資百分之二相等數目的款項，作為工人們的教育和娛樂的費用。這些基金全由工會和工人的工廠委員會共同負責保管。那裏實行八小時的工作日和六天的星期週。我訪問他們的時候，各工廠日夜開工二十四小時，工人分為三班工作，大概可算是中國最忙碌的工廠。

所有關於工廠管理，工人待遇等事情，也許可以說是很進步的，雖則或許與共產主義的理想還相差甚遠。然而這些條件，在蘇維埃為爭取生存的鬪爭中猶能實行，實在是非常使人感到有趣味的。他們所實行的因陋就簡，那全是另外一問題！他們有俱樂部、有學校、有寬敞的宿舍，但是都在泥地的窰房裏，他們沒有淋浴，沒有電影，也沒有電氣設備。公家供給他們膳食，但吃的卻只是小米、蔬菜，有時間或有羊肉，然而大都是味同嚼蠟的東西。他們雖然可以領到以蘇維埃貨幣支付的工資和社會保險費，但他們能夠買到的物品卻全限於種類與數量都很少的必需品！

一般的英美工人會這樣說，『難受呀！』但對這些人，卻很顯然地不是這樣。你應該把他們的生

活跟中國其他各處所運用的制度對照一下，纔會了解牠的原因。譬如，我想起了在幾百家工廠裏，那

裏有許多未成年的男女童工坐着或站着做工，每日工作十二、三小時，到了倦極的時候，就倒在髒污的棉絮上，這是作爲他們的臥牀，在他們的機器底下熟睡起來。我又想起了絲廠裏的小女孩，紗廠裏面的無血色的青年女工——所有這些人，與上海大多數的契約工人一樣，成爲實際的奴隸而出賣他們所有的勞力，做了四年或五年，如果得不到工廠當局的特許，不論白天與黑夜，始終不能脫離那嚴密的監視和高聳的圍牆。我又記起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上，河裏，水溝內發現的二萬九千多具的屍屍——這些就是萬分窮困者的，和他們所無力養育的那些餓死溺死的嬰孩或幼童的屍體。

但是，這些吳起鎮的工人們，不管設備如何粗劣簡陋，他們過的畢竟是一種康健的，有新鮮原野空氣的，自由的，高貴而且富於希望，又有發展的生活。他們知道沒有人剝削他們；我以為他們一定都能感覺到他們都是爲了他們自己，爲了中國而工作，同時可以說他們都是革命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懂得他們爲什麼那樣勤懇地專心地每天化上兩小時的時間去讀書寫字，上政治研究課，參加戲劇團體，爲什麼那樣激烈地競爭那贈與組間或個人間的，對於運動、識字、公共衛生、壁報和『工廠效率』等競賽勝利者的那貌小不堪的獎品。所有這些事物對於他們都是現實的。都是以前從沒有知道的，也都是中國其他各地一切的工廠的工人所夢想不到的東西，因此他們對那爲他們利益的生活方式，似乎很感到愉快感謝。

然而，所有這些事實都很難使像我這類的中國通所能相信，而關於牠的最後的意義，我仍舊很迷惘疑惑，然而我可是不是一筆抹煞我親眼目睹的一切事實證據。這裏篇幅不允許我列舉所有的證據，我本來是應該敘述很多很多和我會談過的工人們的故事，徵引從壁報上節錄下來的文章和



批評——這些是質樸地用白話文寫成的，有許多我已靠了那位英文專修學校的學生的幫助而翻譯過來——同時敘述我所參加過的政治討論會，看過的這些工人自己所創造的和排演的戲劇，以及一連串難以言喻的小事情。

寫到這裏，我又忽然記起這類『小事情』的某一件來。我在吳起鎮會見一位電氣工程師，一位卓然特出的非常嚴肅的共產黨員，他叫朱兆祺。他精通英、德文字，是一位電學專家，他曾經寫過一本關於電氣工程的教科書，這本書在中國採用極廣。他從前在上海電力公司任職，後來到慎昌洋行做事，直到最近，在華南擔任顧問工程師與效率師之職，每年有一萬元的進益。而他畢竟拋棄職位，離開家庭，跑到陝西這荒涼陰沈的叢山中來，毫無代價地爲共產黨服務。這豈非令人難於置信的事！這事件的起始是因爲他敬愛的祖父，一位寧波著名的慈善家，在臨終時囑咐年青的他『獻身於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的事業』。他認爲最迅速達到這目的的辦法就是走共產主義這條路。

我想朱是以殉道者與虔誠的宗教家的精神，走上這條多少會有浪漫性的道路來的。這在他是一樁至高無上的事業，他以爲如此做會早死，而他也希望每一個人都像他一樣想法，然而我以爲當他發覺他認爲是那種種粗俗的娛樂竟會那樣多，而每個人顯然都很欣悅時，他多少要感到驚異。我曾經過他有何感想，他正經地回答說，他只有一個嚴格不變的批評：『他們唱歌，費的時間太多！』他說：『現在還不到唱歌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批評總括了蘇維埃陝西這個獨一的『工業中心』裏，許多熱情而近乎放縱的現象，然而他們卻具有社會主義工業的精神，就是在原料缺少的時候，也是如此！

## 第八章 在紅軍中（上）

### 一 「真」的紅軍

在甘肅寧夏一帶走了兩星期山路和曠野之後，最後我達到了豫旺壩。這是寧夏南部的一個有城牆的大城，那時候是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總司令是彭德懷。

雖然在嚴格的軍事意義上，一切的紅色戰士，都可以被叫做「非正規軍隊」——有些人叫牠做「高級非正規軍隊」——但是紅軍自己，對於他們的主力軍、獨立軍、游擊隊、農民赤衛隊等等是有鮮明的區別的。我在陝西的第一次短期的旅行中，我沒有看見過任何「正規的」紅軍，因為它的主要隊伍，那時候正在離保安約二百哩的西面活動。我已經打算到前綫去參觀一次，但是蔣介石正在準備從南方舉行另外一次的大攻擊的消息傳來，動搖了我的計劃，而想早作歸計，雖然這時候我還可以通過戰綫，去寫我的故事。

有一天我對吳亮平表示了這些疑惑。他是年青的蘇維埃官吏，我同毛澤東的長時間談話裏的譯員。雖然他是一個雙頰如玫瑰色的二十六歲的少年，他已經是兩本關於辯證法的書的作者。我覺得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除了辯證法之外，他對於每種東西都有一種幽默之感。我認他是我的好友，爽直地把我的疑慮告訴了他。

這很使他驚奇，說：「你有一個機會到前綫去，現在你卻懷疑到應不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快不要

犯這樣的錯誤吧！蔣介石企圖消滅我們已經有十年了，他現在是決不會成功的。沒有看到「真」的紅軍，你不能回家的！他提供了我許多不應該失掉這個機會的證據。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只是到前綫去這一個觀念，就引起了他這樣的熱情，他是一個飽受風霜的布爾什維克，是「長征」的老手。我斷定那裏必定有些東西可看的。所以我就作了這次的長途旅行，安全地達到了吳亮平的「真」的紅軍所活動的區域。

我接受了他的勸告。這是一件好事。倘使我不是這樣做，我就會離開保安。而仍舊不瞭解紅黨怎樣獲得了他們那種難勝的威名的。我仍舊不會瞭解正規紅軍的青年精神、訓練、紀律、優良的武器，特別是它的高級政治認識。我會離開這裏而仍舊不明白，這就是中國唯一的政治上的鐵打成的軍隊。統計也許是瞭解這些所謂赤匪的最好方法。因為我發現紅軍對於他們的正式入伍的士兵，是有詳細資料的，我在下面所提供的事實，對於我十分有趣和重要，都是楊尙崑從他的檔案中供給我的。楊尙崑是一個能說俄語的青年，二十九歲，是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除了少數的例外，我只用我有機會從個人印象和觀察證實的事情來證實這些統計報告。

第一，許多人都以為紅黨是飽嘗辛苦的一羣不安分守法的分子。我自己以前也有這一種模糊的觀念，但是我不久就發覺我是絕對錯誤的。紅軍中的絕對多數是由青年的農人和工人組成的，這些人相信他們自己是爲了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土地，以及他們的祖國在戰鬪。

據楊說，兵士們平均的年齡是十九歲，這是很可以相信的。雖然有許多士兵已經作戰了七年或八年，甚至於十年，但他們被一大羣只有十幾歲的青年所平衡起來了。而且許多「老布爾什維克」即

那些身經百戰的老戰士，現在也只有二十多歲，他們大多數是做少年先鋒隊而加入紅軍，或者是在十五、十六歲就入伍的。

在第一方面軍中間百分之三十八的士兵是從農業勞働階級（包括手工業者，脚夫，學徒，長工等）或工業勞働階級來的；百分之五十八自從農民階級來的；只有百分之四是從小資產階級——商人的子弟，知識分子，小地主等來的。在第一方面軍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包括了軍官們，是共產黨員和共產青年團員。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士兵是識字的。這就是說，他們能夠寫簡單的信件、文章、標語和傳單等。這個比白區中的普通軍隊的平均數高得多。比西北的農民階級的平均數，是更高的。紅色士兵，從入伍的第一天起，就開始讀紅黨課本、學識字，這些課本是專門為他們編輯的，讀書進步快速的，黨又頒發獎品、價廉的筆記本、鉛筆等，但是這些東西對於士兵是很有價值的，又用了極大的努力激起讀者好勝和競爭的精神。

紅軍士兵與他們的長官同樣，是沒有正式的薪水的。但是每一個入伍的人，有權利享受他的一份田地，及從這塊田地所得到的一些收入。這塊田地，在他不住的時候，是由他的家人或本地蘇維埃替他們耕種的。倘使他不是蘇維埃區域的住民，他的報酬，是從由大地主沒收來的「公田」收穫的淨益中提出一份來給他，牠也是紅軍給養的重要來源。牠是由本地蘇維埃村民耕種的，這種工作是義務的，但大部份農民，在土地的重行分配時享受了利益，對於保護這種已經改善了他們生活的制度，都是極情願合作的。

紅軍軍官的平均年齡是二十四歲。這包括隊長以上一直到軍長的各級軍官。這些人雖然都很年輕，但是他們平均每人都有八年的戰鬥經驗。連長以上的軍官都認識字。可是我遇見好幾個人他們在投入紅軍以前，並沒有學習過讀書和寫字的。三分之一的紅軍軍官是以前國民黨的軍官。他們有許多是黃埔軍官學校（蔣介石的軍官訓練學校）的畢業生。還有許多是莫斯科紅軍大學的畢業生，張學良的東北軍舊軍官，保定軍官學校的學生，以前的國民軍（基督教將軍馮玉祥的軍隊）的軍官，和一些從法國、蘇俄、德國和英國回來的留學生。我只遇見過一個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紅軍從來不叫他們自己爲「兵」的，這在中國是一個可憎的字，他們是自稱爲「戰士」的。

大多數紅軍士兵及軍官都沒有結過婚。有許多人是一「離了婚」的，這就是說他們已經離開了他們的妻子和家庭。在有幾種情形之下，我很懷疑這種離婚的欲望，多少與他們參加紅軍有些關係，但是這只是一句笑話罷了。

在路上及在前綫許多談話中，我的印象是一半以上的紅色戰士，還是男童子。只有很少的女共產黨員在前綫中和軍隊一起，他們本人都是蘇維埃的職員，或者是嫁給蘇維埃的官吏的。

我所看到和我所聽到的，紅黨對待農民婦女都是很尊敬的。農民對於紅軍的道德也似乎很信託的。雖然我從有些南方來的兵士中間聽到他們談及怎樣離開了情人的故事，我從沒有聽見過一椿奸淫或侮辱農民婦女的事件。紅黨是很少吸煙或喝酒的。節省是紅軍八條紀律之一。雖然對於這兩種惡習慣沒有特別處罰。但是我們壁報上的「黑欄」中，看見了對於習慣的吸煙者幾種嚴厲的批評。酒是不禁止喝的，但是不鼓勵喝的。「喝醉酒」這件事，我幾乎是從來沒有聽到過的。

總司令彭德懷，他從前是一個國民黨的將領，告訴我說：紅軍戰士的極端年青，說明了他所以能夠抵抗艱苦的大部份的原因。這是很可以相信的，這也使女性伴侶的問題，不是十分急切需要。從一九二八年，他率領了國民黨軍隊叛變，參加紅軍的時候起，彭氏自己就沒有看見過他的妻子。

紅軍軍官作戰的死傷率是很高，旅長以下的軍官，都是與士兵共同作戰的。一位外籍軍事隨員說：有一件事，可以單獨說明紅軍和廣大優勢的敵人作戰的能力。這件事就是紅軍軍官習慣着說：「跟着我來，孩子們！」而不說：「向前去，孩子們！」在南京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最後肅清戰爭中，紅軍軍官的死傷率通常是高到百分之五十。但是紅軍實在受不了這樣的犧牲，以後乃採取一種戰術，傾向於多少減少有經驗的指揮官的生命危險。但是在第五次江西圍剿的時候，紅軍軍官的死傷率，還達到百分之二十三。在今天你能在赤區中看見許多關於這種事實的證明。普通所看見的景像，是一些年紀在二十二三歲的青年們，缺少了一隻臂膊或一條大腿，或者手指被擊落了，或者在頭上或軀幹上留着很難看的傷痕——但是他們對於他們的革命，仍舊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在紅軍的各種隊伍裏，幾乎中國的每一個省分，都有它的代表者。在這種意義上，或者可以說，它是中國的唯一的真的「民族」軍隊。牠也是「征途最遼闊」的軍隊。有經驗的軍官學生，足跡走過十八省的地方。它們比任何其他軍隊，有着更豐富的中國的地理知識。他們在長征中，發現了以前的中國地圖完全無用。紅軍畫圖員重新畫了好四千里地的地圖，特別是在苗族居住的地帶和西方邊疆區域。

第一方面軍，大約有三萬多人，內中南方人有很大的百分率，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從江西、福建、湖

南和貴州來的。有百分之四十是從四川、陝西、甘肅等西方省分來的。第一方面軍裏有一些未開化的民族——苗族和獯獯，此外它還有一支新組織起來的「回民紅軍」。在獨立的隊伍裏，是本地人的百分率較爲高些，平均是佔總數的四分之三。

從最高級的指揮官，到下級士兵，他們的衣食完全是一樣的。可是團指揮以上，有資格用一匹馬或一匹驢子。我看到他們對於各種能夠得到的好食物，都是平分享受的。這主要表現在西瓜和梅子這類東西上。指揮員與士兵的住處，很少分別，他們自由地來往着，不需要任何形式上的禮貌。

有一件事使我迷惑的，就是紅黨們怎樣地處理他們的給養衣着和武裝他們軍隊的。我以為他們會和許多其他軍隊一樣，必須完全靠搶劫來生活的。像我上面已經說過，我發現這種猜想是錯誤的，因爲他們佔領一個地方之後，他們就立刻着手建設他們自己的一種自給經濟。這一件事就能夠使他們守着一個根據地，不怕敵人的封鎖。我對於中國無產階級的軍隊，能夠在一種餉銀分到幾乎不能夠使人相信的數目之下生活下去，也是不瞭解的。

首先，紅黨們完全沒有武裝生產的工業；他們的敵人就是供給武裝的主要泉源。這些年來，紅黨們總是把國民黨軍隊叫做他們的「輸送隊」。紅黨聲稱，他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槍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軍火，都是從敵人手裏奪來的。倘使這是使人很難相信的話，我能夠以我眼見的事實做證據。據我所看見的正式的紅軍，都武裝着最新式的英國捷克斯拉夫的、德國的和美國的機關槍、來福槍、自動來福槍、毛瑟槍、過山礮等，這些都是大批地賣給南京政府的。

我看見的紅軍所用的唯一的俄國製造的來福槍，是一九一七年的物品。我從有幾個馬鴻逵的

舊部口中直接聽到這些槍，是從馬鴻逵將軍處奪來的。馬將軍，是國民黨屬下的寧夏省政府的主席，他這些槍是從「基督教將軍」馮玉祥那裏得到的一九二四年這一個區域是馮玉祥統治的。他從外蒙古得到了一些槍械。正式的紅軍不喜歡用這些老式武器的。這些我只有在游擊隊手裏才看到的。

當我在蘇維埃區的時候，任何與蘇俄武裝來源的接觸，是不可能的，因為紅黨被各種不同的敵軍所包圍，他們的總數近四十萬。控制着到外蒙古、新疆或蘇聯去的每一條通路。外間說他們奇蹟似的從蘇俄得到了大批的接濟，這個倘使是事實，我想他們是很高興接受的。但是我們只要看一看地圖，就可以很明白，直要等到中國紅黨能夠在北方和西方，得有更多的地域，莫斯科是不能夠接受任何定貨單的，何況究竟有沒有這種定貨單，還是極大的疑問。

第二，紅黨沒有高薪的和榨取的官吏和軍長，是事實，在別的中國軍隊裏，這些人吸收了大部份的軍費。在紅軍與蘇維埃區中軍費是最簡省的。實際說起來，對於人民軍隊的唯一負擔，只是給養和衣服這二件必需品罷了。

實際上像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西北蘇維埃區——佔有蘇格蘭大小的一個區域——的全部預算，那時候每月只三十二萬元，而這個少得可憐的數字中的百分之六十是用來支持軍隊的。財政委員林伯渠老先生，對於這件事覺得慚愧，但是他說：「除非革命穩定之後，這是不可避免的。」那時候武裝軍隊大約有四萬人（農人輔助隊伍不在內）。這是在第二、第四方面軍未到甘肅以前的數字，後來，紅區大大地擴張了，在西北的紅軍主力，立刻達到了九萬人。



統計太多了。但是真想明瞭中國紅黨的所以能生存這些年，就必得看一看他們的內部精神，他們的軍紀和戰爭意志，以及他們的訓練方法。或者更重要的，看一看他們的政治和軍事領袖。

例如紅軍總指揮彭德懷，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爲了他的頭顱，南京政府曾經懸賞過一筆足以支持他的整個軍隊一月以上的款子（倘使財政委員林伯渠的數目字是正確的話。）

## 二 彭德懷給我的印象

當我在八、九兩月到前線去參觀的時候，紅軍第一、第二及第四方面軍的統一的指揮事尚沒有實現。紅軍第一方面軍有八師軍隊把守着從寧夏的長城直到甘肅的涇源和平涼的一條綫。第一軍團的前鋒正向着南方和西方推進，替朱德打開一條路來。朱德正率領着第二及第四方面軍從西康和四川過來，衝破南京軍隊在甘肅南部的嚴密的防綫。豫旺壩是寧夏西南部的一個回族的故城，是第一方面軍的總司令部，在這裏我找到了第一方面軍的總部人員和彭德懷總指揮。

彭氏做「紅軍」的事實大概是在十年以前開始的。那時候他在國民黨多妻軍閥何健將軍的軍隊裏發動了一次暴動。他是從行伍出身的，曾獲得了在軍事學校讀書的機會，第一次在湖南，後來在南昌畢業以後，他很快地使他自已成了名，很快地升着官。一九二七年，雖然只有二十八歲，他已經做了旅長，而在所有的湖南軍隊裏，都稱他爲「自由主義者的」軍官，因爲他有什麼事情，必定和他的士兵委員會商量的。

當時彭氏在國民黨左派中，在軍隊中，在湖南軍事學校的勢力，對於何健實在是一個嚴重的問

題。一九二七年冬天，何將軍開始肅清他軍隊裏的左派人物，舉行了湖南有名的「農民大屠殺」，其中好幾千急進的農民和工人都被當做「共產黨」而屠殺了。但是對於彭氏，因為他已經有了盛名，還猶豫着，不敢下手。這一次的猶豫使何氏吃了大虧。一九二八年七月，彭氏用他自己有名的第一旅當做核心，聯絡了第二、第三旅的一部分士兵和軍事學校的學生，和一個農民暴動結合著，發動了平江叛變，成立了一個湖南蘇維埃政府。

兩年以後，彭氏召集了八千個同志組成一個「鐵軍」，這就是紅軍的第五軍團。就用這個軍隊他攻打並且佔領了湖南省城長沙，擊走了何健的六萬軍隊——那時候他們一大半是鴉片鬼。紅軍佔領了這個城十天，抵抗着湖南軍隊及南京軍隊的聯合進攻，但是最後在日本英國和美國軍艦的猛烈轟擊之下，被迫撤退了。

在這件事不久以後，蔣介石就開始了他第一次大規模的「紅匪」肅清圍剿。這些次圍剿的情形，已經在前面大體說過。

在南方紅軍的「長征」中，彭德懷是第一軍團前鋒部隊的總指揮。他衝破了好幾萬敵人軍隊的防綫，在前進的路上奪到了重要的據點，替主力部隊獲得了通路，最後獲得了到陝西的路徑，而在西北的蘇維埃根據地住了下來。在他的部下的士兵告訴我，二萬里的「長征」途中，他是大部分步行的，常常把他的馬讓給疲乏的或受了傷的同志去騎。

他有了這樣鬥爭的歷史，我想彭氏一定是個疲憊的，嚴峻的，古怪的領袖，或殘廢者。但是相反的，他卻是一個快樂善笑的人，除了胃口很小之外，他的身體極健康。他的胃口是在長征途中糟場壞的。

在「長征」途中，他有一星期不得不喫沒有煮熟的飯和草，以及喫些半含毒質的東西，有幾天甚至於完全沒有東西吃。他是一個身經百戰的老將，可是他只受過一次重傷，以後受到的都是些輕傷。

在豫旺壩我住在彭氏司令部所駐紮的地方，所以在前綫我會見他的次數很多。這個司令部，那時候指揮着三萬多的軍隊，是一間很樸素的屋子，裏面有一張桌子和一條木櫬，兩個鐵的行李箱，一些紅軍畫的地圖，一個軍用電話，一條面巾和一只面盆，在坑上鋪着他的被褥，他和他的士兵一樣，只有兩身軍裝，而且在軍裝上面是沒有等級符號的，他只有使他像小孩那樣驕傲着的衣服，這是一件背心，是在「長征」途中射下的敵人飛機上所得到的。一把降落傘做成的。

我們在一起吃了許多次的飯。他吃得和他的兵士們一樣節省和簡單。飯食普通是白菜，麵條，蠶豆，羊肉，有時候也有麵包。寧夏出產各種甜蜜的瓜類，這是他很喜欢吃的東西。可是我發現彭氏在喫瓜的競賽中是失敗了，他不得不對司令部裏的一個軍醫低頭，這個軍醫因為他的喫瓜本領特別好，得到了「喫瓜大王」的綽號。

我必須承認彭氏給我的印象是極深的，在他的行動和談話中，我覺得他有中國人性格中很少有的某種坦白、爽快和正直的品質，這是我極喜歡的。他的行動和談話都很快，他是一個極會開玩笑的滑稽大家。他的體格很健全，是一個很好的騎師，一個能喫苦的人。這個一部分因為他是一個不吸煙者和節慾者的緣故。有一天在紅軍第二師野外演習的時候，我和他在一起。我們必需爬一個很峻峭的山。「跑上山頂去！」彭氏突然對我和他的氣喘着的總部人員這樣喊着。他像一只兔子一樣地竄了上去，到山頂的時候他把我們全體擊敗了。有一次，當我們騎馬代步的時候，他又同我們挑戰了。

在這種情形以及一些別的情形之下，再表現着他還有極多的精力存着沒有用。

彭氏是睡得晚而起得早的，他和毛澤東睡得晚起得也晚不一樣的。據我知道彭氏平均每晚只睡四小時或五小時。他永遠不慌張，但他是永遠忙的。我記得我是怎樣詫異有一天早晨，第一軍團接得命令，推進二百里到海源敵人的區域裏。彭氏在早餐以前頒發了各種必需的命令，下來和我一同喫飯。接着他開始出發，好像是到郊外去作一個短旅行。他在豫旺壩的大街上和他總部的人員一同走着，中途上又停着和一羣來送行的回教祭師談話。他的大軍好像自己在單獨進行一樣。

很奇怪的，雖然政府的飛機常常散佈傳單到紅區裏，懸賞五萬到十萬元，捉拿彭德懷——死的或者活的。可是在他的司令部門前總只有一個哨兵站崗，而且他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從不帶一個衛隊。當我在那裏的時候成千的傳單從飛機上散發下來，懸賞捉拿他和徐海東及毛澤東。彭德懷卻下令說把這些傳單保留他。因為他們只有一面印了字，而紅軍正感覺到紙荒。這些傳單的背面以後是用來印刷紅軍宣傳品的。

我看到彭氏是很喜歡兒童的，他常常被一羣兒童們跟着。其中許多孩子，竟當了送信童子、號兵、傳令兵及馬夫等，都編入紅軍的正式隊伍，名字叫做「少年先鋒隊」。我常常看見彭德懷和兩三個「小紅鬼」坐在一起，和他們認真地討論政治問題或私人的困難。他很尊敬地對待他們。

有一天我與彭德懷及一部分的總部人員去參觀一個離前綫很近的小兵工廠，去參觀工人們的娛樂室，他們的列寧堂。在屋子的一邊，工人畫了一張大漫畫。他畫着一個仁丹鬍子的日本人，他的腳踏在滿洲、熱河和河北的上面，手中高舉着指揮刀，刀上還滴着血，刀對着中國的其餘的部分。這張

漫畫上的日本人，有一個大鼻子。

「那個是什麼人？」彭氏問一個看守列寧堂的少年先鋒隊。

「那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小孩回答說。

「你怎麼知道的呢？」彭氏問着。

這個小孩子的回答是「你看他的大鼻子吧！」

彭氏笑着望着我，指着我說：「那麼這裏有一個洋鬼子，他是一個帝國主義嗎？」

「對的，是一個洋鬼子」先鋒隊回答說：「但是並不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他有一個七鼻子，可是還不如一個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大」

彭氏高興得縱聲大笑，從此以後他開玩笑地叫我大鼻子。事實上，在東方社會裏，我的鼻子是正常的，不討人厭的，但是一般中國人都以為外國人全是大鼻子。我對彭氏提出這樣的漫畫，在紅軍真正和日本人接觸的時候，會發生很大的錯誤，因為日本人的鼻子，是和他們自己的鼻子一樣大的。他們會認不清敵人而拒絕作戰的。

「不必擔心！」總指揮說，「我們會認清每一個日本人，不管他有沒有鼻子！」

有一次我同彭氏去看彭氏第一軍團的「抗日劇社」演戲。我們同一些別的士兵一起坐在臨時舞臺的草地上。他對於這些戲劇好像很有興趣，他起來領導着唱了一個最流行的歌曲。雖然那時候只是八月底，天黑了以後，却已是冷風刺骨，我把我的棉襖緊緊地裹着身子。在戲劇演到中間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彭氏已經脫去了他自己的棉襖。原來他早把他的棉襖披在一個坐在後面的小號兵

的身上了。

後來我纔明白了彭氏所以喜歡這些小鬼的道理來，有一天晚上，他允許了我的請求，把他兒童時代的情形，講些給我聽。他自己幼年時代的境遇，在西方人聽來，是很奇怪的，可是在中國，這些是極典型的事情，他解釋了爲什麼中國現在有許多青年看起來是「紅色」的了。

### 三 爲什麼變成一個紅黨

彭德懷生於離長沙大約九十里的湘潭縣的一個鄉村裏，在碧澄澄的湘江旁邊，是一個富足的農村。湘潭是湖南風景最優美的地方之一——綠色的鄉村，有肥沃的稻田，茂密的竹林，和稠密的人口。只是這一縣就有一百萬人以上的人口。但是湘潭的土壤雖然很肥沃，而大多數農民却是極貧窮的，不識字的，照彭氏說起來，他們只「比農奴微微好一些。」在那裏，地主最有勢力，擁有最好的田地，因爲他們在許多情形之下，同時也是政府的官吏，他們任意徵收額外的田租和捐稅。

「湘潭有幾個大地主，每年能收到四萬到五萬擔的米，而全省有幾個最富足的米商就住在這裏。」

彭氏自己的家庭是富農。他的母親是在他六歲的時候死的，他的父親就續娶了一個妻子，這個後母因爲彭氏是前母的兒子，很是憎惡他。她把他送到一個中國的舊式學校去，那裏老師常常打他。很明白的，彭氏是很有能力照顧他自己利益的，當老師有一次打他的時候，他舉起一張板櫟打中了老師，就跑走了。這位老師在地方法院控告他，他的後母不認他做兒子。

在這一天的口舌中，他的父親並不關心，但是爲着要他的妻子保持和平起見，他把這個搗板棧的孩子，送到嬸母家裏去住。她是彭氏很愛戀的一個人。她把這個孩子送到一個「現代」學校裏去。在這裏他碰到了一個非孝的「急進」老師。有一天，彭氏正在校園裏玩耍的時候，這個老師走到他面前，坐下來和他談話。彭氏問他是不是崇拜他的父母，並且請他猜猜彭氏自己對父母的態度。那老師說，就他自己說他是不相信這些迂腐的道理的。小孩子由於父母的求快樂而生出來的，這個正與你（德懷）在這個校園裏求快樂一樣。

「我很領會這種見解，」彭氏說：「所以我在回到家裏的時候，就把這些話對嬸母說了。她聽了駭然，在第二天就叫我從這個惡劣的「外國勢力」中退了下來。聽見了這個孩子的非孝的說法，他的祖母就經常地在「每月初一十五節日，有暴風雨時禱告着，」求天打死這個不孝孫子。

以後就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這件事最好用彭氏自己的話來說明：

「我的祖母把我們大家都當做她的奴隸。她是大煙鬼。我最恨鴉片的氣味，有一天，我實在再忍不住了，我就立起身來，一脚把她放在火爐上的煙鍋踢倒了。她大大地生氣，就召集了全體親族長，列舉了我許多的罪狀，宣布我是一個不孝的孫子，正式要求把我活活的淹死。

「族中人正預備實行她的請求了。我的後母贊成我應當處死，而我的父親說，這既然是全家的意見，他也並不反對。這時候我的一個母舅——我自己母親的兄弟，站起身來，劇烈攻擊我的父母，沒有把我適當地教訓好。他說這是父母的錯誤，在這種情形之下，小孩是不能負責的。

「我的性命就保全了，但是我必須離開家庭。那時候我才九歲。那正是很冷的十月天氣，除了我

的衣褲以外，我便什麼東西也沒有。就是這一身衣褲，我的後母也想取了去，可是我證明，這身衣褲不是她的，是我的生母給我的。」

這就是彭德懷的生命在這個大世界中的開始。他起先得到了一個牧童的工作，後來又做煤礦工人，在那裏他每天要拉十四小時風箱。這樣長時期的工作，把他悶慌了，他逃出了煤礦去做一個鞋匠的徒弟。在那裏每天只做十二小時的工，比以前已經好得多了。他拿不到薪水，在八個月以後，他又逃走了。這一次他跑到一個硝酸工廠裏去做工。這個工廠倒閉了，他不得不再去找工作做。現在除了背在他背上的爛布之外，他仍舊什麼東西都沒有。他改做築隄工人在這裏他有了一個「好的職業」實際上領到了工資，他在兩年中積蓄了十五串錢——約大洋十二元！但是因為換了一個軍閥，省鈔就變成毫無價值的東西，他於是又「喪失了一切東西」——這個使他十分沮喪，決定回到家鄉去。

現在十六歲了，他去拜訪一個富足的母舅——那個曾經救過他的性命的母舅。這個人正新近死了自己的兒子，而且從前是很喜歡彭德懷的。他歡迎他並且供給了他一間屋子。在這裏彭氏愛上了他自己的表妹——而他的母舅是很贊成他們訂婚的。他們在同一個中文教員那裏讀書，在一起玩耍，並且計畫他們的將來。

這些計畫被彭氏的不可遏止的跋扈所打斷了。第二年在湖南有一個大米荒，成千的農民都無家可歸。彭氏的母舅接濟了許多人，但最大的米行，被一個大地主商人把持着，大大的賺了一筆錢。有一天有二百多個農民，聚在他家門前，要求這個商人把米平價賣給他們——這是在饑荒時代對於有道德人的一種傳統的要求。可是這位富翁拒絕了這種要求，把他們趕走了，關上了大門。



彭氏接着說：「我正從他家門前經過，停下來觀察這種示威行動。我看這些人大半已經餓得半死，我知道這個富翁在他的倉裏有一萬多石米。可是他完全拒絕幫助這些饑餓的農民。我不禁怒火中燒，領着農民攻打並且衝進他的家去。他們把他倉裏的米運走了一大半。以後我想起這件事情時，我不知道當時爲什麼要那樣做。我只知道他應該把米賣給窮人，不然的話，把他來搶走，是很對的。」

彭氏又要再逃命了。這個時候他的年紀已可以投軍去了。他當兵的生活開始了，在不久以後，他並且變成一個革命人物。

在十八歲的時候，他當了排長，並且參加一種預謀要推翻那時當權的省長——傅督軍。彭氏接受了在他軍隊中工作的一個學生領袖很深的影響，而這個學生領袖是被督軍槍殺掉了。彭氏就擔任暗殺傅督軍的工作，他走進長沙，有一天等着傅督軍在街上走過的時候，他對他扔了一個炸彈。可是這個炸彈已經着了潮，並沒有爆發。彭氏逃走了。

不久以後，孫中山做西南聯軍總司令，並打敗了傅督軍，可是很不幸的，他又被北方軍閥逐出湖南。彭氏就跟着孫氏的軍隊一同逃走。這裏，孫氏的一個軍長——程潛——派他去做偵察的工作，彭氏又回到了長沙，這一次他爲人所賣而被捕了。那時候張敬堯正統治着湖南。彭氏敘述他的經驗說：「他們每天用許多不同的方法拷打我一個鐘頭。有一天晚間，把我兩只腳捆着，兩只手綁在背後，拿大石頭放在我的背後，獄卒站在我的周圍用腳踢我，逼着我招供——因爲他們對於我還沒有證據。我昏過去了好幾次。」

「這樣拷打了我一個月左右。在每次拷打之後我總想下次我要供招了。因爲我實在受不了。」

可是每一次我總是決定不等到第二天不說的。結果他們對於我沒有得到什麼東西，而且使我非常詫異的最後是把我釋放了。我一生中最滿意的事，是幾年以後，我攻進了長沙，把那老刑房拆毀了。我們釋放了好幾百個政治犯，這裏面有許多人遭受了毒打，非人的待遇，以及飢餓，已經是半死的人了。」

當彭氏重新得到了他的自由以後，他回到他的母舅家裏，去看望他的表妹。他仍舊以為他們已經有了婚約，打算和他結婚。可是他發覺她已經不在人世了。於是他重新去投軍，不久就被派到湖南軍官學校裏去讀書。畢業以後，他在魯滌平手下充當第二師的一個營長，派他在本縣服務。

「我的母舅死了。聽到了這個消息，我打算回去參加葬禮。在路上我必須經過我幼年時候的家。我的老祖母還活着，那時候她已經八十多歲，仍舊很健康。聽到我快要回去，她走十里多路來接我。我原諒她過去的事情。她對我是很謙虛和很看重。我對於這種改變極為驚奇。這是什麼原因呢？後來我想到，這不是她的私人感情上，有了什麼改變，而是因為我從一個被社會拋棄的人，升做一個軍隊裏每月有二百元薪水的軍官，我給了她一些錢，她在家庭裏，稱讚我是一個模範「孝子」。

我問彭氏，什麼書籍對他極有影響？他說，在青年時代，他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他第一次發生了一些軍人對於社會的責任之重大的思想。「司馬光所描寫的戰爭，完全是無主義的，對於人民只是一種痛苦——正像在我自己的這個時代，中國軍閥的互相戰爭一樣。我們怎樣纔能夠使我們的鬥爭成了一個有目的鬥爭，求得一個一勞永逸的改革呢？」

彭氏也讀過了影響毛澤東的許多作家，如梁啟超，康有為等的書籍，有一個時期，他對無政府主

義，有些信仰。陳獨秀的新青年，使他對社會主義發生了興趣，從這裏出發，他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那時候國民革命正在形成，他是一個旅長，他覺得需要一種政治的主義貫輸到他的軍隊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對梁啟超的一種改進，」但是彭氏覺得它「太虛空和雜亂了。」雖然彭氏自己那時候是一個國民黨。鮑哈林的共產主義 A、B、C 對於他好像是「第一本提出了一個切實而合理的社會及國家形式的書。」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懷已經讀過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大綱，新社會觀（一個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員所著的），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及一些關於中國革命的唯物論的解釋的論文和小冊子。彭氏說：「以前我只是對社會不滿意，而沒有看到實行任何基本改進的機會。讀了共產黨宣言之後我放棄了我的悲觀，開始懷着一種「社會一定能够改變」新信心而工作着。」

雖然彭氏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沒有加入共產黨，可是在他的軍隊裏，他接受了共產黨青年人的幫助，在政治訓練方面開辦了馬克思主義的課程，並組織了士兵委員會。一九二六年，他與一個共產青年團的女團員一個女中學生結了婚，可是大革命中，他們就分散了。自從一九二八年起，彭氏沒有看見過她。在那年的七月裏，彭氏叛變，佔領平江，開始了他的反叛者——或土匪的事業。

他告訴我這些青年時代所發生的事情和鬥爭的時候，他在屋裏來往地踱着，一邊笑着，談諧着，他的手裏拿了一根蒙古馬鬃做的驅蠅鞭，心不在焉地揮着來加重說話的語氣。一個信差送來了一疊電報，在他打開來看牠們的時候，他忽然地又顯出莊嚴的指揮官的神氣來。

「好了！我所要說的都說完了。」他總括起來說，「這些話多少闡明了一個人是怎樣會變成一

個「戰士」的。」

#### 四 游擊戰的戰術

這裏我想敘述我和彭德懷的一次關於紅軍怎樣及爲什麼形成的極有趣的談話。我記得是這樣的：我們坐在豫旺壩縣政府的舊地，這是一所兩層樓的房子，有一個有欄杆的瞭望臺從這裏我們的目力可以穿過寧夏平原望到蒙古。

在豫旺壩的高大而且堅固的城牆上，一小隊的紅色號兵在練習吹號，從城牆的一角上，飄着一面大紅旗，旗上黃色的斧頭和鐮刀，從惠風中不斷地發出聲音來，好像有一個拳頭在牠後面敲着。往下看，在一邊我們能夠看見一個清潔的院子，那裏有幾個回族婦女，正在磨晒穀子。在院子的另一邊晾着好些洗好的衣服。在較遠的一塊方場上，有一些紅色的兵士在練習爬牆，跳遠和擲鐵餅。

在紅軍組成以前，他們彼此雖然沒有碰到過，彭德懷與毛澤東同是湖南某一縣的人，他說的是南方的土語，說得像機關鎗一樣的快速。只有在他慢慢地簡單地說的時候，我才能够聽清楚他說什麼。這是他普通不耐煩這樣做的。這一次會談，有一個英語說得很好的年青的北平大學畢業生，當我的翻譯。我希望他現在還活着，將來有一天，能够讀到這本書，知道我在這裏對他表示了最誠懇的謝意。

彭德懷開頭說，「中國游擊戰發生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的破產，特別是農村的破產。帝國主義地主制度，軍閥戰爭，結合起來，來破壞農村經濟的基礎，這些主要敵人不消滅，農村經濟是不能够恢復

的。無數的捐稅，與日本的軍事的和經濟的侵略，由地主來幫助着，加速了這種農民破產的速度。土豪劣紳在鄉村中的榨取權力，造成了大多數農民的生活艱難。在鄉村中有嚴重的失業問題，所以貧窮的階層，都準備着爲一種改革而鬥爭。

「第二、游擊戰術的發展是內地經濟落後的緣故。缺乏交通、馬路、鐵路、橋樑等等，使人民能夠自己武裝起來和組織起來。」

「第三、中國的軍事中心雖然多少被帝國主義操縱着，但這種統治是不平衡的，不統一的。在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之間，有着很寬的裂縫，在這些地帶游擊運動能夠很快地發展的。」

「第四、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革命的觀念深入了許多人的心中，甚至於在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及在城市裏大屠殺之後，許多革命者，都拒絕投降，想出了反抗的辦法來，因爲在大城市裏的帝國主義買辦階級聯合統治的特別制度，因爲開始沒有武裝的隊伍，不能夠在城區裏建立根據地，所以許多的革命工人，知識分子和農民，都回到農村區域，去領導農民暴動。不能忍受的社會的和經濟的情形，造成了革命的條件；它只需要給這種農村羣衆運動一種領導方式和目的就夠了。」

「這些因素，使革命的游擊戰生發和勝利。但是在這裏當然只是很簡單地說到，而沒有檢討到隱在牠們後面的較深的問題。」

「除了這些原因之外，游擊戰的成功，游擊隊的發展，也是因爲戰爭的部隊和人民大眾的一致。紅色游擊隊，不僅是戰士；同時他們也是政治宣傳家和組織者。他們所到的地方，都帶着革命的使命，很耐心地對農民大眾解釋紅軍的真正的任務，使他們知道，只有經過了革命以後，他們的要求纔

能夠實現，並且告訴他們，爲什麼只有共產黨纔能領導他們。」

『說到游擊戰的特殊工作，你方纔問到爲什麼在某些地方，游擊戰很快地發展着，成爲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而在某些別的地方，却很容易，和很快的就被鎮壓下去了。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第一，在中國的游擊戰，只有在共產黨的革命領導之下，纔能夠成功，因爲只有共產黨願意及能夠滿足農民的要求，只有共產黨明瞭廣泛的常久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對於農民的需要，而且能夠實踐它所宣傳的政策。』

『第二，游擊隊單位的活躍作戰領袖，必須是堅決的，無畏的，和勇敢的。領袖而沒有這些性質，游擊戰不僅不能夠生發，而且牠會被反革命者攻破而死亡。』

『因爲羣衆們，只關心他們的生計的能夠實際解決，所以只有「立刻」滿足他們最迫切的要求，纔能夠發動游擊戰。這就是說：榨取的壓迫階級，必須立刻解除武裝。消滅他們的活動。』

『游擊隊不能夠永遠停留着不動，倘然是這樣，那就是自招滅亡。他們必須不斷地擴大，在他們自己的周圍，建起永遠的新的外圍和保護羣。政治的訓練，必需隨着鬪爭的每一方面推行着，而且必須從每一個參加到革命的新部隊裏，產生本地的領導人。從外界引進領袖來，是不十分妥當的，到一種有限的程度，倘使運動不能夠鼓動，喚醒，及不斷地從本地的羣衆中培植新的領袖出來，那麼持久的勝利，是得不到的。』

這些敘述是很有趣的，毫無疑義的，牠們是很重要的。但是假使可能的話，我願意知道指導紅軍的軍事原理，這些原理，使他們成爲武裝配備優良許多倍的南京軍隊的最艱苦的敵人。讀過勞倫斯

將軍及其征戰事蹟的人，一定要把中國的紅軍的戰略，與這位美國天才的游擊戰者的戰略互相比較。和阿拉伯人一樣，紅黨在幾個陣地戰大進攻的表現中，都是平凡的；可是和阿拉伯人一樣，在運動戰中，他們是無敵的。

張學良漸漸地尊敬紅黨（這是他受命要去消滅的敵人）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他被紅黨這種鬪爭的技巧感動了，他相信，對日作戰，是可以利用他們的。自從他和紅黨協定停戰之後，他請了一些紅色教授，到陝西爲東北軍所開辦的新軍官學校裏去教書。在這學校裏，共產黨的勢力很快地發展起來。張將軍和他的許多軍官，都是極端的反日者，他們漸漸地相信，對日作戰，中國必需依靠優越的活動性和游擊能力。他們迫切地要曉得紅黨在十年作戰的經驗中，所學到的一切關於運動戰的戰略和戰術。

關於這些要點，我曾經問過彭德懷。我問他：『你能不能把「紅色游擊戰的原則」扼要的說一說？』他答允這樣做，寫了一些筆記，開始唸給我聽。對於這個問題的較詳細的討論，他介紹我參考毛澤東寫的一本小冊子，這是在蘇維埃區出版的，但是我沒有得到它。

彭氏解釋着說，「倘使新興的游擊隊想要得到勝利，有幾條作戰的原則必須遵守。這些都是我們從長期鬥爭的經驗中得到的。雖然這些原則需要依照當場的情形，隨機應變，但是我相信，倘使違背了這些原則，是一定會被消滅的。主要的原則，可以總括爲下列十點：

『（一）游擊隊必須不担任任何失敗的仗。沒有極大的勝利把握，他們應該拒絕作戰。

『（二）好好地領導着的游擊隊的進攻戰術是突擊。它必須避免靜的戰爭。游擊隊伍沒有協

助隊伍，沒有後防，而且除了敵人的給養及交通綫外，也沒有自己的給養及交通路綫。在長時期的陣地戰中，敵人有一切的利益，而且一般的說起來，游擊隊勝利的機會是隨着戰爭延長減少的。

『（三）在實行或接受任何作戰以前，必定要製定一種縝密的進攻計劃，特別是撤退的計劃。發動任何的進攻，而沒有充分的基本準備，是要遭受敵人包圍的。富於活動性，是游擊隊的特長，而把它用錯了，就自己遭殃。

『（四）在游擊戰的發展中，我們對於民團（註）必須予以最大的注意，民團是地主和豪紳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的反抗綫。我們必須消滅民團的武力，並且倘使可能的話，我們必須極力在政治方面，把羣衆抓過來。除非一個區域裏的民團武裝都解除了，活動能力都消滅了，想動員羣衆是不可能的。

『（五）游擊隊倘使與敵人的正規軍作戰，它的人數必須超過敵人。但是假使敵人的正規軍正在移動休息，戒備鬆懈的時候，對於敵人防綫的致命地點，從側面施以迅速的強烈的突擊，是可以由較少的游擊隊來擔任的。許多紅軍的「突擊」都是用幾百人來對付千萬的敵人的。靠着敏捷，勇敢，堅決和計劃周密的游擊，與選擇敵人部隊最容易擊傷的致命地方得到的。這種攻擊的完全勝利，只有經驗豐富的游擊隊，纔能夠做到。

『（六）在實地作戰的時候，游擊隊陣綫必須有最大的韌性。只要發覺了他們對於敵人的力量或備戰能力的估計有了錯誤，他們應該馬上能夠用開始攻擊時的速度，來解散和撤退。可靠的組織必定要在每一個單位裏發展着，作戰時犧牲的指揮官，必須能夠完全補充起來，士官的補充，對於



游擊戰是極重要的。

『(七)必須精於分散兵力，誘敵、轉移視線、埋伏、詐計，以及激怒敵人等等戰術，中國叫做「東擊西」之計。

『(八)游擊隊必須避免和敵人的主力軍作戰。把部隊集中在敵人最弱的一環或者最致命的地點上。

『(九)必須謹慎地避免讓敵人發現游擊隊主力部隊。爲了這個理由，當敵人前進的時候，游擊隊應該避免集中在一個地方，應當常常改變他們的位置——在開始攻擊以前，在一天或一晚間，應該改變兩三次。行動的祕密是游擊隊勝利的主要條件。攻擊以後的撤退和分散的好的計劃，與正確地集中兵力迎頭痛擊敵人的前進，是同樣重要的。

『(十)除了富於活動性以外，游擊隊和本地羣衆是不可分離的，這是得到正確情報的關鍵，而這個關鍵我們必須充分利用的。理想地說起來，每一個農民應該是游擊隊情報部的人，這樣，敵人的一舉一動，游擊隊就可以完全知道。我們應該用最大的努力，來保護關於敵人的情報路線，而且必須永遠保持好幾條輔助的情報路線。』

依照彭司令說起來，這些是紅軍發生它的力量的主要原則，在擴大每一蘇維埃區中，我們是必須運用牠的。他的結語說：

『所以現在你該知道，勝利的游擊戰爭，是要具備這些基本條件的。無畏、敏捷、巧妙的計劃、活動

(註) 彭德懷估計，民團至少有三百萬人，此外中國還有二百萬人的正規軍。

性、祕密性、行動的神速和堅決。缺少任何一個條件，游擊隊是很難得到勝利的。倘使在戰爭的開始，他們缺少敏捷的決定，那個戰爭是會延長的。他們必須要實行奇襲，否則敵人會增援的。他們必須是流動而有韌性，否則他們就會失掉運動戰的優點。

『最後，游擊隊之取得農民羣衆擁護和參加，是絕對必要的。實際上說起來，倘使沒有武裝農民的運動，就沒有游擊隊的基礎，而紅軍就不能夠存在。只有把自己牢牢地植在人民的心的深處，只有充分實現羣衆的要求，只有在農民蘇維埃裏打好一個基礎，及只有在羣衆掩護之下，游擊戰纔能夠得到革命的勝利。』

彭氏在瞭望臺上不斷地踱來踱去，每次說完了一個要點之後，就走回到我所坐着寫字的桌子前面。現在他突然地停止了，站在那裏沉思着。

他說：『沒有什麼事情，絕對沒有什麼事情，會比這件事情會更重要的——紅軍是人民的軍隊，它是得到人民的幫助，纔生長起來的。』

『我記得一九二八年冬天那時候我在湖南的軍隊零落得只剩兩千多人，而且我們已在包圍中。國民黨軍隊燒燬了包圍區域三百里以內房屋，同時把那裏的食糧也一齊搬走，把我們封鎖起來。我們沒有布，用樹皮來做短的裏衣，剪下我們的袴腳管來做鞋子。我們的頭髮長得像「長毛」，我們沒有居住的地方，沒有燈火，沒有食鹽，我們都病了，都餓得半死了。農民也不比我們好，我們決不輕動他們所僅有的些微東西。』

『但是農民鼓勵我們。他們從地下挖出對白軍藏着的糧食給我們喫，他們自己只喫蕃薯和野

根。他們恨白軍焚燒他們的房屋，搶劫他們的糧食。甚至於在我們到達這裏以前，他們已經和地主及捐稅徵收員戰鬥過，所以他們歡迎我們。許多人加入我們的隊伍，而且每一個人在各方面都幫助我們。他們盼望我們打勝仗！因為這種緣故，我們繼續的打下去，衝破了封鎖綫。」

他轉過頭來，朝着我簡單地結束說：『戰術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大多數人倘使不擁護我們，我們是不能夠生存的。我們不是別的，只是人民打擊他們的壓迫者的拳頭罷了！』

## 五 紅色戰士的生活

中國的士兵，在國外的名譽是壞的。許多人以為他的槍只是主要裝飾品，他只是帶着鴉片煙槍作戰的，作戰時來福槍的實彈射擊是事前有彼此約好，開朝天槍的，是用銀子來作戰，對兵士是用鴉片來發餉的。這些說法，對於過去大部分的軍隊，是很真實的，可是現在武器精美的頭等的中國兵士（白色的和紅色的）就絕對不再有這種喜劇式的笑話了，這是全世界人士馬上就可以看出的。中國沒有能力擊退日本這一點是不能作為批評的標準的。除開上海那次怠工性的戰爭以外，直到現在還未曾有過激烈的抵抗。

在中國仍舊還有許多的兒戲似的軍隊，但是在最近幾年中，已經產生了一批新型的中國戰士，他們不久就會替代那些舊的。內戰，特別是「紅」與「白」的階級鬭爭，是代價很高的，有時候戰爭猛烈地，和苦痛地進行着，雙方決不准有部分的或是暫時的休戰，中國這十年來的鬭爭，倘使別無成就的說法，至少已經造成了一種作戰力量的核心，和精於運用現代技術及戰略的軍事頭腦，這個不

久以後，會建立一種有力量軍隊，不再可以當他「銀樣蜡槍頭」看待。

問題決不是在人力材質的本身。就我從一九三二年淞滬戰爭所知道的，中國人是和任何別國人同樣地能夠作戰的。把技術上的限制去開不談，問題完全是在軍事當局不能夠訓練這種人。材質來供給國家使用，不能夠養成他們一種軍事紀律、政治信仰和取勝的決心。在這個地方，伏下了紅軍的優越性。他們常常是能夠切實相信他們是爲了某種目標而作戰的唯一方面。紅黨在教育工作上最大的成功，是建立了一種能夠抵抗敵人的技術上和數目上的優越性的軍隊。

絕對忍耐、苦而無怨，是組成紅軍底大部分的中國農民的特長。這個是從「長征」中看出來的。這個也是從紅軍的慘淡的和辛苦的日常生活中看出來的。也許有的外國軍隊，在同樣的遭遇，如飽經風霜雨雪、喫粗糲的食物，住簡陋的房子及繼續不斷的磨難之下，能夠生存下去的。但是尙還沒有看到過。也許有外國軍隊能夠忍受同樣的風霜雨雪，同樣的粗糙食物及卑陋的住所等等，可是我沒有看見過。關於美、英、法、日、意和德國的軍隊，我知道得很詳細，但是我相信，只有其中最好的人，纔能夠受得了紅色兵士這樣艱苦的日常生活。

我在寧夏、甘肅看到的紅軍，是駐紮在洞穴裏，在以前的富農的馬房裏，在草率建築的土和樹木造成的營房裏，以及在以前官吏或駐防軍所棄掉的屋子裏。他們睡在硬的坑上，連草蓆都沒有，每人只有一牀棉氈——雖然他們的房屋的地板、牆壁和天花板是粉刷的粘土造成的，都是很清潔和整齊的。他們很少有桌子或書桌，幾塊磚頭或石頭就當做椅子用。大部分的傢具是敵人在撤退以前毀壞了或運走了。

每連都有它自己的廚房和委員。紅黨的飯食極簡單。咖啡、茶葉、餅乾、各種糖果，或新鮮的蔬菜，雖然不是絕對沒有遇見過，卻也幾乎是沒有喫過的。咖啡罐子比咖啡更有價值，因為沒有人喜歡喝咖啡，那味道是和藥味相像的，但是一個好的罐子，能夠做成一個很有用的軍用水壺，開水差不多是唯一的飲料，喝涼水是特別禁止的。

不在作戰的時候，紅色兵士一天到晚都很忙的。實際上說起來，在西北方和在南方，他們曾經蛰伏了一個長的時期，佔領了一個新區域，紅軍就停一兩個月來建立蘇維埃，或者是把它「凝固」起來。他們只安排一小部份的軍力在前哨。除開有一次舉行劃時代的大「圍剿」以外，敵人永遠是守而不攻的。所以紅軍在他們自己或是敵人舉行進攻的時期之間，是很有休息和空閒的。

不在戰壕或不在前哨站崗的時候，紅軍是以六天為一個星期，休息一天。在別的日子，他五點鐘起牀，晚間九點鐘吹號安息。每天的生活表是：起身後一點鐘的運動；早餐；兩點鐘的軍事訓練；兩點鐘的政治講演及討論；午餐；一點鐘的休息；兩點鐘的識字班；兩點鐘的遊戲及娛樂；晚餐；唱歌和聚會；吹熄燈號。

跳遠、跳高、賽跑、爬牆、盤繩、跳繩、擲鐵餅及打靶競賽都是極力鼓勵的。看了紅黨的跳牆、跳欄杆、跳繩等各種動作，你就明白，為什麼中國報紙，因為他們爬山和敏捷行動的技能，替他們起一個綽號叫「人猿」。在從連到旅的關於遊戲、軍事訓練、政治知識、識字運動及公共衛生等團體競賽中，都預備獎旗的。我看見這些獎旗，在各部隊的列寧室裏陳列着。

每一連每一旅都有一個列寧室，那裏是一切社會和「文化」的中心。列寧室是各部隊單位中

的最好房間，但是這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像我所常見的，它們都是非常簡陋，可以臨時移動的東西，它們的使人感到興趣，乃是這些屋裏的人類活動，而不是它們的陳設。這些屋裏，都有連或旅裏的天才藝術家所畫的馬克思和列寧的像片。同那些流行於中國的基督像片一樣，這些像片都帶着鮮明的東方色彩，眼睛像針綫一樣細，前額或者像球形，和孔子的像一樣，或者就完全沒有前額。紅黨把馬克思叫做馬大鬍子，對於他好像是又親愛又尊敬的。這個對於回教徒是特別真實的。他們似乎是中國鬍子最多的人民，同時也似乎是最欣賞鬍子的人民。

列寧室的另外一個特色，是一個屋角有一些專為研究軍事戰術而設的泥土的模型。中國人在這一方面是有特長的。城池，山嶽，要塞，河流，湖澤，橋樑等等，都在這些屋角裏建設着。當上課研究到一些戰術問題的時候，玩具的軍隊就在這些模型上來回作戰。這樣，在有些地方，你可以看到上海、中日戰爭的重行演習。有時候也可以看到長城戰爭。自然，大半的模型，都是用來表演過去國民黨和紅黨的戰爭的。這些模型也用來解釋軍隊所駐紮的地帶的地形的。表演理想中的戰爭的戰術，或者只是用來引起紅軍兵士軍事訓練中的地理和政治課程的興趣的。在一個軍醫連的列寧室裏，我看到了身體各種部分的泥土模型，說明某些疾病的影響，並解釋人體衛生等等。

列寧室的另外一角是用來學習識字的，在那裏你可以看到每個戰士的筆記本，掛在指定給各人的釘子上。而識字班有三組：識字不到一百個的，識一百到三百個字的，能夠讀寫多於三百字的。每一組紅黨都有自己印刷的課本（以政治的宣傳當做學習的材料）。每一連、每一營、每一團、每一軍的政治部，都負有羣衆教育及政治訓練的責任的。他們告訴我，在第一軍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現在還

在「瞎子」班裏。（譯者按即文盲班）

紅軍第二師中那個二十二歲的政治部主任徐華對我說明。「列寧室的意義是很簡單的。在這裏的一切生活及活動，必定要與士兵的日常工作及發展聯繫起來。必定要他們自己來幹的。它必定要簡單而易於了解的，它必定要把娛樂的價值與關於紅軍目前任務的實際教育聯繫起來的。」

在每個列寧室裏都有壁報，由士兵的委員會負責準時出報。這至少是比一般的列寧室裏的「圖書」新得多的。那裏主要的圖書，有標準中國紅軍教科書及講義，俄國革命史，各種從「白」區秘密輸入或奪到的雜誌，和中國蘇維埃的出版物，像紅中國日報、黨的工作、鬪爭等等。

列寧室裏的壁報，使你看到士兵問題及他的發展狀況的真相。許多這樣的壁報，我把它整張的譯成英文，第二師第三旅第二團的列寧室裏九月一日的一張壁報，是一個典型。它的內容包括共產黨及其產青年團每日的或每週的佈告，幾篇新識字的人寫的粗疏文章，革命的讚揚和標語，紅軍在甘肅南部勝利的無綫電報，應學的新歌。「白」區的政治新聞，最有趣的一欄叫做「紅黑欄」，它是用來記載讚揚及批評人家的。

「讚揚」欄記載着個人及團體的精神、勇敢、不自私、勤勉及別的好德性。在黑欄中，「同志」間彼此稱呼着名字，攻擊着，（對於軍官也是這樣）如說沒有把鎗擦乾淨，讀書不用功，遺失了一個手榴彈或一把利刀，站崗的時候吸香煙，「政治的落伍」，「個人主義」，「反動的習氣」等等。在黑欄裏我看到一個廚子，爲了把粥燒得半生半熟而受彈劾，在另一黑欄裏我又看到一個廚子，彈劾一個常常埋怨他做的食物不好喫的士兵。

聽到紅黨喜歡英國打乒乓球的老遊戲，有許多人是會發笑的。這個有些奇怪，可是每一個列寧室裏，中間都有一張打乒乓球長檯子。普通都是兩用，又當做喫飯檯子的。在喫飯的時候，列寧室變成了飯廳。可是在每次喫飯的時候，總是有四五個手裏拿着乒乓球板球和網子的一「共匪」立在檯子旁邊催促同志快些喫，他們要等着檯子打球的。每一連人都誇口他們的乒乓打得好，我簡直不是他們的對手。

有些列寧室裏是有留聲機的，這是從以前的官吏和「白」軍軍官那裏沒收來的。有一晚，在音樂會上，他們用一張美國勝利公司的唱片來款待我。這是高桂滋將軍送來的「禮物」，那時候他指揮國民黨軍隊，在陝綏邊境和紅軍作戰。高將軍的唱片除了兩張是法文的以外，其餘的都是中國片子。法文的一張上有馬賽曲和鐵潑臘雷（Tipperary）。另一張是法國的喜劇曲，這個他們雖然一個字也聽不懂，也能使他們聽了放聲大笑的。

紅黨有他們自己的許多遊戲，他們也不斷地發明新的遊戲。有一種叫做「識字牌」的遊戲，是幫助不識字人學習基本文字的一種紙牌遊戲，有點像「撲克」，但最高級幾張牌上面寫的是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革命萬歲」，「蘇維埃萬歲」！下級的幾張牌也寫着一些標語，依照政治及軍事的背景變化着。還有許多集體的遊戲。共產青年團員擔任列寧室的課程。共產青年團員每天也領着大衆歌唱。

這些活動，使士兵們十分忙碌和健康。沒有見過隨營的雜人及娼妓曾和紅軍在一起。吸鴉片煙是禁止的。在我所到過的兵房裏和路上，我沒有看見過鴉片煙和鴉片煙槍。在崗上的時候，雖然並不



禁止吸香煙，可是一般的宣傳都反對這種惡習慣。似乎只有極少數士兵吸香煙。當我請他們吸香煙的時候，大多數人是謝絕的。

這就是後方紅色「正規」兵士的有規則的生活。這個對於我們，也許是不十分新奇的，但這和宣傳家的故事是不同得多了。從那些宣傳家的故事中，人們都認為紅黨的生活是縱酒作樂，玩裸體舞女，飯前飯後的大搶劫。這完全是鬼話。事實上任何地方的革命軍隊所最怕的不是放蕩淫樂，相反的，倒是太節慾了。

紅黨的許多理想，現在已經被蔣介石的精銳的「新軍隊」以及他的新生活運動抄襲了。他們是有更多的便利來實現這種理想的。但紅軍聲稱有一件事是「白」軍所不能夠抄襲的，那就是他們的「革命意識」。正在這個意識上面，建築了他們的主要的精神堡壘。這種「革命意識」是什麼，可以從紅軍部隊的政治集會上看出來。在這裏你可以聽到這些青年寧願戰死，去爭取這些簡單而深印在腦子裏的信條。

## 六 政治集會

我一個沒有事的下午，去訪劉曉，他是在豫旺壩城上守望所裏辦公的紅軍政治部的人員。

指揮員和黨的領袖我見的太多了。但是士兵大眾我見的還很少。我們現在已經明瞭，紅色指揮員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們都經過每個單位部隊的政治部中的黨代表的指導的。他們確實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的。當然托洛茨基先生，可以爭辯。他是好的或壞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

這裏我不願意來專門分析這一點。最要的一點是：他們是有意識地知道他們是爲社會主義而鬭爭的戰士。他們知道他們所需要的是些什麼，相信他們自己是世界運動的一部分。

我說：『劉先生，指揮員的會議我參加得很多了，可是士兵大衆的聚會，我還參加得很少。普通的士兵的情形究竟怎樣呢？對於這一套反帝國主義及階級鬭爭的事業，他們究竟相信到什麼程度呢？我正要參加他們一個政治討論會，請你陪我一同去，那裏說着許多的方言，我自己一個人，是沒有辦法聽懂的。』

劉曉是我在紅軍中所遇見的思想最嚴肅的青年人，他現在二十五歲。是一個工作最努力，爲人最誠懇，面貌很秀麗而聰明的人。他是極客氣、文雅、與溫和的。可是我覺得他對於他自己的參加紅軍，是有一種很大的精神的驕傲。他對於共產主義，有一種純粹的宗教絕對主義的感覺，我相信倘使有命令叫他去射殺無數的反革命及漢奸，他是決不會遲疑的。

我沒有權力去擾亂他的公事，但是我知道他已經接到命令，無論在那一方面都要他盡力來幫助我——他已經做了我好幾次的翻譯——所以我對他是很隨便了。我相信他是討厭外國人，可是後來他把他自己的歷史告訴我，我就不能夠怪他不是了。在他自己的國中，他曾經被外國巡捕逮捕監禁過兩次！

劉曉從前是東方中學的一個學生，這是美國人在湖南辰州府辦的一個教會學校。他以前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直到一九二六年大革命以前，他還是基督教青年會的一個好會員。有一天因爲他領導學生罷課，而被學校開除，結果他家裏也不要他了。理會了中國的「教會學校的帝國主義的

基礎」以後，他跑到了上海，那裏他又活躍地增加了學生運動，加入了共產黨，被法租界的巡捕逮捕了，拘押起來，到一九二九年釋放他出來。出獄以後，他又集合了他的同志，在江蘇省共產黨省委會下工作，又被英國巡捕捉去，關在有名的華德路監獄裏，用電刑來逼口供，引渡給中國當局，又被押在獄中。直到一九三一年，他再恢復了自由。那時候他才二十歲。不久以後他被紅黨的「地下火車」載到福建蘇維埃區，從此以後他就一直在紅軍中工作。

劉曉答應跟我一同去，我們兩人就一同向列寧室出發，那裏政治班正在聚會。這是第一軍第二師第二旅裏一連人的聚會，參加者共有六十二人，這是連裏的「高級班」。此外還有一個「低級班」。紅軍中的政治教育是分三組來進行的，每組又分成上述兩班。每組都選舉他們自己的士兵委員會，和他們的高級長官商量各種事情，並遣派代表到蘇維埃去。那三組是營指揮員以上，連指揮員及戰鬪員服務隊——火夫、馬夫、驢夫、挑夫、清除夫及少年先鋒隊等。

屋子用綠色的樹枝佈置着，在門上貼了一張大紅星。屋裏通常是馬克思、列寧的像片，在另一面牆上掛着上海戰爭的英雄蔡廷楷和蔣光鼐的照片。還有一大張蘇聯紅軍集合在紅場上，舉行十月革命紀念示威遊行的照片——這是從上海某一種雜誌上撕下來的，最後還有一大張石印的馮玉祥將軍的像片，下面寫着「還我山河」的標語。這是一句成語，是爲了反日運動而復活的。

各人都坐在他們隨身帶來的磚頭座位上面。（你常常可以看見這些學生到學校的時候是一手挾了筆記簿，一手拿了磚頭的。）這個政治班是由營指揮員及政治主任來領導的。（他們兩人都是共產黨員。）討論的題目我聽來是「反日運動的進展」。一個瘦長而憔悴的年青人在演說。他似

乎在扼要地敘述中日五年來的「不宣而戰的戰爭」他在激昂慷慨地喊着，他追述日本進佔滿洲的經過及他自己在那裏親身經歷的事情。他從前是張學良部下的一個兵士，他遣責南京政府不准「抵抗」的命令。接着他敘述日本軍隊進攻上海、熱河、河北、察北、綏遠的經過。在每一個事變中，他竭力攻擊「國民黨」的不戰而退，已經「把國家四分之一的領土獻給日本強盜了。」

「爲什麼？」他這樣激昂地，聲嘶地追問着「爲什麼我們中國軍隊不爲保衛中國而打仗呢？因爲他們不願意打仗嗎？不決不我們東北軍差不多每天都請求我們的長官領導我們到前線，打回我們老家去。每一個中國人都極恨日本，不情願做日本的奴隸！但是中國軍隊因爲有賣國政府，就無法打日本了。」

「倘使由我們紅軍來領導，全國民衆都情願來打仗的……」他用西北的民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反口運動的增長來結束他的講演。

另外一個人站了起來，精神貫注地注意着，兩只手緊緊地貼在他身體的兩旁。劉曉輕輕地告訴我，他是一個連長，曾經參加過「長征」的。「只有漢奸不願意打日本，只有那些資產階級的人，軍閥捐稅徵收者，地主及銀行家，不願意打日本。他們提出了「中日經濟合作」運動及「共同防共」的口號。他們只是極少數人，他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的農民和工人，每一個人都情願爲了保衛國家而戰。對於他們唯一的需要是指出一條路來給他們走……這個我怎麼知道呢？在我們江西、蘇維埃中，總共只有三百萬人，可是我們募到了五十萬的義勇遊擊隊。在和「白」軍作戰的時候，我們的蘇維埃人民就極熱烈的幫助我們。當紅軍

戰勝了全國的「白軍」的時候，我們的遊擊隊會超過一千萬！那時候日本強盜還敢再來搶劫我們嗎……」

此後還有許多人，一個一個的站起來，發表他們憎恨日本的意見，有時候不贊成前一個人所說的見解。也有時候答復討論會主席的問題，建設「開展反日運動」等等。

有一個青年報告去年紅軍經過山西，北上抗日的時候，所得到的人民的反應。他大聲地說「老百姓歡迎我們。他們整百整千的走到我們的隊伍裏來。在我們前進的時候，他們在路上送茶和餅給我們，許多人離開了他們的田地走到我們這裏來，或者在激勵我們……他們很明白那一個是漢奸，那一個是愛國志士——什麼人願意打日本。什麼人願意把中國出賣給日本。我們討論的問題是要像喚醒山西民衆一樣地，來喚醒全中國……」

一個人講演「白」區中的學生反日運動，另外一個演講西南的反日運動。一個東北人說到爲什麼張學良的東北軍拒絕再和紅軍作戰。「中國人一定不要打中國人，我們一定要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一定要奪回我們失去的老家！」用簡潔的言語結束了他的演講。第四個人講滿洲的抗日義勇軍，第五個人講中國工人在中國的日本紗廠裏的罷工情形。

這個討論繼續了一點多鐘。指揮員或政治主任，只是偶爾說上一兩句話，結束他們已經說過的話，再詳細闡明某一個要點或者報告些新聞。偶爾也糾正一些別人所說的話。士兵們在他們小的筆記簿裏，把要點簡明地記錄下來，他們嚴肅的思考工作，使他們的忠實農民的面貌上，起了深深的皺紋。這整個的集會是一種初步的宣傳，而事實的誇張並不使他們着惱。這實在與專門選擇一些材料

去證明一個單獨的理論的福音佈道差不多。但是很明白的，它的影響是很大的，簡單而有信仰的理論形態，在這些青年中已經形成了。

最後我插進去問了幾個問題。他們用了手勢來答覆我。我發現今天這六十二個到會的人，其中只有九個是從城市工人階級家庭裏來的，其餘都是農人。直接從田間來的。二十一個以前是白色士兵，六個是舊東北軍。他們中間只有八個人結了婚，二十一個是「紅色家庭」裏的子弟——這就是說：他們是從某個蘇維埃區裏那些已經得到了重行分配的土地的農民家庭來的。這個集團裏，三十四個人是二十歲以下的人，二十四個人在二十歲到二十五歲之間，只有四個人超過三十歲。

我詰問：『紅軍比中國別的軍隊好在什麼地方？』這樣一問，立刻有五六個人站了起來。這裏是我在那時候記下來的一些簡單的回覆：

『紅軍是革命的軍隊。』

『紅軍是抗日的。』

『紅軍幫助農民。』

『紅軍的生活情形和「白」軍是完全不同的。在這裏我們是一律平等的；而在「白」軍中，士兵大衆是被壓迫者。這裏我們是爲我們自己以及大衆作戰的，「白」軍是爲紳士與地主作戰的。紅軍指揮員與戰士的生活是一樣的。在「白」軍中，士兵是當奴隸看待的。』

『指揮員是從我們自己隊伍裏出身的，他們是只有立了大功才能得到職位的。「白」軍軍官是用金錢買到或用政治勢力得到職位的。』

『紅色戰士是自願參加的，「白」軍士兵是招來的。』

『資本家的軍隊是用來保護資產階級的。紅軍是爲普羅階級而戰鬥的。』

『軍閥的軍隊的工作是徵收苛捐雜稅，及榨取人民的汗血。紅軍是爲了解放人民而戰的。』

『民衆都痛恨「白」軍，愛戴紅軍。』

我又插進去問了一句，『但是，你們怎麼知道農民是真正愛戴紅軍的呢？』又是好幾個人跳起

來回答我。政治主任指名了一個人發言。

他說：『我們走進一個新的區域，那裏的農民總是自動的幫助我們做各種救護事業。他們把我

們受傷的同志，從前線抬回我們的醫院。』

另一個人說：『在我們「長征」途中，經過四川的時候，農民送了許多自做的草鞋給我們，一路

上，他們給我們送茶送熱水。』

第三個人說：『我在劉子丹的第二十六軍裏，在定邊抵抗國民黨軍閥高桂滋攻擊的時候，我們

只有一小隊人防衛一個孤獨的前哨，那裏的農民送食物和水給我們。我們從來不必用自己的人去

搬運給養，都是民衆幫助我們搬運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高桂滋的軍隊終於被我們打敗了。我們俘虜

了一些人，他們告訴我們說，他們已經兩天沒有水喝。農民在井裏下了毒藥逃走了。』

一個甘肅兵說：『民衆在多方面來幫助我們。在作戰的時候，他們常常解除了小隊敵人的武裝，

割斷他們的電話線和電報線，把「白」軍軍隊行動的消息報告我們。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割斷過我

們的電話線，他們都幫助我們敷設電線。』

另外一個人說：『最近有一架敵人的飛機，在陝西的一個山上失事，跌了下來，這件事只有幾個農民看見。這幾個農民的武器只有鋤頭和鐵鍬，可是他們攻擊飛機，解除了兩個飛機駕駛員的武裝，擒住了他們，給我們送到瓦窯堡去！』

還有一個人說：『去年四月在延長的時候，我駐紮的地方有五個村莊組織了蘇維埃。後來我們受了湯恩伯猛烈的攻擊，不得不撤退。民團回來了，捉了十八個村裏人，把他們一齊斬首。後來我們反攻，村裏人領着我們走一條祕密的山路去攻擊民團。我們出其不意的達到了險要所在，我們就進擊並解決了三大隊的敵人。』

接着一個頰上帶着一條長疤的青年站了起來，報告他在長征中的一些經驗。他說：『在紅軍經過貴州的時候，在遵義附近我和幾個同志受了傷。軍隊必須繼續前進；他們不能夠帶着我們一起走。軍醫替我們上了綑帶，把我們交給幾個農民，請他們照顧我們。他們很好地款待我們，當「白」軍來到那個村子裏的時候，他們把我們藏了起來。幾星期以後，我們便復了原。不久紅軍又回到那裏，第二次佔領遵義。我們又加入了軍隊，而村裏有幾個年青人也跟着我們一同走了。』

還有一個人說：『有一次我們還留在陝北安定地方，我們只有十二個人和幾枝鎗。農民替我們做豆腐，並且送了一隻羊給我們。我們舉行了一個議會，多喫得飽飽的，就去睡覺。只留下二個人站崗守衛。可是這個站崗的人也睡着了。到半夜的時候，一個農民的兒童從十里之外的一個山上跑了來，叫醒我們。警告我們，說民團已經到了那裏，快來包圍我們了。一點鐘以後，民團就來攻擊我們。可是我們早有準備，把他們趕去了。』



一個目光炯炯毫無鬍鬚影子的孩子站起來說：『我有一點可說。在甘肅境內，當「白」軍到達每一個村子的時候，沒有人幫助他們，沒有人給他們一些些的食物，也沒有人願意加入他們的隊伍。可是當紅軍到達的時候，農民就組織起來。選舉成立了委員會來幫助我們而且年青的人都自動地走到我們這裏來。我們紅軍就是人民，這就是我所要說的話。』

在那裏每一個人似乎都有個人的經驗可以說出來，證明『農民是愛戴我們的』。我記得在我的筆記本上，對於這一問題記着十七種不同的回答。時間又過了一點多鐘，我發現這些年青的戰士已經耽誤了很久的喫飯的時間。我請求他們原諒，準備告辭，這時連裏的一個小鬼站起來說：『不要客氣。在我們作戰的時候，是不顧吃飯時間的，在我們與一個外國朋友談論我們的紅軍的時候，我們是不怕耽誤我們的喫飯的時間的。』

這是一句極漂亮的話，但是這個小鬼說的每一個字也許都是真實的。然而這個對於他很快地去喫一大碗熱的小米粥，至少是不會發生什麼影響的，因為在幾分鐘以後，我就看見他在連裏這樣地用飯了。

## 第九章 在紅軍中（下）

### 一 紅色陶工徐海東

某一天早晨，我到彭德懷的總司令部去，看見他與幾個將領才開完了會。他們邀了我進去，開了一個西瓜請客，在我們圍坐在桌前，喫西瓜，吐出瓜子的時候，我注意到一個以前我從未見過面的青年將領。

彭德懷看見我的視線釘住了他，他就開玩笑似的說：『那邊是一個有名的赤匪，你認識他嗎？』那個新來的將領，馬上笑了出來，面孔笑得紅紅的，很隨便的在脣齒間露出了一個小洞，這裏應該是兩個門牙所在的地方。這種動作顯得他孩子氣和頑皮，在座的人都笑起來了。

『他就是你極想去見他的人，』彭德懷補充地說，『他也願意你去參觀他的軍隊。他的名字叫徐海東。』現在，在中國的紅軍領袖中，徐海東也許是名聲最顯著，爲人最神祕的人了。一般人除了只知道他是一個湖北某地的陶工，此外，其他的情形，是很少知道了。蔣介石對他施行過文明的鞭笞。近來南京的飛機飛到紅軍陣線的時候，散下了許多傳單，引誘紅軍離開紅色軍隊，答允每個紅軍攜槍歸順國民黨者，賞洋一百元。此外還懸賞說：

『殺死毛澤東或徐海東而投誠政府軍隊的，賞洋十萬元，殺死其他赤匪領袖的，也必論功行賞。』在這裏，徐海東的孩子氣的兩個肩膀上，還好好地安着一個頭顱。

我接受了這個間接的邀請，我心裏盤算要是一個人知道他的生命的價值，正與他的部下人的生命相同的時候，不知是怎麼樣的一種滋味。我再問徐海東是否真的邀我去參觀他的軍隊。他是紅軍第十五軍團司令，司令總部在離此西北約八十里的豫旺縣。

徐海東回說：『我已經在鐘塔裏替你安排好一間屋子，你只要告訴我預備在什麼時候到那裏去，我可以派人來接你。』

我們就在這時候，把這個約訂定了。

幾天以後，我就隨身帶了一枝手槍，從紅軍軍官借來的，由十個肩荷來福槍及毛瑟槍的紅軍保護着，向豫旺縣進發。——這是因為我們路上須經過幾處離開前線很近的紅線據點的緣故。與在陝西和甘肅境裏常見的深山幽谷的地形相反，我們走的一條路——這是走白帝城和內蒙古草原的一條路——是要經過一個隨處有青草，一簇簇的高長野草，以及四週都是小山的高原，小山上放着無數的羊羣在喫草，老鷹和鵬鳥在天空高飛着。有一次一羣小羚羊突然的走到我們身邊來，嗅了一嗅氣味，又飛也似的奔着，奔到山岡深處。

五小時以後，我們到了豫旺縣。這是一個回教徒的古城。城中有四、五百家人家，週圍有極堅固的磚石砌的城牆，城外有一個回教寺，它的美麗的磚頭所砌成的寺壁，一些也沒有損壞。但是別的建築物都顯有紅軍圍城時的痕跡，那會為縣政府的兩層建築物，已經有一部分被燒燬。它的正面牆壁有了很多的子彈孔。據說城外這些建築物，完全是在紅軍初圍攻這個城的時候，被馬鴻逵的守軍從城

外退進城時，爲了避免紅軍利用這種建築物，攻擊城牆的緣故，放火燒燬的。

後來徐海東告訴我，「實際上，只有小接觸，就攻下這個縣城的。我們包圍和封鎖豫旺縣十天。城裏有馬鴻逵的一旅騎兵和一千個民團。我們完全不攻城。直到第十天的晚上我們才動手。這一晚天色很黑暗，我們把梯子架在城牆上，守兵直等到一隊士兵爬上了城才發覺。我們的士兵用機關槍守住梯子，大隊士兵也就爬上了城。」

「上城以後，就沒有什麼戰鬥，在黎明以前，我們已經把民團的武裝全部解除，接着就把騎兵包圍起來。我們只死了一個人，傷了七個人。對於民團，我們每個人發了一塊錢遣散費，對於騎兵，我們每個人發了兩塊錢。他們有好幾百人自願的加入了我們的隊伍，縣長和旅長，早已在騎兵繳械時，從東城牆逃走了。」

我在第十五軍團中住了五天。在這五天中，始終感覺到極大的興趣。在豫旺縣中被稱爲「紅區考察者」的我，沒有一件資料比徐海東自己的故事更好的了。我每夜在他辦完了公以後，同他談話，我和他到過七十三師的前方去，我和他到過紅色劇院去。他第一次告訴我皖豫鄂蘇維埃共和國的歷史，這些外間大概多沒有完全知道的。徐海東他是這個巨大紅區——它比江西的中央紅區小一些，——的游擊隊的組織者，他是很知道它的發展經過的。

我覺得徐氏在我所遇到的紅色領袖中，是階級感最強的一個人。——在態度上、外表上、談話上、以及背景上。——事實上，除了賀龍以外，他也許是紅軍中唯一的純粹的普羅階級的將領。紅軍中的中下級將領，雖然大多數是普羅出身，而多數高級將領，卻都是從中等階級，中農以及知識分子來的。

徐氏是一個明顯的例外。他是很以他的普羅出身自誇的。他常含笑指承自己是一個苦力。他確實地深信中國的勞苦大眾——農人和工人——多是良善的百姓。他們是仁慈、勇敢、不自私而誠實。而富人們卻專有了一切罪惡。我以為他是爲了排除罪惡而鬥爭的。這在他是同樣的簡單。這一種信仰的絕對主義，使得他自己勇往直前的去做，使得他練成優良的軍隊。他說：『一個紅軍可當五個白軍。』這個說法，在他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的敘述。

他的自誇和熱烈，是有些粗野的。但是他是極端忠實的。他的部下，對他這樣信服的祕密，也許就在這裏。他絕對自誇他的軍隊——他們的個人人格，他們的戰鬥技巧，他們的騎術，以及他們的革命精神。他誇獎他們的列寧俱樂部，和他們的藝術化的標語。他又誇獎他部下各師的師長。中間有兩個和他同樣是苦力出身，有一個年紀才二十一歲，已加入紅軍六年了。

徐氏對於各種體力的行動，是極重視的。他知道十年來身體上受了八處瘡傷，微微地妨礙了他的體力。但他是不抽煙，不喝酒的。他仍舊有一個細長筆直的身體，他的每一吋肌肉，似乎都是很堅強的。他在每一條腿上，每一條臂膀上，胸部、肩、及膝上，都受過傷。曾經有一粒子彈，打從他的眼下穿入，從身後出去。但他給你的印象還好像是一個年青的農人。這個年青的農人，好像剛才走出了田園，放下了他的袴管，參加過路的戰士的隊伍。

我又知道了他失去兩個門牙的故事。它們是在馬上跌下來的一次事件中失去的。有一天，徐氏騎了馬在路上走，他的馬踢着了一個士兵，徐氏在馬鞍上轉過身去看那個士兵，有沒有受傷。那隻馬受驚狂奔，把徐氏拋到一顆樹上。兩星期後，當他恢復知覺的時候，他發現他的兩個門牙，已經留在那

顆樹上了。

我問他：『你怕不怕日後再會受傷的呢？』

他大笑着說：『到並不怎麼怕。我在幼年的時候，就受人家的鞭撻，我現在已經過慣這種生活了。』事實上，他的幼年生活，對於他現在所以成爲革命者，盡了大部分解釋的能事，我繼續問他的私生活——從他的口中取得這方面的答覆是很不容易的。因爲他也與別個紅軍一樣，只喜歡講戰爭的。從我所記的許多筆記中，我挑了幾個很重要的事實出來。

徐海東一九〇〇年生於湖北黃陂縣——接近漢口。他的家庭是好幾代都做陶工的。在他的祖父時代曾經有些田地，但是受了水災旱荒和苛稅的打擊，他們一家完全普羅化了。他的父親和他的五個兄弟都在黃陂一家窯廠裏做工，還很可以生活。因爲他們都不識字，所以他的父親對於他的第六個（最小而最聰明）的孩子海東，懷着很大的期望。他們父子湊起錢來，把他送入學校。

徐氏告訴我說：『我的同學，大多數是地主和商人的兒子。因爲窮人的兒女，是極少進學校的。我與他們在同一的桌子上，共同學習。可是他們大多數人，因爲我不穿鞋子，及衣服破舊的緣故，都憎惡我。他們罵我的時候，我總要同他們打架的。我去報告老師，我總不免要挨一頓打。但是地主的兒子去報告老師的時候，挨打的也仍舊是我。』

『我進了學校第四年，我是十一歲，我捲入了「貧兒對富兒」的爭鬥中。我被一羣富兒驅逐到一個牆角落，我們（苦兒們）只好以磚石亂擲，我擲了一塊石子，把一個姓黃的地主的兒子的頭打破了，這富兒立刻哭回他父親那裏去。不多一刻，他的父親就趕到學校裏來，說我「忘卻了自己的出身，

「他就拳腳交加的打了我一頓。不一刻老師又把我打了一頓。從此以後，我就逃出學校，絕對不再回去。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腦子裏。從這個時候起，我想信一個貧兒是得不到公平待遇的。」

徐氏在一家窯廠裏做學徒，在當學徒的幾年頭，他的工作是毫無報酬的。到十六歲，他才滿師，做了三百個陶工中最高工資的一個。他笑着誇口說：『我能够與中國任何的快手的陶工一樣做出很好的窯器來。所以中國革命完成的時候，我仍舊可以做一個有用的公民。』

他又想起一件意外的事來，這件事使他對紳士多了一番憎恨。『有一個旅行戲班，到我們鄰近的村莊上做戲。窯廠裏工人都去看戲。紳士以及官吏的內容，也都在那裏看戲。自然，工人是會好奇心地去看那些嚴密保衛的內容，看看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物。對於這，紳士就指使民團來驅散我們。因此工人就和民團打了起來。後來我們的廠主，只得設宴請那些受辱內容的客，並且燃放爆竹，來補償內容因被工人注視而受到的污點。廠主要想從我們的工資上來撈回那筆請客費，可是我們立刻以罷工和要挾，粉碎了他這個主意。這是我第一次經驗，知道組織的力量，是勞苦大眾保護自己的武器。』

在他二十一歲那一年，家庭的爭吵，激怒了他，使他脫離了家庭。他走到漢口，又從漢口轉到江西去。在那裏他做了一年的陶工，積了一點錢，打算回到黃陂去，可是他害了霍亂病，等到他病體痊愈的時候，他積蓄的錢，也一起用完了。他因為沒有面孔空手回到家去，他就投入軍隊去。這裏他每一個月可以有十塊錢的餉，可是他所得到的，「只有鞭打」。當時國民革命的北伐軍，方在南方發動，有些共產黨員，在徐氏的軍隊中宣傳，他們中間有幾個人被查出斬首，而他就開始對於共產主義發生了

興趣。他憎恨這些軍閥的軍隊，他跟了一個軍官，偷跑到廣東，加入了張發奎統率的第四軍。他留在那裏，直到一九二七年。他在那裏當排長。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國民黨的勢力，分裂為左翼右翼兩個集團。在張發奎的軍隊中（這時候已經開到了長江流域）這個分裂是特別尖銳的。徐氏因為側重於激烈的一面的，他就不得不逃走。他祕密地逃回黃陂，這時他深受了學生宣傳的應響，已經是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在黃陂他即刻組織了一個共產黨的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右派的政變發生。共產黨被逼成一個祕密的組織。可是徐海東還是公開活動，他決定這正是他自己獨立行動的時候了。他把密廠裏的工人和附近農人組織起來，從這些人中間他組織成了湖北的最初的工農軍。在開始他們只有十七個人，及一把手槍和八粒子彈，這是徐氏個人的東西。

後來有六萬人的第四方面的紅軍，就是這個核心發展開來的。一九三三年時，這方面軍隊所控制的蘇維埃區域，大約有愛爾蘭一樣大小。這一區在一個民選政府下有它自己的郵政局，金融組織，礦業，合作事業，紡織工廠及一個組織健全的經濟體系。徐向前，黃埔畢業生，做過國民黨軍隊的軍官，做了第四方面紅軍的統帥，而留俄學生張國燾——後來叛變去做特務了——做了這個政府的主席。

和江西的一樣，這鄂、豫、皖的蘇維埃共和國，也極力抵抗了那開頭四次的南京方面所發動的圍剿，也和江西的一樣，在南京政府同樣的戰略之下的第五次圍剿中，它不得不將第四方面紅軍的主



力，作戰略的退卻。他們先退到四川，然後退到西北。

除了經濟的封鎖，天天飛機轟炸，以及環着蘇維埃區建築無數碉堡之外，南京政府的將領，又實行了另一個完全消滅蘇維埃區以內的人口之政策。因為南京方面最後感覺到紅軍的唯一根據，是農村大眾，所以他們就有計畫地，來消滅蘇維埃區的農村大眾。當第五次圍剿的時候，鄂皖的反赤軍隊，約達三十萬人。都由受過法西斯訓練的軍官統帶着。對於這些軍官，蔣介石曾經用了整年的時間，在南京、南昌兩處軍官學校中灌注反赤的理論。結果乃有和法西斯侵略西班牙的差不多的慘酷的內戰。

統治階級的政權受到威脅的時候，它的報復，總是採取一種同樣野蠻的方式的，這個不論種族或顏色，各個地方都是這樣的。不過所用的技術，是多少不同，很可以啓發人的。下邊有一些篇幅，是用來說明國民黨所採用的這種報復技術。

## 二 階級鬥爭在中國

有三天的下午和晚上的幾小時時間，我問了徐海東自己與他的部下的許多問題，如他們個人的歷史，他們的軍隊，他們在鄂、豫、皖、蘇維埃共和國中的鬥爭及他們在西北的現狀。我是第一個到這裏來參觀的外國新聞記者。他們沒有新聞麻醉劑，沒有沿街叫賣的故事，沒有動聽的公式的談話。我必須用種種問題來取得一些事實。不過我認爲從那些不向外國人作宣傳的人的反應中，聽得爽直的，毫不修飾的談話，是很使我興奮的，你該覺得，你可以深信他們所說的話。

因為這樣，在徐海東回答我「你家屬現在什麼地方？」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立刻感覺到更濃厚的興趣。他回答很質直，很明顯的是沒有掩飾的。我決不能懷疑它的忠實性。

「我的家人，除了剩一個兄長，他現在第四方面軍以外，其餘的多被殺死了。」

「你說他們是戰死的嗎？」

「不，我只有三個兄長是紅軍，其餘的家人都是被國民黨將領湯恩伯和夏斗寅殺死的。國民黨的將領，一起殺了我們六十六個姓徐的族人。」

「六十六個人！我不甚相信地重複着說。」

「是的，他們中間二十七個人是我的近族，三十九個人是我的遠族。——黃陂縣徐姓的是大族。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甚至於嬰孩，都被殺死了。姓徐的一族，幾乎完全消滅。除了我的妻子和三個兄長及我自己，現在紅軍中算逃出了以外。當紅軍的三個兄長，有兩個後來是陣亡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她在一九三一年，白軍佔領黃陂縣的時候，被白軍擄去的，後來我聽說她被賣給漢口附近地方一個商人做小老婆。這些都是我的逃出的，兄長告訴我的。在第五次圍剿中，我們族中有十三個人從黃陂逃出，逃到禮山縣，但是在那裏又被捉住，男的殺頭，女人和小孩都被槍決。」

徐氏看到我驚訝的面孔，他冷笑道：「這是很普通的事，並不奇怪的。紅軍將領的家屬，都是碰到這種待遇的，不過我們姓徐的一家，死的最多罷了。白軍曾經發表一個命令說，徐氏所住的那一縣陷

落的時候，凡是姓徐的應完全處死。」

就在這個情形之下我們開始談到階級的報復。這裏我必需承認，這一個問題，本來我極願意跳過不談的。因為搜集人間殘忍的故事，是一件悲慘的工作。可是爲了對於紅軍表示正義的同情，他們的仇敵怎樣消滅他們的許多方法是應該說一說的。十年來，國民黨繼續地完全封鎖了紅區的新聞。一方面用可怖的故事，宣告全國。把它自己的空軍轟炸所毀壞的生命與財產完全嫁禍於「赤匪」。現在來聽聽紅色人士所講的關於國民黨的行爲，想來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把徐氏和他部下的軍官所說的事一頁一頁的寫了許多筆記，把國民黨軍隊蹂躪鄂、皖、蘇區人口的事件，包括日期和地點，都詳細的記錄下來，但是我不能重複地敘述他們所描寫的最慘酷的事實。它們不但不能見之於印刷物，而且和西班牙的日常事件一樣，對於一般不知人間階級仇恨，而且那樣深刻的，天真的人士，是不會相信我的記錄的。

我們記得在第五次圍剿中，南京的高級軍官，曾經命令各區軍隊實行消滅當地人口，這個據說是出於軍事上的必要，因為總司令在有一次演說中，曾經解釋過，在久已成立蘇區的地方，「分別赤匪和老百姓，是不容易的。」這個方法，在鄂、豫、皖、蘇區內應用得特別兇。這是因爲那統率這方面反赤軍隊的將領，多數是該區的土著。是失去了土地的地主們的兒子，所以存了無限的報復的狠心。所以到五次圍剿結束時，該區人口就減少了六十萬。

在鄂、豫、皖、紅軍所採的戰略，是在廣大的區域中實行運動戰。每一次圍剿，開始發動的時候，他們的主力，就移出紅區，到敵人的地域內，與敵人作戰。他們沒有重要的軍事據點要防衛，他們只是從這

裏移到那裏，引誘敵人，分散敵人，以獲得運動戰的優勢。可是這使他們的「基礎人口」的周圍顯露出來，而便利了敵人的攻擊。但是在過去，國民黨的軍隊看見蘇區內人民各安生業，他們倒不屠殺農民和工人。

第五次圍剿中，也像在江西一樣，國民黨採取了新的戰略。南京的軍隊避免與紅軍在廣大地面上接觸，而以大量集中的單位向前推進。軍隊的前面，建築碉堡，一步步的深入紅區。同時有系統地消滅或遷移蘇區內外的人口。他們決定把這種區域，造成荒蕪而無人居住的地方，使將來紅軍再得到這種區域的時候，不能夠再供養紅軍。南京政府最充分了解紅軍唯一的基礎，是築在農村人口的上而——這些基礎必定要毀滅它。

好幾千個兒童，被俘了，被帶到漢口及其他的城鎮，在那裏就被賣作各種的學徒，好幾千的少女和少婦，也被運到大城市，賣給工廠做包身工，或者娼妓。他們在城市裏被標着「逃荒者」或「父母爲紅軍所殺的孤兒」的名稱出賣的。在一九三四年我記得有很多的婦女，跑到中國各大工業中心來。買賣人口的交易發達起來，有中間人，專門向國民黨軍官，買了婦孺，而轉賣給人。不一時，這種買賣人口的交易極爲興盛，威脅了整個軍隊的精神。教會中人，開始議論這些事。基督教徒的蔣介石將軍，最後便不得不親下命令，禁止官員「接受賄賂，凡是參加這種貿易的，要受嚴厲的處罰。」

徐海東說：「在一九三三年的十二月，鄂、豫、皖區有一半成了荒地。從前富足的鄉村，只剩了極少的幾間屋子。牛羊被趕走了，田地沒人管理了。白軍所佔領過的每個村莊，都有屍尸堆着。湖北有四縣，安徽有五縣，河南有三縣，幾乎全部被燬。在一塊從東到西四百里，從南到北三百里的土地上，全部的

人口都被殺死或移走。

『整整的戰了一個年頭，我們曾經從白軍手中奪回了幾縣。但是當我們回去時，我們發現昔日的良田大半變成荒野。只有少數的老年男女留在那裏。他們講的故事，真夠我們恐怖。我們不相信中國人對中國人會這樣的狠心。』

『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們從天淡山（譯音）和老君山（譯音）退卻。這個蘇區裏當時有六萬人。兩個月以後，我們回去時，我們發現農人是被趕跑了，他們的房子被火燒掉了，或者被飛機炸燬了，這個區內只剩了三百個老人和幾個生病的孩子。就從他們那裏，我們知道了他們的種種遭遇。』

『白軍達到的時候，軍官就開始瓜分區內的少婦和少女。剪髮的或天足的女子，都被認爲共產黨，而遭槍決。高級軍官先行視察被虜的少女，揀美麗的自己享受，其餘讓下級軍官去選擇，再其餘的讓士兵當娼妓去洩慾。軍官對士兵說，這些女子都是赤匪的妻子，所以她們可以任憑我們處置的。』

『那些區內的許多青年，都已加入了紅軍。那些剩下來的，甚至於連幾個老年人也在內，看見了這些罪惡，都設法去殺死這些白軍的軍官。那些向白軍軍官抗議的，都作爲共產黨槍決。那些剩着沒有死的人，告訴我們說，白軍常常爲了分取婦女不勻，而自相殘殺的。他們把這些婦女，奸污以後，就送到各大城鎮中去出賣，只有軍官留下幾個最美麗的作爲他們的小老婆。』

徐氏講到另外一區湖北黃岡縣的事情，一九三三年七月，紅軍把它從王均那裏奪回來的，『在勾容集鎮上，那裏以前是一條蘇維埃合作社所在的繁盛的大街道，這條街除了留下幾個老年人沒有死以外，是完全毀壞了。他們引我們出鎮外到一個村莊上去看，那裏看見了十七具女屍，都半裸着

身子。他們都是被姦以後再被殺死的。白軍退卻的時候，顯然是很匆促的，他們只能剝去女子的一只袴管。這一天，我們開了一個會，軍隊則開了一個追悼會，我們都哭起來了。

『隨後在麻城，我們回到了我們以前的運動場，在場上一個土窟中，我們發現了十二具同志的屍體，他們的皮已被剝去，他們的眼已被挖出，他們的耳朵和鼻子已被割掉。我們對這樣一個野蠻的景象，都憤怒到哭了出來。

『在同一個月份內，也在黃岡縣，我們的第二十五紅軍，到達歐公集，這裏以前也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現在也變成荒野了。我們走到鎮外去看看，見半山上一所農人的草舍，煙囪裏在出煙。我們有幾個人就爬到上面去看，草舍中，只有一個瘋瘋癲癲的老年人住着。我們走下山來，我們又走過一大堆男女屍體，大約有四百多具，這顯然是在最近的過去被殺的。在有些地方，血流有好幾寸深。有幾個婦女，手中還緊抱着孩子臥在那裏。許多屍體交互的堆在那裏。

我突然問看到有一具屍體在那裏動，跑過去一看，是一個還沒有死的男子，接着我們發現還有好幾具活着，一數共有十多個。我們把他們搬到一個地方去救治他們，他們就把他們的遭遇告訴我們。他們從鎖上逃出來，躲在山谷裏，在露天住下來，隨後白軍軍官領了一隊軍隊，也到這裏來命令士兵，就山腰架起機關槍，朝下向他們掃射。他們掃射了幾小時，以爲人都射死了。他們也不跑到山谷下去看看，就開拔走了。』

第二天，徐氏率領了他的隊伍，到這山谷裏，把屍體指給他們看。在這死體堆中，有幾個士兵認出是他們曾經熟識的農人男女，他們的家，曾經留着士兵暫住過，他們曾經賣西瓜給士兵吃，或者在合

作社中互相交易過。他們是深切地感動了。徐氏說，這種經驗使他的部下更有死戰的決心。所以在最後大圍剿的十二個月中，沒有一個士兵脫離紅軍第二十五軍。

徐氏接着說：『在第五次圍剿將要結束的時候，差不多每一所屋子裏，都有死人的。我們常常走進一個村莊，開始以為全村已經沒有人了，等到看到那些破屋，我們就發見屋中，門邊，地板上，坑上到處都有死屍。就是狗類也都逃開了。在這些日子，我們不需要間諜去偵察敵人的行蹤，我們只要望見遠處紅光燭天的村舍，就很容易找得敵人的蹤跡了。』

這些只是我從徐海東及他的部下口中聽到的一小部分——真正極小的一部份——的故事。他們經過了連年的苦戰，最後轉輾到了西部去，他們的軍隊雖然保存而「人口基礎」卻是毀滅了。滿山滿谷，都染上了青年的血液。蘇區的心，是被粉碎了。後來我又與從鄂豫皖蘇區來的戰士談話，他們告訴我更淒慘的故事。他們並不願意講述他們所見的故事，他們只是被我問急了，才說出來的。很明白的，他們的悲慘經驗，已深深地印入了腦子。他們的階級憎恨，是一生一世不會消滅的了。

可是，這些是不是可以說，紅軍自己是不犯仇殺和階級報復的呢？我想不真的，在我與紅軍同住的四個月中，就我各方面打聽所得，他們只殺死過兩個老百姓。真的，我也不曾見過他們燒掉過一村一鎮，從我問過的許多農民口中，也不會聽說紅軍是慣於殺人放火的。不過，我同他們在一處的經驗，只限於西北。紅軍「燒殺」的事情，在別處有過沒有，我是無從證實或否認的。同時我們對於國民黨和外國報紙這幾年來所發表的百分之九十的反赤宣傳，而不懷疑它的可靠性，也未免不老實了。因為這些宣傳，確實是缺乏可靠的證據的。

再說得正確些，上述的兩個反動的老百姓的被殺，其中有一個，也並不是紅軍所殺的，他是被極端憎恨收稅員的寧夏回軍殺死的。下面就要講這個收稅員怎樣的自取死亡。但是在說到他以前，我們要先看看西北回民被統治的情形，然後也許可以明白這個人的被殺的經濟的理由。

### 三 四匹大馬

你可以滑稽地說，青海、寧夏及甘肅北部，正是斯韋甫脫書中所設想的霍亨亨姆 (Houyhnhn) (二) 幻地的模型。因為它們是馳名中國的四匹大馬的管轄區域。在這個區域中政權是由一家姓馬的回教將領——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分割。(這是在紅軍開始從他們的領地上逐漸侵入以前的事。)

馬鴻逵是寧夏省政府主席，他的堂兄弟馬鴻賓是前任寧夏省政府主席，現在統治着甘肅北部的領地。他們同是以多妻出名的回教大領袖馬克勤 (譯音) 的兒子，馬步芳是遠房族人。馬步芳承襲了他的父親的地位，由南京政府委他做寧夏省保安司令。而他的兄弟馬步青則統治了青海，此外並控制了甘肅的杓柄，它在西面是把青海和寧夏分隔開的。十幾年來，這一片遙遠的土地，被姓馬的一家，用中世紀蘇丹國的形式統治着。他們再用自己的回教大神亞刺 (Allah) 幫助他們的。

四馬中，兩馬據說是貴族出身。是回教貴族的子孫。他們在中國西北歷史上，是有決定的勢力的。所以要了解今日中國的回教徒，我們就得略略知道他們的歷史，特別是馬姓——馬姓在中國西北和寧夏的野草，或美國西部的史密斯氏一樣多——以為必要的背景。這裏我們就要停一停來約略



地說一說他們的歷史。

馬姓兄弟和中國其他的回教徒一樣，他們有土耳其人的血液的。早在六世紀的時候有一個種族，我們現在知道是土耳其族，在中國西北邊境上，逐漸強盛起來，因此對於中國平原上的國王，常有所很重要的要求。二世紀中，他們建成了一個帝國，從東部西伯利亞經過蒙古到中央亞細亞。他們又逐漸南下。在第七世紀，他們的大可汗，在隋朝煬帝曾經以賓禮對待他。就在這個時候，土耳其的大可汗幫着半含土耳其血統的李淵，起來推翻隋煬帝，建立唐朝，這唐朝以長安（即現在西安）爲首都，統治了東部亞細亞三百年。

在第七世紀的中葉，航海而來的阿剌伯商人，早已在廣東建築了回教寺。由於唐代對於宗教的優容，回教又從西北方面，由陸路深入中國。回教的祭師、商人、外交官及戰士等，都從波斯、阿剌伯及土耳其斯坦，帶了他們的宗教，到中國來。唐朝歷代的皇帝，都與西方的回教教皇，保持着很密的關係。特別在第九世紀，唐朝會召集大批的奧哥土耳其人（Onigour Turks），幫助他們壓平叛亂。從此以後，回教就在中國境內正式建立。許多奧哥土耳其人都從唐朝受到爵位，受到地產，在西北、四川及雲南等處住定下來。

幾世紀以來，回教徒堅強抵抗中國民族對於回教民族的吸收作用。可是他們到底逐漸地喪失了他們的土耳其文化，而採取了中國文化，服從了中國的法律，但是在十九世紀中，他們還有力量發動兩次爭取政權的變亂。一次在雲南有一個杜文秀，建立了一個回教王國，自稱爲蘇丹蘇利孟。另一次是在一八六四年，回教徒奪到了西北整個的政權，甚至於侵入了湖北。叛變經過了十一年才平定。在

滿清政權衰亡的時期，滿清大將左宗棠出征回疆，收復了湖北、陝西、甘肅及西藏東部。最後他又領兵通過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在中亞細亞的邊境上，重立了中國漢族的政權，震動了世界。

從此以後，回教徒中沒有傑出的領袖，能夠統一中國境內的回教徒，起來作獨立的鬥爭，其間，只有幾次特發的反對中國人統治的暴變，兩方面都有殘酷的屠殺。一九二八年，馮玉祥經營西北的時候，回教徒發生過最嚴重的叛變，西北五馬（註）聯結起來，獲得了很大的勢力，形成了他們今日的財富和勢力的核心。

雖然理論上中國人認回族是中華民國的五大民族之一，但是大多數中國人，似乎是不承認回教徒是獨立的一個民族，因為他們是早已漢化了的。事實上，南京方面採取了積極吸收回民的政策，這種政策雖然不見得怎樣成功，它是施行得比較對於蒙古民族吸收政策，更為直接的。中國官方對於回教徒的態度，只承認他們是宗教的少數者，而不是種族的少數者。不過，凡在西北回教區域內見過回教民族的人，都很明白，他們的要求種族的整一和民族整個性格的權力，在事實上和歷史上，是有他們的實質的基礎的。

中國的回教徒，聽說有二千萬人。這許多人中間，至少有半數是集中在陝西、甘肅、寧夏、四川和新疆一帶。在有許多地方——特別在甘肅和青海，他們是多數民族。有幾個很大的地方，他們對漢族人數的比率，是十比一。一般的說起來，他們的宗教勢力，是跟着他們在一地點中所佔人數的實力而變動的。但是在回教佔優勢的區域中，如甘肅北部及寧夏南部等地方，便顯明地是回教國家的空氣了。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回教徒是中國最高大的人民，在他們中間，教士和主教是世俗生活和精神

生活的裁定人，宗教是他們的文化，政治，及經濟的決定因素。回教社會，以蠻王（*Men Hwang*）和阿哥（*Alim*）為中心（酋長和教士）——他們對於可蘭經及土耳其語或阿刺伯語的知識，就是他們權力的根據。西北的回教徒，每天在許多回教寺裏做禱告，遵守晏會日，絕食日及婚喪等儀式。禁食豬肉，也禁止提及豬狗等名詞。以朝禮麥加為每個人的野心。富人和阿哥大多數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因此增加了他們政治及經濟的勢力。大多數回民，把土耳其——不是中國——作為他們的祖宗之地，汎回教主義——不是汎漢族主義——是他們的理想。

不過，在西北回民中，漢族的勢力，無論如何總是很顯著的。回教的衣着，與漢人一樣。（只是男人還戴圓形白帽，女人還用白布纏頭。）言語也與漢人一樣。（雖然有些人能夠讀一些可蘭經中的阿刺伯字。）而土耳其人的體態在他們中間是很多的，但是他們大多數人的體格，因與漢人通婚了好幾世紀，所以與漢人並沒有顯著的差別。依照回教的法律，凡與回教徒結婚的人，不但必須信仰回教，而且必須整個投入回教的家族，與他或她的漢族家人，完全斷絕關係。而這種混合通婚的子女，長大以後，也只認自己是回民，與他們的漢族的親屬絕對不同的。

現在中國回教徒中三派的爭鬪，削弱了回教民族的團結心，使得中國共產黨，有機會在回民中活動。這三派的回教：舊教，新教和新新教。舊新兩派，已造成了「聯合陣線」來對抗新新教。新新教，在

（註）第五個「馬」，是馬仲英，但是現在因為種族政策和國際糾紛，它的勢力已經消滅了。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大馬之奔逃（*Flight of the Big Horse*）一書對他有很有趣的敘述。

表面上，是打倒許多回教的習慣和儀式，而採取科學。真正的目的是要毀滅教士的世俗的權力。這種權力是四馬所討厭的。又因為這個新新教，是國民黨所支持的，所以有許多回教徒相信它的目的，是在實行那可憎的汎漢族主義的學說。——就是以漢族以收少數民族的學說。在西北，四馬是新新教的領袖。在他們的周圍，有許多食客、幕僚、官吏、大地主，以及大牧場主。那都是靠了四馬維持他們的勢力的。可是那四馬，並不是能够領導宗教改造運動的人物。

例如就馬鴻逵來說，他也許是四馬中最有勢力的一個。他有許多妻子。據說寧夏城內百分之六十的產業是他的，從鴉片、食鹽、皮毛、捐稅，以及他自己特別發行的紙幣，獲得了千萬的家財。還有一件事，證明他思想很摩登，那就是他新近竟從許多相片中，選定一個人做妻子。他派一個秘書到上海去搜集了許多受過教育的美人的相片，轉送給他選擇。並且確定當選者，聘金是五萬元。有一天，馬鴻逵親自趁了飛機，飛到蘇州，在那里他又娶了一個妻子。——蘇州某教會大學的畢業生。——飛回寧夏。當時引起了社會上大大的注意。

這個在西洋人看來，也許是很有趣的，不過馬鴻逵屬下的農民式士兵，是否欣賞他這一段浪漫史是很可疑的。因為農民知道，這五萬塊錢，是從那里來的。士兵會奇怪馬將軍既然有錢娶一個耶穌教的妻子，為什麼不發餉給他們呢？所以幾個月以後，紅軍向西向進入甘肅北部和寧夏南部，馬鴻逵的領土的時候，他的軍隊——他自己誇口，足以消滅「赤匪」的軍隊，——並沒有大作戰，實在是它的理由的。

這裏我不想列舉什麼統計的數字。但是我們看一看寧夏省政府所發表的公報，是很有意思的。

(註)那裏載着省政府所收的各科捐稅項目。他們包括下列各種項目：營業捐、家畜捐、駱駝捐、鹽運捐、鹽銷捐、烟燈捐、羊捐、商人捐、脚夫捐、鴿子捐、地捐、中人捐、糧食捐、特殊糧食捐、額外地捐、煤捐、皮捐、屠宰捐、船捐、溝洫捐、磨捐、房捐、磨坊捐、梯子捐、儀節捐、菸草捐、酒捐、印花捐、結婚捐、蔬菜捐。這些還沒有把各種小項捐稅完全列舉出來，可是從這裏，我可以明白人民不怕紅軍的侵入了。

馬鴻逵的食鹽分配方法是很特別的。鹽不但真賣，而且限定每一個人每一個月，不管他用得完，用不完，必須購買半磅鹽。他不准把鹽轉賣給人。販賣私鹽須受鞭打，甚至於處死，此外爲人民所抗議的，是賣出一只羊，一只牛或一只驢子的時候，政府要抽百分之三十的稅。家裏養了一只羊徵百分之二十五的稅。殺一只豬，徵洋一元，糶掉一石麥，徵洋四角。

但是人民所最恨的，也許是馬鴻逵的徵兵方法。他有四萬軍隊及許多城門的守衛（數目是不一定的）他們幾乎都是徵來的，有兒子的人家，必須應徵，否則就出錢雇人代替。雇一個人的代價大約是一百五十元一年。窮人可以出四分至六分的利息，到馬鴻逵所開的典當裏借錢應付。士兵非但沒有發月餉，他們還得自帶自己的衣食。很明白的馬鴻逵除了出錢討妻子以外，是一錢不費的。

過分的捐稅和大量的債務，迫得許多農民不得不賣掉他們的牛羊，放棄他們的田地。大塊的土地，都爲官吏收稅員和高利貸者賤價買了去。但這些土地，大部分都變成荒田了。因爲在苛捐雜稅的壓迫之下，實在沒有農民肯承種土地。土地、牛、羊和資本，加速集中。雇農的人數，也大量增加。在曾經參

觀過的某區（註）中，有百分之七十的農民負債。有百分之六十的農民靠着賒借糧食過活。在同區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民，有田自一百畝到二百畝；有駱駝二十頭到五十頭；有牛二十只到四十只；有馬五匹到十四匹；有車五輛到十輛；有商業資本一千元到二千元。同時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有田十四五畝，有驢一二匹，平均負債三十五元，欠麥三百六十六磅。——這個要比他們所有的土地平均價高得多了。

最後，有人疑心馬鴻逵密約日本來對付紅軍。有一個日本的軍事特務機關長，常駐於寧夏城。馬鴻逵允許日本人在城北，在阿拉善蒙古的區域內，建造飛機場。許多回人和蒙古人，都擔心着日本人的武裝侵入。

當紅軍到達的時候，假使沒有上面所說的那些情形，紅軍的勢力是否能夠在回民中積極伸張，是很可懷疑的。馬氏的軍隊一些也不想打仗。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因為要保護他們的財產，想從事抵抗。但回民不願與漢人合作，有很深的成見，是必須共產黨設法來克服的，他們對於回民提供了一個適當的綱要，並且因為紅軍深知回教區域在戰略上的重要，他們是出全力來推行這個綱要的。他們在西北，佔據了一帶遼闊的地方，控制了和蘇俄直接接觸的到新疆和外蒙的道路。共產黨的看法是這樣：

「在西北，有千萬的回教徒，佔據極端重要的地位。我們目前的任務和責任，是保衛西北，在這五省中建立反日的根據地。這樣我們才能夠更有力地領導全國的反日運動，馬上發動對日的戰爭。在同時，在我們這種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與蘇聯和外蒙連繫起來。但是我們假如

不能夠抓住回民，加入我們的反日前線，我們的任務是不能夠完成的。」

共產黨對於西北的回教徒，已經做了好幾年的工作。在一九三六年，紅軍經過寧夏，甘肅而向黃河進發的時候，青年的回教共產黨員早已在寧夏的軍隊中宣傳，打倒「回奸」馬鴻逵——有幾個青年就因為這樣失卻了頭顱。紅軍的回教工作的要點如下：

廢除苛捐雜稅！

成立回教徒自治政府！

廢止徵兵！

取銷債務！

保衛回教文化！

保證各派宗教自由！

成立及武裝反日回軍！

聯合全中國和蘇俄的回教徒！

這綱要似乎是每一個回教徒都歡迎的。有幾個阿訇也認定這是脫離馬鴻逵勢力支配的一個機會。（馬曾燒過新、舊兩派的回教寺。）而且也是實現他們經由中亞細亞與土耳其直接接觸的期望的機會。在五月間，共產黨已經宣稱他們已完成了懷疑者認為做不到的工作，他們誇口他們已經

（註）豫旺壩考察記，劉嘯著（載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當地工作，保安出版。）

（註）回民問題第二頁，九三六年六月二日，第一軍團政治部出版。

造成了中國回教紅軍的核心了。

#### 四 回教徒與馬克思主義者

有一天早晨，我同徐海東部下一個能說英語的人，來參觀第十五軍團主辦的回民訓練團。這個訓練團的團部，是在一個回教富商的大住宅內——一座牆壁很厚的大廈，從他的摩爾式的窗口可以望見石子砌成的街道，街道上走着驢馬駱駝和人。

屋子內部清涼而整潔。每間屋子的磚地上，擺着一個石製水池，下面與陰溝通着，這是作洗澡用的。正宗的回教徒，每日須洗五次澡。雖然這些士兵，仍舊極相信教義，遵行洗澡的習慣，我敢說，他們對於教義是不絕對拘泥的。可是他們比較中國境內的其他士兵，保有最清潔的習慣。他們極力避免隨地吐痰的那個通行的惡習。

紅軍會在前方組織了兩個回教徒訓練團，他們是從馬鴻逵，和馬鴻賓的軍隊中轉過去的。他們比漢人個子高大，體格強健，多鬚，黑膚，有着土耳其人特有的姿態。他們有着大而黑的圓形的眼睛，有強健的高加索人的形態。他們都帶着大刀。他們能夠很巧妙地揮舞大刀，砍掉敵人的頭顱。

漫畫標語、地圖、口號在他們營房牆壁上貼滿了。標語是「打倒馬鴻逵！」「反對日本建築飛機場，私繪地圖，侵略寧夏！」「實現回教人民的獨立政府！」「建立我們自己的反日回教紅軍。」這些忠告吸引了不少的回教徒。有時候，我問回教士兵，他們爲什麼加入紅軍，他們的回答也就以上述的標語作爲主要的論點。



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馬鴻逵的士兵，是怎樣的不滿於馬鴻逵！（自然有些地方是紅軍過分宣傳的。）而寧夏的農民也一樣對馬鴻逵不滿。我記得某天早晨我在路上碰到一個賣西瓜的農人，他有整個山坡種着西瓜。他是一個誠懇的鄉人，他有和善的面龐，他有幽默的表情，他更有一個美麗的女兒——我問他買了三個瓜，我問他馬鴻逵的官吏是否真像紅軍所說的這樣壞。他憤憤地張開了兩手，口中噴出西瓜子，喊道：「阿呀！阿呀！馬鴻逵！馬鴻逵！捐得我們要死了，他搶了我們的兒子，燒殺媽的馬鴻逵！」對於老年人這個憤怒的神態，圍在那裏的每個人笑起來了。

回教士兵的加入紅軍，是由紅軍在馬氏的軍隊中祕密宣傳，及他們到了紅軍營裏以後，聽了政治講演，而被吸收過去的。我曾詰問一個軍官，爲什麼他要參加紅軍！

他說：「爲的是要打倒馬鴻逵。在馬氏統治下，回民生活太苦了。回民中沒有一家是安全的。假定一家人家有兩個兒子，一個兒子必須當兵。假定有三個兒子，兩個必須當兵。除非你有錢能雇人替代，你是逃不走的。窮人怎麼辦呢？不但是這樣，每一個當兵的人，還要自己備衣服。他的家屬還要出錢替他預備食物，燃料，及燈火，這個得花上幾十元一年。」

雖然這些紅色的回軍訓練團，只成立了不到半年工夫，他們似乎已養成了相當的「階級意識」。他們已經自己讀了，或者聽人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的選文，以及其他有關回民生活的馬克斯主義的政治講演。這種教育，不是由漢人，而是共產黨中的回教徒來施行的。他們多是學校出身的。馬鴻逵的軍隊，百分之九十，是不識字的。大多數回教徒在初加入紅軍的時候，是不識字的，但現在他們每一個人都能够識幾百個字，而閱讀簡單的課文了。共產黨想從這兩個訓練團，養成回教紅軍的

幹部來防衛他們。希望在西北建立的自治回民共和國。這些回教徒，現在大約已經有百分之二十五正式加入共產黨了。

對於自治這個口號，一般回教徒，都很表同情，因為這是他們要求了好多年的事。倘使漢人能夠幫助他們剷除不良政治，幫助他們組織和武裝自己的軍隊，幫助他們組織自治政府，幫助他們處置其產業，他們是願意接受這機會的。倘使紅軍不實踐他們的諾言，他們會拿這個軍隊自己來運用的。不過從農人的親善的態度看起來，從他們準備接受紅軍的組織看起來，紅軍的政治綱要的確有很大的吸引力，而紅軍尊重回教習俗的謹慎的政策，甚至於深深地印入了最富懷疑心的農民及阿訇心中了。

在加入紅軍的回教士兵自己中間，歷史的種族疑忌之心，似乎早已消滅，而且逐漸地轉而形成階級對立的意識了。我曾詰問幾個回教士兵，問他們在蘇維埃政府之下，漢人和回人是否可以合作，其中有一個回答：

「漢人和回人是弟兄；我們回民身體中，本已經有漢人的血液存在。我們都是大中國的人民，所以我們爲什麼要互相戰爭呢？我們的共同敵人是地主、資本家、高利貸者，壓迫我們的官僚及日本人。我們的共同目標是革命！」

「但是倘使革命干涉了你們的宗教，你們怎樣辦呢？」

「不會干涉的，紅軍不會干涉回教徒的信仰的。」

「我的意思是這樣，譬如，有幾個阿訇是大地主，是高利貸者。倘使他們反對紅軍，你們怎麼辦呢？」

你怎樣對付他們呢？」

「我們要請求他們參加革命。不過大多數阿訇並不是財主，他們同情我們。我們中有一個將領，便是阿訇。」

「再譬如說，這些阿訇不接受你們的請求，而且他們聯合了國民軍來反對你們，你們怎麼辦呢？」

「我們要懲罰他們，他們是不良的阿訇，民衆會要求懲罰他們的。」

同時在第一軍團和第十五軍團中施行着緊張的教育，教育紅軍士兵了解共產黨的回民政策，及建立「回漢聯合戰線」的努力。我曾經隨班上過幾次政治課。在課中，士兵討論着「回教革命」，感覺到極有興趣。有一次課上辯論得很長久，特別關於土地問題。有些人主張，紅軍應該沒收回教地主的土地，有些人反對這個主張。那政治委員，則在辯論終結後，起來精確的說明黨的立場，並解釋爲什麼必須由回教徒自己起來實行他們自己的土地革命，而且他們必須有回教羣衆作基礎的強有力的革命組織來領導的。

有一課溫習回關係的歷史，另外一課討論紅軍公布的紅軍士兵在回教區內應守的種種規則。這規則規定紅軍在未得回民同意以前，不得闖入他們的住宅，不得侮辱教堂及教士，不得在他們面前，談及豬或犬，或問他們爲什麼不吃豬肉，或稱回教爲「小教」稱漢教爲「大教」。

除了實施這些回教政策，團結整個紅軍的努力之外，共產黨對於農村也有長時期的工作。上述的兩個回教士兵訓練團，領導了這個宣傳。但是紅軍也分派他們的宣傳隊，到一家一家去宣傳解說共產黨的政策，勸農民組織起來。紅軍戲劇團又跑到一個一個的鄉村上來表演回劇，這些都是以本

地情形及歷史事實作根據，足以鼓動大眾的。——同時發用漢文及阿刺伯文寫的小冊子，報紙及標語舉行羣衆大會，組織革命委員會及村蘇維埃。那些農民——漢民或回民——對於這些舉動，似乎感覺到乏味，而有逃避學習的趨向。但是這確是一個制度，似乎確是在活潑工作的一個制度。到了七月，寧夏好幾十個回教村鎮，選定了村蘇維埃，並且推派代表到豫旺縣去，和回教共產黨員共同開會。四個月以後，第四方面紅軍，渡過黃河，又向西行了二百里，到達肅州馬步芳的領地以內。朝着趨向新疆的大路前進。他們的迅速前進，實在由於他們在早期和回民成立友好關係的緣故。在這友好關係的發展中，我在寧夏看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九月初，寧夏方面召集一個在紅軍勢力下各村所選的蘇維埃委員會推舉出來的三百個回民代表大會。這些代表中，有阿訇，有教師，有商人，有二三個小地主，但是他們大多數是貧農。有產階級，早已在「漢匪」到達的時候逃走了。這個代表大會，舉出了一個主席，一個臨時回民蘇維埃政府委員會。他們通過議決案，與紅軍合作，接受紅軍協助，組織反日回軍，並立刻組織漢回聯合同盟，組織窮人會，及羣衆反日會。

現今在這一次大會中，最後的一件事——我認爲這是對於這邊農民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處置一個國民黨的收稅員。很明白的這個收稅員，在紅軍未到以前是已經爲回教徒所深惡痛絕的。紅軍到達以後，他逃到張家集，在鄰近的山村中住下。在那裏，他還是繼續收稅，他而且加倍收稅，對外宣稱那是紅色政府的新稅則，他是代表他們收的。回教農民知道新政府是沒有收稅員的，於是就由五六個農民把他捉住，解到豫旺壩去受羣衆裁判。我個人以爲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這樣的時候，有膽量胡言欺人，也的確是個人才，很可以供我們利用的，可是回教農民，並不這樣想法。當代表們決定

要處決這個收稅員的時候，就全體通過。

這是在豫旺壩兩星期中所看到的唯一被槍殺的老百姓。

# 第十章 戰爭與和平

## 一 再談四馬

八月二十九日，我騎馬到達紅城水。這是韋州縣一個美麗的小市鎮，它是以美麗的梨園、蘋果園、和葡萄園等出名的。這些果樹園受着澄清的泉水灌溉。這裏七十三師有一部份人駐扎着，附近有一個要塞，一道沒有壕溝的臨時防線，只有一排小鼯鼠洞似的機關鎗洞窟，及山頂週圍的堡壘——泥土築成的矮牆的防禦物——紅軍就在這裏對抗逐漸地撤退到五哩路以外朝着城裏去的敵人。幾星期來，這邊前線上沒有戰事，紅軍休息着，趁這個機會，把這個新得到的區域「凝固」起來。

我再回到豫旺縣，發現這邊的軍隊正在舉行西瓜宴，慶祝從甘肅南部傳來的無線電消息，說馬鴻逵部隊整整一師士兵已經走到朱德所統率的第四方面軍來。這個國民黨師的司令李宗義本來是奉命阻止朱德北上的。他部下較年青的軍官，內有祕密共產黨員，領導叛變，帶了三千左右士兵，包括一隊騎兵，加入了隴西附近的紅軍。這個對於南京軍隊在南部的防線是一個大打擊，加速了南部南方紅軍的向北邁進。

兩天以後，徐海東的第十五軍團的三師人馬有兩師又重新準備移動，一縱隊向南移動，爲朱德部隊造成一條通路，另一縱隊向西面黃河流域移動。大約在早晨三點鐘喇叭開始響了，到六點鐘，隊伍已經出發。我自己在那天早晨動身回到豫旺壩去，兩個紅軍軍官與我一起走，他們是向彭德懷報

告去的。我和徐海東及他的總部人員從南門出城，跟在軍隊和牲口的長長的行列後邊，這好像一條灰色的龍游過無邊的草地，一直到你的視線盡頭。

大軍肅靜地開出城去，只有軍號不停地響着，給人一種指揮得很好的印象。我聽說軍隊進行的計畫是好幾天以前完成的，仔細地勘察好了路線，仔細地在紅軍自己繪成的地圖上標明了敵軍集中的地點，哨兵事前阻止過路客商通過這些路線（除了交戰或行軍的時候，紅軍爲要鼓勵商業起見，一向允許他們通行的）。他們在國民黨軍隊一些不知道他們出發以前走掉了，這是可以從日後他們乘敵人的不備而佔領他們的哨地來證明的。

跟着軍隊走的，除了三十多隻甘肅獵犬以外，我什麼都沒有看見，牠們緊密地在一起跑着，在平原上奔來奔去，追逐一隻在遠處偶然發見的羚羊或野豬。牠們快樂地吠着，鬪着，顯出很喜歡去打仗的樣子。許多士兵隨身都帶着他們自己心愛的東西。有許多個人帶着幾根弦線；有一個人肩上一隻一隻灰色鴿子；有些人帶着小白鼠。有些人帶着小兔子，這是一個軍隊嗎？從戰士的小小的年齡上看起來，從一路上的歌唱的聲音看起來，他們活像是小學生在舉行假期旅行。

走出城幾里以外，突然下令舉行防空演習。一小隊一小隊的士兵都離開大路，躲在很長的草裏，戴着用草做成的闊邊帽子，披着草做的披肩。機關鎗（他們沒有高射礮）在大路邊的草丘上架着，則待着飛得很低的目的物。不多一刻工夫，這條龍就整個被自然景色吞沒。你不能够從無數草叢中辨別出人影來。只有驢子、駱駝和馬在路上還看得見。航空員也許會把牠們看做普通的商人旅隊。但是騎兵隊（他們那時候在前面開路，這裏看不見的）就比較困難，他們唯一可能的警備辦法，就是找

尋隱蔽的處所，否則只有仍舊騎在馬上，儘量的往四面散開來。在空襲的時候，倘使沒人騎在馬上，這些蒙古馬是無法駕馭，整個騎兵隊就要極度混亂。一聽到飛機軋軋的聲音，對於騎兵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上馬！」

司令宣稱這次演習很爲滿意，我們繼續前進。

李長林說得對的。紅軍的好馬都在前線。紅軍的騎兵師是全軍中足以自豪的一師，每個士兵都渴望升到這一師裏來。他們在體格上是全軍的精銳，騎在三千匹美麗的寧夏馬上，這些馬，比你在華北看到的蒙古馬更高大，更強壯，有光滑的脅腹和豐滿的臀部。大部分從馬鴻逵和馬鴻賓部裏奪來的，但是也有三大隊的馬是在一年以前與何柱國將軍的騎兵第一軍交戰的時候奪來的，包含一大隊全白的和一大隊全黑的馬。這是紅軍第一騎兵大隊的核心。

紅軍走進甘肅陝西的時候，紅區以外的人都料定回教徒的騎兵隊會把牠們擊破的，而事實的證明却並不這樣。一九三五年，在陝西創辦了一個學校，紅軍騎兵隊的核心是由騎兵專家，曾在蘇俄的騎兵隊服務的德國顧問李德訓練起來的。陝西和甘肅的民衆有許多是在馬鞍上長大的——不像大多數南方人一樣不會騎馬的——這邊的人有了這種好的根底，就立刻練成了一個優越的騎兵軍團。一九三六年他們開始踏上戰場，把馬上戰爭的新戰術介紹到西北來。

回教徒們是優秀的騎兵，但他們沒有受過馬上射擊或使用馬刀的訓練，中國的騎兵隊也沒有受過這種訓練。他們的戰術是與步兵配合着，擔任側面攻擊，倘使這樣打不退敵人，他們就下馬從地上放鎗，因此失掉騎兵的活動性。李德訓練紅軍騎兵隊使用馬刀，這是紅軍兵工廠製造出來的很粗



劣的，但是很適用的。因為紅軍騎兵能夠用馬刀密集砍殺，因為他們在短短一年中接連打了許多勝仗，奪得許多新馬，他們是很快地就成名的。

我在甘肅與紅軍騎兵隊騎了好幾天馬——更正確地說，我與牠步行了好幾天。他們借一匹配着一個奪來西洋馬鞍的好馬給我，但是每天一到夜，我總覺得自己非但沒有節省時間，反而爲馬費了許多時間。這是因爲我們的騎兵隊長深怕他的四腳動物跑得疲乏，一定要我們兩只腳的，每騎了一里路，就牽着馬走三四里路。他對待他的馬匹，好像對待他的寶貝一樣，所以我結論說凡有資格在這個樣的騎兵隊裏當兵的，必須是一個看護而不是一個馬夫，而且他走路的本領一定要比騎馬的本領強。我對於他們這樣的愛護牲口——在中國這是不平常的現象——是相當的欽佩的，但是我情願離開他們，回復我的自由自在的行動，在這時候，我有時倒能夠真正騎得到馬。

我把當時這種情形，婉轉地對徐海東說了。我疑心他是有心和我開個玩笑的。我回到豫旺壩去的時候，他借了一匹好的寧夏馬給我，牠與公牛一樣的強壯，這在我生平是騎馬騎得最出神的一次了。在草地上一個大堡壘旁邊，我與第十五軍團的路線分開。在那裏我向徐氏及他的總部人員告別。隨後我騎上了借來的馬，在這時候，我心裏起了一種感想，我想到了豫旺壩的時候，究竟是誰還活着的。

這是橫過平原的五十多里的坦途。一路上我們只有一天下馬步行。在最後五哩路中，我的馬不斷地飛奔着，最後掃過了豫旺壩的大街，同伴都老遠的落在後面。在彭德懷的司令部前，我跳下來，檢視我的牲口，我想牠會昏過去的。牠卻輕輕地喘着氣出了一身汗，但是牠是仍舊非常沈着。

這次騎馬真正使我不舒服的就是那中式的木頭馬鞍。那馬鞍很狹小，我坐不進座位裏去，事實上我一路都是用兩股的內部騎在馬鞍上的。短而且重的鐵踏蹬把我的兩腿緊緊地拘束着，使我感覺到和木頭差不多。我現在只想休息和睡眠——但是我沒有得到。

## 二 『小紅鬼』

有一天早晨，我爬到豫旺壩的闊而且厚的黃色城牆上，從這城牆的上部，我們可以看到三十呎以下的地面，望得到許多不和諧的普通工作在進行着。這好像你揭開了這個城的蓋子一般。一大部分的城牆毀壞了，真的，這是紅軍所做的破壞工作。城牆對於紅軍這樣的遊擊戰士是一種障礙物，他們竭力想法來同敵人在空曠的鄉村裏作戰，倘使他們失敗了，他們並不想保衛有城牆的城市來消耗自己的士兵，因為他們在這裏有被封鎖或消滅的危險，所以他們一定撤退，讓敵人來佔領那種的陣地，倘使他們高興的話。無論怎樣，假定他們有充分力量再度奪取這城市的時候，破壞了的城牆會使他們的工作趨於簡單的。

在這鋸齒形的城頭上轉了半個圈子，我碰到一隊號兵——他們這時在休息。我看到了他們很高興，因為他們響亮的號聲已經連着響了好幾天了。他們都是少年先鋒隊員，純粹是小孩子，我裝着父輩的神氣停在一個孩子面前，與他談話。他穿着網球鞋，灰色短褲，戴着一只褪色的上面有一個很黯淡的紅星的灰色帽。但是戴這只帽子的號兵卻並不黯淡，他有玫瑰色的臉龐，閃閃有光的眼睛。你看到這樣的孩子，你會像看到一個需要慈愛和朋友的有毅力的流浪兒童，你的心就自然會熱起來。

我想：他一定極想家！但我立刻明白，他不是媽媽的孩子，而是一個老練的紅軍。他告訴我，他今年十五歲，四年以前在南方加入紅軍。」

『四年！』我將信將疑地喊道，『那末，你是十一歲加入紅軍的？你參加「長征」嗎？』

『是的，』他意氣揚揚地回答道：『我已經當了四年紅軍了。』

『你爲什麼加入紅軍？』我問。

『我的家住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常常到山上去樵柴，冬天就到山上去檢樹皮。我常常聽村裏人講起紅軍。他們說紅軍是幫助勞苦大衆的，我贊成這一點。我的家很窮。我家一共六個人，我的父母和三個哥哥。我們沒有田地。田租吃去了我們一半以上的收成，所以我們老不夠吃。冬天，我們用樹皮燒湯喫，把穀省下來做來春的種子。我總是挨餓。

『有一年，紅軍來到漳州近旁。因爲我們很窮，我爬過山頭去請他們幫助我們的家。他們待我很好。暫時把我送到學校裏，我吃得很多。幾個月以後，紅軍佔領漳州，達到我的村裏。把地主、高利貸者、官吏完全都趕走。我家分到田地，用不着再付捐稅與田租。我們家裏人很快活，都稱讚我。兩個哥哥也加入紅軍。』

『他們現今在什麼地方呢？』

『現今我不知道。我們離開江西時候，他們在福建的紅軍裏；他們和方志敏在一起。現今，我不知道。』

『那時候農民歡喜紅軍嗎？』

『歡喜紅軍呀！當然，他們歡喜紅軍，紅軍分田給他們，趕走了地主、收稅員及高利貸者。』（這些『小鬼』都有馬克思主義者的字彙）

『其實，你怎麼知道他們歡喜紅軍呢？』

『他們用自己的手替我們做千萬雙的鞋子。婦女給我們做軍衣，男人偵察敵軍。每個人家都送子弟加入紅軍。老百姓就是這樣待我們的！』

不必問他歡喜不歡喜他的同志：沒有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會跟自己所憎惡的軍隊走六千哩路的。

紅軍裏有無數像他一樣的少年。少年先鋒隊是共產青年團所組織的，據C. Y.的祕書馮文彬說，西北蘇維埃區裏有隊員四萬名。單在紅軍裏總有幾百人。紅軍每一個駐紮地都有一個少年的先鋒隊的『模範隊』。他們都是十二歲到十七歲（照外國算法，實際上是十一歲到十六歲）的少年，從中國各地方來的。內中有許多人，像這個小號兵一樣，經歷過長征的磨難而留下來的。有許多是在向山西遠征的時候加入紅軍的。

少年先鋒隊員在紅軍裏當傳令兵、伙夫、號兵、偵探、無線電收發員、挑水夫、宣傳員、演員、馬夫、看護、書記，甚至於教員！一次我看見一個這樣的少年在一幅大地圖面前向一班新兵講解世界地理。生平所看見的最優美的兩個舞童，是第一軍團劇社的少年先鋒隊員，他們是從江西那兒來的。

你也許要懷疑，他們是怎樣度過這種生活的，一定有好幾百名死了或殺掉了。有兩百多名因為做偵探工作或宣傳工作，致被逮捕，在西安骯髒的監獄裏監禁着，有些是長征時趕不上軍隊的散兵。

但他們堅忍的精神真是驚人，他們對紅軍的忠誠，是每一個少年人的毫無問題的絕對的忠誠。

他們大多數人所穿的軍服都太大，袖子垂到膝頭，上衣幾乎拖到在地上。他們說他們一天洗三次手和臉，但是他們老是很憐的，鼻子裏流着鼻涕，他們常常用袖子管揩抹，露出牙齒癡笑。但世界總是他們的：他們吃得很多，每個人都有一條毯子，他們的領袖甚至於還有一枝手鎗。他們纏着紅布，戴着多少嫌大一些的帽子上面綴着一個紅星。他們的出身都很模糊。有許多記不清他們自己的父母，有許多是逃亡的學徒，有些曾經做奴隸。大多數是從人口過多，不能過活的小屋裏逃出來的，而他們全體是自己決定加入紅軍的。有時候成羣的少年逃到紅軍裏去。

他們有許多英勇的故事。他們的神情不像孩子，有許多孩子實際上已打過仗。他們說在江西，當紅軍主力離開的時候，有好幾百個少年先鋒隊員和共產青年團員與遊擊隊一同作戰，甚至上了刺刀實行肉搏戰——因此白軍的士兵都笑着說他們自己能够奪下他們的刺刀，把他們推到壕溝裏，他們實在是太小太輕了。在蔣氏爲江西匪徒而設的感化院裏，有許多被俘虜的紅軍只有十歲到十五歲。

少年先鋒隊員所以歡喜紅軍，大概是他們在紅軍裏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的緣故。他們的食和住都像人，他們似乎每樣事情都要參加；他們認定他們自己與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沒有看見過他們中間有誰挨過打或受了欺侮。他們真的被『利用』做傳令兵和伙伕了（這是很驚人的，有很多命令從最高當局傳下來，最後傳到少年先鋒隊），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自己的活動自由，有他們自己的組織保護他們。他們練習競技和遊戲，他們受着初步的教育，他們獲得一種簡單的馬克思主義。

的口號的信仰——這些口號的意義，在他們的心中，不過是幫助別人打地主和師父的。很明顯的，在師父的工作檯前，一天做十四小時工作，侍候師父吃飯，吃完師母吃剩的夜飯碗要好些。

我記得在甘肅碰到一個這樣逃亡的學徒，他的綽號叫『山西哇哇』。他曾被賣給山西洪洞附近某縣的一個店家。紅軍來到的時候，他與另外三個學徒偷偷地爬過城牆，加入紅軍。他怎樣決定去參加紅軍，我不知道，但是閻錫山的一切反共宣傳及老年人的一切警告，顯然已發生了一個相反的效果。他是一個布丁似的胖孩子，有嬰孩般的臉孔，只有十二歲，但是已經很能夠照顧他自己，像他在穿過山西和陝西而走到甘肅的長征途中所表現的一樣。我問他為什麼當紅軍，他說：『紅軍為勞苦大眾作戰。紅軍是反日的。為什麼我不要當紅軍呢？』

另外一次，我碰到一個十五歲的個子很瘦的少年，他是在甘肅河灣連附近一個醫院裏工作的少年先鋒隊和共產青年團的領袖。他的家在興國（江西紅區的模範縣）。他說他有一個兄弟還在江西遊擊隊裏，他的姊姊做過看護。他不曉得他的家族到底怎麼樣了。是的，他們都歡喜紅軍。為什麼？因為他們『都懂得紅軍是我們的軍隊——為無產階級作戰的』。我懷疑遠征到西北的大軍到底在這少年的腦子裏留下什麼印象，但是我沒有找出來。全部長征在這個深思的孩子看來，是一件事，不過是走過兩倍美國的闊度一樣長的徒步旅行罷了。

『這是極辛苦的吧？』我冒失地問。

『不辛苦，不辛苦，與同志在一起走什麼長征都不辛苦。我們革命的少年不能夠想到事情的辛苦不辛苦，我們只能夠想到我們當前的任務。倘使牠要我們走一萬里，我們就走一萬里，牠要我們走

兩萬里，我們就走兩萬里！」

「那末你歡喜甘肅嗎？牠究竟比江西好還是壞？南方的生活比較好些嗎？」

「江西是好的，甘肅也是好的。有革命的地方都是好地方。我們吃什麼，睡在什麼地方，都是不重要的。只有革命是重要的。」

我想這是千篇一律的回答。這個孩子從紅軍宣傳員學好他的回答。第二天，在紅軍的士兵大會中，我很詫異地發見他是主要的演講者之一，他天生是一個宣傳家。我聽說他是軍隊裏最好的演說家之一，而在那次大會中，他簡潔而有力地說明了現在的政局，和紅軍所以要停止內戰而與一切反日軍隊結成聯合陣線的理由。

我碰到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他以前是上海一個機器廠裏的學徒，同着三個伙伴，歷盡了種種危險，到了西北。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是保安無線電學校的學生。我問他是否想念上海，他說不，他什麼也沒有留在上海，他在上海所有的唯一的趣事，就是望着商店櫥窗裏的美味食品——當然這種食品他是買不起的。

但是我歡喜的孩子中最好的一個，是保安那個「小鬼」。他是外交部交通司司長李克農的傳令兵。這個小鬼是山西人，大約十三、四歲，我不知道他怎樣加入紅軍。他是少年先鋒隊的交際大王，是一個極盡職責的孩子。他穿着一套很好的極配身的小軍服，他的帽頂破了的時，他老是襯上一張新的厚紙。在他的刷得很乾淨的上衣的領口裏邊，老是襯着一條白麻布。他是鎮上最漂亮的一個士兵。毛澤東站在他旁邊，和他比較起來，毛氏就真像一個遊蕩者了。

但是由於他父母的疏忽，這個娃娃的名字恰巧叫做季伯。這個名字本來沒有什麼不好，不過季伯唸起來很像『雞巴』，因為這樣，別人就常常叫他『雞巴』，給他無窮的煩惱。有一天，季伯走到外交部我的小房間裏來，帶着往常莊重的神色，兩腳立正向我行了一個我在紅區所看到的最像普魯士式的敬禮，叫我『斯諾同志』。接着他說出他小心裏的憂慮來。他的目的是要我說明，他的名字不是『雞巴』，而是『季伯』。他說這兩者在世界上是完全不同的。他在一張紙條上很當心地寫下他的名字，放在我面前。

我驚駭得很嚴肅地回答他，說我只有叫他『季伯』，從未叫過他別的名字，而且從不想叫他別的名字。假使我叫過他別的名字，我希望他用刀子殺我，或用手鎗打我。

但是他謝了我，很恭敬的對我鞠了一個躬，又向我行了那種不平常的敬禮。『我希望你擔保，』他說：『當你在外國報上寫到我的時候，不要寫錯了我的名字。倘使外國同志想到一個紅軍士兵，名叫『雞巴』，是會給他們一個壞印象的。』在那個時候以前，我根本沒有想把季伯介紹進這本奇書裏，但是經過了那次談話以後，我對這件事情就不加甄別，就顧不得歷史的莊嚴，到底讓他走進這本書來，站在總司令旁邊了。

在後方檢查過路旅客是蘇維埃少年先鋒隊的職務之一。看他們有沒有通行證。他們很認真執行這個職務，把每一個沒有通行證的旅客帶到當地的蘇維埃去盤問。彭德懷告訴我，有一次幾個少年先鋒隊員叫他站住，向他要通行證，聲言否則就要逮捕他。

『我是彭德懷』他說，『通行證就是我自己發的。』



『即使你是朱德司令，我們也不管，』年青的懷疑者說；『你必需有一張通行證。』他們發出了一個求助的信號，幾個孩子就都從田野裏跑來增援。

彭德懷到底寫一張通行證，他自己簽了字，然後他們纔放他通行。

總而言之，正像你們推斷的一樣，中國紅區『小鬼』的言行是很難找出他們的嚴重的錯誤。他們的精神是莊嚴的。我料想大人看到了他們，就會忘掉了自己的悲觀，興奮起來，想到自己正在爲這種孩子的將來而戰鬥。他們永遠是愉快的，樂觀的，他們不管白日行軍的疲乏與否，一碰到人就問他『好！』他們是忍耐的，苦幹的，活潑的，及熱烈求知的，看到了他們就會感覺到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倘使這種孩子都能夠得到解放，受了教育，使他們覺悟，使他們有機會參加新世界的建造，那末從這少年先鋒隊裏就可以看出中國的將來。我想我這樣說來好像是在說教，但任何人看見了這些英勇的少年人都會感覺到中國人並不是生下來就下流的，相反的，它是有前途無量的人格。

### 三 實踐中的『聯合陣線』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旬，我在寧夏和甘肅前線的時候，彭德懷部隊開始朝西向黃河移動，然後再朝南向西蘭公路移動，爲從南方來的朱德部隊造成一條通路——這次行軍在十月底順利地完成，這時候赤色聯軍完全佔領了西蘭公路以上的甘肅整個北部。

但是因爲要求國民黨軍隊抗日而決定與他們妥協，紅軍一天一天的增加他的政治宣傳隊的成分，而不是專門注重打勝仗而奪取權力的軍隊了。共產黨發出新訓令，要紅軍在將來的行動中注

意『聯合陣線的戰術。』什麼是『聯合陣線的戰術』呢？我當時的行軍日記也許是對這問題的最好的回答。

包頭集，九月一日。第一路軍的司令部離開豫旺壩，步行了四十多里路，彭德懷司令常常和驛夫們開玩笑。一路所經過的地方差不多全是山地。彭氏的司令部就在這小村莊裏一個回族農民家裏過夜。

馬上在牆壁上掛了地圖，裝了無線電。消息來了。彭氏利用他休息的時候，召集了許多回族農民，向他們說明紅軍的政策。一個年老的婦人坐下來，和他談了兩個鐘點，向他訴苦。同時紅軍的收穫隊從他們旁邊走過，打算去收割一個地主的稻，因為這個地主已經逃走，所以把他當做『奸細』沒收了他的土地。另外一小隊士兵奉命保護當地回教徒的寺院。他們與農民的關係似乎很好。農民們已經在紅軍統治之下過了好幾月不納稅的生活。一星期前，有一個代表團獻給彭氏六車穀物和雜糧，表示他們的謝意。昨天幾個農民送給彭氏一張很好的木頭牀，這使他覺得很高興。他把這牀轉送給當地的阿訇。

李家溝，九月二日。上午四點鐘在路上。彭氏早就起身了。撞到十個農民，他們從豫旺壩跟着軍隊到這裏來，幫助他們運傷兵回醫院。他們因為馬鴻逵強迫他們的兒子加入軍隊而恨他。他們爲了要打倒馬鴻逵，便自願來做這工作。一架南京政府的轟炸機在我們頭上飛過，看見了我們，我們就四散地躲避起來。全軍消失在自然風景裏。飛機繞了兩個圈子，扔了一個炸彈——『下了一個鐵蛋』或『落下一些鳥糞』。紅軍是這樣說的——於是又猛烈地轟炸馬匹，又上前轟炸我們的先鋒隊。一個

士兵躲避得慢一點，就炸傷了一條腿——一些些輕傷——傷口包紮好了，以後他仍能走動，不須要別人扶持他。

從我們過夜的這個村子看去，簡直看不到什麼東西。有一團敵軍駐守在附近的堡壘裏，十五軍團的一部分在進攻。

從豫旺壩傳來一個無線電消息，報告敵機飛到那裏去轟炸城堡，今天早晨擲了十個炸彈。炸死與炸傷了許多農民，士兵未擊中。

太堡子九月三日，離開李家溝，在路上，許多農民都給兵士送開水，這是那一帶鄉人日常的飲料。回族的小學教員都前來爲彭氏送行，感謝他保護他們的學校。我們逼近太堡子（這時離豫旺壩西一百多里）的時候，馬鴻逵部下的一隊從孤立的陣地撤退下來的騎兵，抄到我們的後方。離開我們只有幾百碼路。嚴參謀長派一隊司令部騎兵去追擊他們，他們就在塵埃中疾馳而去。一個紅軍的輸送隊突被襲擊，就派遣另外一隊士兵去保護騾子和物品。輸送隊安然回來。

今夜在告白板上，揭示了幾件有趣的新聞。李王堡被圍，一個白礮彈打中那邊附近的堡壘，幾乎落到徐海東的司令部。炸死一個少年先鋒隊員，及炸傷三個士兵，在附近另外一個地方，一個白軍排長被突擊隊所執。紅軍士兵把他稍稍打傷了，然後解回司令部。彭氏因爲他們打傷了那個排長，對着無線電機大聲叫喊：『這不是好的聯合陣線的戰術。』他解釋：『一句口號值十顆鎗彈。』他對部下演講『聯合陣線』及它的實際的應用。

農民在路上販賣水果和西瓜，紅軍士兵購買什麼東西都是付現錢的，一個青年士兵與一個農

民經過了很久的交易以後，把他的愛兔換了三個西瓜。喫完了西瓜，他很懊惱，又想要回他的兔子來。電話傳來一個報告：敵軍一團被第一軍團第二師一部所包圍。他們用歡迎的吶喊，親善的口號及號聲『歡迎』他們的敵軍。紅軍因為他們絕糧，送給他們二百隻羊，並附了一封信，說明紅軍的政策。白軍答應當天下午答覆，在那封信裏紅軍提出聯合陣線的綱領，彼此和解，聲明倘使我們撤退，他們也不開火。到兩點鐘，那些白軍（馬鴻逵的部隊）撤退了。『這是聯合陣線鬪爭中勝利的一着』彭氏得意地說。有些紅軍士兵仍舊向他們開火，但是這些似乎是少數的『個人主義者』。他們不懂得爲什麼要放棄了他們手中的那些武器。因為這樣他們受到了嚴厲的譴責，並且又爲他們講了一番『聯合陣線』。有些兵士還不能理解，還想俘獲白軍，但是這個舉動是被阻止了。這一次紅軍本來可以俘獲一隊騎兵，但是命令卻叫他們不要這樣做。

今天晚上彭氏和政治部人員討論，士兵反對聯合陣線的傾向的問題。大家感覺到須『做更多的教育工作』。

另外一個消息：在馬良湖，一羣敵兵來到紅軍防線內參加反日大會。他們放下了他們的來福槍，接受紅軍的邀請，由他們的團長同着，前來聽講。他說：『對於日本軍，我們是準備打的。只要告訴我怎樣打法。』他告訴紅軍他本團以及馬鴻逵所部的各團裏，不管是中國兵或是回兵，至少都有三個法西斯（藍衣社）偵探在內，所以必需秘密合作。

徐海東騎着他那匹大騾子，前來與彭氏及第一軍軍長左權開會。過後，他講了第十五軍裏一個『小鬼』的故事，他是前線的信差。他奉命傳送幾件公文，在路上他要繞過一個敵人的堡壘，他不走

山上的小路，卻從容不迫地沿着大路，走過敵人的堡壘戰位的前面。白軍看到了他，就派了一隊騎兵來追他，但是他騎着一匹沒有馬鞍的快馬，把敵兵遠遠的落在後面。『他老是這樣做的』徐氏憤憤地說，『但他是前線騎馬的最好的信差。』

爲了慶祝今天的消息，彭德懷舉行了一個『西瓜宴』這裏的西瓜真是價廉物美。

太堡子，九月四——五日。政治部的劉曉現在李王堡附近的回兵中工作。今天他送一個報告來，講述近來當地工作的開展。馬鴻逵部下有一團士兵要求紅軍回兵團派一個回人去與他們談話。馬氏的團長拒絕接見紅軍代表，但是允許他與他的士兵談話。

王君（紅軍回兵團代表）回來報告他在兵營裏到處看見紅軍的傳單。他說同兵士們談了幾點鐘，他們越聽越高興，最後團長也來聽，但是聽得憂煩起來，決定逮捕他。士兵們提出抗議，他就安然由士兵們護送回到紅軍防線。該團送來一封信，答覆王君爲劉曉帶給他們的信。他們說他們不撤退，因爲他們是奉命守住這個區域，他們必需這樣做的，但是他們準備訂立抗日協定，但紅軍應該同他們的師長商議，倘使紅軍不打他們，他們也不打紅軍，紅軍送給他們的信和小冊子都已分發給弟兄們了。

今天有兩架飛機轟炸這裏附近的紅軍騎兵隊。兵士和馬匹都沒有炸中，但是有一個炸彈擊中了一個鄉村回教堂的屋角，炸死三個老年的回教侍役。這一個舉動是不會增進當地百姓對南京政府的情感。

太堡子，九月六日。休息一天。第一軍團全體司令官聚集在彭德懷的司令部裏，舉行西瓜宴，士兵

們在休息，同時也有他們自己的遊戲及『西瓜宴』。彭氏召集所有中下級長官開一個大會，接着又開政治會議。他們允許我參加。彭氏的演詞要點如下：

『我們開拔到這些區域的原因，第一是擴大和發展我們的蘇維埃區，第二是與第二、第四兩方面軍（在甘肅南部）的進軍聯絡，第三是消滅馬鴻逵和馬鴻賓在這些區域內的勢力，直接與他們的軍隊結成聯合陣線。

『我們必須擴大這裏的聯合陣線的基礎。我們必須堅決地抓住目下那些同情我們的白軍軍官，使他們堅決地轉到我們這邊來。現在我們已經同他們有許多人感情很好，我們必須在通信裏，在我們報紙上，由代表，由祕密團體的關係等，繼續努力我們的工作。

『我們必須趕快解放這裏的回民羣衆，等到他們組織好了，成立了他們自己的代議政府，我們就馬上把他們武裝起來，這樣使反口回軍早日產生出來。

『我們必須在我們自己隊伍裏加強教育工作。在新近幾次事件中，我們的弟兄向我們同意着撤退的白軍開了火，破壞了聯合陣線的政策。在另外一次事件中，弟兄們不願交還奪獲的步鎗，使長官要連下幾次命令叫他們這樣做。這並不是破壞紀律，而是對長官命令缺乏信仰，表明弟兄們沒有充分了解這種行動的原因，實際上有些弟兄正在譴責他們的頒發『反革命的命令』的領袖。一個連長接到白軍連長的信，看也不看，就把牠撕了說：『這些白軍，他們都是同樣的貨色。』這表明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的教育我們的士兵；我們最初的演講沒有使他們弄清楚他們自己的地位。我們必須

徵求他們的批評，徵求他們對我們的政策經過周密討論與說明後認為必要修正的意見。我們必須使他們了解，聯合陣線的政策，不是愚弄白軍的詭計，而是一種基本政策，與我黨的決議站在同一線上的。

「在江西，蔣介石對於我們和我們政策散布了許多可惡的謠言，他的封鎖政策，阻止我們向蘇維埃區以外的中國人民提出否認。現在他的法西斯黨正在這裏散布關於我們的謠言，用中日物力比較來打擊我們的反日政策。蔣氏隱匿了真理，他不提到中國反日運動並不孤立，而是有我們的友軍如蘇俄及日本本國內的無產階級。我們必須使敵軍澈底了解反日運動的根據，而打倒法西斯黨的欺人之談。」

「東征（進入山西）以後，我們許多同志來到這裏，再轉到甘肅、寧夏，因為我們在那裏所引起的反應與這裏的一比，相差太遠，很感覺到失望。因為這裏是這樣的窮困，民衆的政治熱情的水準又這樣的低，他們很感覺到苦悶。不要失望！更加努力工作吧！這裏的民族也是兄弟，他們對於我們的待遇，也會像別人一樣起同樣反應的。我們切不可失卻一個去說服白軍士兵或回族的農民的機會。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十分賣力。」

「在羣衆方面，我們必須督促他們去領導每個革命行動。我們自己切不可去觸碰回族的地主，但是我們必須明白指示民衆：他們有這樣做的自由，我們會保護他們做這種工作的羣衆組織，這是他們勞動的產物，是屬於他們的。我們必須加強我們的努力，喚起羣衆的政治意識。記着，他們直到如今，除了種族仇恨以外，就沒有什麼政治意識。我們必須喚起他們的愛國意識。我們必須在「哥老會」

及其他秘密組織裏加緊我們的工作，使他們不僅僅是被動的而且是主動的結成反日陣線。我們必須與「阿哥」們保持友好關係，督促他們領導反日運動。我們必須把回族青年全體組織起來，加強革命政權的基礎。」

彭氏演說完畢，接着第一軍團和第十五軍團的政治委員對他的演說作了一個詳細的批判。他們兩人都敘述自己在「聯合陣線教育工作」中的努力，暗示工作的進步。全體長官都記了很多的筆記，隨後開了一個很長的辯論會，一直開到喫中飯。彭氏提議兩軍各招新兵五百名，有人附議，全體一致的通過了這個提議。

午飯後，第一軍團戲劇團根據過去一星期的經驗，演了一齣新編的戲。牠演出長官及弟兄在實行新政策的時候所犯的錯誤。一場是演一個長官同一個士兵的辯論，另外一場演兩個長官的辯論。第三場演一個連長撕掉一封白軍送來的信。

第二幕表演這一切錯誤都改正了，紅軍同反日回軍共同前進，歌唱着，同心協力地抵抗日軍和國民黨軍隊。戲劇教育部的工作看起來真夠敏捷。

來了一個報告，說南京政府的飛機猛烈轟炸國民黨軍隊駐守的李王堡。很明顯的這轟炸員因為那個地方的四周圍全是紅軍，以為他們的軍隊早已撤退了。在轟炸的時候，有些回兵逃到城外，躲避在山洞裏，但紅軍並未開槍打他們。彭氏說這種事情，在江西是常常發生的，有時蔣介石自己飛機上的轟炸員以為他們在轟炸紅軍，毀滅了整個市鎮和民團或南京政府的軍隊。



先鋒隊還沒有到達海原，就暫緩前進，肅清少數敵軍的據點。這些據點都在李王堡及馬良湖。整個固原河流域和固原河以西的區域就首先赤化了。紅軍現在開進了全是回民的區域，這裏人口極稀，直要等到他們到達在清原的黃河流域，纔是人口稠密的漢人區域。

明天我回到保安。一個月以後，每個中國紅軍的注意都迫切地集中在接連的行軍上，一切紅軍的主力部隊都聯合起來。最後在一個大區域裏集中。這在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應該歸功於這次從南方北上的大軍的領導——朱德、『全中國』紅軍總司令，他在西藏度過了一個寒冷的嚴冬，而現在又在意想不到的勇敢和成功的進軍中，領導第二方面和第四方面大軍衝入西北。

#### 四 關於朱德

與沙氏比亞不同，孔子主張人的名字是極重要的。朱德這個名字至少是很有意義的。這是一個很響亮的名字，在英文中根據這個名字的發音，實在應拚作 *Mr. Deh*。由於文字上的巧合，這是一個很恰當的名字。這兩個中國字的意義，是作「紅德」解釋的，不過當他父母於他在四川儀隴出世，爲他取名字的時候，是沒有方法預知這名字日後的政治意義的。否則他們一定會在恐怖中把他的名字改掉的。

關於朱德的出身，現在有一點該特別提出的。就是在一九三六年倫敦出版的中國在歧途中一書宣稱：「朱德有許多年的生命是消耗在極苦的苦力生活中，」然後從這個很低的地位爬起來與壓迫者鬥爭的一段話是記載錯誤的（對於毛澤東這本書也有同樣錯誤的記載。）實在相反的他

並不是城市裏面的所謂苦力，而是農村裏面的貧農。根據雷謨韋爾斯所記的他的自傳，他於一八八六年生於儀隴縣的馬鞍莊。他的家族是窮苦的佃農，爲着一家二十口的生活，他們租了二十畝田。他六歲的時候進了一個地主辦的私塾，受到很壞的待遇。他在家裏吃飯，在家裏睡覺，每天得走三里路放學以後，他還做各種勞作，如挑水、看牛等等。

我們從他『母親的回憶』一文中，深切知道那時佃農家庭的生活苦況，可是由於他母親的聰明能幹，還能過得下去。他們把桐子榨油來點燈，吃的是豌豆飯、菜飯、紅薯飯、雜糧飯。把菜子榨出油來，放在飯裏做調料，他母親却能使一家吃起來有滋味。他們必須趕上豐年才能縫上一些新衣服。這些衣服也是自己生產出來的。他的母親親手紡出線來，請人織布，染了顏色，他們叫它爲『家織布』。有銅錢那樣厚。一套衣服老大穿過了，老二老三接下來穿，還穿不爛。

一九〇〇年前後四川連年旱災，很多農民飢餓着，破產農民不得不成羣結隊去『吃大戶』。他曾親見六七百穿得破破爛爛的農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被所謂官兵一陣兇殺毒打，血濺四五十里，哭聲震天。在這樣的年月裏，他家裏也遭受更多的困難。僅僅吃些小菜葉、高粱，通年沒吃過白米。特別是一九〇四那一年，地主欺壓佃農，要加租子，因爲辦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脅着他家，逼着他們搬家。在悲慘的情況下，他們一家人都哭泣着，連夜分散。

他被過房給一個叔父，這叔父待他如己，出送他進學，使他唸了六七年的書。他一面讀書，一面還是要做各種的勞作。

一九〇五年他考過科舉，一九〇六年到順慶縣，又在一個高等小學裏和中學裏讀了十二個月。

的書。一九〇七年到成都入體育學校，然後回本鄉高等小學裏教體操。一九〇九年到雲南府進雲南講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發生後才離開學校。然而在踏進講武堂不到幾星期的時候，他已經加入同盟會了。

一九一一年他是一個連長，蔡鏐率領的滇軍參加推翻滿清的革命，他也加入。他在同一年派往四川，與滿清巡撫趙爾豐作戰，將趙軍打敗，第二年四五月間回到雲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他被任爲雲南講武堂學生隊長，並且在校裏教授戰術學、野戰術、射擊術和步槍實習。

一九一三年他被任爲蔡鏐部下的營長，在中法交界駐紮了二年。一九一五年，升爲團長，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凱的軍隊作戰，打了六個月，獲得勝利。此後又升爲旅長，用他的部隊不斷跟反動軍隊作戰。

一九二一年秋天，他做雲南警察廳長。唐繼堯得勝回來，追他追了二十天，終於被他逃了出來。他帶領一連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線就是一九三五年紅軍長征的路線。他們渡過金沙江，經過打箭爐附近的雅州，在會理停駐一下，於是進入四川。

離開四川以後，搭船到了上海，找尋上海共產黨。他對於共產主義的注意，是在自修俄國革命史時候喚起的。跟法國留學生的幾次談話，也給予他相當的影響。當他停留在四川的時候，凡是能夠得到的關於歐戰和俄國革命的書籍，他都讀過。

在上海找不到共產黨的蹤跡，他便趕到北京，在北京仍然找不到，又回到上海。

朱德現在大約四十歲，他的身體極康健，他的求新知的心極熱烈。跟着幾個中國學生到德國去，在哈諾佛（Hanover）附近住了一些時候。在這裏，他碰到了許多共產黨。在這個時候，他似乎專心研究馬克斯主義，而潛心於社會革命的新學說。在這個研究中，他由一個年紀輕到足以做他自己兒子的中國青年教導着——因為他從來沒有學過法文，他只懂得一些德文，而且是一個外國話說得很不好的人。他在德國的一個「學生先生」告訴我，他是怎樣的熱心，怎樣的有耐性，肯吃苦，有毅力，去研究一個新世界的理想，了解了它的真理和意義，他去棄了他古老的中國訓練的一切偏見和限制，真是多麼聰明的一回事。

在這個方法下，他讀了許多世界大戰史及熟悉了歐洲的政治情形。一天他的一個「學生先生」很興奮地說到國家與革命這本書。朱德要求他幫着他唸這本書，從此以後，他對馬克斯主義及俄國革命發生興趣。他讀布哈林（Bukharin）的共產主義ABC及他的其他的唯物論的著作，接着再讀了許多列寧的著作。當時德國的革命運動打動了他，同幾百個中國學生，去參加世界革命的鬥爭。

他加入了在德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支部。

「朱德有一個經驗豐富，紀律嚴明及切合實際的頭腦。」在德國知道他的一個同志告訴我。「他是一個絕端樸實的人，謙遜而不自負，他常常請人家批評；他有請人儘量批評的脾氣。他對於共產黨的興趣是從他的同情勞苦大眾出發的，也是這個原因使他加入了國民黨。有一個時期，他是很信仰孫逸仙的，因為孫氏是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但是等到他了解了馬克斯主義，他覺得孫逸仙的步驟是有欠正確了。」

朱德也曾經在巴黎住了好些時候。在這裏，他進了國民黨前輩吳稚暉爲中國學生創辦的一個學校。在法國和德國，他坐在年青的德國、法國及中國教師身邊，他小心地聽着，問着，辯論着，以求了解。「要現代化，要了解革命的意義。」他的年青的教師重複地對他說，「你一定要到蘇俄去。那裏能夠看到將來。」朱德又接受了他們的忠告。在莫斯科，他進入東方勞工大學，在中國教師指導之下研究馬克斯主義。一九二五年底，他回到上海，從此以後，他在共產黨指導之下工作着，在這裏沒有多少時候，他就擠上了領導的地位。

朱德又加入他老上司朱培德的隊伍。朱氏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勢力，蔣介石之下，就輪到他。一九二七年朱培德佔領長江南部各省的時候，他委朱德做南昌公安局長，同時兼任軍官學校校長。那裏，他與駐紮在江西更南部的第九軍有了接觸。第九軍中有幾隊兵從前在雲南是由他統帶的。因此計劃好了南昌的八月暴動，從這裏起，共產黨軍隊揭開了對抗國民黨的長期鬥爭的序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是朱德決定他日後事業的一日。他不執行總司令朱培德壓平武裝農民

叛變的命令，便是同他們聯合起來和臭惡的過去的聯繫斷絕關係，而公開的做一個紅軍。他選定後面一條路，在賀龍大敗之後，他帶了他的警察及軍官學校學生跟着叛變者一齊向南方進發，在他後面關着的城門象徵着他青年時代的安全及成功的最後結束。擺在他面前的，是長期的和繼續不斷的鬥爭。

一部分的第九軍也跟着朱德走，這一隊革命的隊伍疾馳過汕頭的時候，就佔領了這個地方，旋被擊退，再退到江西及湖南。那時候他們並不自稱紅軍，他們只稱他們是國民革命軍。自從福建敗退以後，朱德的兵力大部分犧牲了，只剩下九百個人，五百枝步槍，一挺機關槍，和每人幾發彈藥而已。

在這個情勢之下，朱德採取了下面一個建議：和大軍駐紮在湖南南部的另外一個雲南軍司令方希聖（譯音）將軍聯合起來。希望從政治方面利用他們來抵抗蔣介石。方將軍本人雖然不是共產黨，他的軍隊中有很多共產黨的。因為他是一個雲南人，他也願意給他的同鄉一個避難的所在。這裏，朱德的軍隊就改編為第一百四十團。他本人就做了第十六軍政治部主任。在這裏，他就逃過了他的生命。

在方希聖將軍的軍隊中共產黨的勢力很快地擴張着，不多幾時，一個反布爾什維克的團體組織起來，與蔣介石秘密聯絡，計劃突擊朱德。一天晚上他只帶了四十個心腹在一家小旅館內住着。那個團體的領袖郝家龍（譯音）就率領了一隊兵來攻擊他，就立刻開火，那時候天已黑了，刺客也看不清他們的目標。當幾個人齊用手槍描準朱德頭顱的時候，他很興奮地叫起來，「不要打我，我只是一個廚子。不要打一個能夠為你們做菜的人」那些士兵，吊了他們的老胃，躊躇着，把朱德帶到露

天來仔細辯認。那裏他被郝家龍的表弟認出來，叫道：「這是朱德，打死他！」但是朱德立刻拉出他自己藏着的武器，槍殺了他，戰勝了他的守衛，逃走了。只剩五個弟兄同他逃了出來。

這個意外事件，解釋了朱德在紅軍中所以有「廚子頭腦」的綽號。

回到團部，朱德通知方希聖，他即辭職。這一次據說方氏還送五萬塊錢給他表示好意。因為反蔣（介石）的爭論還沒有明白決定，而這些青年共產黨對於他的下級軍官及弟兄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是他所不敢輕視的。但是幾個月以後，事實證明送錢的事是不確實的。這一小部份軍隊只是忠於朱德及他的幾個下級軍官而集合起來的。黨的工作很混亂，確定的路線沒有成立，戰略也沒有決定。朱德的軍隊仍舊穿了國民黨的軍服。但是它們都破舊了，有許多人也沒有鞋穿，吃極粗糲的東西，有時候甚至於完全沒有東西吃，使得他的軍隊逃亡了一些。但是廣州方面傳來的消息，建議了一條明確的行軍路線，給他們許多鼓勵。朱德改編他的軍隊成三隊，叫做「農民縱隊」，移到湖南江西及廣東邊境，在這裏他與由一個過激主義的學生率領的一隊土匪聯合起來，開始取消租稅，重分土地及充公富人的財產。經過了一場血戰之後，就佔領宜章縣做根據地，這一個年青的軍隊就吃南瓜及作政治辯論過了冬。

同時，毛澤東的農軍敗退湖南，最後退江西及湖南邊境的井崗山，在這裏他得到匪首王佐與袁文才的援助。這兩個佔有附近二縣，在山上已經築好了極難攻破的根據地。毛澤東的「農工紅軍」與朱德的駐地，相去很近，毛氏就派他兄弟毛澤丹來和他（朱德）接洽。他帶了黨的訓令來聯合軍力，他也帶了游擊戰，土地革命，及建立蘇維埃的確定計劃來。一九二八年五月，這兩軍就在井崗山聯

繫起來，他們控制五個縣分有五萬個信徒，其中四千人的武裝是步槍一萬人的武器是長槍大刀和鋤頭，其餘的都是非武裝的黨的工作人員，宣傳員，或戰士的家屬，包括很多的兒童。

這是朱毛結合的開始，他們創造往後六年的中國南部的歷史。此後的故事，各人都很知道了。毛澤東已經講過蘇維埃及紅軍發展的過程。朱德隨着蘇維埃發展的同樣的曲線成爲一個所向無敵的軍事領袖。

一九三一年，舉行第一次蘇維埃會議的時候，全場一齊選舉朱德做紅軍總司令。在二年之內，建立了四個軍團，有五萬枝步槍，幾百架機關槍，（這大部分是從敵人方面奪來的），共產黨控制了江西南部大部分的區域及湖南、福建的一部分。加緊的政治訓練開始了，兵工廠建立起來了，共產黨全體都了解初步社會革命的經濟及政治改造了。紅軍制服都日夜的翻製，供給新的游擊隊應用，革命的道德是「變強」了。二年多一些，紅軍已經擴充了一倍。

在南方這幾年中，朱德率領了紅色聯軍，打了幾百次小仗，打了幾十次大仗，衝破了五次大圍剿，在最後一次圍剿中，他要抵擋武力（包含重炮隊，飛機隊及機械化部隊）超過他八、九倍，資源超過他許多倍的敵人的進攻。可是他的勝敗的程度是須要比較一下的。我們必需承認，戰術的靈活，巧妙的運動，和隨機應變的行軍，他重複地證明他能夠戰勝敵方的每一個軍官，無疑地在游擊戰中他養成了中國革命軍隊的堅強的戰鬥力。紅軍在南方的大錯誤是戰術的錯誤，這是政治領導必需負極大的責任的。雖然有這些錯誤，紅軍在第五次圍剿中無論在那一方面仍舊能夠抵住敵人的進攻。上述的純粹的戰略及大軍撤退時戰術的運用，朱德在「長征」中的優越的領導在中國是空



前的事。領袖的吸引力和那少有的人類品性，感動了他的弟兄，使他們絕對信仰和忠心，敢爲主義而死——這是一定要歸功於紅軍的不能擊破的團結力，使得他的軍隊在風雪凜烈的西藏高原抵抗「圍剿」，祇吃犂牛，度過了艱難可怕的冬季。在我至少完全不能想像蔣介石、白崇禧、宋哲元及國民黨其他任何將領能够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着，更不要說在受了這種種辛苦之後，還能夠四師大舉攻擊，攻破了敵軍從容佈置了好幾個月的防綫。這就是在我騎馬游歷西北的時候，朱德所做的事業。

難怪中國謠傳他有各種神奇的本領，能夠看清楚周圍一百里以內的東西，能夠飛行，能夠運用道術，如呼風喚霧，打擊敵人。因爲有千萬個槍子和炮彈沒有打死他，迷信的人相信他是打不死的。因爲國民黨屢次宣布他已被擊斃，並且敘述他擊斃時的詳情，有人說他能夠復活的。千萬人都知道中國的一「紅德」，而因爲各人之立場不同，有些人認爲他是惡魔，有些人認爲他是燦爛的明星，但是每個人都承認這十年的歷史上是有他的名字的。

可是人家都說，朱德的相貌並不動人——一個鎮靜，謙虛和說話溫文的人，大眼睛（和善的眼睛是他普通的表情）箇子很矮，很胖，有着鐵一般的臂膀和腿。他現在五十歲開外了，是五十三或五十四歲，就沒有確實地知道了。——但李長林笑着告訴我，他曾經說過他到現在能够記得的，他是四十六歲。這對於他自己似乎是一件笑話。李氏想他自從和他現在的妻子結婚了以後，他就停止計算他的年齡了。她是一個骨骼極大的農家女，她是一個好的槍手和騎師。她是一個統帶她自己的游擊隊的巾幗英雄。她肩上揹着受傷的同志，她是和男人一樣粗手大腳的女子，很率直的，健康的和勇敢的。

朱德對待弟兄的忠心是人人知道的。自從當了紅軍總司令以後，他的衣食住行都和士兵一樣，同受士兵的辛苦。早期常常赤腳走路，有一個冬季專吃南瓜生活，另有一個冬季專吃犂牛，永遠不叫苦，很少生病。據說他歡喜在軍營裏散步，同弟兄坐在一起講故事，或同他們遊戲。他兵打得很好，籃球也打得不弱。每一個士兵都能够直接向總司令訴苦——事實上常是這樣做的。朱德叫他弟兄的時候，就脫下他自己的帽子。在「長征」途中，就把馬借給疲乏的同志騎，自己走很長的路，一些也沒有倦容。

可是做了紅軍的犧牲的人，無疑地看他是人類的一個惡魔。階級鬥爭不曉得慈悲的。許多紅軍的恐怖故事，現在沒有人相信了，但是認爲朱德不知道殺人有時候是一種「革命的需要」也太嫌忠厚。爲了完成他的任務，他就得把他自己的忠心整個獻給被壓迫的民衆，在這個任務中，他不能夠比授權給他及他所服從的民衆更爲慈悲。所以除非你相信民衆不殺人，朱德手上不是沒有鮮血的，但是你把它看做外科醫生的血或是劊子手的血，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哲學或宗教，偏見或人類的同情來決定了。無論如何，朱德不是聖人，但是在他自己的民衆中，在中國極大多數的勞苦大衆中，他是一個高舉着解放火炬的可愛的人，他的名字在爲中國人類自由而鬥爭的人中，已經是不死的了。



# 第十一章 回到保安去

## 一 途中所見

我從寧夏轉向南行重新走入甘肅。四五天內，我又回到河連灣，那裏我遇到蔡暢與她的丈夫李富春，跟他們又喫了一餐法國式的飯，同時碰見第一軍團政治委員聶榮臻的一位年青美貌的太太。她最近纔從白區偷入蘇區，此刻王從她那離別了五年的丈夫那裏回來。

我在河連灣的兵站部住了三天，這兵站部設在一所以前是一位回教徒穀商的大倉庫裏。這是一宅有趣的中亞細亞建築式的屋子，平而厚的屋頂，深深地嵌在牆裏，至少有四呎厚的阿刺伯式的窗戶。當我將我的馬牽進了開闊的馬廄裏，一位魁梧的白鬍子的老頭兒，穿了一套灰色舊制服和一件衣長及地的皮褂，他向我迎上來，行了個紅軍的軍禮，同時他那曬黑了的臉上，透呈着微笑。他是來照料「馬鴻逵」——我的馬的。

我奇怪在這世界上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老頭兒，跑進我們的童子軍軍營裏來？我要他告訴我他的歷史：他是從山西來的，他在紅軍遠征山西的時候，就加入了紅軍。他姓李，現在已經六十四歲了，他說在紅軍戰士中他是最長。他怪不好意思地解釋他不到前線去的原因他說：『因爲楊指揮以爲我在這裏做這種養馬的工作，是非常需要的，所以我就留在這裏了。』

在加入紅軍以前他是山西洪洞縣一個小本經紀的賣肉的商人，他很厲害地咒罵「模範省長」

閻錫山，和一般地方官，以及他們的苛捐雜稅。他說：「在洪洞是不能做什麼生意的，連人糞都有捐稅。」當老李聽得紅軍來了，他就決定加入。他的妻子已經死了，二個女兒都已嫁了人，他也沒有兒子，除了他的捐稅重重的豬肉生意之外，他在洪洞已一無掛碍，洪洞是一塊充滿死氣的地方，他需要更有生氣的生活，所以這位冒險家就爬出了城投入紅軍去了。

「在我加入的時候，他們對我說：『你年紀老了，紅軍的生活是很困苦的，』你猜我怎麼說呢？我說：『不錯，我的確是六十四歲了，但是我跟二十歲的年青人一樣會跑路，我也會打鎗，能夠做別人能做的。工作。如果你們所需要是這種人，那末我也可以算一個了。』這樣他們就叫我一起來了。我跟了紅軍穿過山西，也跟了紅軍渡過黃河，現在我到了甘肅了。」

我笑了。我問他，在這裏的生活是否比賣豬肉好？他是否歡喜這種生活？

「呵！賣豬肉是一種沒出息人做的，這裏的事，是有意義的。一支窮人們的軍隊為被壓迫的而戰，是不是當然我喜歡這種生活。」這老頭兒從他胸上的口袋裏摸出一個滿是塵土的布包，留心地尋出一本破舊的小冊子。『你看』他說，『我已經認識了二百多個的字，每天紅軍教我識四個字。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誰也沒有教過我寫自己的名字。你想紅軍好不好？』他很自驕地指着那像雞爪印在席上的泥印一樣的寫得非常地惡劣的字，又格格不吐地念着幾句新寫的句子。一回兒，好像高興極了，他拿出一段鉛筆頭，很用心地把他的名字寫給我。

『我猜你還想再結婚罷，』我跟他開玩笑。他很正經地搖着頭否認，說因為忙於照料馬匹，沒有工作來想到女人的問題。他就慢慢地走開，照料他的馬去了。

第二天黃昏，我走過屋子後面的果園，碰到另一位山西人，比老李小二十歲，但卻同樣的有趣。我聽到一位「小鬼」在叫「禮拜堂！禮拜堂！」我好奇地尋他叫的人。在一座小山上有一個剃頭匠，正在剃一位青年的頭，光光的像一個雞蛋。問了之後，我知道他的真名字是解河春，曾在山西平陽一所美國教會醫院的藥室裏做過事。「小鬼們」給他起了這個綽號，因為他是基督徒，而且至今仍舊每天做禱告的。

解捲起他的褲子，把腿上重的鎗傷給我看，爲了這處鎗傷，他至今走起路來還是一拐一拐地，他又解開衣服給我看腹部的鎗傷。他說這些鎗傷就是戰爭的紀念品，也是他爲什麼不在前線的原因了。剃頭根本不是他的職業：他是一位藥劑師，也是一位紅色戰士。

解說那所教會醫院裏還有二位助手，也跟他一同加入了紅軍。在離開之前，他們把自己的志願與醫院裏的美國醫生商量過。這位醫生的中國名字，是李健。李醫生「是一位好人，他義務替窮人醫病，而且從不欺侮老百姓。」在解與他的同伴問他的意見時，他說：「去吧！我聽說紅軍都是些良善而誠實的人，並不像其他的軍隊，你們應該是幸福的，跟他們一起去打仗。」這樣他們就跑去當紅軍，——紅色的羅賓漢！

『也許李健醫生正想辭掉你們吧！』我說。

剃頭匠憤然否認了，他說他與李醫生一向是感情很好的，而且李醫生是一位很好的人。他要我轉告這位李健，倘使我能碰到他的話，說他還很愉快地活着，只要革命過去了，他仍會立刻回到藥室裏做他的老工作。我悵然地離開了「禮拜堂」。他是一位很好的紅色戰士，很好的剃頭匠，同時是一

## 位虔誠的基督徒。

出乎意料之外，我在紅軍中碰到了幾位基督徒與從前是基督徒的人，許多共產黨的領袖——周恩來是一位很顯著的例子——都曾在外國教會學校裏唸過書。而且其中有幾位一度都是很積極的基督徒。紅軍的軍醫隊主任納爾遜，傅醫生以前就是一位江西教會醫院的醫生。他雖然自願加入紅軍，而且熱心地爲他們服務，但他仍堅持着他的信仰，所以他沒有加入共產黨。

在江西蘇維埃，施行了普遍的「反宗教」宣傳。沒收了所有的廟宇、教堂，以及教會的財產，作爲國家的財產。剝奪了僧侶、尼姑、牧師、傳道士及外國宣教師們的公民權。但在西北對宗教卻實行了更和緩的政策。事實上信仰自由已有了初步的保障。保護所有外國的教會財產，請避難的宣教師們回到他們的教會裏去。共產黨員保留了他們自己的反宗教宣傳的權利，把「反對信仰的自由」和「信仰自由」同時被認爲民權。

因共產黨對於宗教制度的新政策中，得到利益的唯一外國人，要算是幾位綏遠大地主的比利時宣教師了。他們在長城的汀平，擁有二萬畝或有的五千畝的土地。當紅軍佔領汀平之後，比利時宣教師的地產，一邊接着蘇維埃區域，另一邊都在白軍勢力之下，紅軍並無沒收這些比利時人的土地的意思，只是和他們訂立一條約，「規定紅軍擔保護教會的財產，但是教會方面應許可紅軍在教會的佃農（實際上與農奴一樣）中間組織反日團體。這條約中，另有一個希奇條款，就是這些比利時人應該代中國蘇維埃政府拍一份賀電給法國國務總理勃倫，祝賀法國人民陣線的勝利。

在河連灣附近，曾有過幾次民團劫掠的事情。有一鄰近的村莊，在我未來之前，曾被搶掠過兩夜。

正在拂曉之前，這隊民團偷進了村莊，鎗殺了孤獨的哨兵之後，縱火焚燒十幾位紅軍睡在那裏的茅屋。在紅軍從屋子裏逃出來，在濃煙裏睜不開眼睛的時候，民團就鎗殺他們，搶了他們的鎗。那時這些民團還勾結了四百餘個土匪，他們大都是高桂滋的部下，從北一路搶劫焚燒而來。第二十八軍派了一營軍隊，去圍剿他們，在我離開河連灣的那天，這些年青戰士，已凱旋而歸了。

發生戰爭的地方，離河連灣不過幾里，正是「白色土匪」預備襲擊的地方。有的農民發覺民團躲在山裏，紅軍得到了報告，於是分爲三縱隊，而中路的縱隊和土匪發生正面的衝突。當紅軍兩側的縱隊包圍了他們，也就決定了戰爭的勝負。這次雙方除很多受傷之外，民團死了大約四十人，紅軍也死了十六人。民團全被繳械並且還捉到了兩個首領。

我們在回陝西的途中，碰到這營紅軍帶着戰利品回來了。村莊裏已安排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農民們都站在路旁，歡迎這得勝的軍隊。農民保衛隊也拿了紅纓的長鎗，站着迎接他們。少年先鋒隊爲他們奏着紅色的歌曲，婦女們帶了她們所有的茶、果子、熱水等來慰勞他們。疲乏的兵士們的面上都浮着微笑。他們非常年青，甚至於比前線的正規兵還年青，而且依我看來，那些受傷的，似乎只有十四五歲。我看見一位騎在馬上的青年已失去了一半知覺，兩旁由他的同志扶持着。一條白的綳帶包在他的前額，當中現着一塊圓的血跡。

兩位土匪首領走在扛着像他們人一樣長的步鎗的這些少年隊伍的正中。一個是頭髮已經灰白的中年農民，你也許覺得，他被這些可以做他兒子的年青戰士們牽着走，會感到侷促不安的。但是看到他那種神色自若的態度，倒頗有點偉大，我想他也是和其他窮苦農民一樣，他是爲了個人的信



仰而與他們戰爭，現在對於自己的將要喪失生命，也許會覺得後悔的，但是傅金魁在我問他的時候，卻搖搖頭。

『我們是不殺被俘的民團的，我們感化他們，予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他們將來大部分都可以變爲很好的紅色遊擊隊。』

紅軍肅清了這些土匪，是一件幸運的事，因爲掃除了在我們回保安去的路上所有的危險了。我們在甘肅的邊境，走了五天，在第五天我們走了百里以上，路上仍然發生不少的事情，但也沒有什麼大事件。我回到保安除了沿途買的幾隻瓜之外，並沒有旁的戰利品。

## 二 保安的生活

又回到保安來了。我又住在外交部，在這裏我曾經度過一個九月和半個十月。我已收集了許多傳記材料，足以完成一部『紅色中國名人傳』。每天早晨我挨次訪問一位指揮官或蘇維埃的公務員。然而我對於要離開蘇區，卻逐漸感到不安了：因爲中央軍源源地開到甘肅、陝西，並且逐步地代替了各地與紅軍對峙的東北軍。蔣介石從西方與南方的新的「圍剿」一切已準備完竣了。如果我不馬上離開，以後也許沒有離開的機會了。因爲封鎖線中的最後的一條路也許會被封鎖。我焦灼地等待爲我離開的種種準備。

這期間，保安的生活，是非常平靜的，你不會想這些人們會憂慮他們馬上就要被「勦滅」。離我不遠駐紮着新編的教導團，他們整天的操練，唱歌，與舉行競賽的遊戲。有幾個晚上，則表演戲劇，並且

每天晚上當各種不同的歌聲從山谷裏集合到窖洞裏或板屋裏來，使整個市鎮都充滿了歌聲。在紅軍大學裏，學員每天有十小時勤勉的研究工作。新的民衆教育運動正在城裏開始。甚至外交部裏的「小鬼」每天也得唸着讀本，政治或地理。

至於我自己，則過着閑散的生活，騎馬、洗澡、打網球而已。那裏有兩個網球場：一個在紅軍大學附近，被山羊、繇羊，啃得短短的草原上；另一塊是泥地的，築在西北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博古家的隔壁。在每天清晨，太陽一昇到那小山上，我就和紅軍大學的三位教授——德國人李德、蔡樹藩和吳委員等在這裏打網球。網球場裏滿是石子，接一個急球，是非常困難的，但是還是起勁地比賽着。

蔡和吳二位都跟李德說俄國話，李德是不會講中國話的，我對李德用英語，對蔡、吳用中國話，這樣我們有了三種語言的比賽。

我給公衆的最壞的影響，是我的賭博俱樂部。我有一副撲克牌，到此地以來還沒有用過，有一天我檢出來，並且把 rummy 的玩法教給蔡樹藩。蔡在戰爭中已失去了一隻手臂，但並不妨礙他的打網球，和玩撲克牌。當他學會了 rummy 後，他可以毫不費力的用一隻手打敗我，不久 rummy 盛行了，甚至連婦人們都偷偷地跑到外交部的賭博俱樂部裏來了。我的土坑成了保安的精華所在了，在晚上的燭影之下，你可以看到周恩來夫人、博古夫人、凱豐夫人、鄧發夫人，甚至毛澤東夫人。於是有人講開話了。

但是對於蘇維埃道德發生真正的惡影響的開始，倒是從保安玩起「撲克」來以後。「撲克」是我們打網球的四個人，每夜輪流在李德的小屋裏和我在外交部裏的裏一間罪惡的房子裏開頭

的。我們把一班爲人尊敬的人物，如博古、李克農、凱豐、洛甫及其他，拖進了罪惡的泥潭裏。賭注不斷地增大，最後獨臂的蔡，在一夜之中，贏了博古主席十二萬塊錢，在博古唯一的彌補方法似乎只有盜用政府的公款了。於是我們強迫他解決了這件事，就是博古可以從國庫裏支出十二萬塊錢付給蔡，如果蔡願意用這筆錢爲並未存在的蘇維埃空軍購買飛機，然而他們賭的都是些火柴，不幸得很，蔡所買的飛機，也只是些火柴。

獨臂的蔡是一位和善有趣，漂亮的孩子，同時也是很機敏，熱情，而又善於詞令，愛開玩笑的人。他在紅軍裏已經有十年了，當他在河南做鐵路工人的時候已經加入的。以後他到莫斯科讀了二、三年書，愛上一位俄國女同志而結了婚。有時候他很苦惱地看着自己空的袖子，並且憂慮着他的夫人見到他自己少了一隻手，是否會和他離婚。『這種小事情用不到擔心呵！』一位也是從俄國回來的留學生吳教授安慰他。『倘使你傳種的東西沒有失掉，你見她的時候，你仍是幸運的。』但是蔡無論如何，還是竭力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後，送他一隻人造臂。

這是要我送東西進來的許多要求間的唯一不可能的事情了。羅鼎儀要我在賣掉紅軍照片的收入中，替他們買一隊飛機來。而且要連汽油機件，和駕駛人員都齊備的。徐海東要買一副假牙齒來填補他的牙齦，因爲他墮入了戀愛的網裏了。他們每個人的牙齒都有些毛病的，他們多年不看見牙醫生了。但是他們的忍耐力確實可驚，雖然他們因爲多年飲食不良的結果，大部分的人都生着胃病，特別是潰瘍，和旁的胃病，但你決不會聽到有人在抱怨的。

至於我個人，卻喫得到很好，體重也有增加，雖然每天看到那種不變的菜單，覺得討厭，但仍能喫

得很多。他們給我喫粗糙的沒有烤過的麵包。這種麵包，只要烤過，也是不錯的。有時我可以喫到豬肉、羊肉。此外我還時常吃粟米——煮粟米、煎粟米、烘粟米。捲心菜很多，還有胡椒、洋蔥及豆類等。我雖然沒有咖啡、牛油糖、牛乳、雞蛋及其他許多東西，但還是很知足地喫粟米。

有一天圖書館裏到了一網字林西報，我看到一種似乎十分簡單的巧格力軟餅的製法。我曉得博古的小屋裏藏着一罐可可，我想用一點可可，並用豬油來代牛油，可以做成那種餅的，於是我請李克農寫了一張正式的申請書給中國蘇維埃共和國西北區蘇維埃政府的主席，請他們供給我兩盎斯的可可。經過了幾天的耽擱，敷衍和他們不信任我做餅的本領，與許多冠冕的解釋，以及同一般官吏們有了不同的意見後，我們結果迫着博古拿出那兩盎斯的可可，同時從食品合作社裏領到了其他的東西。但在我調合麵粉、雞蛋、牛乳之前，我的衛兵跑來看，這傢伙卻把可可打翻在地上了。經過了多次的交涉，我得到重新補充的命令，着手幹這偉大的實驗。結果怎樣，每位賢敏的太太，是都能預料到的。我臨時改造的爐子，完全不生效力，餅並沒有發酵，我從火裏拿出來的時候，底裏已變了二寸厚的木炭，而上面還是黏液的流質。但是，雖然是這樣的餅，外交部裏一些有趣的旁觀者，卻仍喫得津津有味，因為餅裏有很多很好的原料。我出了很大的醜，從此就安分守己地喫我的粟米了。

李德請我同他喫一頓「西餐」。他常時可以得到米與雞蛋，又因為他是德國人，所以有許多香腸。你可以看見這些香腸吊在繩上，曬在他自己靠近保安的大街的門外。他已在着手準備他冬天的食料，他自己也造了一隻爐子把烘烤的方法教給他的中國太太，一位跟他一起從江西來的女子。他告訴我那些原料是可以做很够味的東西的，只是食品合作社（平常我們的飯都是在那裏燒的）

不知道怎樣做吧了。一位紅軍司令太太羅炳輝夫人（她是經過長征的唯一小足婦人）是食品合作社的社長，我猜李德太太一定和她有交情，所以李德就有雞蛋和糖了。

### 三 蘇俄的影響

這本書並無以研究中國共產黨與蘇俄共產黨，或共產國際，或蘇俄的關係，為主要目的之一的意思。但是如果不論述這種基本的關係，與牠們所給予中國革命史上的非常重大的影響，那麼這本書，也不能算為完璧了。

在過去十二年來，顯然地中國思想界上關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問題受到蘇俄的一種有力的影響（特別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是一種有力的外來影響）。這種影響不獨在蘇區裏是一件公開的光榮的事實，即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地方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的。在中國各處已有了堅持不變的政治信仰的青年中，無論當一種哲學，或宗教的替代品，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在年青的中國人中，列寧是最受崇拜的，史太林是一位最熟知的外國領袖，而社會主義則被作為中國社會的一種未來的形式。蘇俄文學最為一般人所歡迎，譬如高爾基作品的銷路，比除了魯迅以外的其他中國作家的作品更來得廣大。而魯迅本人，就是一個偉大的社會革命家。

這一切，特別有一個事實，是非常應該注意的：譬如英、美、法、德、日、意等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派了幾千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或傳教的工作人員到中國來，對中國民衆宣傳他們自己國家的信條。但是這幾年來，蘇俄在中國沒有一所學校，一間教室，或者甚於可以給他們作公開宣傳馬

克思列寧學說的學會都沒有。他們的影響，除了在蘇區之外，全是間接的。而且到處還要受到國民黨厲害的壓迫。但是在這十年中住在中國而且熟悉他的社會環境的人，差不多沒有人不承認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以及蘇俄的成就對於中國人民精神上的影響，要比所有資產階級基督教的影響普遍與深刻。

恰與許多人對於共產國際這妖魔所有的觀念相反，蘇俄給蘇區的影響，大都是在於精神上，思想上，而很少直接干預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我們要記着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密切關係，與蘇俄的聯合，完全是出於自動的，而且隨時都可以由中國人從內部來予以查核的。蘇俄對於他們不過是一個有力的實例，與一個產生希望和信仰的理想。這是火與熔爐幫他們鍛鍊一般人們認為中國人所沒有的那種鋼一般性質的英雄的性格。這些紅色的人們，一定相信中國的革命不是孤獨的，而且相信不但是蘇俄，全世界數萬萬的勞動者，渴望着他們，只要時機一到，全世界的勞動者，一定會仿效他們，正像他們自己取法於偉大俄羅斯的同志們一樣。在馬克思和昂格斯的時代裏說『勞動者無祖國』也許是對的，但是現在的這些中國共產黨員，卻相信除了他們自己的一小塊的無產階級統治下的區域之外，蘇俄是他們的偉大的祖國。這種信仰是足以增加他們的勇氣和革命的力量。

在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憲法上說：『中國蘇維埃政府宣言準備與世界的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民族，來形成革命的聯合戰線，同時宣言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俄做牠的忠實的同盟者。』短短的幾句話，對於當時在地理上、政治上、經濟上很長久地完全陷於孤立的中國蘇維埃有多少意義呢？這是對於不曉得中國共產黨的任何歐、美、人所不易了解的。

但我卻看到，聽到並且想到的。在他們的背後有這樣一個偉大的同盟者的這一種觀念（即使這種觀念沒有經蘇俄積極的事實上的表現所確認）對於中國紅軍的士氣，是非常重大的。這一種觀念是給他們的鬥爭以一種有世界性的信仰的原因。他們高呼『世界革命萬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是一個滲透進他們一切訓練，信仰的觀念。並且在這觀念中，對於社會主義的世界大同的希望，更增加了他們的忠誠。

我認爲這些觀念，已表明可以變更中國人的行爲。在共黨對待我的態度裏，我尋不出有何『排外主義的氣息』。他們當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一位美國或歐洲的資本家，跟他們在一起，也許會覺得異樣，一位中國的地主或上海的買辦，也會有同樣的感覺的。民族的貽視似乎全被消滅在沒有國界的階級鬪爭中了。即如他們的反日運動，也不是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來反對日本人的。他們始終踴躍力的宣傳他們只反對日本的軍閥、資本家，及其他法西斯侵略者，日本的大衆，還是他們有力的同盟者。當然，他們從那種信念中，博得了極大的鼓勵。把這種國家的偏見，提高到更高級的鬥爭的，無疑的是不能不完全歸功於留俄的二十幾位中國紅軍的領袖的；他們都進過孫逸仙大學、東方勞動大學、紅軍大學，或其他訓練共產主義國際幹部，回國後做他們自己人民的教師。

他們對於西班牙事件的感到極大的興趣，就是這種國際主義精神所表現的一種。他們在報上刊登這事件的專號，張貼在村蘇維埃的會議室中，公佈到前線的軍隊中。政治部則舉行西班牙戰爭的意義與原因的特別講演，比較西班牙的『人民陣線』與中國的『統一戰線』。他們召集羣衆大會，舉行示威運動，鼓勵集體討論。這是可以十分驚奇的。甚至在窮僻的山鄉裏，紅色的農民們也能知

道一些關於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亞、德意侵略西班牙等的事實，並且說這兩個國家是他們的敵人，——日本的『法西斯同盟者』。不問他們在地理上是怎樣遠隔着，現在這些鄉下人，靠了無線電壁報，共產黨的宣傳者與講演者，知道的世界政治，比中國任何地方的農民來得多了。

共產主義者的行動與組織的嚴格的紀律，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中，建立了合作的，非個人主義的模範。這種模範，普通的『中國通』、『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自稱『懂得中國人心理』的傳道者，假如不是他們自己所目賭，是不會相信的。個人的存在，在他們的政治生活中，在社會全體的集團中，是十分渺小的，無論他是一個領袖，無論他是一個重要的創造者，都必須服從社會全體或集團的意志的。在共產黨員中當然也有過爭論與猛烈的鬥爭，但是沒有一種鬥爭能危害黨與軍隊的。這種現象，這種『非中國』式的合作，是一種階級間爭奪支配權的新的社會觀念的結果，在這鬥爭中，最有理知的，最團結的，最有意義的，最有力的，最有決心的，終久是會勝利的。這種合作充分地解釋了共產黨存在的原因，雖然他們還沒有獲得勝利。

假使南京政府能够像對付其他一切反對派一樣，隨時利用離間、挑撥、分化的手段以消滅共產黨，也許可以得到最後的成功。但是這一個計劃是失敗了。譬如說，在幾年以前，南京政府希望利用全世界的史太林、托洛茨基兩派的鬥爭，來分化中國共產黨，雖然出現了所謂中國的「托洛茨基派」，但是他們卻得到了一個非常惡劣的污名；即間諜與叛徒。他們大部分因環境的壓迫，都加入了特務隊，並且出賣了以前的同志。——他們自始至終沒有抓住任何重要的廣大的影響與羣衆。他們只是一批孤獨的知識分子，滑稽的、可憐的、奇怪的一羣，而遺留着。他們毫無能力破壞共產黨的領導。



紅軍拋掉了所謂中國的禮儀這一封建的廢物，他們的心理和人格與中國人的傳統思想，是絕對不同的。荷罷特（Alice Tisdal Hobart）決沒有寫一本關於這些的書的能力，王寶川的作者也是不能。他們是正直、坦白、天真、忠誠，而又有科學頭腦的人。他們差不多排斥中國文明過去的基礎的一切陳舊的哲學，而且似乎最重要的，他們是舊式的中國家族主義（註）的最大的敵人。我時常會深深地感覺到跟他們在一起，是非常舒適，正像跟本國人住在一起一樣。意外的，在某一種意義上，我的存在，對於他們是有很大的意思的。他們把我與引起我跑到蘇區來的這一種興味，作為他們這一種運動的『國際主義』的一個具體的見證。他們把我作為一個很好的陳列品，以對付那些懷疑的人。

因為對於蘇俄的這種熱烈的希望，自然會摹仿和抄襲蘇俄的許多組織、方法、制度，以及思想，中國紅軍是根據蘇俄軍事系統而組織的，紅軍許多戰術上的知識是從蘇俄的經驗中得來的。一般的社會組織也效法蘇俄共產主義所制定的型式，許多紅色的歌曲全用了蘇俄音樂來表現，在蘇區裏普遍地歌唱着。中文的「蘇維埃」只是直接從俄文中譯過來的許多字中的一個罷了。

但是所有這些仿倣來的東西中間，有許多是修改過的。蘇俄的觀念或制度，都因求配合着他們所活動的環境，而加以極大的改變的。十年來試驗的結果，已經把大批的外國貨放棄了，在蘇維埃制度中特別地適於中國的那種特徵的施用，也就是這一結果。採用與摹仿西洋文明的過程中，在中國資產階級的社會裏，當然也有的，因為在古代封建的遺產中，像斯賓格拉（Spengler）所說的偉大的

（註）在這裏我所說的，當然不是農民大眾全體，這是純粹的共產黨員。

歷史的碎屑，很缺少那些能夠建立近代資產階級或社會主義的社會，因此西洋的文，切就都能解決現代國家之廣大的新的需要，在詩歌中也如此。在老大的中國同時包含着兩個社會，而兩者都是從國外運進來的。這是很有趣的，譬如紅軍方面對於青年的組織方式，完全根據了蘇俄，而蔣介石將軍非但用了意大利的轟炸機來毀滅他們，並且同時借了基督教青年會來提倡他的反共產主義的新生活運動。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上的領導，戰略上的路線，以及政治意識的結果，不用說，是由共產國際密切指導的（雖然沒有明白詳細的命令）。這一個共產國際，在過去十年來，事實上，已成爲蘇俄共產黨的辦公機關。分析到最後，這多少有這種意義：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正與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樣，是跟蘇俄普通的戰略上的要求相同的。

這裏已很明白了，毫無疑問的，中國紅軍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以及俄國革命的集體的經驗中取得極大的幫助。但這也是真的，中國共產黨在其困苦的生長過程中，所遭受的嚴重的失敗，共產國際是不能辭其咎的。

#### 四 中國的共產主義與共產國際

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中，俄間的關係，我們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是蘇聯和各派國民革命者「實際」同盟的時期。這些國民革命者在國民黨和共產黨旗幟之下組織一個貌合神離的集團，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當時存在的中國政府，並從帝國主

義那裏取得中國的獨立。這驚人的事業。爲了國民黨右派的當權，南京政府的成立，與帝國主義的妥協及中、俄的反目而結束了。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國與中國隔離，而南京政府力謀與俄國勢力完全斷絕關係的時期。在一九三三年末莫斯科和南京恢復邦交的時候，這第二個時期纔告結束。第三個時期是以南京和莫斯科半推半就的接近而揭開的，這種接近，曾因南京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劇烈內戰而受得極大的阻礙。在一九三七年年初，這個時期好像要演劇般的結束了。當時國、共間有實現部分的協調的可能，中、俄的合作也可以展開到新的階級。但我在紅軍中的時候，共產黨的情歌還不能使國民黨駐足。這個新時期且將在將來適當的情形下再加討論。

上述中、俄關係的三個時期，也準確地顯示近年來共產國際在本質上所發生的變化，與它從國際煽動機關變爲蘇俄國策工具的諸步驟。我們在這裏不能討論蘇俄和共產國際中發生這種轉變的極複雜的許多因子，但是卻很適宜於研究它們在大體上怎樣影響到中國的革命，跟怎樣受到中國革命的影響。

這是每個研究這問題的人所知道的，中國革命的高潮，與俄國及共產國際中托洛茨基派和史太林派爭奪世界革命勢力的理想和實際領導的鬭爭中所發生的高潮，是若相吻合的。假如史太林已能在一九二四年前提出他「一國中建設社會主義」的口號，假如當時這問題已經澈底解決，假如在那時史太林已能控制共產國際，那末，在中國的「干涉」永無開始可能的。此種投機無論如何是無謂的。可是在史太林發動他的鬭爭的時候，早已規畫了對中國的路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給予中國國民革命的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上的合作，是大都在共產國際的主席季諾維夫的指導之下的。那時史太林派尚未堅決地克服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的理論。但是從一九二六年初以後，史太林就變為共產國際及蘇俄共產黨一切事件和政策的實際負責的人了。從此他就牢牢地竊住了這兩個機關，這是大家所承認的。

在一九二六年全年，與一九二七年春季的大災禍中，發作戰路線及「訓令」給中共的共產國際，是史太林領導的。在這幾個月，中，災禍如暴雨狂風般的結集在中共的頭上。同時，史太林路線也受着托洛茨基、季諾維夫、喀門納夫等所領導的反對派的繼續不停的攻擊。雖然季諾維夫在做共產國際主席的時候，是竭力維持國共合作的路線的，可是現在他卻劇烈攻擊史太林所取的一路線了。特別在蔣介石一九二六年廣州政變流產以後，季諾維夫就預言着將有不可避免的反革命。在這次反革命中，民族布爾喬亞會與帝國主義妥協，而出賣了大眾。

至少在蔣介石第二次，也就是成功的一次，政變的一年之前，季諾維夫就已經主張共產黨應該與代表民族布爾喬亞的政黨國民黨分離。他認定民族布爾喬亞的政黨是不能實行革命的。二大任務的——反帝國主義，就是打倒在中國的外國統治勢力和反封建主義，或者可以說，剷除在中國農村中劣紳士豪的統治勢力。在那時候托洛茨基也已經主張建立蘇維埃與獨立的中國紅軍。總而言之，反對派預言者，假如仍舊繼續史太林的路線「布爾喬亞民主革命」是准要失敗的。這個預言當然是成爲事實了。

但是，如果反對派的反對在中國境內建立了早期雅各賓（Jacobin）政策的基礎，那末這幕悲

劇就會更加淒慘。這種設想也有充分的理由。托洛茨基的論理的批評，正和原先一樣，是漂亮的，他的忠告與實際情形的許多特點也有着相當聯系。但這聯系，正和原先一樣，並不十分多。那本收集他這時期中大部份論文的書，中國革命的諸問題，當然是一本立論散漫的著作，到處表示着他忽視當時現狀的客觀的限制。共產國際的政策固然造成了一次巨災，但他所主張的政策，據該書清晰指示也適足以造成更早發的、更厲害的巨災。

在「大崩潰」之後，托洛茨基派把共產國際的路線作為失敗的主因。史太林就為自己辯護，並且取笑這種解釋為非馬克思主義的。他說：『喀門納夫同志說中國革命的失敗應歸咎于共產國際的政策，並且說我們「在中國扶養了卡佛納（Cavagneri）……我們怎能自作主張，說一個黨的策略就能肅清或變更階級勢力的關係呢？我們對於那些在革命期間漠視了階級勢力的關係的人，對於那些想用一個黨的策路來解釋每一事物的人，將有怎樣的說法呢？我們對於這些人只有一個說法——就是，他們已經拋掉了馬克思主義。』

其實，凡是觀察這全時代的賢明學者，都不能不有一個結論，就是：托洛茨基派誇張了共產國際錯誤的重要性，同時，他們縮小了客觀環境中絕對不利的許多原素。他們對於在共產國際的錯誤中找尋攻擊史太林的材料，比對於中國的直接命運更感覺得有興味。但是他們的攻擊到底是沒有成功。大體而論，共產黨仍舊信仰史太林。因為中國革命的失敗，巴威利邦（Barwin）和匈牙利共產政權的相繼毀滅，又因為東方諸國中共產國際希望的總退却，俄國共產黨遂放棄了遠方的冒險，並且預備轉向到國內的建設。史太林得到了勝利。托洛茨基受到了放逐——並且，走進了破壞鐵道的事

業中去（如果我們以為莫斯科審判的證據是可靠的。）

我們如果再把史太林和托洛茨基的爭論討論下去，就要使人覺得討厭了。

重要的是史太林得了勝利，他的政策左右了共產國際在中國後來的活動。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有過一個時間，這種活動幾乎是沒有的。俄國在華的機關是被查封了，俄籍的共產黨員是被殺却或驅逐出國，從俄國輸入的經濟、軍事和政治援助都斷絕了，中國共產黨陷於極大的混亂，甚至有一時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絡。蘇維埃運動與中國的紅軍是完全在中國領袖之下漸漸地產生的。他們實際上並未取得俄國的讚許。在第六次大會以後，共產國際纔給它以事實上的追認。

此後，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所担任的任務是大加擴充了。有好幾個機關的確已經偷偷地恢復了起來；它派代表到幾個大城市中去與中國共產黨接洽；中國的學生繼續到俄國讀書并且秘密回國從事於革命工作；也有少數金錢流入中國。但是俄國絕對無法與蘇區作直接的物質聯絡，因為蘇區沒有海口，而且處處在敵軍嚴密的包圍之中。以前在中國有幾百個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現在只存兩三個了，他們大都行動詭秘，絕對不敢在一個地方耽擱幾個月。以前有數百萬的金錢供給蔣介石的國民黨，現在卻只能每次一千一千的送進去。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是曾經受過全蘇俄的幫助，現在中國的共產運動只有共產國際在幫忙，這共產國際也已無力調撥「世界革命根據地」的巨大資源了，它只能像養子一般的循規蹈矩地行動看，假如做錯了事，它的承繼權就會正式被剝奪的。

事實上，莫斯科或共產國際在這十年中在經濟上給予中國紅軍的助力是小得可以的。當牛蘭

在上海被捕，在南京被判決爲共產國際駐遠東總代表的時候，警察所提出的全部證據，證明在全東方（並不單是中國）的每月總支出並沒有超過一萬五千美元。如與流入中國支持基督教宣傳（大部分是資本主義的宣傳）或支持日本或納粹法西斯宣傳的巨額經費比較起來，真是微小得可憐了。跟一九三三年南京政府五千萬美元的棉麥借款相比，也有霄壤之分了。這筆借款據外國軍事參贊的報告，是有決定蔣介石勦共的內戰的價值的。

英、美、德、意以大批的飛機、坦克車、大礮和軍火供給南京政府，以摧殘中國的蘇區，他們當然不肯把軍火賣給紅軍的。美國的軍隊派了許多軍官來訓練中國的空军，這些空军曾在蘇區裏轟毀過數百個鎮市。德的教練官并且曾經親自領導過幾次最爲厲害的轟炸——正像他們今日在西班牙所做的一樣。納粹德國更派它最能幹的軍官西格德和一個普魯士的參謀團來幫蔣介石，他們改進了南京政府殺人的技術。有了這些人人知道的事實，而我如果還說俄國扶助中國的紅軍，那真太無聊了。反之，很明顯的，列強以有力的援助支持蔣介石，將有十年，但他們是不肯支持紅軍的。

我們可以毫無虛僞地說——而且我相信，凡是一個有理性的外國軍事專家都能够同意這句話的——在近代的中國歷史上，中國紅軍在作戰上所得的外國助力，要比任何其他軍隊來得少。

## 二 告別紅色的中國

在我離開保安之前，碰到兩件有趣的事情：十月九日我們接到從甘肅發來的無線電報，知道第一軍團陳的師與第四軍的先鋒隊，已經在會寧取得密切的聯絡。過了幾天陳及第一方面

軍所有重要的將士，與第二、第四方面軍的領袖們，如朱德、徐向前、賀龍、張國燾、蕭克等等，在甘肅舉行了一個愉快的聯歡會。整個的甘肅東北部，都入了紅黨的掌握，而且第四方面軍的一個縱隊，正在渡過黃河，向甘肅的西北部——葫蘆腰形狀的地方移動，政府的抵禦不久就告失敗了。

紅軍的正規軍勢力現在全部建立了很好的集中，在中國的西北部的交通線。冬季軍服的定貨單繼續不斷地飛到保安與吳起鎮的工廠裏。三大軍隊的聯合勢力，到現在已經有八九萬有良好訓練的武裝齊備的戰士了。在保安與整個蘇維埃區域都舉行了慶祝會。在甘肅南部一個長時間的不利的戰爭，已經結束了。現在每個人對於將來都有了新的自信。因為中國最優秀的紅軍的全部，集中在一大塊的新的土地上，並且緊接着引為同調的，同情他們的十萬東北軍隊。於是紅軍相信他們為「統一戰線」而提出的要求，將引起南京政府的極度的興趣。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正要離開之前，和毛澤東的一次會見。在這會見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對於共產黨願與國民黨和平解決，以及聯合抗日的這一基礎上的具體的條件。這些條件中有的已經在八月間共產黨所發表的宣言中公布了。在這次晤談中，我請他解釋這一新政策的原因。

「第一」他開頭說，「日本侵略的嚴重性，一天一天在增加，而且這是一種可怕的威脅，所以在這種威脅之下，中國一切的勢力，都必須聯合起來。除了共產黨，中國還有旁的黨派和勢力，而最有力量的是國民黨。現在如果沒有牠的合作，那麼我們的力量，在抗戰中是不足抵敵日本的，我們必須參加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合作。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中國兩個主要的政治力量，假如牠們現在仍舊進行內戰，則結果對於反日運動不利的。」



『第二、自從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黨發表宣言，鼓動中國各黨各派聯合抗日後，這一種主張已得到全國人民同情的反應，雖然國民黨仍舊繼續向我們進攻。

『第三點是許多愛國份子甚至國民黨黨員，現在也都贊成重行與共產黨聯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份子，以及南京政府自己的軍隊，也因為我們民族的生存受到嚴重威脅，現在都預備與共產黨聯合了。

『這些都是中國目前的主要現象，有了這些現象，我們得重新精密地考慮一個具體的方式，在這方式之下，促成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合作。我們堅決主張的聯合的基本要點，就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則，爲了實行這一原則，我們以爲必須建設一個民主的國防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必須抵抗外國的侵略，以民主權利給人民大衆而盡量發展國民經濟。

『如此我們情願維持這個議會制度的民主政府，一個抗日救國的政府，一個保護和領導一切人民愛國團體的政府。如果建立了這樣的共和國，中國蘇維埃將成爲這個共和國的一部分。我們將要在我們的區域裏，實現一個民主的議會制度的政府。』

『這是不是說這個（民主的）政府的法律，也要實行於蘇維埃區域麼？』我問。

毛肯定的答覆了。他說這樣的政府應該重新的恢復與實行孫中山的遺囑與他的大革命時期的三大『基本原則』，即聯合蘇俄及其他以平等待中國的國家，聯合中國共產黨，積極保障中國勞動階級的利益。

『如果這樣的運動，能在國民黨裏面發展起來，』他繼續說，『我們預備幫助牠，跟牠合作，並且

與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相同組織反帝國主義的聯合陣線。我們相信這是挽救我們國家的唯一的生路。」

『有沒有何種直接的原因，來決定這些新的提議？』我問他，『這些提議，在你們十年來黨的歷史中，必須作爲最重要的決議。』

『直接的原因』毛解釋着，『是日本的新的嚴重的要求，如果我們被這種新要求所屈服，那麼對於將來抵抗上的各種努力，一定會發生極大的障礙。同時，也會妨礙大衆對付日本積極侵略的反應的偉大的人民愛國運動這一形式，這種情形已改變南京政府的某些份子的態度。在這種情形之下，像我們所提議的這種政策，是有希望實現的。假如這種政策，在一年前或更早的時期中提出，那末，不論全國或國民黨，都不會接受的。』

『目前已在進行交涉，但是共產黨對於說服南京政府抗日並不存有怎樣的奢望，雖然這是可能的，祇要是可能的，那麼共產黨願意準備在一切必要的方法中求合作，如果蔣介石要繼續內戰，紅軍也準備與他周旋。』

毛澤東的確宣布了一個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願意停止內戰，停止用武力打倒南京政府的正式宣言，並且表示：如果建立了由國民黨及旁的各黨各派合作的面成的政治機構，則共產黨也願意服從這個民主的中央政府的最高命令。在這時候，（雖然不是正式談話中的一部分，）他也表示：在不根本妨礙紅軍與共產黨的獨立的工作，共產黨爲求實行「合作」起見，準備名義上有所變更。這樣，如果是可能的話，則紅軍將改編爲國民革命軍，並取消「蘇維埃」這一個名詞；在準備對日抗

戰的時期中，也將變更土地政策。在後來的緊張的幾週中，這一次談話（註）對於事變是有極大的影響的。在事變發生之前，共產黨自己的宣言，曾爲一般人所忽視，看到這些宣言的幾個南京政府的領袖，對此也有了甚深的疑忌。但是從共產黨領袖與外國人的會見記傳遍以後，許多有力量的人，反而更加相信了共產黨的誠意。兩黨「覆水重收」的必要，從此博得了許多新的擁護者——因爲停止耗費國力的內戰，與因抗日而實現和平的統一的提議，現在已宣傳於各階級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我和紅黨同居將近四個月之後，我回到白色世界去的準備，畢竟安排妥當了。這是一件很討厭的事，幾乎每條戰線上的張學良的東北友軍都撤退了，代他們的是南京跟旁的敵軍。那時只有一條通路，就是穿過洛川附近（在西安北面，汽車一天可到）一師東北軍仍和紅黨前線相接的地方。

我最末一次走到保安的大街，愈走近城門，我愈是走得慢。人們都從各辦公所裏伸出頭來，高聲地向我道別。我的撲克俱樂部的全體人員走出來，送我這撲克大師的行。還有幾個「小鬼」蹣跚地跟我走到保安城牆裏，我停步替老徐和老謝照相，他們像小學生似的，把手臂搭在肩膀上。只有毛澤東沒有來，他還在睡覺。

『不要忘了我的假臂！』蔡喊着說。

（註）會見時全談話記錄，請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二十二日期的上海密勒氏評論報。

『不要忘了我的膠片！』羅鼎儀丁囑着。

『我們在這裏等你的飛機隊！』楊尙琨笑着說。

『送一個老婆來給我！』李克農要求着。

『還要還我那四崙斯的可可！』博古抱怨地說着。

我經過紅軍大學的時候，全體學生正坐在一棵大樹下，在露天聽洛甫講演。他們都走過來，我們彼此握了手，我含渾地講了幾句話，於是反身涉水過河，對他們揮手道別，然後跨上我的小馬車很迅速地走了。我想：我或許竟是最後的一個看見他們都活着的外國人吧。我感到非常的悵惘。我感到我並不是在回到家鄉去，倒像在離別家鄉。

五天後，我們到了南方的邊境，在那裏我等了三三天，就擱在一個小村裏，喫着黑豆和野豬。這是一個美麗多林的村莊，適宜於游獵的地方，我就把這幾天工夫消磨在山中，同幾個農夫和紅軍士兵獵着鹿與野豬。樹林中充滿了肥碩的野雞，有一天我們甚至於看到在射程之外，有兩隻老虎正穿過一塊耕地，在秋天的紫金色所渲染過的山谷中。前線絕對平靜，所以紅軍祇有一營軍隊在這裏駐紮。

在二十那天，我平安地通過了沒有人煙的地帶，遠在東北軍的後方；第二天我騎着一匹租來的馬，走進洛川，那裏有一輛運貨汽車在等我。一天後我到達西安。在鼓樓邊，我下了車，請一位紅黨（他穿着東北軍的制服）把行囊給我。他找得很久，同時我也深感不安了，最後無疑地，我的行囊已經不知去向了。那行囊裏藏着十多本日記簿，和筆記簿，三十卷膠片——中國紅軍最初的照片——與幾磅紅色雜誌、報紙和記錄。這行囊是一定要尋到的。

鼓樓下面非常嘈雜，交通警察們卻站在不遠的地方好奇地望着，切切地在私語，後來我們終於明白了這件事原來汽車裏裝着許多麻袋，都是些預備送去修理的東北軍的破舊的步鎗，而我的行囊，在找尋的時候，也裝進這種麻袋裏去了。但在離西安二十里渭水對岸的咸陽的地方，我這失去了的行囊與其他的貨物一起卸下了！汽車夫很懊傷的望着車子，「他媽的，」他聊自解嘲地罵着。

時間已是黃昏了，車夫想到第二天早晨，再回頭去尋。但在我終覺得明晨太遲了，有些不妥當，我一定迫着那車夫當天回去，於是車子重新開了回去，而我則留在西安的朋友家裏，一夜不睡，想念我的，貴重的行囊。如果在咸陽這行囊打開了，那末非但我所有的東西會永遠失去，就是「東北」的汽車，及整個這些東西的所有者也都完了。因為在咸陽駐紮着南京的憲兵。

幸而行囊是找到了。在這本書裏你能看到紅軍的照片。不過我急急乎要找尋我的行囊，是完全正確的，因為第二天蔣委員長突然飛到西安來了，這天早晨街上完全斷絕了交通，通到城裏去的所有路上，都是憲兵和軍隊，沿路的農民都從家裏趕了出去，有幾家難看的小屋子也完全拆毀了。因此那裏見不到惹眼的東西了。那時候我們的汽車無法通過那條路到渭水，因為那條路是靠近戒備森嚴的飛機場的。

## 第十二章 回到白區

### 一 叛變的序幕

正在我出蘇區的時候，張學良將軍的東北軍和蔣委員長之間的形勢一天緊張一天。蔣委員長那時是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同時還是行政院院長——一個等於內閣總理的職位。

東北軍的往來勦共，已經踏過半打以上的省分，軍事上與政治上都漸由被雇傭的職業軍隊轉變為一種受了牠對手的民族革命反日口號影響的軍隊，牠轉變的程序，已在前面講過（註）他們已經知道從事內戰的無聊，他們被一種勸告所打動，而只忠實於「打回老家去」的一個中心觀念，日本人把他們從家庭裏驅逐出來，奸淫屠殺他們的眷族，他們要從日本人手中把滿洲恢復過來。這些觀念直與那時南京所主張的相反，有人說東北軍同情反日紅軍是很自然的。

這種情緒更因在著者四個月旅行中所發生的重要事故而更形嚴重。在西南，白崇禧、李宗仁兩將軍曾經一度反對南京政府，他們的政治主張是針對着南京的「親日」不抵抗政策。經過幾星期的戰雲密佈的緊張狀態，終於達到和平解決的目的，但這期間曾與全中國反日運動一個大刺激，在內地有三四個日本人被憤怒的羣衆所殺害，日本便向南京政府提出嚴重交涉，要求道歉、賠償及新的政治上的退步。一個新發生的中日「事件」，是可能地引起一次日本舉兵進犯。

同時，「全國救國會」領導的反日運動，不顧嚴厲禁止，到處在勃鬱地發展，羣衆的偉大壓力間

接使南京對日態度轉為強硬。這種壓力在十月中，當日本領導的蒙古軍以及在日本佔領下熱河察哈爾所豢養，所訓練的偽軍進攻綏遠北部時，更為增強。但普遍的民衆要求，認為這是已到了一最後關頭，應有全面抗戰的表示，但政府卻完全置之不顧。亦不下令動員全國。南京仍表示其不變的立場。「國內統一」——那就是勦清共黨——應該最先完成。許多愛國團體開始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共產黨停止內戰與根據「自由聯合」造成民族聯合陣線的建議，以便集中全國的力量抵抗日本這共同的敵人。擁護這樣意見的人與「漢奸」一般地被逮捕拘禁。

但是最高情緒的激動，卻集中在西北。那時極少數的人知道東北軍的反日情緒與停止勦共的決心有密切關係。西安之與中國所有通商口岸，對於大部分中國人，正與外國人一樣，非常的隔膜，新聞記者也很少去遊歷。在最近幾個月，也沒外國通訊員到過西安，沒有一個人對於在那邊發生的事有可靠的根據——只有一個人例外，她是韋爾斯女士 (Miss Nym Wales)，一個美國的作家，她在十月到了西安，訪問過張學良。韋爾斯女士正確地報告了在西北發展中的新醞釀。

『在中國西安——西安，一種危機正在負有勦共責任的張學良將軍部下極端反日的軍隊中發展着，這些軍隊從一九三一年的二十五萬人，減少至目前的十三萬人，都是失去了家鄉的人，念念不忘他們的老家，厭惡內戰，極端痛恨南京政府的繼續對日不抵抗政策。下級士兵的態度，很可以說，是容易叛變的，這種情感甚至於已傳到高級軍官那裏。』

『這種情形引起了許多瀾言，甚至於說：張學良以前和蔣介石的私交，也變成惡感，他正在謀畫與紅軍合作，在一個國防政府指揮下，成立反日聯合戰線。』

『嚴重的中國反日運動的造成，仍有其他原因，並非完全因爲自北至南接踵發生的事件。但在西安這地方，在被從滿洲驅逐出來的流亡人當中，正如一般人所想像的一樣，那是必然的結果。雖然這種運動在中國其他地方時受禁止，在西安，這運動卻由張學良將軍公開熱烈地領導（假如不是受他的軍隊的強迫而走向這條路的話）——而由其軍隊熱烈合作。』（註一）

回想她與張學良會見的重要意義，韋爾斯女士曾這樣記述：

『實際上，以及考察與此次談話有關的背景，這次會見可以認爲是一種想勸告蔣介石去領導積極抗日……；同時也含有一種威嚇（用張氏的話來說）：「只有抵抗外來侵略（那就是停止內戰），纔能出現真正統一的中國」並且，「如果政府不服從民意，牠有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最重要的，這位副司令（其地位僅次於蔣委員長）說：「假如共產黨能夠誠意合作，抵抗外來的侵略者，這一個問題或許能夠和平解決。」』

真是叛逆的談話！但蔣介石顯然對於這警告的嚴重性估量過低。在十月中，他調他的最精銳的第一軍作攻擊甘肅紅黨的先鋒隊，當他抵達西安後，他的目的是在完成第六次大圍剿的初步計畫。在西安與蘭州，佈置一百架轟炸機升降的嚮有設備，好多噸的飛機炸彈也已運到。據報告，毒瓦斯也準備施用。這是蔣氏所謂他要勦滅殘餘赤匪，「將於兩星期至多一月，可盡全功的」（註二）唯一的可能的注釋。



蔣氏在其十月抵西安後也許早已明瞭那東北軍對於勦共已變爲毫無用處。與東北軍將領會見以後，委員長已經看出東北軍對於新的進剿感到毫無興味。張學良參謀部一個軍官後來告訴我，在那時候，張學良正式將民族陣線停止內戰，聯俄抗日的意見書送呈蔣委員長。蔣氏的回答是：「非至每一個紅軍都消滅，每一個共產黨都監禁，我決不談這問題。」只有到那時期，纔能與蘇俄合作。

於是蔣委員長回到洛陽的行營，檢閱新總攻的準備。如在必要時，準備調二十師的軍隊赴西北。近十一月底，十師以上戰鬪力極強的軍隊，已集中在陝西門戶，歷史上著名的潼關以外。火車滿載着礮彈與軍需品，開往西安。坦克車、裝甲車、運輸汽車也將運去。

但關於這一切的大規模的激烈內戰計畫，局外人——除開在西北的人以外——完全不曉得。報紙上很少提到西北的事情。官方的報告是這樣說：紅黨已經「勦滅」，只有少數殘餘部隊四散竄逃。同時綏遠的防衛交付地方軍——他們卻勇於作戰。沒有一架南京飛機升空與每天轟炸中國陣線的敵機抵敵。但生動的宣傳，都說中央軍領導防衛；同時東京與南京互相交換保證，「地方衝突」不應擴大。少數中央軍——最多不過兩師人——開進綏遠，其目的是在防止地方軍隊把「抵抗」這件事看得太嚴重。恐怕他們真的進攻日本及察哈爾、熱河佔領的區域。有些南京軍隊駐紮在綏遠軍隊與紅軍之間，蔣氏想到紅軍也許會從陝西侵入綏遠以謀達到他們真正進攻日本的目的。

(註一) 紐約太陽報，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左右。

(註二) 參照西安半月記序言。

熱烈的民族情感火一樣燒遍全國，日本人要求禁止全國救亡運動，日本認爲這個團體是在鼓動反日。南京又屈服了。這團體的七個最著名領袖都是可欽佩的，屬於資產階級的國民：一個有名的銀行家，一個律師，幾位教育家，和幾位著作家，一起被捕。同時政府一次就禁止了十四種國內著名的刊物。上海幾家日本紗廠工人罷工，一部分是——關於日本進攻綏遠的愛國抗議，也被日本人的暴力與國民黨的合作而壓服。當其他的出於愛國心而罷工在青島發生時，日本海軍自動登陸逮捕罷工者，並且佔領了該市。海軍撤退唯一條件，是要在南京實際上答應禁止將來青島日本工廠中所有罷工之後。

這一切事件，在西北都有不同的反應。在十一月，爲他的軍官所壓迫，張學良曾向蔣氏請纓要求赴綏遠前線投效。『爲達轄制我們的軍隊起見，』這封信中的末了說，『我們應保持我們對他們的諾言，一有機會，就得讓他們實現他們進攻敵人的要求。否則，他們不但當我自己，並連委座是在欺騙他們，因此不再服從我們。請下令給我們，動員一部分的東北軍，如果不是全部，立刻開赴綏遠，援助那些盡他們神聖天職，在那兒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弟兄。如果這樣，我以及我的十萬多的隊伍，將隨從委座的領導，至死而不渝。』在這封信（註一）裏懇切的語氣，燃燒的報仇雄心，恢復軍官已經失去的榮譽的希望，都極有力量的透露出來。但是蔣氏拒絕這種暗示。他仍舊要東北軍去勦紅軍。

接着張學良坐自備飛機至洛陽，親自再提出這項要求。在這時候，他也爲被捕的救國會七領袖說情。後來，在委員長被監視以後，張學良曾發表下列談話：

『最近蔣委員長逮捕監禁上海的七個救國領袖。我請求釋放他們。這七個人，沒有一個是

我的朋友或親戚，甚至於我都不認識他們。但是我反對他們的被捕，因為他們的主張和我一樣。我那時曾經對蔣氏這樣說：「你的處置人民愛國運動的殘酷，是和袁世凱或張宗昌差不多。」

「蔣委員長回答是：『那不過是你的觀點。我是政府。我的舉動，是革命舉動。』」

「同胞們，你們相信麼？」

「（這質問是集會的幾千羣衆，發出憤怒的吼聲。）」（註二）

但是張學良那時飛到瀋陽，卻完成了一項使命。委員長答應在他下次到西安的時候，他將要對東北各師長詳細解釋他的計畫與戰略。張氏回去靜候他上峯的第二次光臨。可是在蔣氏到西安之前，中途又發生了兩件事，因此更引起西北的反感。

第一件是日德反共協定的簽定，與意大利的非正式的參與。這項協定，意大利早已默認日本佔領滿洲，以爲日本承認意大利兼併阿比西尼亞的交換條件。意大利與「滿洲國」發生關係，使張學良極度憤怒，他有一時與齊亞諾是老朋友。接到這消息，他痛罵齊亞諾與墨索里尼，立誓消滅意大利在中國的勢力。他曾經在他的受訓的軍官面前演說，有這末一句話：『這是中國法西斯蒂運動的末日！』東北人從此又多了一層怨恨。德意軍事顧問訓練蔣介石的軍隊，蔣介石的空軍去轟炸紅軍。他

（註一）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西安西北軍事委員會發表。

（註二）這演說辭登載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安的《西京民報》上。

們難道不會把他們所知道的中國的軍事消息供給日本麼？難道蔣氏事實上會不知道德、日協定的消息而認可這協定麼？據說事前他曾曉得這一切。

第二件，也在十一月中，又傳出胡宗南的著名第一軍不幸的消息，那軍隊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受到慘重的失敗，胡將軍，南京政府最善戰的軍事家，在幾星期前，勢如破竹地深入甘肅北部，紅軍徐徐後退，除開小接觸外，不與他們大戰。但用各種方式，對南京的軍隊宣傳聯合陣線，勸告他們停止前進，要求他們參加抗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種宣傳，證明得到了極大的效果。

但胡將軍斷定紅黨的末日到了——疲乏、懼怕，他們已消失戰鬥能力。他粗心地率軍深入。紅黨繼續向後退，一直等到他們退到將近河連灣。到了河連灣，他們決定不再退下去；他們要給敵人一點教訓。應該使人知道聯合戰線，必須有點反抗能力。忽然回過頭來，紅軍神妙地把胡將軍的軍隊引入一個泥濘的山谷裏，在天黑的時候，空軍已經不能轟炸了，把他們包圍起來，到了深夜，開始襲擊，左右兩翼用刺刀衝鋒。那時天氣是在零度以下，紅軍赤裸的手凍僵了，連揭開他們手榴彈的蓋子都感到困難。好幾百人衝進敵人陣線，用手榴彈當棍棒使。這次第一軍猛烈的進攻，結果完全失敗，兩旅步兵一團騎兵被解除武裝，同時步槍與機關槍也喪失無算，而且有一營人投降紅軍。胡將軍領軍疾退，將他幾星期以來恢復的土地，在幾日內完全放棄。他停止進攻，等委員長的援軍。

東北軍在一旁冷笑。這正如他們所說的：紅黨更比平常鬼計多端，這次新總攻的幸運的開頭，指示勦滅共黨是將多麼困難。一年、兩年、三年，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仍舊在打紅黨。那末日本又怎樣了呢？侵佔了更大的中國領土。他們這樣思想，但是固執的委員長，因為他的最優良軍隊的失敗而震

怒，譴責胡將軍，而且更堅決地要去勦滅跟他反抗的十年以來的敵人。

在這些主要戲劇開幕時，蔣介石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乘了他的巨型機飛到西安的飛機場。

同時重要的事件也在舞臺的左右兩面發生。在東北將領中，一致提出消除內戰，對日本抗戰的請求，已經商議穩妥。參加這種商議的，還有陝西綏靖主任楊虎臣將軍手下的軍官，關於楊虎臣氏上面已經講到過。為數大約四萬的楊虎臣將軍的軍隊，對於打紅黨這件事，比東北軍，更不感到興味。他們以為勦共是南京政府的戰爭，他們覺得犧牲他們自己去勦共，毫無理由——許多紅黨正與他們一樣，同是陝西人。他們以為，那也是一種可恥的戰爭，在日本正在侵略鄰省綏遠的時候，楊將軍的軍隊通常稱為西北軍，早在幾個月之前與東北軍取一致行動，暗裏加入停止與紅軍作戰。

這風聲也許已經傳到軍事委員長兼行政院長的耳中。他在西安過去雖則沒有常駐軍隊，可是在幾月以前，有一萬五千的著名第三憲兵團，即所謂「藍衫黨」的特務團，該團歸其姪蔣孝先將軍統率，他曾經擔任綁架、監禁、與殺害幾百急進分子的職務，開赴陝西，駐紮在西安，在陝西全省設立特務機關，從事於逮捕與綁架被認為共產分子的學生，公務員與兵士。而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則控制全部省域的警察。因為張學良與楊虎臣除開衛兵以外，沒有部隊駐紮在城內，蔣委員長在西安實際上統轄一切。

這種形勢又引起一件意外事件。在蔣氏到了後兩天，九日那天，幾千學生舉行反日遊行到臨潼，向委員長提呈要求。邵主席下令驅散警察，因蔣氏的憲兵的協助，粗暴地對付學生，在某處開鎗射擊，

兩個學生受傷，恰巧這兩個人是東北軍官的子弟，因此這行動特別引起憤怒。張學良出來調停，不准毆打，勸學生回城，並且答應把他們的要求轉呈委員長。蔣氏對於此事十分震怒，責罵張學良的不忠實，想代表兩方面。蔣氏自認爲這次在他們之間發生的意外，乃是叛變的直接原因。

委員長的參謀部全部人員與他的衛隊都和他一起在西安。蔣氏不允許他們所希望的同時接見東北與西北將領，而分別跟他們談話，想用各種引誘手段，離開他們。可是這種方法是失敗了。所有的人承認他是最高統帥，但是每一個人表示不願意參加這次新總攻，都請求遣送到綏遠前線去抗日。對他們蔣氏只有一個命令：『勦滅紅黨。』我告訴他們：『蔣氏在他的西安半月記中說：『勦匪戰事已經達到這樣程度，只須最後五分鐘——就達到最後的勝利。』

因此，不顧一切反對與警告，委員長在十日那天，召集參謀部會議，那天正式決定第六次總攻的最後計畫，準備下動員令，調遣西北軍東北軍，在甘肅、陝西的中央軍，以及待命在潼關外的中央軍。這命令已經宣告在十二日公佈，並且公開聲明，假如張學良抗命，中央軍就要來解除他的軍隊的武裝，他自己也要受褫職之處分。(註)同時張、楊都得到報告說：藍衫黨與西安警察已把他們軍隊中同情共黨的名單預備好了，這些人在公佈動員令後，即將逮捕。

到了這樣一個複雜的有歷史性的一聯串事件的頂點，張學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點鐘，召集東北軍、西北軍將領的聯席會議。早在前一天，已祕密調一師東北軍與一團楊虎臣的軍隊開至西

(註) 蔣鼎文將軍已調任行營主任，代替張學良。

安城郊。這師人是調來逮捕委員長與他的參謀部的。十七萬軍隊的叛變，到底成爲事實了。

## 二 委員長的被扣

無論怎樣我們反對其動機，或在他的幕後的政治作用，我們得承認這一次在西安的叛變，是適當其時，而適當地處置的。這一件事比蔣氏在南京或上海的政變，或共產黨的廣州暴動，來得更少流血，更爲巧妙。在事前沒有一點叛變者的消息洩漏出去給對方知道。在十二日早上六點鐘，全部事件都已完成。東北軍與西北軍控制了西安。藍衫黨措手不及地被解除武裝與逮捕，事實上參謀部全體被包圍在其駐紮處——西京招待所，而被監禁，邵力子主席及省公安局長也已成爲囚徒，西安城市警察投降了叛軍，五十架中央飛機與駕駛員也在飛機場被扣。

但是逮捕委員長是一件流血的事件。蔣介石是住在距城十哩臨潼地方著名的溫泉，事前在這地方的其他遊客已奉命避開。半夜到這地方去的是張學良的衛隊長，二十六歲的孫銘九營長。在途上，他挑選了二百個東北軍，在早上三點鐘的時候，他已到了臨潼附近，到五點鐘，第一部載重車，載了大約十五個人，衝到委員長的行營門前，立刻與崗衛發生衝突，雙方開火。

援軍接着就開到協助東北軍的這些先鋒，由孫營長率領進攻委員長住所。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衛隊的一陣抵禦，使受驚的委員長獲得充分時間逃出。當孫營長走進他的寢室，他已經不在那裏。孫銘九率領一羣搜查部隊走上在這滿蓋着雪的名勝後面多石的山上，指揮搜索。立即他們發現委員

長的隨從侍役，不久，終於尋着他自己。他只在他的睡衣外面穿着一件寬大的長袍，光裸的手腳，已在上山時擦破，身體在嚴寒中抖顫，他是躲藏在一個大磐石旁的山洞裏面——這磐石恰巧是指點走到築長城的秦始皇的墳墓所在地的標識。

「孫銘九向他行敬禮，委員長開頭第一句話是：『如果你是我的屬下，殺我了事。』」孫回答道，「我們決不槍殺你。我們只請求你領導我們抗日。」

「蔣仍舊坐在那塊磐石上，猶豫地說：『請張副司令到此地來，我要下山去。』」

「張副司令不在此地。軍隊在城內發動；我們是來保護你的。」

「聽到了這句話，委員長好像纔放心了些，吩咐備馬載他下山。」

「孫說，『這兒沒有馬，我來背你下山。』他伏在委員長的腳下。經過短時間的遲疑，他很痛苦地伏在這位青年軍官的寬闊的背上。他們這樣走下山坡，軍隊在一旁護衛，後來一個侍役送來蔣氏的一隻鞋子。這幾個人纔在山脚下坐上汽車，向西安進發。」

「『過去是過去，』孫向委員長說。『從現在起，中國應有一新政策。你準備怎樣呢？……中國政府目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在抵抗日本。這是東北人的特別要求。你為什麼不打日本，而反下令打紅軍呢？』」

「蔣厲聲說：『我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我代表國家。我認爲我的政策是對的。』」（註二）

在這種情形之下，流了很少的血，但沒有屈服，委員長到達省城，那裏他成爲楊虎臣、張學良的被強迫的客人。



在政變那天，東北軍與西北軍所有的師長聯名向中央政府、各省領袖及全國人民發出通電。這短短的通電中解釋「爲促成他的覺悟」，委員長「應讓其目前暫留西安」。同時擔保他個人的安全。向委員長呈請的「救國」主張也向全國廣播——但各處都禁止發表。下面就是著名的八項主張：

- (一)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負救國責任；
- (二) 立即停止一切內戰，與採用武裝抗日政策；
- (三) 釋放上海被捕七愛國領袖；
- (四) 釋放一切政治犯；
- (五) 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
- (六) 保障人民愛國組織權利與政治自由；
- (七) 實行總理遺教；
- (八)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對於這八項綱領，紅軍、中國蘇維埃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立即允許贊助。(註二)幾天以後，張學良

(註一)這是 Daily Herald 駐西安的我的通信員白脫利瑪 (James Borran) 孫銘九會見記的一部分。

(註二)上述八項主張的七項，是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所發通電中的救亡綱領完全一致。因此張學良與共產黨對於這綱領早已商妥，雖則共產黨沒有料到張學良會採用這樣驚人手段，使南京採納。

用其私人飛機飛至保安，請來了共黨的三位代表：一位周恩來，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一位葉劍英，東部紅軍參謀長；一位博古，西北區蘇維埃政府主席。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代表隨即召集了一個聯席會議，三方面成爲公開聯盟者。在十四日那天，發表通告，宣佈成立反日聯軍，擁有十三萬東北軍，四萬西北軍，與九萬左右紅軍。

張學良被舉爲反日聯軍軍事委員會主席，楊虎臣爲副主席。于學忠部下的東北軍在十二日那天曾自動在甘肅省會蘭州發動政變，反對中央政府派去的官吏與軍隊，並解除南京駐在那兒軍隊的武裝，在甘肅其他地方，紅軍與東北軍合作，控制交通要道，包圍在甘肅的五萬中央軍，因此叛軍實際控制全部陝西與甘肅。

事變後，新軍事委員會命令隨即發佈，調遣東北軍與西北軍東開至陝西、山西與陝西、河南邊境。紅軍也奉這委員會的命令而南下。在一星期內，紅軍事實上已佔領渭河以上的陝西北部的全部。彭德懷率領紅軍前衛，駐紮在離西安只有三十英里的三原。另一部分在徐海東指揮下的一萬紅軍，則駐紮在西安四周，預備向陝西、河南邊境移動。紅軍、東北軍、西北軍在陝西邊境，守望相助。但是一方面在進行防禦的佈置，一方面各方都肯定宣言反對新的內戰，聲明他們的舉動全是出於政治目的，否認有進攻的動機。

八項主張的實施步驟立即施用——紅軍在其新的領土內，嚴格遵守這種主張，並且停止進行土地革命綱領，取消一切反共命令，釋放在西安四百多的政治犯，取消新聞檢查，廢止一切愛國（反日）團體的禁令。好幾百學生自由到民間去工作，在各階級裏組織聯合陣線團體。他們也往農村中

去，訓練與武裝農民。在軍隊中，這些政治工作且領導了空前的反日運動。羣衆大會差不多每天召集。有一次大會中參加的人數超過十萬人以上。總之，所有的口號是聯合起來抗日與停止內戰——後者尤爲合乎農民心理，因爲他們的糧食與牲畜已被徵用，作爲即將開始的勦共軍事之用了。

但這些消息在西北諸省以外，全受禁止。有膽登載一些從西安發出來消息的刊物編輯，正如有較高地位的大公報所說，就有立即被捕的危險。同時南京宣傳機關放出煙幕，這更使蒙在鼓裏的大衆昏亂。南京被這突然的消息所震動，其首先的反應是召集中常會與中政會議，這會議立即宣告張學良爲叛逆，褫奪其一切職務，而着令釋放委員長，如不奉行，即將開始討伐。人民對於這含有刺激性的消息，也有各種反應，有的喜悅，有的憂懼。蔣介石成爲一種軸心，因爲這軸心，而中國各種互相衝突的勢力曾有相當的穩定。把他移開，則一切勢力都沒有約束，正面和反面的勢力會發生公開的衝突，必須設法準備新的調整，新的集中力量與新的結合。

經過三天，沒有人曉得蔣氏的生死問題——除開美國合衆社明白宣稱，張學良在無線電播音中報告他殺害蔣氏的方法與目的。沒有人知道叛軍的目的，也沒有人明白這件事的政治意義，即使有幾個同情他們的，也爲僞造的消息所蒙蔽，而非難他們。南京切斷一切與西北通信的工具，所有西北的報紙與宣言都被檢查員焚燬。西安一天到晚的廣播，一次又一次地說明他們行動的意義，爲正義與和平而呼籲，而並不是攻擊政府；但南京電力極大的無線電臺發出震耳的雜音，擾亂西安方面所播的演說。在中國從來沒有這樣充分表現過統制一切輿論的可驚力量。

作者本人好多電報也常是一刪幾百字。著者幾次想發出西北方面八項主張的消息——這或

許可以稍爲幫助西方讀者解釋這一個謎——但被檢查員刪得一字不留。許多外國通訊員不曉得發生於西北的事件，而迅速地採用那些宣傳機關所造的謠言，當作新聞。因爲國民黨及其黨員對世界發出許多幼稚的偽造的消息，因此使中國像一個瘋人院。有好多這樣無稽的傳聞，如叛逆把省公安局長釘在城門上，紅黨佔領西安，在城內搶掠，把紅旗升在城門上，張學良已被他自己人暗殺。差不多每天南京宣佈西安發生混亂，紅黨誘拐男女青年，婦女驅去「公妻」。全部的東北軍、西北軍成爲土匪。到處搶劫，張學良要求八千萬贖蔣委員長。(註)莫斯科援助他。他是一個紅色分子。他是一個鴉片煙鬼。他是一個殺不可恕的壞蛋。他是一個鬍匪。

許多流行的最離奇的消息，也有許多是從在中國出版的日本報紙，甚至是從日本官方那裏傳出。日本人方面特別增刊驚人的目擊的西安「紅色恐怖」的消息——雖則他們正如別人一樣，遠遠地離開這城市。日本人也同樣發現蘇俄的陰謀在策動這次政變。但他們卻逢到宣傳比他們高明的對手。在莫斯科報紙上，新聞報與真理報上絕對否認蘇俄有任何關係，痛詆張學良，而頌揚蔣介石，並捏造一故事，說西安事變是前行政院長與「日本帝國主義者」聯合鼓動的——一個與事實完全相背的玩笑，甚至中國最反動的報紙，怕人家嘲笑，都不敢這樣揣想。「謊話是可以的，紳士們。」這是列寧說過的，「但有一定限度。」

誣謗的煙幕繼續了好幾天。但在蔣氏被禁一星期後，南京對於這樣引人注意的大事的新聞封鎖顯然已經表現力量不夠。起先透露一些，後來竟大量地洩漏出來。八項主張的綱領普遍地刊登在有胆量的報紙上，取得自由主義者與進步分子的擁護，因爲那些主張都是自由進步布爾喬亞的綱

領大衆方始明瞭西北並不要造成內戰，而在求消除內戰。民衆的情感逐漸由爲一個軍人的安全擔心，而轉移爲對國家的安全擔心。內戰不能救出蔣氏，但可以促中國於覆亡。

得到蔣氏被扣的消息之後，南京的奪取政治大權的陰謀已在躍躍欲試。軍政部長何應欽，與國民黨中的「政學系」，那時在南京高據要津，密切合作，竭力主張「討伐」。對於這問題，贊成何將軍的人有傾向法西的黃埔派、藍衫黨，在野的汪精衛派、西山會議派，以及南京的德意顧問。他們以爲，在這種情勢下，是一個機會攫取全部軍權，排除國民黨中自由主義者，親美派、親英派、親俄派，以及聯合陣線團體，使他們在政治上完全失勢。何將軍立即派遣二十師中央軍，開到河南、陝西邊境。他再調幾隊飛機不斷地在西安城上示威，而對於叛軍陣線，大有拔劍張弩一觸即發之勢。有幾架飛機（是獻給蔣委員長祝壽的禮物）轟炸陝西境內的渭南、華縣，炸死幾個熟練工人。

然而蔣夫人的主張顯然不是這樣，她比她的丈夫了解那時的情勢。惱恨這樣殺人流血的一切準備（在南京的人那時以爲委員長決不會生還）他去訪問何將軍，問他有何用意。假如他發動戰爭，他能善其後麼？他能救她的丈夫麼？他的安全，她會這樣寫：「實與國家之生命，有不可分離的聯繫。」他是不是要謀害她的丈夫呢？將軍面色變了，她堅決主張何將軍應停止戰爭，而用一切有效方法救蔣先生出險。她希望他仍能生還。她的主張勝利——後來蔣氏的專使就到了南京。

這也是很明白的，假如發動大規模的戰事，西北方面也並不是沒有同盟軍幫助。廣西、廣東、雲南、

（註）蔣夫人痛心這種謠言，曾這樣寫：「始終絕未提及金錢與權位問題。」

湖南、四川、山東、河北、察哈爾、山西、綏遠與寧夏的軍事政治領袖，都在乘機而動，並且還可以確定，他們沒有一個人肯費一些些的氣力，去幫助何應欽發動戰爭。有幾個人，也許全體的人，或者會走到叛軍方面。至於要籠絡那些省分裏的政客，尤其量只須費上一大筆款項，就可取得他們的中立，可是每一個人，都想在這次衝突中謀畫擴充勢力。這是很顯然的證明，在二十三日那天，擁有實力的宋哲元將軍與韓復榘將軍（冀魯兩省的統治者）發出通電，主張和平解決，乾脆地反對戰爭，而明白地表示不贊同何應欽的計畫。

主要的問題，那時變為這樣：蔣介石被扣在西安的時期中，是否仍能獲得相當的擁護，阻止消耗戰事的爆發。這一戰事，無論如何，必然會結束他的政治生命，即使不是他的肉體生命。在南京與上海，他的弟兄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他的連襟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及蔣夫人，甚至他的大姨孫夫人（大家知道她反對蔣氏的），召集蔣氏的親信，竭力阻止南京比較反動的分子利用討伐共產黨的名義，造成進攻的企圖。

同時在西安發生快速的心理改變。蔣委員長被扣不久之後，他方始明白，也許出賣他的最壞的人，不在西安，而在南京。考慮這樣局勢，蔣介石就決定放棄做殉道者的辦法，因為在他遇害後，何應欽將軍或其他人會爬上去奪取獨裁的權力。於是委員長以一種很精明與切實的態度，與那掌握他的生命的普通凡人接洽，甚至連「赤匪」也在內。

### 三 蔣張與共產黨

委員長在西安蒙難的事實曾由委員長自己和他的夫人蔣宋美齡女士合作寫下來。那些沒有讀過在中國歷史一大轉變中最引人注意的他倆記載的人，是必須一讀的。據著者所知，最近沒有什麼文章會比這更動人的了，也沒有一種文章對於那富有中國知識的讀者，能夠把中國統治者的性格與心理表顯得這樣深刻與活躍的了。

因此本篇所提到的事實，作者不敢自滿，而僅能補蔣委員長兼行政院長與他的勇敢多才夫人寫作的不足。他們認為西安事變是一種暴行，由於個人命運而以十分誇張的情感敘述，用他們經歷的主觀的敘述，告訴我們。但那些事件有打擊他們生命的力量，當然不得不十分小心地處置，幕後由於政治的原因，或為保持其地位的尊嚴計，使他們不得不捨去許多有價值的材料。

現在必須鄭重聲明的，對於大部的中國人，因為他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民族，道德上對於判斷西安事件，並不居重要地位。中國歷史自然是富有同樣事件，特別在那記載封建戰爭的古史上，這種事實每一個將軍都深深地記着。最近也有不少前例。在一九二四年，基督將軍馮玉祥監禁那時的總統曹錕，而強迫他接受他的政治條件時，大眾更加地敬仰馮將軍。他今天是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蔣介石自己也給我們兩件近例。不久以前，他扣留已故胡漢民，他的前輩，國民黨的元老，他的反對派。另一個例子是監禁李濟。蔣氏把他扣押在南京，直等到他的政治勢力崩潰時為止。

其次必須記住的，中國現在還不是一個民主國家，時常有在政治上會開回到純粹的封建制度的機會。因為報紙的完全被統制，民衆沒有參政權，每個人都知道只有一個有效方法去非難政府與促其改變政策。那就是武裝示威，或者就是中國人所謂「兵諫」——一種在中國政治運動上的公

認的計劃。我們可以暫且不講其中有什麼感情作用，我們可以認為張學良是應用最平和直接的方法，完成他的目的，在他用直接行動對付總握大權的領袖以後。這方法損失最低的人力，與最少的流血。這是封建的方法，不須考慮，但張學良採用這種方法，其在半封建制度所處的重要性，他直覺上是明瞭的。他的行動是根據於極端現實主義，而其客觀的歷史的效果，是進步的。

但是蔣氏的生命，真的在嚴重的危險中麼？

看起來曾經有這樣的事，不是張學良方面起意的，也不是共產黨方面楊虎臣有起意的可能。然而急於這樣幹的還是東北軍急進青年軍官，和不滿足士兵，以及有組織的武裝羣衆，他們都表示意見，要處罰蔣院長。青年軍官決定召集民衆大會審判蔣氏與他的屬下。軍隊的意見，竭力主張加害委員長。希奇得很，反而是共產黨勸告他們，應該保全他的生命！

在西安事變中，共產黨的政策，從來沒有明白表示過。好多人以為共產黨為報復十年來蔣氏對他們殘酷的戰爭，現在要置之於死。許多人相信，共產黨要乘此機會，與東北軍、西北軍聯合，努力擴充他們的根據地，向南京挑釁，發動新的大鬪爭，以奪取政權。實際他們並沒有這樣做。他們非特促成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並且請他回到南京任領袖之職。甚至蔣夫人也說：「完全與外間所信相反，共黨並無劫持委員長之意。」但他們為什麼無此意呢？

在上面已經時常提起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創造民族統一戰線，以抵抗日本，而在南京建立一種民主政治組織。這些口號是絕對可信的，因為這些口號與共產黨所實際行使的策略，完全配合。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以及各方面，他們確實需要和平，需要一種多方面的代議制的民主政治，以達到



他們面前的目的。他們認清，這樣一個民主政治，纔是唯一的可以滿意的構造，在這局勢下面，現在可以實際聯合全國，達到反帝尤其反日戰鬪，完成獨立。這一種鬪爭，他們自己完全相信，應該站在中國社會革命的完成之前，並且有不可分離而應同時並進的關係。從經驗上，他們曉得在外侮當前，勢將滅亡的全盤情形之下，如果繼續革命戰爭，不但會更削弱國家抵抗的力量，並且也許連革命本身的潛力，也因之斷送了。

『中國解放運動的勝利，』毛澤東說，『將爲世界共產主義勝利的一部分，因爲打敗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就是毀滅帝國主義的最得力的根據地之一。如果中國完成獨立，世界革命即將很迅速地發展。如果我們的國家爲敵人所征服，我們將要失去一切。因爲一個民族被剝奪了他的民族自由的時候，革命的任務，就不是在立即實行社會主義，而是爲獨立的鬪爭。我們如果要在一國裏實行共產主義，我們失去了這個國家，那我們甚至於連共產主義都不用談了。』(註)

因此共產黨向國民黨提出的和平建議，是完全根據這種結論的，在委員長被打以前，已經是如此。在那次事變全部過程中，他們堅持他們的「陣線」絕對沒有更改，一種不參雜感情作用的客觀性，是以人情爲政治中心的中國所從未有過的。不問外界形勢所給他們一切的試探，他們表現一種黨的紀律，這使一個公正的觀察者，感到極深刻的印象。在開始，他們就認爲西安事變的中心意義，對於他們是表示忠實於他們聯合陣線綱領的機會。他們與扣留蔣介石絲毫無關。這件事使他們覺得

(註) 著者與毛氏在保安一次會見當中的談話。

驚奇，正如國內其他的人一樣。但他們對於這件事的結束，卻很有關係。

蘇維埃政府與共產黨一聽到這件事，就召集一次聯席會議，決議贊助八項主張並加入聯合抗日委員會。不久以後，他們發出通電（註一）發表意見，信任「西安領袖的行動，是出於愛國忠誠，希望決定立即抗日的國策。」這通電切實責備何應欽的討伐，宣說「如果內戰開展，全國將混亂，日本強盜，乘機侵略我國，而亡國奴就將為我們的命運。」為達到和平解決的目的，紅黨主張避免戰爭，開始和平談判，並且召集各黨各派開和平會議，商討全國一致抗日綱領。這通電很清楚地指出應張學良之召而到西安的紅黨代表以後所遵行的政策——在全部事變過程中，張氏很多地方靠這幾個人做他的政治顧問。

共產黨首席代表周恩來，到西安不久，就去看蔣介石。（註二）人們很容易想像這次會見對於委員長的震驚。他的身體依舊很羸弱，他的心理上仍舊被不久以前所達到的經驗所深深的打擊，據說蔣氏，在周恩來——他的舊僚屬，以前曾懸賞八萬元購他的頭——走進了他的房間，向他親切的招呼後，他的面色因憂慮而變白。他一定斷定紅軍已進西安，而他將為他們的俘虜這種恐懼，在蔣夫人也是一樣的，她說：（如果蔣委員長從西安被移往別處）「則其目的地，常在紅軍陣線後方。」

但委員長對於這種憂慮，不久也就消釋。周恩來與張學良雙方都承認他是統帥，並且坐下來表白共產黨對於國難的態度，委員長起初冷酷地靜默不發一言，當他靜聆（這是在他十年反共戰爭中的第一次）共黨的意見以後，他漸漸溫和起來。在十二月十七與二十五日中，蔣介石、張學良、楊虎臣與共黨代表舉行了幾次談話，正如大家所知道一樣，蔣在開始甚至拒絕討論叛逆的綱領。但是當

他單獨久居於他部屬爲他所造成的隔離環境中以後，當接到了在南京進行中的陰謀消息以後，與他的憂懼一個內戰而發生嚴重後果以後，他不但相信動手扣留他的人的誠實，並且也相信共黨反對內戰與聲明如果他能夠定下積極抗日政策，共黨情願在他領導下幫助完成國內和平統一的這件事，也是可靠的。在這幾次會談中，也許也同時討論到後來南京與蘇維埃政府休戰根據的四點。

蔣氏當然不能在他的西安半月記內詳細敘述這些所討論的問題，因爲他的地位是，而且應該是，『一切皆應聽命於政府』。因此這兩星期中全部內容，將永無一人知道，除非張學良或別人發表了他們會談的記錄——這就目前政治情形來說，短期間內恐怕還不可能，可是從各種已知的事實也可以明白「雙十二」事變的大概。

第一次造成雙方接近的機會的是委員長的一個「外國朋友」澳洲人端納(W. H. Donnan)他於十二月十四日到西安，他是蔣氏的不居名義的顧問，以前在張學良那裏擔任同樣職務。在各種人物當中，爲什麼張學良一定要召請端納來親眼看見同時使世界因他而知道「蔣氏安全與舒適擔保」的真實呢？這理由表示中國人心理一個有趣味的一面。張氏知道而南京也是如此，沒有人會相信這樣危險中去擔任這樣使命的任何中國人的話，但一個外國人因爲他是個第三者，是會爲人所相信！

(註一)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出版的『召開和平會議的建議』

(註二)在西安半月記中，蔣並未提到會與周恩來談話。

端納於十五日回到洛陽，以電話報告南京。蔣氏是平安並且頗受優待。他同時傳出委員長已派蔣鼎文攜帶了他給軍政部長及南京中央政府的親筆信的消息。這個消息更加使蔣夫人對於主戰者的憎恨，因為她那時已得到確實證據，不但她的丈夫仍舊安然無恙，而且證明除用武力以外，還有別的「途徑」可走。和平解決是可能的了。

在十八日那天，蔣鼎文將軍帶了委員長的信抵南京，信裏命令何軍政部長停止「討伐」。蔣鼎文將軍又負有從南京方面推出幾個代表回到西安的使命。張學良自然提議委員長的連襟孔祥熙博士為最適宜的代表，他那時不但是財政部長，並且在蔣氏離京的時候，代理行政院長與國家的主腦。孔博士遲疑不決，因為「醫生堅囑，不令飛陝」。蔣夫人這樣說。但南京其餘的人也反對這件事，因為他如果前往，一定會被人認為開始正式談判。何應欽將軍堅持為保持政府威信，應該避免這種事。折中的辦法，是由蔣先生的舅兄，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生現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宋子文屬於南京的自由主義派，是國民黨中所謂歐美派。（這一派極端反日，而那時正趨向於聯合陣線。）就成為西安所最信任的代表，而為最適宜的調解者。與宋子文一起飛去的，是顧祝同將軍，除軍政部長何應欽外的另一重要將領，他沒有在西安事變中被扣。

宋子文於二十日乘飛機抵達西安。在這時候，一個「原則上」承認的普通協定，好像已經成立。委員長沒有提起過這件事，但從張學良在十九日對外國通訊社談話的節要看來，他至少認為這件事的解決，實際上已經完成。

「委員長的逗留於此，並非因為我們。在端納先生於星期一到此，委員長怒氣少平不堅決

拒絕談話之後，他即安詳地討論我們各人當前的問題，到了星期二，在原則上我們已經商定應該採行的關於國策的各項主張，與更改政策，遵守總理遺囑，使民族在政治上物質上得到自由合理的發展。

『我因此電京，歡迎任何人前來聆聽委員長的意見，而與他處置必要的安全辦法，以防止內戰的發展。委員長仍然熱烈要求回京，但在我一方面，個人完全信任他要履行他的諾言，可是我們不能擔保他到了南京以後，不受包圍而廢續內戰……他默認這個意見。從那時起，他正如我們一樣，毫無辦法地希望南京有人來，解決這問題（那就是適當的保人），而使委員長能早日返京。

『那是一切事實的真相。真是奇怪的事，會發生如此的耽擱，如果早有人來，他也許幾天以前已回南京了……』

張學良（註）

但在東北軍的激烈青年軍官幹部中間發生了嚴重的糾紛。他們對張學良的政治措置有直接發言權，而他們的意見也佔着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們受到全西北極有力量的羣衆運動的情感的影響，起先絕對反對釋放蔣介石，以待南京實行八項主張。半數以上的軍官預備召集一民衆大會，堅決地主張對於蔣委員長的生命，付之「民衆審判」。

（註）這一電報是在十二月十九日從西安發給在上海的泰晤士報通訊員佛萊采（Fletcher）的，並附帶要求分

發給別的通訊員。南京檢查員扣留了這電報。另一份是發給戴納，本報所出，即由戴納處得來。

蔣也想到，有這種公開屈辱的可能性。對於在西北有發生這種運動的可能性，比任何人都清楚，因爲在一九二七年已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甚至在他身旁的衛兵也講起過這件事情。蔣在西安半月記中寫着：他會聽到看守者關於那種決定他的命運的談話：『余聞其交人民公斷一語，乃知彼輩殺余之毒計，將假手於暴民之所爲也。』

然而紅黨代表卻盡了極大力量。在他們與蔣氏會談以後，他們得到確實保證（除了從全部局勢可以清晰推測以外），認爲他假如釋放，一定會停止內戰，而大概會實施聯合陣線的全部綱領。因爲希望達到這目的，應該保全蔣的地位，他應該回南京，依舊保持他的威信。因此他們很明瞭，如果簽訂任何協定，而給局外人知道了，或者他真的受了民衆審判這樣一件屈辱的事，這一切事就要無法避免地損害他，毀去他的領袖地位。更進一步，如果蔣氏被害了，內戰必將繼續發展到不堪收拾的地步，十年混亂的國共戰爭更要拖延下去，而與反日聯合陣線的希望，則相去愈遠。到了這樣一個田地，任何政黨都無有利的希望，只有中國遭難，只有日本得利。至少共黨是認爲這樣。

因此博古、葉劍英、周恩來與其他在西安的共產黨員，那時化了幾個鐘點，有時講上一整夜，幾次三番解釋他們的政策的許多理由。東北的激烈分子，對於他們的地位，絕對不了解，因爲他們在理想中，應該是共黨第一個要求殺害蔣氏。他們中間有幾個人真的因憤怒而哭泣，覺得受了「欺騙」。——因爲這一羣人到共黨當中去尋求他們的政治領袖，共黨正與張學良一樣，對於他們很有影響。但是，他們中間大半的人——楊虎臣也和他們相同——雖然仍是不以爲釋放蔣介石是件聰明的事，可是，是要殺害他的要求，比較減少下去。逐漸地一個比較合理的態度勝利了。逼他採用激烈手段的壓力，

比較少下去，張學良對於他的談判，便更爲順利。

除了宋子文、端納及其他從南京來的兩三個人之外，政府中人在西安早已有了好多，其中有陝甘省政府主席、內政部長、軍政部次長、軍事參議院參議委員長的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以及總參謀部的人員，這些人都是和委員長同時被扣的。他們中間大部分人參加一部分的張學良、楊虎臣、周恩來與東北軍高級將領的會議。在實際開談判的時候，顯然八項要求中沒有一項曾被接受，因爲雙方都承認有保持政府威信的必要。但是中國人的要求總從最高點出發，而有一些真要達到目的的意思，僅是因爲先提出一個最高點，可以從這最高點加以討價還價，達到實際的目的。西安事變也是如此。提出八項要求人的實際目的，就其重要正確的項目講是如此：（一）停止內戰與國共合作；規定武裝抵抗任何日本再行侵略的政策；（二）罷免某幾個南京親日官吏，與採用積極外交政策，建立與英、美、俄更密切的關係；（如果可能，與之聯盟）；（三）改組東北軍與西北軍，政治上、軍事上與中央軍一體待遇；（四）予人民以更廣泛的政治自由；（五）在南京建立一種民主政治機構。

以上所說的似乎是蔣介石與張學良在他們離西安前所協定的主要幾點。蔣氏並且私人擔保不再進行內戰。顯然蔣介石所謂沒有簽訂任何文件是完全可信的，那些懷疑的人並沒有找到可以證明他曾簽字的證據。但是南京與委員長雖則仍有「面子」，可是後來的事變證明張學良雖然失了他的面子，卻也有相當的用處。

蔣夫人二十日到西安，無疑地她促成談判，（正如她的西安事變回憶錄所說的一樣）她懇求與責罵張學良，催促速放委員長。正如她的丈夫自比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蔣夫人也承認她擔當

了聖經上所規定的任務，就是『耶和華今將有新作爲，將令女子護衛男子。』在二十五日那天，正當蔣夫人默念聖誕老人是否會經過西安，這老頭兒終於變爲張學良而出現，他宣佈他已說服了他的部屬。他要在那天讓他們飛回南京。他真的做到了。

最後還有結束的敷衍面子的驚人做作。張學良將軍，乘着他自己的飛機，和委員長一同到京，靜待處分！

#### 四 「針鋒相對」

現在我們要開始敘述最後一幕。東方人做作的技巧對於一個生手（即使對於幾個有經驗的觀察者亦復如此）最感到奇特與迷惑的。在以後三個月中西安事變所造成的大部分事實，完全明白，而在這一幕的結束，場面突然更換。有巨大的征服在進行，有勝利在獲得。有重大的損失與潰退在紀錄下來。但舉行的決鬥，正像你所看見的中國戲中古時代戰士的決鬥一樣，他們喊出使人百脈沸漲的呼殺，在空中兇猛的亂砍亂殺，但實際上從來沒有互相接觸，而在結束時，當失敗者承認他自己的死亡後，自己用布遮起來，無力地在地板上躺一會，於是他再爬起來，用着極嚴肅的態度，自動地跑進後臺。

這是不可思議而同時是滑稽的在南京進行的假裝的武劇。各人都「勝利」，只有歷史被欺騙了——成爲一個犧牲者。

張學良到京後立刻呈蔣一函謂：『茲靦顏隨節來京，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綱記，警



將來……」

蔣氏對此坦然回答道：『由於我的不德，及對於部屬的教導無方，致使發生空前叛變……你現在既衷誠悔悟，我應呈請中央，採用適當處置，以恢復原狀。』

那末用什麼方法來恢復原狀呢？讀者要留心研究，表面上極為嚴重的行動而事實上是用和解決替，並且要注意賞與罰的巧妙的應用。這是長於和解技術的專家的傑作。中國人所謂「有名無實」與「有實無名」的區別，在這裏應用得非常巧妙的了。

蔣回到南京的第一個舉動是什麼呢？他發出一篇很長的談話，承認他未能防止叛變，與不能勝任行政院長之職。隨後令所有中央部隊從陝西退出——這樣，履行了他的停止內戰的諾言——並向國府提呈辭職。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他召集中常會，請國民黨的最高機關實行四件事。這四件事是：交付軍事委員會（他是那會的委員長）審判張學良，由軍事委員會解決西北問題，停止進攻叛軍，撤銷何應欽「討伐」叛逆的大本營。他的呈請由中央完全照辦。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張學良由軍事法庭（蔣未列席）判決十年徒刑，褫奪公權五年。在下一天，他准予特赦。在這時期中成爲最近到西安專使宋子文的私邸的上客。到了一月六日，終於撤消委員長西安勦匪行營。再過兩天，大家都已知道那會講日語在日本留過學的外交部長，國民黨中政學系的重要領袖張羣，已經免職，而由王寵惠博士繼任爲外交部長。王氏是在美國受過教育的律師，國民黨中歐美派的一個領袖，他很受西北的歡迎。

再因蔣的請求，在二月十五日召集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過去中

中央全體會議的作用，很可以揣想得到的，那就是不過合法通過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所已決定的黨政策的改變罷了。現在所提出的重要政策的改變是什麼呢？幾百件的議案已經準備送交這個隆重的會議中討論，其中大部分是關於「救亡」問題。

在一月與二月初，蔣委員長請病假，回到浙江奉化的故家去休養，張學良也到那裏。蔣因第一次辭職未曾照准，又提出了二次辭職。同時表面上雖不在任，他卻有解決西北問題的全權，完全處理在進行中的與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將領的談判。張學良待罪奉化，實際上仍是囚犯。在南京蔣的部下忙碌地替他搜集情報，以便考查事變以後，傾向他和反對他的各種勢力，以便重新估計他的部下，調查出誰是忠實者，誰是投機分子，而曾經預備在西安轟炸他的。西安事變，真如蔣夫人所謂『因禍得福』，實際上恐怕還不止此。

在二月十日那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一個有歷史價值的通電（註）給南京國民政府與三中全會。那通電祝賀政府對於西安事件的和平解決，與祝賀快將實現的國內和平統一。向三中全會，這通電報提出四項改變政策：終止內戰，保障言論出版與集會自由，釋放政治犯，抵抗日本侵略，恢復孫總理的三大政策。

如果這些建議表面上或實際上都被採取，共產黨準備為達到迅速完成國內統一抗日起見，情願放棄一切推翻政府企圖而採用下列政策：（一）把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而歸軍事委員會指揮；（二）把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三）在蘇區內，實現完全民主政體；（四）停止土地沒收政策，集中人民力量於救亡工作——那就是抗日政策。

但三中全會在二月十五日召集的時候，並未公開注意共產黨的通電。因為三中全會要完成比這更重要的事。蔣介石在他第一次對大會的報告中，再用不帶情感的說話，把他西安蒙難的經過情形完全敘述一遍。他生動地敘述，如何拒絕叛逆們要求的簽字擔保。他同時也報告叛逆如何轉變態度，如何因讀了蔣的透露愛國熱誠的日記，而感動得流淚。還沒有等到把這些話說完，他最後就用懇促與輕藐的態度，把叛逆所提出的八項主張，交給大會。大會表示完全信任委員長，不准蔣委員長的第三次的辭職，嚴責張學良，而也輕藐地不接受那不法的主義與要求。

但是同時，在巧妙的方法下，三中全會自動地完成了好幾件事。最重要的，也許是在黨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汪精衛的大會開幕辭。自從反共戰爭以來，這是汪同志第一次演說沒有提起「安內」（剷除共產）是國內最重要問題，與他的名句「抗日必須統一」。「當前國內最重要的問題」他說，「是收回已失的領土。」此外大會並決議收復冀東、察北與取消冀、察政務委員會。當然這意思並不是南京向日本進攻。這意義僅表示從現在起，如日本再侵略中國領土，將遇南京的武力抵抗。但那真是一種向前躍進。

第二，再由行政院長提議，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久延的「國民大會」而不再延期。更重要的，是三中全會授權中常會得修改國民大會組織法，增加各「團體」的代表。委員長——仍由汪精衛代表——宣佈國內第二個重要問題，是迅速實行民主政治。

末了，蔣在大會最後一日，發表談話，在這次談話裏，他允許開放言論，除開漢奸以外，一切人皆可享受更大的言論自由——他不再提起「文化匪徒」——這是第一次聽到委員長保障出版自由。他又允許釋放已經省悟的政治犯。很祕密的下一個命令給出版界，以後「赤匪」與「共匪」等字眼不准復用。有幾個監牢開始釋放一些輕罪的政治犯。

於是像追溯往事一般在富有歷史價值的大會的末一日，發表很長的宣言，表面上是斥責共黨，追述他們十年來犯罪及破壞的歷史。有人要問，那些共黨他們曾經在一個時期中是良好國民，甚至於是國民黨的道德高尚的聯盟者，怎麼會變得這樣墮落呢？與殺人放火的匪徒「和解」難道竟是應該的事麼？但這些言論的所以發出，實際上就是準備和平條件，宣言就用這種條件來做牠的結論，這使那些不惜任何代價反對和平的反動派，極感不高興。

那末這些建議究竟是什麼呢？三中全會在四個條件下給共產黨「以自新之路」：（一）取消紅軍而改編爲國軍；（二）取消蘇維埃政府；（三）停止共產黨從事三民主義所絕對不相容的宣傳；（四）放棄階級鬥爭。這樣，雖以投誠的名稱來代替合作，然而國民黨最後卻決定接受共黨的主張，作爲和解的談判根據。應該注意的是，那些條件仍舊允許共黨享有他們自主的國家，他們的軍隊，他們的政體，他們的黨以及他們將來最大限度的綱領。或者至少共黨可以這樣想，並且實際上他們也這樣做。因爲在三月十五日那天，共產黨、蘇維埃政府以及紅軍，發表一篇很長的宣言，要求與南京開談判。

蔣介石的這一切複雜策略有什麼目的呢？無疑的這些策略的巧妙的編排，是用以跟反對派和

解，而不致減少他自己或南京政府的威信。有次序地去讀他的命令與談話，以及三中全會的議決案，指出他滿足了一切反對團體的一部分的要求——恰巧足夠分離他們的團結與反抗他的決心，而不致引起國民黨內的變故。內戰已經停止，南京最後擔任武裝抗日的工作。更大的政治自由的允許已經完成，實行民主政治的日期，也已規定。最後一個國共武裝休戰的方式——即使不是合作——也已造成。同時在名義上政府拒絕了叛逆的要求與共產黨的建議。這一切都是難得見的。

這是斷不能疏忽的，蔣介石這種折中辦法，乃是因為南京方面有一種極大的反對妥協的勢力存在而不得不如此。受了可怕的刺激後，會使一個缺乏遠視的人恨毒到極點而不能自禁，因而促迫他報仇——這件事，確是蔣介石手下的憤怒的人們所要求的。但蔣卻比他們聰明得多。當他出險回來時，各地民衆舉行大規模的遊行慶祝，這並不是一種個人的勝利，而是有力地表示人民對於和平、反對內戰、與統一抗日的要求。蔣氏完全明瞭那件事而同時深知他如採用任何討伐西北的舉動，結果會使他所得到的擁護，立即降落。

比這更重要的，是西安事變，使中央權力基礎發生極深的裂痕。他知道這些裂痕是很容易擴大，變為致命的毀滅，而使全部建築崩潰。現在他很有把握，知道對於他最有利的，乃是和平，在和平情狀之下，那些裂痕會全部消滅。實在是政治策略真正的人才，他並非忽略了他在西安所允許的條件，立刻公開對扣留他的人採取報復手段，而巧妙地應用了一種恩威並施的政策。在這種政策下，他果然達到分散了西北集團（他的第一個目的）而和平地把東北軍從陝西調到安徽與河南，另一方面，把楊虎臣的軍隊改編，由中央指揮。在二月裏，南京軍隊能毫無阻礙與糾紛開到西安與其近郊，在三

月裏，與共產黨舉行談判。

## 五 破鏡重圓

共產黨對於蔣氏的友誼的舉動，如撤消勦匪行營，放棄新的總攻紅軍的計畫，以及其他已經講到的各種命令決議等，也發生了深刻的印象。一切戰爭都停止了。南京部隊與紅軍部隊和平地分駐在幾處接近的區域。蔣氏曾表示如果他們遵守他們三月十日所發通電中的條件，他對於紅軍的存在，採用和解的方法；至少現在是如此。

在西安事變中，紅軍佔領了廣大的新的區域。在陝西，佔領該省一大半的面積，幾乎包括渭河以北的所有地區。在他們約有五十縣的區域內——將近六萬至七萬方哩的面積，或者差不多兩倍於奧地利國的面積——共黨統轄了他們歷來所統治的最大的單獨的地域。但這地方，經濟上是貧困的，開發的可能性也極是有限的，並且人口極稀，也許不到二百萬。

但從軍略上講，這區域卻是極端重要的。從這地方，假如必要時，他們能夠封鎖到中亞細亞的通商路線，或者可使他們自己與新疆或外蒙古發生直接關係。假如一旦與日本開戰，顯然這邊疆本身有極大的價值。這是中國所有兩個通達外國的邊疆的路線之一，可以從這裏取得國外供給，而非日本所能封鎖的。約有五十五萬方哩面積的新疆的一半以上，早已是在華社會主義政體之下，傾向於中國共黨，而對南京，是半獨立的。還有自主的外蒙共和國，跟他東北的蘇俄已有一種相當的聯合。其面積有九十萬方哩，牠原是中國的藩屬，到現在蘇俄還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可是因爲一九三

六年與蘇俄訂結軍事同盟（軍事互助公約）的緣故，外蒙事實上已在紅旗勢力之下了。

這爲共產黨所統轄的三個區域，名義上仍是中國領土，其總面積約有前大清帝國領土的三分之一。從前這三個地方相互隔絕，而無法接觸，成爲一種政治上的緩衝地帶，其間住着蒙古人、回人與邊疆居民。他們和南京的關係，甚爲淺薄，日本人征服他們的危險，將逐漸成爲事實。那些地帶，將來有可能性加入反日聯合戰線，而受蘇俄的影響。但是也有可能包含在未來廣大的紅軍根據地之內，這根據地自中亞細亞起，到中國西北的中心爲止。但所有這些地帶全是很落後的。有幾處地方，只有草原與沙漠，交通很不便利，居民稀少。如果與有進步的工業和軍事基礎的蘇俄或中部中國，或中蘇兩方，發生密切聯盟關係之後，這地帶在東方政治上變爲重要的因素，纔有可能。

中國紅黨直接所獲得的，只限於這些範圍以內；停止內戰，南京政府對內政策達到相當限度的寬大與容忍，對日態度變爲強硬，蘇維埃區在長期間的封鎖之後，得到部分的開放。因爲委員長駐西安，專使張冲將軍與紅黨的代表周恩來舉行談判的結果，四月、五月、六月這三個月，發生了許多重要變更。解除經濟封鎖，在特區與特區以外各地成立貿易關係。更重要的是暗中恢復了兩地交通。在接壤的地帶，紅星旗與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交叉在一起，表示聯合。

一部分地方重行設立郵電機關。共黨在西安買了幾輛載重汽車，在他們的區域內，創立了長途汽車機關，銜接各重要地點。各種必要的工程材料，也已開始輸入。共產黨最爲寶貴的是書籍。在延安創辦一個新的魯迅紀念圖書館，爲充實這圖書館內容，各地共產黨同志送去大批的新書；好幾百青年共產黨從各大城市到陝西北部紅都延安去。在五月左右，二千以上的學生在「紅軍大學」（已

改爲抗日大學）註冊上課。另外大約五百個學生進共產黨學校。其中有蒙古人、回人、西藏人、臺灣人、苗人以及獮獮族人。還有許多學生，入各種技術訓練學校讀書。

許多熱情的青年急進份子，以及老資格的黨務工作人員，從中國各地一齊到那邊去，有的是走去的。到了七月，不願學生生活怎樣刻苦，不願玉蜀黍與菜蔬等飲食怎樣的難於果腹，仍有無數的人請求入學。結果因無法安插，好多人回轉去，等到下學期再來，屆時紅黨準備容納五千人。許多熟練的工程師也到來，他們被選爲教師，或擔任現在剛開始的「建設計劃」。在這方面，因和平而得的直接利益，也許就在這地方，奠定了一個基礎。在這基礎上，可以無拘束地訓練，補充，與教育革命軍隊新的將校與反帝運動的戰士。

自然，國民黨繼續在監視紅黨與外界的接觸。現在對於共黨運動的限制比較放鬆一些，但還沒有公開承認。非共黨的許多黨派的知識分子也到蘇區去考察——其中許多人就留在那兒工作。在六月，中國國民黨自己也祕密派了一個半官性質的團體，由邵華領導，去參觀紅都。他們遊歷蘇區，而在羣衆大會而前發表帶有紅色的反日講演。他們主張恢復國共之間的反帝統一戰線。可是在國民黨刊物方面，這一類的消息，卻禁止刊登。

在國民黨控制區域內，對於列寧信徒的待遇也加以改善。共黨名義上雖仍屬不合法的，但因壓迫逐漸減輕，它可以擴張它的勢力，與發展它的組織，少數政治犯絡繹的從監獄中放出來。特務員繼續偵查共黨，但已停止綁架與非刑拷打的方法。據說，此後特務機關的工作，將集中在偵查「親日漢奸」上面。好多漢奸被捕，而破天荒的，有幾個受日本僱用的中國間諜被處死刑。



到了五月，爲報答這些讓步，蘇維埃政府預備採用「特區政府名義」，而紅軍也要求編入國軍，爲「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黨軍的全國代表大會，在五六月間召集，通過實行與國民黨合作的新政策，所應採取的步驟的議決案。在這些會議中，列寧、馬克思、史太林、毛澤東、朱德及其他紅軍領袖的肖像，和孫中山、蔣介石肖像並懸着。

這種現象，反映出共產黨在一方面不得不改變形式和名義，而另一方面卻仍保留他們重要的主義，政綱的內容，跟他們獨立自主的存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權、民族、民生——正與北伐革命時期相同，又爲共黨所信仰。這並不是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因爲共黨對於這主義參以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他們是決不肯放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革命的基本理論，採取每一個新的步驟，造成每一個新的改變，都用馬克思主義的名辭來觀察、辯論、決定，而使它完成——而無產階級革命，這是他們最後的目的，也並沒有放棄。

在共黨政策中最重要、的變更是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的實施，停止反南京，反國民黨的宣傳，與擔保所有國民，不問其社會所屬的階級，都有平等權利與選舉權。在這些政策中，最直接影響紅黨經濟的一個政策，當然是停止土地沒收。這並不是說在土地已經實施重行分配的區域內，將土地歸還給地主，而是一種協定，在新的紅黨統轄區域內，放棄這種措施。

因爲這種退讓，結果收入短少，蔣委員長還暗中——雖則非正式的——承認蘇區爲「國防區域」的一部分，而發給軍餉，第一次付給紅黨的五十萬元是在蔣介石回南京不久以後交付的。於是紅軍用國民黨的紙幣收回蘇區貨幣，買他們合作社所賣的東西——現在貨物已很充足——還有

許多錢是用來購買急需用品的。這一筆錢沒有一文是用來發薪水的。財政委員仍舊是五元一月的生活費！從南京津貼他們的每月正確數目，當著者寫本文時，仍在談判中，這實在是未來合作最重

要的條件。

在六月間，委員長派他的自備飛機到西安去接共黨首席代表周恩來到特嶺，中國夏天的首都，周與蔣介石及行政院各部長，舉行了幾次談話。所討論的問題是，共產黨要求派代表列席十一月國民會議——這會議的組織，是為通過民主憲法。據報告，雙方商定「特區」可根據區域為單位，選舉代表九人。

這些代表，或許不成問題，但絕不會用共黨名義出席的。南京從來沒有公開承認所謂「破鏡重圓」。南京情願把這種關係當作一個外室。她的貞操既還不能證明可靠，所以對於這件事，為了外交的關係，在家族範圍以外，愈少提起愈妙。然而即使這樣偷偷摸摸的結合，早已使日本喫驚而公開的挑釁了。幾月前，她絕對不會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同時日本自己（經過廣田這媒婆牽馬）答應的結成一個高貴布爾喬亞反共的婚姻，卻被一脚踢翻。在這一點，也許是最後與最確切的表示，南京的外交政策已經過一個根本的改變了。

這一切，對於一個不熟悉中國政治的西方觀察者看起來，一定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大團圓。他在分析其意義的時候，會造成嚴重錯誤的判斷。自然，這樣的事，除開中國外，不會發生在其他地方。經過十年之久的最殘酷的內戰，紅與白突然一言歸於好，這是什麼意義呢？紅變為白，而白也變為紅了麼？兩者都不是。但是一定有一個人勝利而有一個人失敗。不錯，中國已經勝利，而日本已經失敗。因

爲這種嚴重複雜的兩條路的鬭爭的最後勝負，是又因第三個因素——日本帝國主義——的干涉而拖延下去了。

因此我們要提起帝國主義在中國革命當中的影響，來找出未來的紅色地平線的大體。

## 六 未來展望

解釋中國的革命，與探求牠那豐富的社會、政治經驗的蘊藏，這些並不是本書的責任。然而就是在這最後幾頁裏，也許還能夠供給航海者，在沿着這脈絡錯綜的歷史的急流下駛時，一幅簡括的認識的海圖。

淵博的社會科學家列寧曾經說過：『一般的歷史，尤其是革命的歷史，牠的內容，總比最優秀的政黨，最進步的階級中那些最富於階級意識的前衛所能想像的要更豐富，更複雜，更多方面，更生動和更微妙。這是很顯然的，因爲最優秀的前衛所表現的是百萬人的階級意識、意志、感情和幻想，但當革命到達了牠的頂點與人類所有的能力發揮盡致時，牠卻是爲千萬人，爲最尖銳的階級鬭爭所推進的千萬人的階級意識、意志、感情和幻想所促成的。』（註）

這個解釋可以用之於中國。在某一意義上講，列寧所承認的，只是共產主義者的預測的易誤性，與他時常將私人感情上的願望與現實相混雜，以及將百萬人的『階級意識』與千萬人的『幻想』

（註）見列寧著左傾幼稚病（“Left-Wing”: An Infantile Disorder, by V. I. Lenin.）

相混同等傾向。這並不是證明辯證法唯物論的方法的錯誤，而是說運用辯證法的人的錯誤。第三國際的機關報國際通訊 (Imprecor) 和美國的新羣衆週刊 (The New Masses) 在分析歷史的可能性時，有時也發現與泰晤士報和意大利人民報 (Popolo d'Italia) 一樣錯誤的原因，也可以因此得到說明的。

中國歷史的內容，在那方面，比共產主義的理論家在十年前所預測的要『更豐富，更複雜，更多方面，更生動和更微妙』呢？具體地說：紅軍既已經過了英勇的和竭力的鬪爭，爲什麼還不能取得中國的政權？在回答這種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把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和他的主要的目的重複想一遍，深深地記在心裏。

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有着這麼一個普遍的而現在還盛行的觀念，認爲牠是反資本主義的，牠要跳過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時期，而直接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錯誤的。共產黨的每一次宣言都明白地表示出他們承認目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特質』。這鬪爭與其說在革命的本質上面，不如說在革命領導的本質上面。共產黨認爲領導本身的任務就是趕快實行兩種主要的歷史工作：第一、推翻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勢力，完成民族獨立（這就是使中國從半殖民地狀態解放出來）；第二、打倒地主與縉紳的政權，完成民主政治（這就是使民衆從『半封建制度』解放出來）。共產主義者認爲只有在完成這些任務之後，方始能夠向社會主義走去。

但是如何取得這些勝利呢？共產黨曾經希望與資產階級合作而找求牠，但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運動勃發的時候，在國民黨（地主與資產階級的政黨）放棄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手段的時候，

共產黨纔相信『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工民主專政』纔能領導資產階級的革命——這革命自從推翻了滿清政權之後，始終沒有取決定的形式，直到一九二五年與一九二七年間的大革命。

所有這些，對於不熟悉辯證法的人實在是非常繁雜的。假如讀者有意去研究牠，關於這整個理論的著作不用說是非常之多（初學的人，可看史太林的論反對派“About the Opposition”），在此地我只能對這論題作一粗枝大葉敘述而已。

將上面所說的話用另一種方法說來，共產主義者的革命的觀念是這樣的。中國總要有一個民族資本主義的時期，但要達到這目的，只有在掃除了在各城市的帝國主義勢力和取消土地私有制，打倒地主在農村的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勢力，把土地分給農民大眾，使他們得到澈底的解放之後。

共產主義者以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是真正的布爾喬亞，而是『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牠是一種『買辦階級』，具有寄生於牠所服侍的國外金融和獨佔資本主義的性質。事實上，要博得牠能自由發展的條件，一定先要完成反帝的工作，剷除一切國外的勢力。但是唯獨中國的工農大眾方能領導這革命達到最後的成功。而共產主義者卻主張工農大眾不應把這勝利的結果送給因此取得了解放的新資產階級，像法國、德國和意大利所發生的一樣——事實上只有俄羅斯不是如此。實在他們應當保存他們的力量，從一個『新經濟政策』的時期，就是一個短促的『統制資本主義』的階段，再進一步到國家資本主義的時期，最後便利用蘇俄的協助而迅速轉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

所有這些已清楚表示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基本法中間。

『排除帝國主義和打倒國民黨的目的，是求中國統一，使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能够完成，並且使這革命有轉而爲較高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這就是蘇維埃的任務。』（註一）一九三四年毛澤東這樣說過。

從這些巨大的阻礙（這些他們都是很知道的）看來，一九二七年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爲什麼自以爲他們能夠躍過這廣闊的歷史的鴻溝呢？大概主要的是因十月革命的指示。巨大的變動曾經使俄羅斯民衆從低下的封建君主專制一躍而登社會主義的高原。而因爲兩個也許在中國可能再現的條件，這躍進在中國也是可能。托洛茨基非常簡單地說明道：『就是農民的戰爭——資產階級發展初時期的特質的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叛變——資產階級沒落期的特質的運動——這兩個原動力，這兩個屬於完全不同的歷史的人類的原動力之互相吸引與滲透。』（註二）

當中國大革命到了頂點時，中國的農民大衆與無產階級都表示了必要的革命情緒。但就形勢而論，卻與發生俄羅斯革命的有許多不同。其中有一點是非常不同的：封建制度的殘餘留在舊俄的甚至比在中國還來得厲害，但中國是個半殖民地的國家，一個『被壓迫的民族』，而舊俄卻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一個『壓迫人家的民族』。在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只要克服一個階級，牠的國內的布爾喬亞帝國主義階級，而中國的革命卻不能不跟一個有雙重人格的敵人奮鬥——與國內新興的資產階級和有着一堅固不拔的利益的外國帝國主義兩者奮鬥。在理論上說，中國共產主義者在初期的時候，想用他們自己那兩重性質的奮鬥——除自力外，加上世界上同情他們的那些『無

產階級的盟友』和『蘇俄的勞苦大衆』的援助——來推翻他們那雙重人性的敵人。

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能取得政權的原因，本質上確實是很簡單。最重要的一點是在於中國產業工人存在的性質和狀況。中國的產業工人是非常之少，總數幾乎不到四百萬人，而且都是缺乏經驗，沒有教育，多疾病，營養不足，飽受恐怖的工人。此外再因為他們中間有衆多的童工與女工，使他們的力量更形薄弱，在本國與外國資本家的重重剝削之下，即使中國是個獨立國家，這階級也很難發展他們的政治意志，而使他們忍受奴隸般的最惡劣的條件，這是因為中國近代工業都集中在外國勢力籠罩下的地帶中，而在這些地帶的工人們都是不通問問的。

所有中國的產業工人中，約有三分之一是擁在世界上六個強國的軍艦威脅下的上海。在天津、青島、漢口、香港、九龍和別的帝國主義勢力範圍內所有的產業工人，約佔全中國的四分之三。上海就是牠們中間最好的例子，在這裏你可以看見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日本的、意大利的和中國的兵士、水手和警察，世界上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和本地的流氓與買辦階級——中國社會中頂惡劣的分子——共同「合作」揮舞着警棍，落在千萬個手無寸鐵的工人大衆的頭上。

這些工人當然不會有什麼言論、集會和結社的自由。如果本國與外國的警察勢力這雙重的制度存留一天，動員中國的產業工人在政治上有什麼行動，就完全不可能。在中國的歷史上牠的力量

(註一) 引自紅色中華報。

(註二) 托洛茨基蘇俄革命史，第一卷，第七十頁。(倫敦，一九三六年)

只顯示過一次——在一九二七年——那就是當蔣介石想利用工人以擔保他對北洋軍閥的勝利時那幾天。但隨後便立刻被壓服了，當時手段的殘酷，使牠成爲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一次流血。

在當局與外國勢力相勾結而且獲得國外資本家的經濟的援助之下，在城市暴動的一切企圖，因此完全失敗了。南京政府將外國帝國主義勢力所壟斷的各通商口岸作爲他的安全的工業根據地——利用他們的軍隊，他們的軍火，他們的軍艦，跟他們的內地警察和內河礮艦，甚至他們的財富，他們的新聞，他們的宣傳與他們的偵探。這些國家雖然很少直接與紅軍作戰，但當這種行動是認爲必需時，他們就會幹起來。但他們主要的任務還是束縛產業工人使他們不能有所動作，供給南京政府飛機軍火，有意稱共產黨爲『赤匪』，借此不承認有內戰的存在，因此沒有發生過『不干涉』（像今日的西班牙一樣）這樣的問題。

在最初工人階級是這樣無力，他們不能在城市裏得到一個整個的重要的工業根據地，於是無產階級前進的領袖們便不得不退到農村去，而農村的共產主義運動——牠仍舊保持社會主義的目的和理想——實際上卻採用農業革命的性質，共產黨希望最後能在農村區域裏創造一種足夠的力量，開始攻擊在那些南京統治下而國外勢力比較薄弱的城市（註一）然後——他們希望在這時候能夠博得世界無產階級的協助——圍攻各通商口岸的外國勢力的根據地。

但是在各帝國主義國家已成爲南京反共的盟友時，他們所希望的國際無產階級的協助竟不能實現。雖然在共產國際綱領（註二）上切實地承認半殖民地國家（如中國）的無產階級運動，果如希望成功，『除非能夠從已經建立了無產階級獨裁的國家（如蘇俄）獲得直接的援助』，而事實



上，蘇俄並沒有牠的中國同志所預期的，及時的『無產階級獨裁國家的援助與供給。』甚至於相反地，蘇俄在一九二七年以前給蔣介石以巨大援助，簡直到了干涉的程度，竟在使國民黨中最反動的分子握得了政權。當然，在一九二七年之後，蘇俄如直接援助中國共產黨，便與她所採取的立場絕不相合，因為國際戰爭的危險足以摧殘蘇俄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部計畫。然而，我們必須注意，這個原因對於中國革命有非常巨大的影響。

中國的共產黨既失去一個盟友，但仍舊單獨地繼續為奪取『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而奮鬥，他們深信國內和國際政治的嚴重的變動，將產生對於他們有利的新力量。他們的認識是否有錯誤呢？總之結果是一個長時期的內戰，使中國大眾忍受着流產的，政治分娩的痛苦。

因上述的理由，南京在各巨大的城市中心的勢力依然相當穩固，但在鄉村裏的發展卻非常的滯緩。奇妙地——可又是辯證法的地——這農村資產階級的貧血症，其根本原因與南京在各城市裏的勢力所患的相同，都是因為國外的帝國主義。因為當帝國主義亟願『共同合作』以阻止或鎮服城市的暴動及其可能性時，牠也同時客觀地着手——主要是日本，這遠東壓迫組織的焦點——於徵收補償此種服務的報酬，而徵收的方式則為佔據新領土（滿洲、熱河、察哈爾與冀東）與攫取

（註一）甚至於在一九三〇年紅軍佔領長沙時，他們終不得不在英、美、日等國戰艦猛烈攻擊之下，退出該城，但長沙

實際上是一個內地的，對各帝國主義國家較不重要的城市。

（註二）一九二九年倫敦版。

新讓與物新財產等。這個帝國主義侵略的新方式，在南京政府的肩仔上，加以非常重大的負擔，使國民黨不能夠迅速地將必需的資本主義的『改良』——如設立商業銀行，改良交通，統一稅收與警權等——行施於農村，以防止農村不安與農民叛亂的擴大。而共產黨卻因實施土地革命而滿足了大量的農民大眾的要求，取得了中國一部分農業區域的領導權，甚至於還在純農業的經濟上創立了幾個有力的根據地，但同時，他們在各城市的力量卻並沒有增強，牠們仍然在他們敵人的手中。

在這種情形之下，共產黨便標榜着這樣的論調，說國民黨向蘇維埃進攻，因之使中國民衆未能將日本驅逐出去，完成『民族解放』的神聖任務；而國民黨的本身也無保衛祖國的誠意，這已證明資產階級領導權的失敗。共產黨革命的論題是這樣的有力，但憤怒的國民黨卻向他們反攻，說共產黨企圖推翻政府，因之使他們不能抗日，不顧國難的嚴重，仍舊在內地繼續實行『赤化』，更使內部的改組不能實行。最有趣的是雙方的攻擊，都是對的，又都是錯的——這又是辯證法的。這就是現在的中國革命之所以特別受阻和脆弱的原因。

這十年來，帝國主義的壓迫已逐漸地成爲這麼瘋狂，而帝國主義者保護各城市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所討的酬報又是這麼巨大，因此國民黨（資產階級與地主的政黨）與共產黨（工人與農民的政黨）之間發生了消滅階級矛盾的趨向。就是因爲這一個緣由——也因爲上面幾章所敘述的各種最近的事件——所以國民黨與共產黨就能够在廢續十年的內戰之後，在聯合的姿態下共同抗日。這聯合因爲牠內部的矛盾，是不鞏固的，也不是永久的；而在內部的衝突重於外部的時候，牠也許要重行分離。然而現在聯合的成功已確實結束了革命戰爭的期間，而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什麼是這十年來的政治經驗的主要特點呢？在理論上說，下面所述的一點是很明顯的：共產黨已不得已而暫時放棄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方能發展的論據。現在牠認為要達到這些目的，只有『各階級的聯合』。而在實際上說，主要的特點就是牠已明白表示承認國民黨在資產階級革命上的現在的領導權，而領導權在這裏就與政權的意義相同。若以他們在江西時，竭力『鞏固農民的領導權，把這領導權擴長至全國，並動員組織武裝蘇維埃與民衆在這個革命戰爭中作戰』（註）的理論相比擬，顯然不能不認為這是共產黨的『極大的退卻』（這是毛澤東公開承認的）。爭奪政權的爭鬥已經停止了。現在共產黨的口號是擁護中央政府，在南京領導之下迅速完成和平統一，實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組織全民族抵抗暴日。

但在這樣的時期內，『効忠於共產主義理想——列寧這樣寫——必須與從事各種必要的妥協。從事「轉向」調和、紆迴、退卻等的能力和配合』，因此，中國共產黨雖然在戰略上有了這麼巨大的變動，他們仍舊相信，在這比以前還更方便的環境中，他們仍舊能够實行戰鬥的。這種『兩方面的讓步』照毛澤東說，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毛澤東接着說：『共產黨仍舊保留着領導紅軍與蘇區內一切問題的權力，在黨與國民黨的關係上，也保留着批判的獨立與自由。在這兩點上，是絕對不能讓步的……共產黨永久不放棄牠的社會主義的與共產主義的目的，牠仍舊要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程而到達社會主義與共產主

（註）見紅色的中國，十一頁。（倫敦一九三四年）

義的歷程。其產黨仍舊保留着牠自己的綱領和政策。」（註）

共產黨因這種讓步而得到實際利益，這已經討論過了。但這些利益能否確實的獲得，共產黨有什麼保證呢？對於目前的和平能否保持，所應許的民主能否實現，抗日到底的政策能否實行，共產黨究竟有什麼保證呢？

很明白的，國民黨將盡量利用共產黨的新政策。中國唯一能與國民黨相頡頏的政黨現已承認南京的政權，於是蔣介石將把他軍事與經濟的力量繼續地擴展到軍閥勢力還很強盛的邊區裏（如廣西、雲南、貴州與四川等省。）對共的軍事狀態已經改善，他可以放棄對軍閥的妥協來補償共的暫時容忍。最後，他希望運用政治的與軍事的縱橫交攻的方式在政治上削弱這些軍閥而全部加以制伏。到那時候紅軍一定孤立無助，南京政府便可從國內政治糾紛的根據上來擊潰他們，把這些頑強的殘餘部隊，作爲個純粹的局部的軍事問題來應付。

共產黨是洞悉這一點的。同時，他們深信，除了他們不停地作有力的反抗外，民主或反帝的諾言就無從實行。在實施完全民主與反帝的口號——這是他們永不放棄的口號——中，共產黨對於政治上的讓步，並無躊躇，因爲他們認爲，他們主要的政治立場是鞏固不拔的。當然，在歷史上，獨裁的政黨如果不達到重大的壓力，從不肯分一絲毫的政權給民衆的，這在國民黨也不能例外。甚至就是現在所見到的這樣的『民主』，假如沒有共產黨十年的奮鬥，也不會存在。真的，沒有敵對的人，民主就不需要，而現在在中國正在發生的那種逐漸集中的政權也就不會有，因爲民主的產生，跟近代國家本身的長成相同，是一種企求政權與政體的代表，牠的目的在假此以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內根本不

相調和的矛盾，這就是所謂階級的矛盾，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的最簡略的解釋。

這些矛盾在中國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在迅速地增加，甚至到了尖銳化的程度，國家是應該承認他們的存在的。和平本身的成功，使這種情形無法避免。假使能夠和平到底，那麼南京政府將變為一個較普遍的社會階層的代表，但這並不是說國民黨在這中間全為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而靜靜地宣告牠自己的死刑，准許共產黨在公開競選運動中跟牠競爭（因為各方面都承認只有農民投票就可使共產黨取得絕對多數），雖則這正是共產黨與其他各黨所企求而繼續在爭取的，而是說現在掌握國家經濟和警察權的極少數人，將接受大多數民衆的要求部分，在國民會議中，准許蘇維埃代表於地方的原則下參加。

經濟、政治和社會利益的向心的擴展，這所謂「統一」的過程——就因這些條件產生了民主制度——同時，為着牠自身的生存，牠需要逐漸增大的集體集中於中央，以求解決難於解決的問題——那逐漸加深的階級利益的衝突的問題。南京越向着代表全國不同的、更普遍的階級利益的路上走——這就越發接近達到民主政治的完成——牠就越是被迫在恢復民族主權中找尋一個自存之道。

所以，共產黨勢力增長的保證，與將來不再有『圍剿』的保證，在共產黨的立場上觀察，是存留在本國有機的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關係中，也就因為這些，纔能造成了現在這樣的局勢。造成這

種局勢的，第一，是武裝與非武裝民衆對於國內和平，改善生活，實現民主，爭取民族自由的普遍而熱烈的要求；第二，共產黨的保證是靠着他對於漫瀾全國的這種要求運動，與保持着繼續領導共產黨軍事的政治的確實的戰鬪力的權力；第三，他們靠中國人民十年來的政治經驗，在這十年中，已確切地顯出，需要不顧階級的分別，以完成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聯合，以抵抗帝國主義。

在一九三七年春間，日本對南京壓迫的暫時減低，內蒙進攻的停止，英日對華合作的談判，與英國政府的企圖調解中日糾紛，以便締結協定，以造成遠東『永久的和平』，曾經使得許多人驚奇：共產黨對於政治形勢的推測，是不是錯誤的，把政策的重心完全放於抗日的必需一點上，是不是一個孟浪的舉動呢？有人就揣測，現在中國已經實現國內和平，現在共產黨已經放棄推翻國民黨的企圖，日本將會改變對南京的態度吧。日本帝國主義者認清楚他們對中國資產階級的壓迫是太厲害了，太急進了，因此使中國內部的爭鬥在普遍的對日的憎恨之下消弭了。他們學得了新的聰明的舉動，實行友好的政策，對待中國的資產階級，以便唆使他們再行發動內戰，而這麼一個東京與南京間的提攜將會消滅共產黨的政治勢力——因為牠把基礎放在抗日運動之上是太過分了。

但根據力學的定理，汎濫的歷史必須找尋牠的出路，牠不能被逼流回原先的河床。現在日本要寒阻水閘已經太遲了。共產黨知道，即使日本最有才幹的政治家認清了絕對必須止步時，日本也斷乎不能對中國實行靜止政策。七月八日，蘆溝橋事變的爆發，已完全證實共產黨的預言，而日本所謂改變態度的空談，也完全消除了。離北平城西十哩的宛平城舉行『午夜演習』（這完全是非法的）的日軍，藉口中國護路警察向他們開鎗，而再度表示了他們的實際的需求。七月中旬，已有一萬日兵

開至平津地帶，並提出了新要求，如果接受這種要求，就無異於承認華北爲日本的一個保護國。共產黨對這種局勢，對這時時變動着的引火的事件的認識是這樣的：如再發生新侵略事件，全國要求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高漲的壓力，將壓迫南京確定牠的立場，如果日本不變更牠一貫的態度與政策，南京就只有抗戰一條路可走，而這就是說，南京已只有抗戰這一條路。我們還要明瞭共產黨以爲這一種戰爭，不僅是爭取民族的獨立，而且是一種革命的運動，『因爲在中國打敗帝國主義就是毀滅帝國主義的最有力量的根據地之一』。又因爲中國革命本身的勝利，『與中國民衆抗日的勝利是相吻合的』（毛澤東語）。戰爭或許就在明天爆發，但是或許再過一年、兩年仍舊沒有爆發。但是共產黨分析日本、中國和世界極度緊張的政治經濟形勢所得的結果，知道這決定人類命運的戰爭，絕對不會有長時期的耽擱了。

他們預測在這個戰爭中，必須武裝訓練及動員千百萬的民衆，只有這種力量纔能割去外面帝國主義的惡瘤與內部階級壓迫的胃痛。他們相信，只有最廣泛地動員民衆，和擴張高級政治化的部隊，纔能夠擔任這樣戰爭的工作。只有在最前進的革命的領導之下，這樣的戰爭纔能獲勝。這戰爭可以由資產階級發動，但只有革命的農工大衆纔能夠把牠完成。只要人民真正大規模地武裝和組織起來，共產黨將盡其力量以博得最後的勝利。只要資產階級能够領導抗日，共產黨將忠誠地與牠合作，但牠卻準備着在資產階級畏縮不前成爲『失敗主義者』和顯出有願被日本屈服時——這傾向在初次遭受巨大的損失之後，將會發現——奪取這領導權。

自然南京政府，與其他的中國要人相同，都完全明瞭共產黨這些目的，因此他們將尋每一條可

能的妥協的路；如果他們能够避免在國內引起反響來，他們將更向日本讓步。要等待有利於他們的實力的機會，不獨有實力可以應付戰爭，而且在戰後，還能保存實力，同時又能夠拖延國內的革命。但共產黨卻非常滿意於他們自己的對於將來歷史過程的分析，因為這分析與他們所揀定的將來的方向，即南京因種種壓迫而確定抗戰圖存的立場的事件而進前的方向，非常配合。他們知道南京將仍舊蹣跚不前，而日本也將繼續做着多方面的佯攻和動員，以時間的需要如何，時而甘言引誘，時而武力畏嚇，直到外部的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的民族利益之間的衝突與內部的中國的與日本的大衆與其資產階級地主，統治者的衝突到了頂點時，直到一切的束縛與壓迫已到了再不能忍受的限度時，於是歷史的欄柵崩潰，由帝國主義所造就的巨大的危機也爆發開來，像神話中害人自害的惡魔一樣，摧毀帝國主義的洪水便汎濫而不能阻止了。

只有帝國主義纔能毀滅帝國主義，只有帝國主義的大戰（牠將以世界大戰的姿態出現，可以說是毫無疑義的），纔能解放各種勢力，這種勢力將提示亞洲民衆以武器訓練，政治經驗組織的自由，必然削弱國內壓迫的力量。這是任何有成功希望的革命政黨，在最近的將來，取得政權的必要助力。不問那時『武裝的羣衆』能否會隨着共產黨走，而最後的勝利總是決定於現在尙難預決的許多不同的因素——最主要的是國內的許多因素，但是英、美、德、法和意大利的遠東政策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至於蘇俄是否會牽入戰爭的漩渦以及牠在戰爭各個發展的過程中，牠無產階級的勢力，加在那方面上，這是決定上述勝利的最大關鍵。

我相信這就是將來的共產主義的輪廓。此種推論或許不會全體實現，但至少看起來是正確的。



——列寧在二十年前所說的話，到今天仍舊是正確的：『不管中國大革命（『文明』的豺狼們正對着牠磨着他們的牙齒）的命運如何，世界上任何勢力都不能恢復過去亞洲的奴隸地位，也不能從地面上毀滅亞洲各國民衆的偉大的民主政治。』

另一件事也是同樣確實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中國千萬青年爲牠犧牲了自己生命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這種思想幕後的勢力，都不能被消滅。中國的社會革命運動也許要遭受失敗，也許要暫時退卻，也許要暫時失去活動力，也許要變更戰略，以適應目前的需要與目標，甚至於有一個時期也許會被逼到隱匿起來，但是牠不但仍舊繼續生長，而且終於要取得勝利，只是因爲產生這個運動的各種基本條件本身就完成這種運動的需要。這種勝利光臨時，牠的力量是那麼偉大，牠的破壞力的噴射是那樣難以抵禦，要把目前踐踏東方的帝國主義的暴行摧毀無餘。

但是假如有人以爲此種結論過於『驚人』誇張，那末請他回到本節第一節的引語中，去尋求辯證的慰藉，因爲在『空論』的領域內，個人主觀的影響，當然是很佔優勢的。

# 第十三章 旭日上的暗影

## 一 論日本的戰略

當一九三八年七月(註)，那是共產黨神祕地預料着的中日戰事爆發以後的一週年。他們對於這次戰事預測的準確性也已經可以看出來了。他們對於這次戰事的分析和牠所包含的革命的內情的信仰，以及他們對於中國獲得最後勝利的信心——一種在戰事發生以前被許多中立的觀察者認為離奇的見解——都已經被實際的事實所證實了麼？

誰是中日戰爭中的「勝利者」？

從遠隔重洋的眼光來察觀，這問題對於有許多人民一定仍是顯得有些值得討論的。日本在海陸空各方面是否仍是明顯地比人家優越？日本有沒有三十倍於中國的槍械和飛機？日本仍是一個海軍的強國，而中國現在竟毫無兵艦麼？日本在經濟上是穩固的麼？她在實業上的基礎仍是健全的麼？她戰時的資源在增加着麼？她軍民的士氣仍是很旺盛的麼？

日本已經破壞或攫取了約有四分之三左右的中國新興實業。減少了中國國外貿易額的一半，侵佔了五十萬方哩以上的中國領土。她的海軍現在控制着全部中國海岸。她的軍隊從長城南下已經到達了黃河，從上海西上直抵了揚子江流域的中心。他們的侵略已經遍及了十省。他們又曾搶掠焚燬了一個國都，並且似乎準備要攻擊牠的繼起者。

但這是一種奇論：說這種屠殺忍受得愈長久，最後的結果愈變成可疑。日本愈深入到大陸內地，她將來的幻影也愈顯得不幸。她戰勝的次數愈多，那麼事實也愈是明顯：這一次的戰事決不能就以幾個禮拜或幾個月，的陣地戰和爭奪戰就算了事，而是二大民族拚死競爭的一個長期戰爭。在這戰爭中，各自競爭着大陸的盟主權和他們五萬萬的人口。並且在這個目光遠大的透視中，最後的決定將不單靠軍備，而是要靠亞洲戰略的二個主要因子——時間和空間。

要估計日本從近衛首相所謂的「中國事件」發生以來所獲得的成功或失敗，我們必須首先了解她的目標。根本上，這是很簡單的事實，無需再用疑惑。日本是切望着想征服中國，把白種人趕走，而最後想統治整個亞洲的。不合理的麼？不可信的麼？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想。但是在東方住了十來年以後，在這一點上，我已經給日本軍閥說服了。——給他們那種率直的宣言和再三的行動——證明這是他們計劃的理論。並且，他們也已經說服了我，說是實現這個小計劃的可能性的宗教信心，是日本軍閥統治者腦中在二十世紀的中心事實。

但是無論什麼事總是逐步進行的。在現階段的侵略聲中，軍事上的目標祇是在實際上管轄華北，內蒙古，和西北的一部分——約三倍於日本本部的面積——這是日本希望把牠們變為像滿州偽國一般的殖民地的。同時在華中和華南方面呢，日本或許祇要在她的卵翼之下設立幾個偽組織就夠了。

在經濟上，中國各處嚴重的實業競爭，必須像在滿州國一樣的加以破壞，以爲一勞永逸之計。日本希望能獨佔全中國的天然資源，交通和她的人工、勞力、市場。

在政治上，目標已經擴大了。所有實權像近衛文磨說的「蔣介石政府」必須推翻，中國的人力、和物力也必須復興起來，以便將來在日本的領導之下和西方列強的抗衡中助成中國的徵兵制度。這便是日本「亞洲門羅主義」、「中日合作」以及「鞏固遠東和平」的夢想。

這就完備了。在戰略上，靠着這些行動，日軍希望把從高麗越過蒙古平原一直到中央亞細亞的國防線都武裝起來。把俄國東南部的邊疆用堡壘包圍起來，這樣，使破裂了所有中俄的接壤。並且延着富饒而直到現在還沒有設防的中國海岸，日本的海軍計劃建築許多砲壘和海軍根據地，以實現她在西太平洋中最後的野心。這種根據地，一經建立之後，別國想把她從那裏驅逐出去，就不能沒有重大的犧牲了。日本海軍界的激進派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們從那種根據地將來可以攻擊或破壞西方各國在南太平洋中的最後壁壘——同時，他們的陸軍也可以開始攻打歐洲的門戶了。

但是，當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進犯華北的時候，她並不想吞嚥這麼一大塊像她現在正想一次嚼盡的一樣。但是事態的敗露使她不得不背信而貪食過度，甚致或許會因嚴重的不消化症而致死。不能獲得她預期的速戰速決，她便不得不侵佔比她原來的計劃更大了許多的土地。時間漸漸地從日本那裏奪去了先佔土地以制勝敵人的機會，並且無可避免地，她將被牽累到空間的紛擾中去。在那裏，戰爭延長下去的時候，她將無以自拔。

因爲空間和時間——在戰略中可以講作出奇制勝的長期戰和擴大戰場的全面戰——在力

量的相互關係上是中國永遠佔着優勢的二個因子。「速戰速決」是戰爭開始時解決一切日本陸軍問題的一個答案。

她需要速戰速決，第一，因為要使這次戰事不致擴大爲主力戰。第二因為要阻止中國人民從一致抗戰的團結意志下發覺他們的力量。第三，因為日本不但需要在這次戰事中保持她一等強國的地位，並且還想從這次戰事中表現出她在經濟和政治上足夠和反對她的列強週旋而有餘。第四，因為要保持她的國外貿易，要立刻開拓她征服的土地，以及保持中國的經濟基礎使足夠抵償她在戰事中的賠款。最後，因為要阻止任何國內叛變或社會革命的發生，不得不在日本人民開始感覺到他們可怕的財政負擔的痛苦之前，帶回去一個完全勝利的結果。

但是在執筆寫這篇文的時候，大多數日人認爲至多不過延長到六個月的戰事，現在却已經是她的第二年了。並且結束的日期還不一定。因為她不能在空間和時間二方面去限制這次戰事，日本對於上面列舉的最初二點需要已經是無疑的失敗了。並且可以預言的，她在第三和第四點上也不會成功。假使她在最後一點上又失算，那麼，日本的太陽或許不會在一個新帝國的天空高升起來，却很有可能在她曾經經驗過一次的失敗上沒落。

日本的根本錯誤是她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戰略不能同時並進，尤其是她的軍事戰略不能在中國及國際間和她的政治需要相調整。從一種純粹軍事的眼光來看，大多數的觀察者都同意日本的戰略在整個上說起來是健全的，有許多地方甚致是很超越的，並且在立即實現她的目標這一點上是相當成功的。但是她最大的錯誤是在發展她的軍事戰略中，日本却没有運用一種狡猾的政

治戰略因此便破壞了她出奇制勝的立場。

日本的軍事專家，他們自信是十分「了解中國」和中國人的心理的，他們早就想藐視西方人對於中國的智識的，却不能把握政治戰略的主動地位以獲得東亞戰局的決斷力。在這一點上，他們顯示了一種幾乎使人不能相信的愚鹵。從政治的立場上來看，他們像一個生手一樣的在從事着運動，不但對於目前的政治環境全不熟悉，而且根本不了解中國內部勢力均衡的各種特點，以及最近二十年來的教訓。

結果，日本差不多失去了所有內部分裂，地域觀念，敵對和嫉妬等等的良好機會。這種機會在戰事開始時是任憑一種完美的政治戰略所支配的。她又被迫着不得不改變戰略，不時改變她的目標，增加她的困難，以及擴大她最後失敗的範圍。假使有人要爲日本陸軍目前所遇到的悲劇找出一個單獨的理由，他便可以這樣說：她甚致完全不能接受南京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在華南作戰的教訓，更不能在蔣氏克服蘇維埃區域的戰略中得到什麼好處。委員長曾經再三的說過：和中國紅軍的戰事，「祇能用三分軍事，却需七分政治。」中日戰事中的政治成分正和這一樣的大；但是日本的參謀機關在計劃她戰略的時候，幾乎不把這政治的因素看在眼里。

日本政治戰略的主要錯誤根源於一種先見，這便是對於中國人民目前正在推行着的統一，士氣，愛國心，和抗日思想——的深刻化和普遍性估計得太低。她在和一個不再存在的敵人作戰——和軍閥時代的中國。對於中國內部的分化力，腐敗，叛逆，地域觀念和不抵抗等自動的成分估計得太低，她在實際上幾乎沒有採取什麼步驟來使這些阻力尖銳化，但是却因了她的軍事行動使每

件事情都促成了他們內部的緊張。由於她推測的謬誤，對於這些得到一個及時勝利所必須的希望，她已是悲慘的失敗了。

所以，即使在華北，她的預料也是毫無根據的。三個北方的行政長官中——河北省的主席宋哲元，山西省的老督軍閻錫山，或山東省意志薄弱的首領韓復榘——一個都沒有變爲傀儡。日本在這幾省中幾百萬元的賄賂都白白的犧牲了。日本原須要征服他們每一呎土地的，現在却仍舊寸步未動。像北方這樣弱的民族精神尚且足夠驅策所有當地重要的中國領袖出來抵抗，並且用着驚人的力量來抵抗那種多數中國人都怕他們會出賣領土給日本的人。

在上海，尤其在南京，日本在政治和經濟的戰略方面曾造成了她最嚴重的錯誤。現在一般都承認她的進犯揚子江，尤其是進犯南京，即使在侵略成功的時候，也是她在軍事上時間方面的大錯誤。我個人的意見以爲這或許會鑄成歷史上一次斷然的錯誤。她的結果和她所希望的頗相逕庭。日本希望靠着這次對於華中一個實業、經濟、和政治的中心的致命打擊能够在表面上「叫中國屈膝」。但是不然，她却使他們站得更穩了。她攻擊揚子江下游時的那種恐怖的震動，中國政府往日的經濟基礎的全部毀滅——所有這些恐怖的和極端主義的計劃，產生了在空間上擴展這次衝突的變化，因此，日本才知道在時間上去限制這次戰爭——這些事實不但沒有破壞抗戰，却反大大的鼓起了抗戰的朝氣。

由於她在上海和南京的種種暴行，日本完成了幾件她所應該竭力避免的事。她給予當時中國政府裏的官僚們以一種經濟上的破壞。那些官僚們在客觀上都是反對戰爭的——上海的「買辦

階級，「銀行家，實業家，大地主的家族，和腐集在上海外國租界裏的富商們，他們經濟的興旺大抵都依靠和各帝國主義間的妥協。她竟死命地暗損了他們在南京有力的政治活動，這種活動常是在贊成和日本「合作」的一方面的，并且這種活動仍是繼續地存在，直到戰事發生時為止，始終想把華南和華北的往來繼續維持一個相當時期。

排斥了這些人以後，中國政權的基礎便開始迅速地轉移到青年人和激進的愛國份子身上——這些人是誓死反對和解的。並且他們是把這一次戰事看作爭取獨立的一個長期奮鬥的開始的。因此，日本便破壞了曾失去每件事的人的權力，而把牠轉讓於相信能戰勝別一民族——甚致全世界——的人的身上。

所有日軍認為足以促成中國內部分化和阻礙一致抗戰的地方封建勢力，都給她在華中的暴行所大大的破壞了。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方面，牠又摧毀了他們所夢想着的世界的最後憧憬，在這世界裏他們曾夢想過和日本共存的可能性。在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方面，牠又打破了他們和解的幻想。最嚴重的，她更分散了南京的政治力和經濟力，這種統治着全國的力量，是日本達到了牠的軍事目標以後，實行牠和解的條件時所絕不可少的。

即使在頑強的西南，在那裏白崇禧和李宗仁等幾個軍事領袖一向脫離中央政府，單獨地統治着廣西一省的，日本的希望仍是顯得很渺茫。她的陰謀和賄賂已被證實為無用。拒絕了日本的慨助趁這國難時期來作爭權奪勢的勾當，李白二人不但沒有在戰事爆發的時候派軍衝入北方，相反地他們却變成了中國抗戰中的一層堅強壁壘，單獨派一百萬軍隊參加戰事。



當五月裏，日本的海軍攻入廈門，而在華南一帶開始她聲東擊西的戰略的時候，華北徐州的會戰在軍略上是日本一個有價值的幫助，但是在政治上這是許多謬誤中重要的一次。牠很快的結束了華北，華中與華南在政治關係上的間隙，牠正和揚子江的襲擊破壞了和南京動搖份子妥協的戰略一樣，澈底地消滅了華南一種分立運動的可能性。

但是最使日本失望的是她期望着的中國共黨和國民黨間的衝突却沒有實現。蔣委員長自從和共黨訂立了統一戰線的和議以後，他不但誠意地依附着這次和約，並且把從前的紅軍派到北戰場戰事最嚴重的地方。自從紅軍以動人的迅速姿態在山西省出現以後，他們的武力已經證明為遠出於日軍的意料，並且很早便開始影響到中國抗戰的特質和主動性。——一種愈到將來愈會涉及更多的事。

因此，山本被迫着不得不獨自去戰勝他們。不能使中國人自己打自己，他們被迫着利用這些政治的誘惑，一般人稱為傀儡政府的，這些除了在政治和軍事上是衰弱者而外，不過是些人類的渣滓。——搜羅些中國人民早就摒棄了的殘羹。因了她在強佔的地方所施的無限恐怖，因了她在中國平民身上所施的姦淫，劫掠，和殺戮，尤其是普及於全國的轟炸，日本的軍人促成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並且在有些情形之下，避免了一向使國家分立的階級觀念。在不多幾個月之內，她把中國人民鼓動到政治和軍事的團結中去。這種團結在和平的準程上，即使再隔十年二十年也是不能獲得的。——的確，這種團結如果日本祇在北方一隅作戰，而不把她的戰略擴展到全國的話那麼即使在戰事中也是不能獲得的。

由於這些政治上嚴重錯誤的結果，日本目前在軍事上的實際地位較諸在地圖上所顯示的要差得多。實際上，他們顯然沒有控制着征服的土地和一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十分之一。他們目前在戰事中所獲得的，無非是些劫掠得來的贓物，天津、青島和上海等地海關的管理權，少數都市居民身上的征稅權，以及使日貨免稅運到中國來的特權。

當然日本的誤斷一些都沒有關於中國的民族意識和農民的戰鬥力的。而這些農民在每一處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兵士，把他們從幾百年的睡夢中驚醒以後，給予相當政治上的指導，把他們武裝訓練和組織了起來以後，他們便可成爲一架死命戰鬥的機器，遠在廣一先生的預料以外。後者曾經期望和山西、陝西尤其是華中的農民發生游擊戰。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看透目前正在北方各省和內蒙古一帶開展着的不正規戰。尤其他們不能預料中國共黨在戰場二翼進佔的速度和力量，以及他們在日軍後方各地發動民衆的活動。

多數日本的軍閥不明瞭在中國共黨的眼裏，日本征服全中國的迷夢是無足恐懼的。相反地，牠會掀起全個亞洲大衆革命的巨浪。報上的標題雖然繼續登載着徐州會戰的消息，佔領像徐州那樣的大城市，但是戰事在無限的內地發展着。在這樣廣大的戰場上，在中國的河流、山脈、平原和山谷之間，日本不單會遇到正規的大軍，並且會遇到一個由全民族幾百萬男女老幼所組成的大敵。這些人都預備在這次革命的戰役中爲着家鄉，爲着自由，爲着他們自己的將來，而長期抗戰下去的。

並且就是爲了這種人民運動和抗戰的精神在中國農村中所起的紛擾，我們應該及時轉移我們的視線，以便瞭解未來的發展。

## 二 紅軍的迎擊

就是這次日本對於華中的侵襲，畢竟促成了中國紅軍和國民黨的合作來抵抗日本，並且爲中國國內的和平建下了一個穩固的基礎。

當一九三七年七月，共產黨和國民黨間對於紅軍，蘇維埃和黨務上的措商都在實際上停止了，一種諒解似乎還沒有把握可以獲得的樣子。當時蔣委員長對於共產黨的誠意仍然是懷疑的，但他決計要使紅軍切實歸降，並且仍舊希望在最後分散牠的軍權，收編牠的主力使成爲中央軍的一部分，並且因此破壞了他在政治上獨立的立場。但是共產黨一方面改變他們的政策和名義，放棄一切用武力來爭取政權的嘗試，另一方面仍舊拒絕放棄他們獨立的軍事組織或他們的根據，除非一個民主主義的國防政府能夠在南京建立起來，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策能夠廢止，並且共產黨能夠公開地合法地存在。

從這種情形中我們或許可以推論到幾點重要的觀點。第一，這情形清晰地表示出日本侵略的藉口的虛偽性，說中國政府已經是被赤化了。相反地，南京政府正和以前一樣地反共，並且一樣地決定結束共產黨和共產黨的和議，正像以前反共的軍事行動一樣，不過是政略的一部份，用以破壞他們政敵的主力的。

第二，在戰事發生以前，南京政府甚致沒有採取一種強力的民族政策。當日本人進襲河北的時候，非共產黨員（如救亡協會的領袖）依舊爲了他們反目的愛國標語而下獄。對於一切反侵略的

宣傳仍舊加以嚴厲的監視。在蘇維埃區域以外，政治上的集團組織幾乎是一無自由。日本的國民和財產在各處都受着充分的保障。

最後，值得更注意一次的，便是日本在過去侵略的結果，已經使中國內部勢力的均衡發生了強烈的變化，使每次共產黨在政治上的讓步得到充分的公斷，尤其是他們對於反日階級鬭爭白熱化的着重。因此，這是一件奇怪的事實，日本反共思想的侵襲，在中國，不但更合着時機的來增進中國共產黨的威望，並證實他們在政治上的智敏。

常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共產黨和紅軍立刻恢復他們效忠中央政府的宣言，並請纓抗日。但是，直到八月的後半月，日本進攻揚子江流域的事實證實了日本是在從事於大規模的戰事以後，蔣委員長和南京政府纔允許了他們的請求，同時，合作的和議也便成立了，蘇維埃區域於是也廢止了，接着另外建立了一種民治制度，在那裏每個人都有同等的選舉權，從前的紅軍區域也就改名為邊區政府特別行政區。紅軍本身就聯合着國防的武力，作為國民革命軍的一部份，同時蔣委員長便和毛澤東、朱德等幾位司令長官聯合發表了一個通電，明白宣示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統一戰線終於變成了一件進行中的事實。

從那時集結在西北一帶的主力中，共產黨本想抽出三支邊防軍。實在他們最初祇允許在總指揮朱德和前敵總司令彭德懷的領導之下動員五萬人，他們二人都由南京政府給予軍銜。改組為現在聞名的八路軍以後，這些軍隊都在那年八月裏發給了新的國防軍制服，並且拋棄了他們依戀着的紅星帽子和紅色軍旗，換上了中央政府的青天白日章和青天白日旗。

去年九月，我又到陝西西安共產黨的總部，當時八路軍的先鋒隊離去了在該省的根據地，渡過黃河到山西的前線。他們的軍備，若是和日本全部機械化的部隊比較起來，當然是差得很遠，他們的槍械和軍火也是不充足的。但是他們一點都不驚慌，並且和平常一樣的一邊唱一邊開拔到前線。他們都用過去在內戰中所繳獲的槍械把自己武裝了起來。他們現在預備把日本人弄得和從前的國民軍一樣在展開他們的武力時，做了他們軍火的攜帶者。

他們向多山的晉省的統治者那個年老的閻錫山將軍報到以後，那些紅軍立刻被派到該省的北部去從事保衛工作，這些地方都是鄰近長城的。閻自己的部隊早就沿着主要的公路從那些地方撤退了下來。這些公路是日本人在八月裏早就看透的了，並且預備藉此攫取這軍事上的孔道和惟一的鐵路。當日軍開始進攻山西省的時候，他們大吹法螺說是蔣在「一個月以內結束紅軍。」這是一件易說難行的事。實際上，到十一月末，第八路軍竟克復了晉北二十六個行政區域並且把日軍侷促於單薄的交通線以內。

在九月末，紅軍靠着出奇制勝的技巧戰略，在敵人的後背和側翼出了一支伏兵，沿長城的平型關給了板垣的部隊（第五和十一師團）以一個迎頭痛擊。他們在輕捷顯赫的行動之下和敵人的步兵肉搏爭鬪。他們所殺傷或俘擄的總共在一千人以上，並且還奪得了三十輛戰車和七十輛載重汽車的軍火和給養。他們還搗毀了一個聯隊部，搜獲了所有的地圖和文件，俘獲了一部份的官長。聯隊長單獨地逃跑了，他的全部衛隊被派到隱蔽的處所流為烏合之衆，總算得以幸免。

平型關的戰事算是第一次——祇是一時的——中國在武器方面的重要勝利。牠在中國和日

本的軍隊中都發生了一個深刻的印象。接着發生了好幾次的襲擊，紅軍便把日軍在山西省內的四條主要交通線截斷了三條，並且把三萬個日本的步兵包圍了起來，這些步兵在事實上差不多已和外界隔絕了。這些日軍因為給養、汽油、軍火和食物等差不多全都用盡，於是在二禮拜以後，他們都已陷入了險惡的境地。他們幸賴國軍在晉南的失敗，支持了他們一個大包圍攻擊的形勢，把他們救了出來——同時日軍在晉東的大量援兵也及時趕到了，這才解了晉北之圍。從這次以後，在十一月裏，太原府終於陷入了侵略者的手中。

但是第八路軍繼續在晉北內地鞏固他的根據地。他也曾更向北方推動——到察哈爾——向東又到河北。在無數次發生在敵人側翼和後方的大大小小的游擊戰事中，共產黨在一月裏曾經克復了許多軍事上的據點，奪獲了約有九千枝步槍，大量的給養，幾千箱的軍火，好幾輛重戰車，和約有二千匹的驢馬，並且還俘獲或破壞了敵人一千輛以上的載重汽車，坦克車，摩托車，和彈藥車。當十月十八日，在一次有效的壯觀的襲擊中，一營紅軍竟破壞了在敵陣後方陽明堡地方的飛機場上的二十一架日本飛機。美國駐華海軍陸戰隊的情報員卡爾遜上尉的證明便是第八路軍在華北諸省內地已經獲得了根據地最有力的表示。在十二月裏，勇敢的在中國的外國軍事觀察家之一的卡爾遜上尉獨自跑到山西省去，並且准予和第八路軍同行。他於是便變成了第一個進謁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參贊。在他二月裏回來的時候，他報告說在四十二個晉北和察南的行政區域中，總共約有五分之一的日軍認為已經佔據的地方却都在第八路軍人民自衛軍和武裝農民所組成的軍事組織的保護之下。卡爾遜上尉又發現紅軍是他見過的軍隊中調動最迅速的軍隊。他們在日軍衛戍下的鐵路

上自由地調來調去，並且還不時的攻擊這些鐵路。他自己在他的行軍中亦曾好幾次越過這種鐵路線，一起約共走了八百多哩路。這種路大部都是在日軍防線的後方的。他說「河北的一部和山西的大部都不在日軍的佔據之下。實際上佔據的勢力祇及於沿鐵路及公路線的範圍以內。」

卡爾遜上尉又說：第八路軍的控制力一直越過河北省，直抵天津以南二十哩的範圍以內，這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日軍早就把牠強佔了的。每一處的農民都很活躍地在擾亂敵人的交通和間諜工作。他們「機敏地搜查着所有的旅客，並且堅持着他們必須是很可靠的份子。」

據說這是卡爾遜上尉對於紅軍所領的區域內的一種事實上的估計，這終於使蔣委員長信服了從前的所謂「赤匪」。現在已是他一個有力的援助了。在二月裏，蔣氏告訴他的部下說：無論如何，第八路軍是「唯一得到滿意的戰果的軍隊」，並且他鼓勵其他的將領去「效法他們那種模範的領導精神」。從這個時候起，紅軍在軍事參議院的影響漸漸的變為顯著了。紅軍的軍事戰略和組織民衆的方法也開始在委員長繼南京的失陷，而發動的第二期抗戰中被採用了。

紅軍怎麼能在這樣簡短的時期中造成了這樣非常的結果呢？爲什麼五個月以來在揚子江流域一帶熱烈勇敢的陣地戰中，中央軍失去了江蘇和安徽的一部，犧牲了二十五萬乃至三十萬的士兵，同樣在同時期中，第八路軍却在山西和河北省的大部收回了中國在軍事上的控制權，並且切切實實的用着敵人的武器來把他們的正規軍擴充到一倍以上呢？關於這二件事實當然在性質上有許多不同的地方，而他們的結果也是大不相同的，但是有一個主要的解釋可以從毛澤東對於從前的紅軍在內戰中的成功這一篇解說中看出來。

「這解釋便是第八路軍在他們區域內的羣衆裏正造成了一個磐石一般堅強的團結，因爲每一個蘇區中的人民都預備爲着中國反抗壓迫者而戰，因爲每一個人都是爲着本身的利益和真理而自動地組織起來參加作戰。其次，那些人民都是受着有能力，和有決心的人的領導來參加作戰的。這些人對於他們所處的地位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刻的了解。第八路軍所以能够獲得了許多次的勝利便是因爲牠在人民中建有穩固的基礎，在平民方面同樣在許多武裝同志的團體方面。敵人——正像從前在江西的「白軍」一樣——在軍事上固然大大的勝過紅軍，但是在政治上他們却是無能爲力的。」

讓我們來看看紅軍的領袖們怎樣採用他們從過去戰爭中所得來的經驗，怎樣採用他們的政略和戰略，來適應這次中國求獨立的戰爭的新情況。

### 三 游擊戰爭的展開

九月裏，這是我看見了蘆溝橋戰事中受傷的士兵的二個月以後，我同着一個姓劉的背一捆紅色帶子的朋友一起在山東和河南的原野中經過幾天的旅行。他是一個在北方很熟悉的人。這位姓劉的曾經在馮玉祥的國民軍裏當過軍官，後來又做過紅軍的司令官，在最近又曾到日軍佔領區域內做過秘密工作。他現在正要到河北省的北部去組織游擊隊。

那時宋哲元將軍（從前也是國民軍的幹部之一）正在很快的向保定府撤退，日軍在側翼的進攻正在用着他們經常的機動力向四面伸展他們的勢力。劉很信任地依賴重組宋殘餘的部下以



爲他新軍的核心。劉也都知道遺藏在保定府的一筆來福槍，並且很想在宋失去這個城市以前到達那邊——同時得到那些槍械。我記得我們當時談了許多關於愛情和戰爭以及他們可能的結果的話，並且當時我似乎問起劉在戰事結束以後，將做些什麼的事。他一邊露着牙齒望着我，一邊用着最鎮靜的態度說道：「我那時一定是死了。我們中的大部份都一定會在這次戰事中死去的。」

這一個巧答是這樣出於我的意料之外，以致使我受到了一個很大的打擊，並且不時的在我腦中復現。這一件事情反映出中國一種完全新的哲學，在過去沒有一個人會加入軍隊去和壓迫者拼命作戰的，但是相反地，每一個人都希望活着，得到一個自肥中飽的職位，愉快地希望他自己能够輕易地到達他老朽的年齡。後來當韋爾斯女士發現了對於這個幾乎不可信的革命的中國的哲學的一個適當的形容詞，她便稱牠爲「死的藝術」或稱林語堂哲學的反面。

我想當日日本樂觀地發動戰事的時候，或許她所有最大的幻想便是絕對相信像劉這樣的中國人還沒有產生。

於是，我和劉在鄭州分手。在那裏我們在空襲下道了再會。他穿着他那身臨時做起來的西裝，從他的眼邊擦掉些煤灰，便走出了月臺。並且還帶了一塊頭巾。據我所知道那便是他所有在人世間的東西了。他那時是不名分文，於是我借給他到保定去的盤費，在那裏他便獨自去打日本鬼子去了。以後我便幾個月沒有聽到他的消息。直到幾個禮拜以前，我纔知道劉現在正在冀北領導一支一萬五千人的游擊隊，同時在那裏有許多他的同志都從山西趕來。

我特爲提出這一件意外的事情當作一個例子，來說明抗日的流動戰爭開始牠追擊佔據華北

的日軍的速度。

因爲在抗戰一週年末，紅軍不但深入到山西省的每一個行政區域，在日軍的四週從河南的邊界一直向北到長城各處組織民衆，他們不但在山西一省三倍了他們正規軍的力量，並且在鄰省河北和山東一直到黃海一帶很快的建起了一支訓練成熟的游擊隊和一個偉大的反日人民運動。日本曾經樹立了傀儡的北平臨時政府，但是在大部分他們認爲已經征服了的領土上的實權，實際上都是在武裝的中國民衆的手裏，並且有許多都在山西察哈爾和河北等省新的邊區（紅軍）政府手裏這些政府都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央政府所發的訓令下建立起來的。

在邊區政府之下，所有給日軍侵染過的領土分爲五個大的區域，總共有幾萬方哩的面積。牠的武力從西向東一直伸展到黃河邊界，從隴海線稍北由南向北伸展到內蒙古平原。在每一個區域裏，有一個紅軍組織的政府，或者正在進行建立一個反日的行政機關。這種行政機關的主要作用便是在動員所有鄉村和市鎮中的資源來支持對於侵略者的一長期抵抗。

每個鄉村，每個市鎮，和每一個縣都有或是將要有牠自己的動員委員會。動員委員會的組成是包括着士紳和農民的二方面。牠的主要功用是在徵發戰士，勞力，現銀，衣服，和軍火。這些動員委員會供給了較日軍佔領區域內多幾百倍的自衛軍的房屋和衣服，供給他們足夠的軍火，在他們的區域之內組織農民保衛隊和間諜，分派每一家應付的一份防衛的代價，依照他們的能力去支付，爲軍隊招募新兵，並且發動各種不同的民衆運動來支持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社會上，和軍事上的力量。例如：在動員委員會之下，有婦女抗日會，青年救亡協會（自十五歲到十八歲的青年），少年先鋒隊（

八歲到十五歲的幼童)和人民自衛團，參加人民自衛團的人大都是十八歲到四十八歲的成人。

在這簡短的六個月中，附屬於第八路軍的共產黨員單單在邊區政府下的晉東和冀北十七個游擊區域中竟能把五十多萬人施以訓練並組成了所謂人民自衛軍。大約那邊四分之一以上的自衛軍都是有武裝的，並且他們一經使用槍械以後，立刻他們的力量逐漸的增加了。單在這個區域裏約有五十萬以上的民衆都活躍地參加着動員委員會的工作，同時約有七百萬的民衆繼續從事着他們日常的農事，商業和工業。這一切都在日軍的防線以內，在他們的側翼和後方進行着。

紅軍又在日本每一個衛戍軍的工作隊裏安插了許多間諜，所以不久他們便有一個工作很緊張的間諜網，因此在衛戍軍每一次事變發生以後的不久幾個小時以內，他們便全都知道了。這樣進行着之後，他們罷工的工作增加了日軍許多調動上的不便利。他們常常破壞從北平外圍到河南邊界的公路和橋樑，結果使日軍不時發生燬車和肇禍的事情，而且常使他們好幾天不能行車。農民自衛軍對於日軍的暗襲據說約使日軍在冀北每個禮拜發生五十次以上的不幸事件。

在這些自衛軍所造成的經常的騷擾以外，日軍又須和八路軍的主力在擴張他們勢力到該省內地的時候在較大的戰役中和他們週旋。但是他們一離開了公路，一沒有了他們機械化的運輸力以後，他們便處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去和長征中活潑的能手抵抗。第八路軍在他們所展開的游擊戰中應用着特別的戰術，造成了好幾次的勝利。這種游擊戰術似乎是日軍所不大明瞭的。到了五月，山西的日軍又全部採取了守勢，把他們自己閉守在少數幾個城市中，和沿鐵路線一帶。

隨着第八路軍克復晉北重鎮靖國以後，很顯明的可以看出日軍如果沒有大量的援軍使他們

在數量上超過紅軍的話，他們絕難嚴重地恢復攻勢。在流動戰事的肉搏戰中，紅軍不斷的證明他們自己在戰術的靈巧方面是日本的優越者，至少在戰鬥精神方面是他們的相等者。外國的軍事觀察家都承認在五月裏，當日軍正從事於把幾千萬的陸軍轉移到徐州前線的時候，祇是因為缺少了砲兵和空軍的協助，使紅軍不能克復在山西和河北的許多重要堡壘，在這些堡壘中，日軍在當時祇留有少數單薄的兵力。

在冀北和山西四個月中的戰事中，共黨人民自衛軍消滅了三十六個日本的衛戍隊。在一次四月裏開始一直延長到五月裏的「游擊隊的進攻」中，第八路軍和他附屬的部隊在平漢路沿線收復了十個以上的縣，並且在五月裏竟到達了北平和天津的四郊。四月裏八路軍的部隊在綏遠山西二省和日軍作戰了三十多次，並且據說單在這一個月內日軍在綏遠山西和河北諸省的游擊戰事中犧牲了二萬六千多人。

當一九三八年春天紅軍在第二區內的三千個市鎮和鄉村間進行着一種郵政制度，並且設立十個無線電收發站，長期和漢口以及八路軍在陝甘一帶根據地內的收發站，甚至和日軍佔領區域內祕密地活動着的收發站互相保持聯絡。紅軍的工廠每天製造出一千二百套製服，同時有十一個輕兵器的兵工廠製造着步槍、迫擊砲、火藥、軍火、地雷、手榴彈、大刀、和槍刺等。邊區政府又進行着約有三千哩長的一個電訊網，連接約有六百個動員的中心城市。牠又發行十七種日報。開設十四個傷兵醫院。有幾個在邊區政府下的縣城早已成立了民治制度，自己選舉縣長。這是他們自己所定的規例，他們希望能夠儘速地推行到全個區域。到了六月，有許多共黨管制下的山西和河北的地方，

秩序已經是這樣的穩定，甚至外國的傳教士都可以回去執行他們的職務。交通、運輸、和郵遞制度都很快的組織起來了，傳教士們也開始委託八路軍在漢口的總部護送他們在戰區的各站間往來。其中有許多傳教士對於人民對他們的優待，和他們一向認為是最壞的敵人的共產黨所施行的社會改革都得到了一個深刻的印象，以致有幾個傳教士都自願地出來為他們在醫藥上服務。在這些自願者中有一個六十歲的比利時主教親自率領了許多中國教徒組織第一個服務團跟着八路軍一起參加在山西的幾次最激烈的戰役。

所有這些活動的基礎都急速地發展為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方式，這和從前在江西和陝西的蘇維埃區域差不多，能夠自己維持一個農村的市場，和日軍佔領下的城市和鐵路線互相獨立。農村生產、分配、銷售、和信用等合作社都普遍地設立着，種植法都靠着口頭宣傳和反日教育在農民間介紹着。例如，從前的植棉區和煙草生產區，都改植大麥和別種穀類，這是和日本紡織商剝削華北資源的計劃發生嚴重衝突的一種措施。(註)

第八路軍應用牠的金融計劃預備給予日本的佔領一個嚴重的經濟上的打擊。新的邊區政府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特許發行牠自己的紙幣以後，牠在三月裏大約收進了二千萬的法幣，和三百萬的現銀。這使得日本將來在佔領這種地方的時候，不能再拿北平傀儡政府下的聯合準備銀行所

(註) 日本的棉商計劃在一九三八年能够攪得一百萬擔華北的棉花，漸漸的剝奪美國棉的進口。但是實際上，

四了中國的黨務工作，他們現在祇能得到從前中國棉購買量的十分之一。

發行的軍用票來換取中國政府的法幣了。在事實上，這種計劃也就是要使任何已經黨化過的地方，將來日本萬一得以佔據之後，實際上也將不能拿任何日本或傀儡銀行的金融政策來產生購買力。旭日的商人們的惡運！

動員委員會又設立學校來訓練游擊戰士，農村衛隊，間諜，罷工者，看護，和機械士等等。在晉冀邊界的八路軍的總部，阜平附近有二個「抗日大學」，一個是政治學校，一個是軍官學校。每隔三個月那裏就可以造就幾百個新的軍官和政治委員。在內地紅軍的兵工廠裏，有城裏來的機械師和從城裏那種被日軍所破燬了的大學裏來的化學教授。因此，工程破壞隊在設備上和技術上都進步了許多。

每一處，當這種運動擴展到的時候，新的人民政府就推進着民衆教育。四月裏，據邊區政府宣稱，在牠教育部管轄下的學校要比北平臨時政府管轄下的多上十倍，每一個學校當然是強化抗日訓練的中心，引起大量的青年和成人來參加活躍的抗日計劃。民衆們更由無數的劇團宣傳着——旅行「反日劇團」，這個我們在陝西早已碰到過了。這種劇團的演劇者當然利用羣衆集會，招貼，新聞紙和演講運動等來煽動着和幫助着。這種演講運動是由動員委員會下的各種組織領導着的。

所有這些在游擊區中顯著的活動都是在「統一戰線」的口號和計劃下實現出來的，這個統一戰線是共產黨忠誠地支持着的。這個，無論怎樣，並不阻止共產黨的從事民衆運動者去實現他們立刻改進農民生活的計劃。根據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海陀爾漢遜先生的通訊上說，他曾在我離開華北以後，到河北省中部的游擊區中旅行過二百多哩路，他說共產黨「一點都沒有觸犯他們和國

民黨所訂的和約，廢止土地的極端計劃，却已經成功地獲得了一大部份最窮苦的農民的援助，這些農民所有的土地都並不是依靠着目前的政府的。

「所有已經逃到北平去的地主們的土地（大都的地主已經逃去）」漢遜先生這樣寫着：都担保着是屬於原主的所有物，但是暫時的由政府借用。這些土地都分配給貧農，或是給那些從被燬了的鄉村中逃難出來的農民。紅軍代收了這些地租，並且允許在地主回來的時候全部轉付給他們。這無疑的是目前一筆很大的收入。

「其次，有幾處地方所有的地租都已經主觀地減低了百分之二十五。在其他各處的減低額或高或低，略有出入。第三，所有的債務都宣布緩付三年，在這期間的利息依年利一分計算。第四，所有沒有牲口的農夫們的土地都由紅軍幫助讓騎兵所有的馬來耕種。無論到那處，我都看見這種工作在進行着。第五，所有在紅軍佔領區域內的任何難民，如果沒有足夠的食糧，都由動員委員會供給他們直到秋收期為止。第六，動員委員會所用以為軍隊徵發食糧和衣服的制度必須不能使責任落在窮苦者的肩上。」

自然，大部份華北的內地都還沒有被八路軍有紀律的武力所平復，因此各種名目的土匪和半土匪仍舊在鄉間出沒。有幾個都是共產黨以外的義勇軍集團，他們分別由各省潰散下來的軍隊，或是由大中學的師生，破產了的商人，原來的公務人員，警察，保安隊，地方武力，以及一二個中國的祕密組織所領導着。但是差不多其餘的都是抱着「焦土政策」的觀念的，並且都預備和紅軍的專家在游擊戰事方面互相合作，漸漸的後者便得到了同樣的領導權，從愛國者中驅出了土匪份子，並且組

織人民來充實他們天天在擴張中的武力。

這樣，這似乎是很明顯的，即使在侵略開始時首先攻佔的河北省，日本也已經失去了一個市場。假使不是幾年，至少也有好幾個月了。這市場在從前實際上是她帝國的一個經濟上的附屬物。除了北平天津二處和牠們的四郊，以及沿鐵路線和公路線的幾條狹長地帶而外，全省現在都在武裝的中國人民手裏。沒有一個日本人能够平安地冒險走到「臨時首都」的城牆以外二十哩的地方去，或是任何鐵路線和衛戍地帶以外幾百碼以上的地方。在五月裏，第八路軍覺得他自己的實力已經足夠去作第一次襲擊蘆溝橋的嘗試了，那裏是「中國事件」最初發生的地方，他們竟把驚奇中的日本衛戍軍驅逐到北平城附近。

在華中對於煩悶的日本商人的情形幾乎是一樣的暗淡。日本控制着所有在揚子江下游富饒的三角地帶的主要城市，鐵路，水路和公路。但是她這交通網，沒有一部份是不受到攻擊的。此外，在鄉村和市鎮中，都是成千武裝齊備的反日游擊隊。到五月裏，約有八萬名游擊隊甚至在上海和杭州的四郊進行流動戰，槍聲可以在這些城市中聽見。每天他們襲擊日軍的運輸線和交通線，把生命當作換取代價的工具。在新四軍（註）第八路軍的友軍的號令之下有更大的不規則的單位，更好的組織和更完善的裝備；這些都變成了日軍的後方和側翼在進佔揚子江流域中的嚴重障礙。

華中這個大市場的本身是死的。在戰事以前日本經上海銷售貨物，當時約佔中國進口貿易的半數，每個月四千萬元以上的貨物。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和一九三八年六月間，她在這一區域的出口貿易降低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揚子江下游，除了外人控制下的上海地方以外，實際上沒有什麼



生產。那裏有消費者，但是沒有消費者的現銀。那裏根本沒有什麼本地的資本。

在一處全世界人口要算最密的地方，約有四千萬人口組成的一個日本貨的豐裕的市場，到七月裏却祇剩一半都不到了。往往整個的一族一鎮，或是一村捨棄了他們城市和公路附近的土地遷居到內地去——有時剩下那些年青的子女們去加入游擊隊。幾千頭耕田的牲口都被殺戮了，農具和工廠裏的設備都被燬成碎片給日軍帶回去做炸彈。在遺留在戰區裏的人中，大多數都是赤貧的。他們所有的一切都被搶劫一空了。他們可以說根本不能組織什麼重要的市場。他們現在除了勞力以外沒有什麼可以給他們搶的了。日本軍隊在內地對於成千的農村從事於有組織的焚燬，以及用暴力來殺戮居民以阻止游擊戰事的擴展，這些都更足以使可能的市場一天天的減少——相反地每天增加牠的抗力。

他們力量的總和漸漸的對於有幾個日本人也有點明瞭了。他們深知道當他們前線在沿着大城市和鐵路線進攻的時候，他們同時也在逐漸破壞她自己的市場，和某一個中國政府，某一種抗戰力量，以及某一個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基礎。他們同時又在內地造成了另一個新的中國市場，另一種或許是更堅強的抗力，這種抗力是建築在另一種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基礎之上，這種抗力的根

(註)

第四路軍由聞名的張發奎葉挺和項英等幾位將軍所率領，係由從前的第二十四路軍所改編，當統一戰線成

立時，該軍正在福建作戰。牠的根據地在浙江江蘇和安徽邊界，並且和八路軍在北方一樣，牠在漢口政府之下也有同樣的機構。

據地是在他們的側翼和他們的後方的。如果日軍對於漢口政府能夠得到一個政治上和軍事上成功的決斷的時候，那麼他們一定會發現他們並沒有征服中國，而不過是中國抗戰的另一種方式。他們從此將要回過頭去開始重新征服這個國家。他們從此將要遇到真正的奮鬥，去奪取蘊藏着的財富，和她內地的人民的所有權，去抵抗紅軍所領導着的武力。這種武力在今天對於中國農村的控制較歷史上任何時期來得大，並且隨着戰事的延長一天天地在增強。

蔣介石氏在五年功夫的時期中，用了幾乎近兩百萬的軍隊，祇和江西一省的紅軍政府競爭。要日本去征服組織在這樣一個基礎上的全中國，又將需要多少年數，多少軍隊呢？除非在同時日本國內發生革命，或是第三者出來調停使促成了這次戰事的結束，那麼這是很容易斷定的，即使在五年之後，日本在中國的泥足仍將是愈陷愈深。

在這種情形之下，去閱讀日本在因開發華北而設立的公司裏的幾千萬投資的誇大的報告是很可笑的。即使日軍的確有這幾千萬——實在這還是個疑問——那麼他們在華北計劃着的正式的戰時工業也不能開始發展，除非在中國資源和市場所在地的領土的確是被征服和平復了以後。雖然特務工作團和牠的一羣推行者都是非常熱烈的，但是他們却不能下鄉去看看他們自己所有的「戰利品」，除非在這種單單得到交通線的初期估據能夠進步到穩固的估據的階段以後。

這種情形在五月裏終於給日本駐華艦隊的總司令長谷川所自認了。在他回到日本去提出一個新的辭呈的時候，他譏諷着日本國會裏那些不知大勢的議員。他們都是不知道爲什麼在強佔區域內沒有「經濟的開拓」的實現的。「中日貿易或戰後的繁榮都屬次要的，除非日本能得到勝

利。」這位將軍對着失望的聽衆這樣表示。他說「他並不是凱旋而歸，」而是來警告他的國人「日本必須動員所有可以應用的資源來打倒蔣介石政府。」

這一定使許多天真的議員們感到十分震動的。他們幻想當他們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強佔了南京，在那裏殺戮了四萬二千多個非武裝的平民以後，他們早就打倒了委員長。（據廣田外相表示委員長在當時已經遇難。）

#### 四 不可征服的中國

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派到大陸上來的軍隊總數已達一百二十萬人。其中約有二十二萬五千人已經在戰事中犧牲了；另外有三十五萬人需要在滿州和高麗一帶護衛。實際上她在中國本部活動的軍隊不過六十萬人，他們散佈在一條支離破碎，日益在伸長並且日見薄弱的戰線上，要從綏遠平原一直伸展到上海以南的杭州灣——一條一千多哩路長的戰線，並且又在開始進襲華南的海岸線，以延長她的戰線。

很顯明的，單是這些軍隊去應付這次事變還不够得很，要日本再派出軍隊來又很困難。除了不可或少的在她的本部三島以及她的殖民地中從事於政府的行政工作，警務，實業，農業，商業，運輸和其他的公用事業的六百萬人以外，日本至多祇能動員一枝不能超過七百萬壯丁的軍隊，有人相信不能超過五百萬。但是在這些像着棋一樣的軍隊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必須留着預防和第三者或許要發生衝突，——尤其是蘇俄。

除非日本在這一次長期戰爭中決意孤注一擲的犧牲一切來換取對於中國的直接征服——這次戰爭的結果她或許仍會在敵對的蘇俄面前遭難的——她在和中國的戰事或許再不能做到一百萬以上的壯丁了。她利用滿州軍隊的力量已經證實爲完全是失敗的；她在強佔了的城市中祇能利用中國人的力量來作爲警衛的工作。德國的軍事專家甚到相信如果戰事像現在這樣的再繼續一年，日本將要遭遇到人力的嚴重飢荒。

中國方面根據下面的事實發現她樂觀的理由。如果在一年以後，約有中國本部三分之二以上的被侵奪的土地仍在中央政府的號令之下，——同時如果游擊隊所佔領的土地也都包括在內，那麼日本的佔據區域將受到很大的限制。中國在軍事上所受的損失已很重大，根據外國人的估計犧牲的數目已經超過了九十五萬。但是日本所犧牲的比例也並不小。在六月初日本所犧牲的三十五萬人平均起來和中國比較已經是三比一。中國因爲武器的不及，預料作更重大的犧牲，所以在戰事初期實際上與日本損失的比例是五比一，在山東前線某部所犧牲的比例甚至增高到十一比一。

(註)

因了北方，東方和南方戰線的延長，她們易受游擊隊攻擊的交通線約需半數以上的侵略軍隊來負起衛戍全線和保護後方的責任。要雄厚地把日本的武力展開出來在任何前線方面作一次「戰略上的決戰」漸漸的變成更困難了的確，「決戰的焦點」在軍事方面變爲和政治方面一樣的不可捉摸。每一次號稱「決戰」的戰事似乎都祇開展了一個更廣漠的前線，需要更多的人力來作另外一次的突擊，這樣便輪流地延長了戰事的時間性。於是這個日本人民所勉強要求着的「局部

戰爭」便變成了「全面戰爭」。牠的結果已經不再能够拿地理上的目標來想像；却開始在包括着人類一切的微細物件，這是祇有「迅速的決斷」才能避免的。

事實是這樣的，戰事發生了一年以後，中國在多方面都較戰事開始的時候來得強盛。中央政府已經動員了四百萬正規軍，並且幾乎有二百萬都是在前線，其中包括了死難者的補充。還有四百萬正在訓練中，並且很明顯的中國如果能加倍這個數量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除了材料、組織和領袖以外，這不再是一個問題了。

足供另外一年消耗的軍火給養已經積存了起來。在內地無數小的兵工廠在日夜的工作着。每天接着有飛機、飛機的零件和武器等從香港運進到國裏來。中國空軍的力量在質量上和效果上都已有了穩快的進步，並且這是很可以相信的，有了蘇俄的慨助和歐美各國的交易，中國在空軍武器方面更將得到許多進步。

雖然，中國軍費的預算額祇及日本的十分之一，她的經濟力也決不能允許她這樣有效的發動戰爭，但是她仍是繼續呈顯出一個財政上健全的關係，反映出她金融的穩定。這使全世界都覺得震驚。宋子文氏在十月十九日對我所發表的談話中說起中國抗戰的財政機構，中央政府「在經濟上可以繼續抗戰到二年以上，如果需要的話，或許更可以延長。」一直到現在為止，這句話已經給實際

(註) 祇有第八路軍因為應用牠特別巧妙的戰術的緣故，使日軍受到比牠自己所受的更大的損失。在平型關

和紅軍作戰，日軍約受到了一與五之比的損失，在其他各次戰役中約是一與二之比。

的事實所證實了。(註)

中國銀行總裁宋氏指出共產黨昔日在華南所支持的持久戰是表明中國民衆應付大困難的能力的一個例子。「祇有江西省的一半作爲他們的根據。」這位前進的銀行家提醒我說：「共產黨竟阻止了五十萬政府軍的前進。」雖然目前還不需要採取這樣激烈的步驟，宋氏說政府已經預備在需要的時候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實現一個和從前蘇俄所用的相仿的整個性的戰時經濟。

我們必須記得正和日本的情形相反，中國抗戰時在物質上的消耗固然要比平時大，但是大部份的比例却都在軍火的消耗上。當戰事初發生時，她早已維持了一枝近二百萬的軍隊，用最簡單的話來講，她的財政問題純粹不過是一個繼續維持戰線上的軍隊的問題。和日本不同的，中國是在她自己的領土上作戰，所以無需像出征軍所需的那種特別的消耗。

據日本經濟專家的估計，中國在實際的軍事行動上所消耗的每月約計法幣五千萬，或者據他所說，約當日本在戰事中所消耗的十分之一。又和日本不同的，中國既無需要在海軍競爭上作大量的消耗，又不必在別國的領土上維持一枝大量的警衛軍；他更無需乎維持二枝軍隊，一枝應付目前的戰事，另一枝應付和蘇聯預期的戰爭。中國可以展開她全部的力量——但是目前決計還沒有做到這一步——來單獨反抗日本。

雖然，姑且把生命的悲慘代價擱在一邊，中國在這次事變中實業方面的損失是很偉大的。並且遷移內地和在那邊所作的經濟基礎的發展祇解除了牠困難的一部份。幾乎百分之七十的中國近代工業都建築在上海外國租界的四周，一個和世界上其他各處都不平衡的驚人的「人造環境」——

這種環境給予這個城市對於南京政府的計劃以一種決斷的輿論力。當政府和這個區域一斷絕了政治上動盪的影響的時候，牠在政治上便變成更革命的。中國主要工業基礎的破壞也便給予全國其他各處以一種莫大的負擔。中國急需要在內地創造並維持一種分權的工業經濟和商業經濟來適應本國新的軍事環境上的需要，但是對於她這種建設的能力目前發生了一個嚴重性的大問題。

上海和內地的隔絕恰巧產生了這些補償。牠解除了內地市場和上海舶來品的競爭，牠給予華南幾個通商口岸以一種繁榮，牠對於內地的工業生產發生了大量的需求，牠又減低了中國不景氣貿易的出超額。同樣，廣州的失陷也是如此。一九三八年春天，幾百個新式的工廠加入到內地的工業設備中。但是真正的問題，是要建立幾千個輕工業的工廠遍佈在內地各處，並且要不受日軍的攻擊，這些在實際上都還等待去實現。雖然，一個大的新工業的合作運動已經在那裏進行着，不但希望吸收避難的工人，並且希望在經濟上適合這國家新的需要。這對於解決這個問題有着很大的可能性，同時介紹了一種中國還未曾有過的最進步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計劃。無論如何，這是無疑地是可能的，在內地建立起中國的經濟基礎來支持這種抗戰的重大責任，使萬一在日本佔據了這種根據地的時候，也不過證明他們獲得了許多債務而已。

當南京陷落之後，蔣介石氏所發表的「堅持到底」的政策正和引用新的更積極的戰略的事實相符合。這種戰略一部份採用在中國的外國參謀的意見，一部份是由於從前的紅軍在游擊戰術

方面十來年的經驗。大量軍隊和武器在深長的濠溝中的集結，預備像上海會戰那樣的作前線的大戰——這是助成了敵人利用大量優越的火力和高超的技術來毀滅自己的方法——必須禁止施行，除非在最活躍的軍略的據點上，同時攻擊的行動主要的留作攻擊敵人側背和阻撓敵人發展之用。

配合着主力軍隊純粹防禦性的陣地戰和獨立的流動部隊的攻擊戰，中央軍自己在四月裏也在徐州附近造成了一次勝利的反攻。

堅決地撤退到徐州四郊幾哩以內，中國隴海線大護衛計劃中一個重要的據點，中國軍隊給予日本軍隊以一種過分的擴張，終於使她鹵莽地投入了陷阱。同時，華軍的司令部祕密地實現了側襲和包圍的行動，全部和後方不規則的軍事行動相呼應——表現了華軍從來沒有達到過的幹部工作的優越——竟在一次突然的攻擊戰中把全部日軍的攻擊力孤立於山東前線以外。

在台兒莊空前的勝利之後，四分之三的日軍武力都相繼的被阻撓或被擊散了，這是德國人把牠比作在坦能堡對俄國軍隊的勝利的。但是在範圍上這決不能和坦能堡的勝利相比，這是從日俄戰爭以來日本皇軍所受到的一次最嚴重的不幸，牠對於華軍士氣方面的影響或許甚至可以改變這次戰事將來的過程。這種從「可鄙的」華軍那裏受到這樣一次打擊的侮辱，和牠在日軍士氣方面相反的影響是很難在筆頭上描寫出來的。這要使日本費掉二個月的功夫去恢復她在徐州附近的地位，重新開始她的進攻來攫取這個前線活躍的半圓形。

在中國，空氣立刻從一個凶暴地為生命而作戰，並且希望各國幫助的國家轉變為一個開始真



正相信能由她自己獲得最後勝利的國家。日軍「不可戰勝」的誇大語被粉碎了，中國醫好了她自己的「恐日」病。顯而易見的，抗戰的精神從一個拚死從事於「保衛戰」的國家改變到一個從事於獨立奮鬥的社會革命的人民的一種樂於犧牲的精神。

在前幾個月，政府在從事於純粹守衛性質的戰爭時，那種沒有政治訓練的軍隊幾乎和任何民衆運動沒有什麼有機的聯繫。民衆組織和民衆政治和軍事訓練的力量給國民黨中某種份子所阻止着——這種人仍舊懼怕有組織的羣衆比怕日本人還要利害，他們仍舊懷着屈辱的和平的希望。在上海和南京失陷之後，在投降的最後一條戰線也被日本破壞了之後，在覺悟了這是一次終極的戰爭之後，事實需要政府去適應人民對於羣衆組織的需要，這種羣衆組織的運動是正以驚人的速率在開展的。民衆教育，民衆軍事訓練，甚至有些場合民衆政治訓練都在改組後的漢口政府的領導下普及於內地各處。慢慢的蔣介石政府中最愛國的分子的觀念和共產黨愈顯得接近了，他們的工作也漸漸的平行了，他們活動的中心也漸漸的傾向於結合方面。

因了羣衆的需要，因了共產黨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實力的增加，並且因了政府對於一切能從蘇聯方面所得到的幫助的需要，漢口政治上的改組使從來被誹謗着的「赤匪」也得到了相當的尊敬，並且在中央政府和軍事行動二方面的影響得到了增大。

紅軍的領袖朱德，彭德懷，周恩來，和林彪等都被派到新近產生的軍事參議院裏任職。其餘紅軍中的顯要人物也都給予政治上重要的地位。共產黨得到了合法存在的地位，第八路軍也得到了和別的軍事單位一樣的待遇。在牠暫時的佔領地帶以外，牠又設立了許多支部。共產黨的報章和雜誌

都在中國抗戰中心地的漢口刊布了，並且享受到一個合法的流通。

幾十種共產主義的書籍和小冊子經了十幾年的埋沒之後，又忽然在市場上復活和發現了。除了蔣介石和孫中山的照相而外，朱德、毛澤東、彭德懷和其餘幾個紅軍中的傳奇人物的照相都在每一處公共場所陳列出來，並且使許多雜誌和報章生色。人們似乎都不能常常仔細地看牠，所以每個人都須擦擦他們的眼睛，望着年輕的書記和學生們，公開地平靜地讀着「紅軍」的寫作，在前幾個月的时候，單單祇要有了這些書籍就會被拘禁、拷問，甚至受死刑的。

共產黨的組織者在每一處和國民黨合作的場合在羣衆組織中都顯得非常的活躍。在國民黨中仍舊有少數分子存着煩惱和疑懼的心理，但是在全中國都有一個顯著的趨勢，那便是認統一戰線的繼續存在是中國勝利必需的保證。甚至不單統一戰線，就是一個有力的民衆運動所包括着的一切，以及在日本覺悟以前所有可能的深刻和廣泛的民衆組織，都是在長期抗戰中絕對不能或少的條件。對於這件事實漢口政府還沒有完全覺察，因此遲疑和阻礙使時間和能力都受到莫大的損失，並且更削弱了中國的地位。

同時，似乎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懷疑共產黨維持和國民黨和議的意向，和在委員長領導下一致効忠統一戰線的決心的。他們明瞭，並且再三加重地說，無論任何別的方法都將使中國和他們自己變爲不幸的。他們對於一個更有代表性的更民主的政府的煽動繼續着並且獲得了更大的成功，但是並沒有用武力來嘗試攫取政府中盟主的地位。表示，或是除了合法的方法以外用任何方法來強使政府改變政策——在抗戰一直繼續下去的時候，相反地，任何對於漢口的攻擊似乎都變成了

不可能的，除非在不滿意的反共派，國民黨中的反蔣份子聯合着日軍強佔區域內的中國社會的腐化分子的領導之下。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人都需要民主國家繼續不斷的給予同情，尤其是英國和美國。他們不會採取什麼步驟去損害中國從他們那裏接受幫助的機會。蘇俄的幫助也是很明顯的以中國統一團結的加強爲條件，而不以黨派間的互相傾軋爲先提——並且至少也要以英美對於這種援助的默認爲條件。但是中國的共產黨深信這次戰事中本身所產生的客觀條件將無可避免地強迫政府採取他們民族獨立運動中的反封建和反帝國主義的政策。在二年以前，日本侵略的本身是無可避免的，但是最近事實的發展已經證明了他們這種信心正和假設一樣地得到了根據。在這裏回憶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對於我所作的問題的答案或許是很適切的，當時我問他要在怎樣的條件之下中國才能起來抗戰。

「三個條件，」他說，「將能保證我們的勝利：第一，在中國獲得一個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第二，全世界反日陣線的形成；第三，目前在日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人民的革命行動。在這些條件中，中心的需要是中國人民自身的團結。」

這第一個條件，「中心的需要，」已經獲得了期望以外的結果，甚至對於許多樂觀者也是如此。第二個條件還不過是一種趨勢，但是在民主國家和蘇聯方面至少已經足以施行對中國重要的幫助了。但是第三個條件的發展怎樣呢？「目前在日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人民的革命行動——在中國的要求中最急迫的，便是日本人民的本身！

## 五 日本財政上的危機

當日本競爭作中國的成吉思汗的嘗試已經使她消耗了和日俄戰爭相當的人數，和六七十倍於佔據滿州的人數的時候，她國內資金的外流甚至較這二次戰役中合起來的數量更多。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本國會通過了大量戰費的預算。現在這國會已幾乎認為是實現軍事獨裁者的要求的唯一機關。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專門指定作侵華軍費的二十五萬萬日元很快的用完了。在這一個人財政年度中附加的軍費預算暫時定作四十八萬萬五千萬日元，或者說就是二倍於日本預期的輸出貿易額。這使日本自從爆發這次東亞戰爭以來的總支出預算提高到七十三萬九千萬日元，或者說超出美國的軍費預算額二十萬萬元。

日本目前這個不可思議的總數，三倍於日俄戰爭中的消耗，使這島國在經濟上十分疲乏。果真，日本現在較日俄戰爭時無疑的已經強了三倍。所以才能應付這些急迫的需要。但是實際上戰事的負擔還祇剛剛開始。日益加重的中國事件的消耗，在陸海軍雙重實力的準備下表現出來以應付風雲瀾漫的世界。除了對中國每年必需的五六十萬萬元的戰費以外，還需要四五十萬萬元一年的預算去和英美作海軍的競爭，日本從那裏去找這些錢呢？她還需要三四十萬萬元去和俄國龐大的軍備，軍事設備，以及西伯利亞的防禦工事去競爭，並且她要在數量上超出俄國的潛水艦隊，這艦隊目前正在日本北部的海面騷擾着，她又那裏來這一筆費用呢？

事實是這樣的，查勘了民族經濟方面每一種可能的壓力和努力以後，財政部得到一個結論說，

牠靠增稅的方法大約可以增加三十萬萬的歲收。要得到其餘的部份，更需加上十萬萬元去補足。已經不很平穩的上年度の「預算」，日本軍隊在一九三八年內更須在國內發行近乎六十萬萬元的「赤字公債」，而她的總歲收平均約當美國的十五分之一。

單是這些公債票已將使日本的內債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們將使國債的總額增高到一百七十萬萬日元——或者二倍半於日本在一九三〇年剛在她開始「奴化」滿州以前的負債額。也就是超出她平均歲收的百分之五十。她的武士或許在中國捉不到幾個紅軍，雖然他們是這樣堅決地要擒獲，但是他們在國內卻潑滿了許多紅的色彩。或許有人要說這便是「反共」的赤色。

在二年以前日本的藏相馬場警告他的軍閥們說，全國祇能再舉十萬萬元的公債。馬場的十萬萬元在上個財政年度中發行了——並且又同樣地發了二個十萬萬。但是私人的銀行和羣衆還剛在溶消從一九三一年以來便擠塞在喉頭的四十萬萬，所以大多數公債票還都在日本的窰裏的時候，鈔票的發行額卻一直向上升。日本的銀行家和羣衆將在今年用他們進款的半數去再購買六十萬萬元的公債麼？政府能付出這些已經發行的公債的利息麼？而這些公債利息的總數約比她全體人民的歲入還多。這個答案是正面的，他們將要付出，因為他們必須付出。因為假使這些公債票不能售出，已經發行的鈔票也將突然的發生擠兌。

即使一個日本的軍官都知道這將發生什麼結果：大規模的通貨膨脹。被宣傳所麻醉了的日本農民或許說是給共產國際所夢魘了，但是可怕的鬼怪使資本家和政客夢寐不安者，是戰後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無限制的通貨膨脹將使日本發生空前的大動搖。並且將結束了日本帝國的梦想。爲

要避免這種危機，陸軍部發覺必需用資本來收買各種企業。在政府底下產生一種偉大的國家企業，以便直接抵押各種實業和帝國勞工生產力的開拓。

爲了這個緣故，剛在去年三月解散她目前毫無能力的國會之前，軍事參議院批准了一個國家總動員法案，在國家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方面，這動員法給予軍事當局以一種絕對的專權。這種動員法授權政府——就是指陸軍和海軍的最高當局——他們可以去徵發「國家動員商品」，不但包括着所有的戰時資源，並且搜羅了每件公用的物品和生產這些物品的事業。並且，獨裁者更有權去從事創造，分解或合併各種企業，增加減少，限制，或分派他們的資本，爲這種企業發行股票，指導他們的盈餘投資，抵押他們的設備和資產，控制他們的債務，或是直接把牠們接收過來，由帝國的法令來規定賠償費。

用不到再進一層討論日本的戰時經濟，我們便可以看出動員法在事實上准許了政府強迫所有動員的實業，商店，和各種課稅貨物的業主把他們的設備和資本向私人銀行抵押了去購買「赤字公債」，而這種業主的資本力在目前是絕對不夠去直接吸收公債的。這便是說，在戰事進行中，所有的實業和農業爲要供給軍事上重大的需求起見，將發現他們自己完全是在爲着一個大的專賣公司和資本家工作着（這資本家是控制着所有的戰時經濟的）——但同時內部的購買力，和人民的「生活程度」都將劇烈的減低。

固然在理論上講起來，總動員法祇能在「大戰緊張時」才可應用。但是在國會裏通過以後，牠祇需要帝國的諭令便可變成法律。這便是說無論什麼時候，陸海軍有什麼建議，天皇都得批准。同時，

有許多條款在事實上都已經實行了，並且單是這種實踐時的恐怖或許將使他們夠受一個時候。最後，當動員法正式變成法律的時候，主要的或許是爲了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財政的原因。

沒有一個人能夠預知日本人民的爆發點。「如果日本受到一次嚴重的失敗，或發現她自己是包圍在一次長期的消耗戰中或是她甚至遇到了經濟制裁的話，那麼除了一小部分的財主以外，日本人民的極端窮困和各階級間的革命騷擾勢必將爆發一次社會革命。」弗蘭特，烏特萊博士在他含有預言性和誘惑性（註）的書中這樣寫着。這書中說明了日軍壓制所有在中國的事務消息的極度留意。無論事實是怎樣的發展，但是沒有一個日本的官報承認過一次失敗——關於這種失敗的消息中國人常是這樣驚奇的傳遞着的。依據日軍官報的數字，日軍每失去一個戰士，總要殺死十個以上的中國士兵，有時甚至五六十個，同時在空軍方面的損傷也維持一個相當的比例——每架飛機總要經過三次完全的損毀。

烏特萊博士又說：「所有對於思想危險份子的加害，過激派成羣的被捕，各種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改革派的被害，因爲掀起各種自由思想和所有改革日本破舊的政治主義的運動的緣故，沒有一個別的國家牠的革命運動是這樣熱烈的，而同時牠反抗的情緒又是這樣的廣佈而凶猛的。」當日本留意的觀察者看到了每處的困苦和激烈的不滿意的時候，對於廣泛的叛變運動，卻仍是很少預兆。一年之後，當日本的農工階級完全明瞭了劫掠中國對於財政上所生的犧牲的嚴重性的時候，日

（註）日本的，泥足弗蘭特，烏特萊作。倫敦，一九三六，第27頁

本將變成怎樣一個局面還留待發展。

日本在戰事第一年中所生產的較牠所消耗的更大，結果國民的生活費用大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同時工資仍是保持原狀，較諸滿州事變以前的工資數約摸減低了百分之十。當然有幾種戰時工業是例外的，在那裏技工的工資享受到相當的增加。但是，在全體講起來，對於一個早就在滿州國五年經濟計劃下喘息着的國家，這情形是滿含着政治的爆發性的。中國「友好」的熱情隨着戰事的延長一天天地減少下去。官員們想盡了方法以引起軍隊出征大陸的興趣。

但是，很明顯的，爲要達到目的，即使再有一年或二年更重大的犧牲，對於一般日本人民不易覺察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影響——他們正和爲生命爲祖國而作戰的中國人相反，一點沒有從敵人方面覺到什麼壓迫，卻祇從他們自己的統治者那裏感到痛苦——這是一個日本的領袖們思考着的煩惱的問題。甚至莊重的廣田外相也在五月裏認目前的情況爲「日本歷史上最嚴重的危機。」

日本的農民是在世界上最努力地開墾着的——甚至較中國的農民更甚。農事生產方面約到百分之九十的酬勞都是用來滿足債權人、地主和徵稅者的慾望的。日本一千五百萬成年農民中，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佃農或半佃農，他們的土地都是抵押給剝削者的，而他們是整年爲着大地主而工作着。他們中沒有幾個是夠吃的。日本的經濟專家很坦白的承認日本農業的退化幾乎已經到達了限度。許多家庭都面對着飢餓；他們沒有兒女可以出賣給工廠或妓館，而這種地方卻又每處都幾乎到達了飽和點。假使太鹵莽地強使了，新的艱難或許會使軍隊發生一次公開的叛變，這叛變的基礎是建築在低賤農民的效忠精神上，而且還滲入着俱有階級性的下等社會。



日本的軍閥，當你問他們這個新的負擔怎樣能支持下去的時候，往往模糊地說到「中產階級」，他們想這些人會「減低他們的生活費用」的。但是所謂日本的「中產階級」實際上還不如說牠是「中下階級」。這個封建制度和專權者的雜種，就是日本國家經濟的機構，不過是一個二十世紀的頭裝在十六世紀的腿上，並且這個畸形的矮子的「內臟」也沒有包括什麼，不過是天皇的崇拜和警衛的權力而已。

所有半數以上的日本財政資本都在四個人的控制之下。所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本投資事業和工業都可說是給不到一打的王室家族所控制着。在這些家族中，每個家族中都有幾個人，他們的私人歲入平均在二三百萬日元之間。岩崎住友安田和三井都是很好的例子。三井男爵新近的收入竟達四百萬日元，並且在這次戰時工業的澎湃中，很可能的將加倍他的收入。但是在這樣一個大資本家和極端貧窮的羣衆之間，「中產階級」幾乎是可忽略的。在日本，這個可驚的財富的集中，在下面的事實中反映了出來。不到百分之二的日本人是足夠付他們的所得稅的——雖然免稅律的免稅額是定在一千日元，或者說就是較美國新經濟政策所規定的私人收入免稅額減少三分之一，但是日本人民，如果他們要以暴力來反抗的時候，將發現他們的警察都已經準備好了。因為動員法如果激起了什麼反動，牠也規定了鎮壓的方法。在牠的條款之下，政府爲了任何必需的原因，可以「徵發」所有帝國的任何物件，這樣便結束了一切私人的自由。軍部可以（在實際上）培植、控制，或鎮壓所有的「國家思想」和各種地方的或國家的組織，結社，或出版物。牠可以規定房租、物價和工資。牠能禁止罷工。如果牠需要的時候，牠可以告訴那些日本人消費多少在柴米上，他可憐的積蓄中

又有多少須投資到「赤字公債」上。牠可以直接管理所有公衆言論，調查和教育機關，包括政治科學，以及各學校各社團和各工廠的社會訓練。

在這種情形下反動麼？這祇是在軍隊本身某幾個部分的直接領導下是可以想像的。他們必須同時反抗警權和他們自己的高級官長。但是正因為所有日本的權貴都集中在軍隊裏，和天皇所共享的神性裏，所以任何大規模的軍事叛背將以爆裂的速度擊破整個的社會政治生命。並且甚至不需要一個大規模的叛變。

沒有利用機會這些軍官們早就運用了他們動員特權的大部。他們沒有忘記了一個偉大的理由，為什麼他們被迫着和中國掀起戰事。在一九三七年春天上一屆的自由選舉中給日本人民所拒絕了之後，政府中的軍事獨裁者，現在是凱旋者，排斥了所有那些反對他們「強化中國政策」的分子。自從去年七月以來，幾千個反法西斯主義和反戰份子，都被捕入獄，幾百種刊物都被壓制，所有對於最後軍權獨霸的嚴峻批評都被毀滅了，牠們的發言人也被問罪了。

國會中的勞工黨，甚至那些支持戰爭的，都被壓制了。去年十二月裏，政府在一天內逮捕了五百個日本農工黨和社會黨的行政人員，包括許多有名的編輯，作家，教授和科學家。同時牠又破壞了所有國內的農工團體。據可靠的外國觀察家報告，在日本和高麗至少有二萬名政治犯，其中有許多是征役的逃避者。或許是更顯要的，有幾次小的叛亂和兵變竟在中國服役的軍隊中發現。在負有重要職務的兵士中不時發現自殺者，尤其是在侵掠軍中。自從徐州會戰以來，日本共產黨的騷擾在軍隊中漸漸的變成嚴重起來。（註）

但是在全部講起來，日軍傳統的良好紀律直到華北戰事緊張，日軍在台兒莊大敗之前，還是不能說有什麼脆弱的預兆。在最初的幾次戰事中，中國發現要活捉任何日本兵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全體都願作戰到底甚至情願自殺，卻不願投降。這是因為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為日本軍隊中的反華宣傳，他方面因為日本軍官在表面上所承認的規律，任何被俘虜的日兵，假使他們回到了自己部隊裏的時候，將被作最後的槍殺。

這樣的作用首先在山西省失去了牠們的效率。在那裏，紅軍選出幾個日本的俘虜，很好的待遇他們，給他們反日宣傳的麻醉，不久就讓他們用日文來寫成文章，用飛機來散發給他們戰爭中的伙伴。這是一個很有力的方法，不久中國軍隊中就都普遍地用着這方法。因為祇要日本的農民主兵們一被說服了，當他們被俘虜時他們不會給中國士兵拷問或是吃掉了他們的心——像日本軍官所告訴他們的一樣——卻將文明而優逸地待遇着時，他們效死的熱誠將因時間，思鄉病，以及厭戰的心理所大大的減低。這種戰事全部缺少了一種急需的動力去激發高度的情緒，卻很容易給日本的氣質所降低。

但是正因為日本的軍隊現在已經深深地覺察了在中國發生長期戰的嚴重的潛勢力，正因為牠發現了，甚致一個國會的議員，在不久以前竟敢公開地說「人民的忍耐也有一個相當的限度」

(註) 四個日本的共產黨帶着大量的反戰宣傳品當五月裏的時候在上海租界內被捕。當時據報告說，有許多

日本士兵都被牽入。

所以軍部才在她殖民地的主要地方留住了她動員法最嚴厲的實施——滿州、蒙古和在中國本部佔據的地方。這裏又是一個時間的競賽。

實際上，動員法所介紹給滿州的很少，祇僅僅把有組織的劫掠行爲合法化吧了。這種劫掠，自從滿州國成立以來，一直給陸軍特務隊在那裏行使着的。這裏軍部祇實施了於他們有利的幾件事。在補償他們的財產和生命權的被竊盜中，中國人民在事實上由他們的勞力組成了團體去支付日本「赤字公債」的本金和利息。這裏中國的「帝國庶民」在表面上並不比羅馬的奴隸享有更多的權利。對於日本有系統的劫掠他們的國家的「合作」其唯一促成和默認這種服從性的改變便是期望一個加速的租借。當然，「動員」的同樣複雜的方法便愈快愈好的應用到中國本部強佔的區域之內。

應付中國的問題於是便變成了日本能利用中國的富源到什麼程度來征服中國。

## 六 中國戰略的展望

中國的抗戰能夠把日本操縱中國勞工、原料、富源、市場、和強佔區域內的征稅權的事實阻止到多久？足夠把遠征的主要負擔阻止牠從日本民衆的身上轉移到中國民衆的身上多久呢？

報酬漸減律的法則或許可以在這裏應用着。依據戰事的延長性和擴大性的比例說起來，這次事變將逐漸的變成對於日本不利；同時日本民衆所負擔的一份戰費也將比她從中國人身上搜括去的漸漸的變大。後者的現象將不會減低，却將更尖銳化，假使日軍繼續在刻毒的中國人身上實

施她真正的奴隸化——他們中的大部份當人力的缺乏嚴重時，或許都會被送到日本去幫助那裏工廠中的工作，尤其是假使有一個第三者捲入了戰爭的漩渦的時候。

總括看起來，中國戰略的初步工作將是這樣：使用所有的方法去延長這次戰事，不時在面積上擴大牠的範圍和參加的人數；到處使人民在革命的鬪爭中產生政治的組織以延遲日本軍隊的佔據，利用聯合的運動戰和陣地戰，阻止任何日軍的前方，側翼和後方的關閉；在每一處阻止敵人在中國建立經濟上自給自足的基础。由於強迫日軍從他們自己有限的後備隊和國內的根據地中大量的抽調，由於強迫他們用最長的時間在大陸上展開一枝最大的軍隊，由於這枝軍隊不斷的困擾，使牠們地位在各方面都是浪費的，挫敗的並且是困憊的，這個戰略的樞紐是在時間和空間的二個因子上。牠的目標並不是在正式的勝利，却不過是敵人軍紀的逐漸敗壞和最後忽略了她所有的勝利。

這是中國唯一可以應用的健全的戰略，因為牠包含着中國對於日本僅有的二個自然優越點的充分利用：她人口的衆多和不易制服的內地的廣大。人類的痛苦所表演的無論是怎樣的淒慘，但這是歷史對於每個自由民族得到自由所要求的代價。中國必須付這些代價——否則便會淪入不可估價的奴役中。

這樣一種戰略當然可以預料到日本海軍最後會佔據所有中國沿海的城市，並且隔斷她所有沿海的國外貿易。這就是說：中國到最後或許會被逼着運用她自己的資源，在英勇的抗戰中和日本競爭。這完全是可以想像的，在這樣一次競爭中，日本將是第一個爆發者——假使她也是祇限於應用她自己的資源。但是在中國一方面還有阻礙。

繼續和所有的列強進行着正常的貿易關係，聲稱要在沒有宣戰的條件下封鎖中國的海岸，阻止中國所有的船隻往來，日本便可以在牠佔據了中國最後的港口很久以後，從外洋更補足她軍火、煤油、鐵條、鋼和別種有用原料的貧弱的倉庫。不但她能毫無限制的從我們這裏購進所有她所急需的戰時原料，不但她能在國內的港口維持着平時的貿易關係，沒有了這種關係她會立刻遇到崩潰的，並且她還能在日軍強佔的中國城市內和列強進行交易。

一個孤立的中國能夠戰勝一個孤立的日本，一個孤立的中國也能戰勝一個在軍事上受她同盟國德意幫助的日本。但這是十分懷疑的，一個孤立的中國不能夠戰勝一個受全世界幫助的日本——用很實際的方法來幫助她：供給日本所需要的一切遠征的用具，並且不但繼續購買她從自己的口岸出口的貨物，並且還購買他從日本海陸軍控制下的中國海口所出口的貨物，這樣便更供給了她購買這些工具的款項。

但是即使是在這樣驚人的不利的條件下，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仍是信仰着最後的勝利——假定一件事物。假定民主國家或他們的國家機關至少不會直接或間接地用公開或密祕的信用貸款的方式來幫助日本侵略的財政。假使這些事情實現了——在某種程度下這早已是實際的了——同時假使沒有一個第三者的列強加入到中國這一方面來，那麼，日本或許仍舊能夠避免她國內的經濟禍害，並且最後造成征服中國大部的事實。

此後，假定給予十年的時間去開拓他們的戰利品，給予西方人民的繼續不斷的幫助，（這西方人還是高興地以為這些是無關他們的痛癢的）日本的軍閥於是便會造成一枝足以破壞全世界

去。的海陸軍，包括他們自己——和大量輕蔑的白種人，這些人在目前正給日本人從中國境內驅逐出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3 1211B

# 長 征 25000 里

(中國的紅星)

實 價

外 埠 酌 加 郵 費

---

版 權 所 有 · 不 許 翻 印

---

著 者 斯 諾

譯 者

趙一平 王念龍  
顧水筆 祝鳳池 合譯  
史家康 張其章

發 行 者 啓 明 書 局

四馬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八 月 新 四 版



